刘文彩

真相

刘文彩腐朽生活的真真假假
刘氏家族百般罪恶的再调查

刘文辉
凌姨太
梁姨太
管家
刘文彩

笑蜀／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说的
历史的
刘文彩

图书代号：ZH154700

刘文彩真相

笑　蜀　著

责任编辑：周　宏

装帧设计：北京友谊广告责任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613—1974—6/K · 108

定　　价：25.00 元

目录

序篇 “侏罗纪公园”的诞生

上篇 乱世春梦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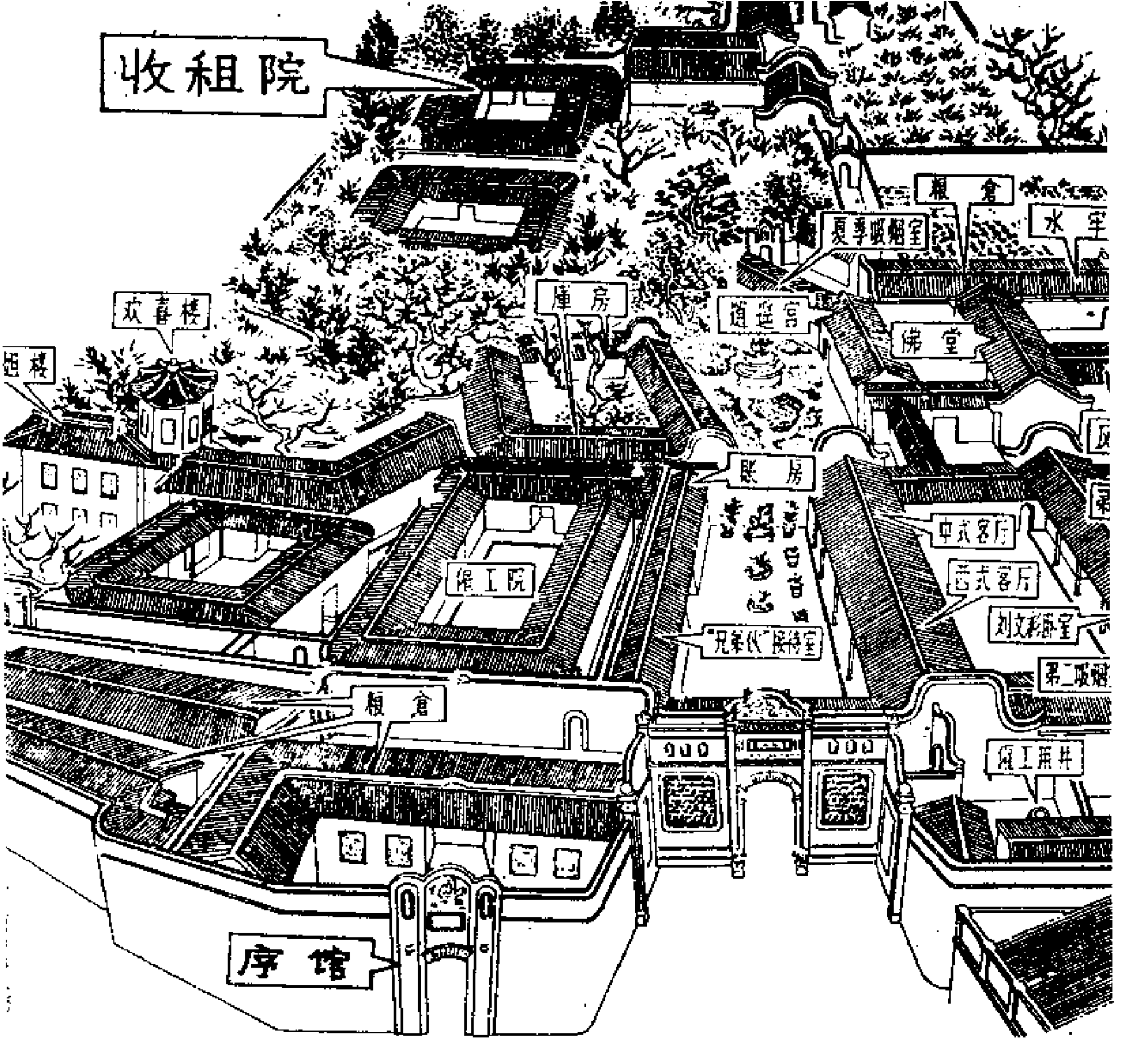
序篇

侏罗纪公园的诞生

第一章

发　现　刘　文　彩





1. 文革中的刘文彩庄园陈列馆
2. 馆藏刘文彩照片
3. 现大邑县刘氏庄园博物馆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着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

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不翼而飞，一直踪影皆无。

九泉之下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 1958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

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

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5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镯，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〇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

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着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

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

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蹭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

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同意，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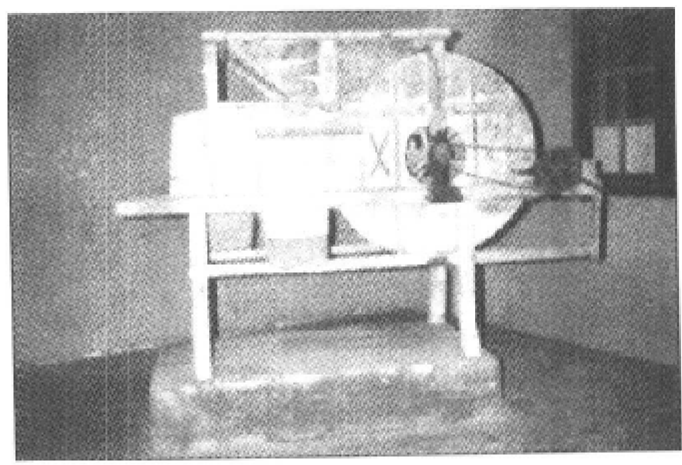
29 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 11 月 8 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出来。

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1. 庄园一角
2. 传说中刘文彩使用过的风谷机
3. 60 年代初庄园陈列馆创作的 17 尊蜡铸模型之一

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

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着，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
>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

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 67 宗 A38 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 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处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 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

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
>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 A37 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 1948 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像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

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着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狗做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人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二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例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

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着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
> 1946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于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

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80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很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着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

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像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

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 67 宗 G1 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 1961 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

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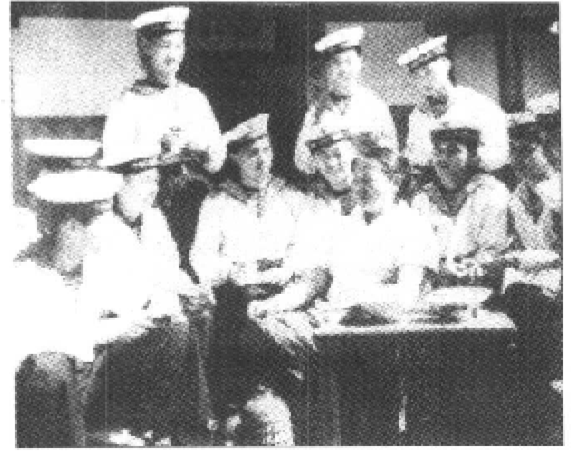
“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

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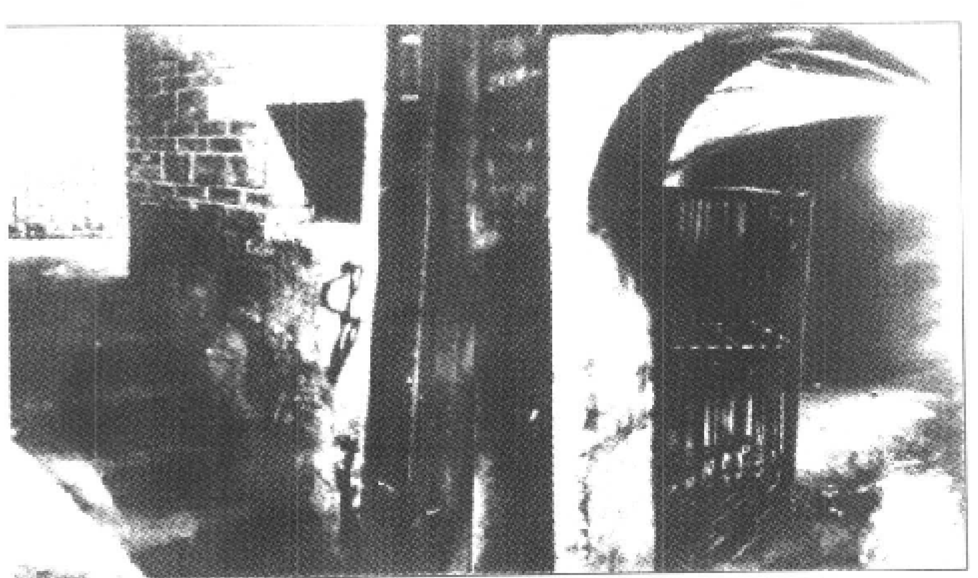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一万七千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



第三章

“水牢”传奇

1. 冷妈妈忆苦思甜
2. 水牢
3. 庄园一角



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二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
>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
>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承，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
>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

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50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50年代而是60、70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着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50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

为她在50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50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

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

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竞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

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6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着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着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着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

刘文彩真相

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着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哀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账。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着：“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

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着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掀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凼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着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栅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着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着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着石壁坐着，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着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着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刹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

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着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着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着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着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着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 1977 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 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

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过了三年，她就去世了，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惟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惟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

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60、70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 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 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 “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 “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

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

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着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

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 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 冷月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惟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着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 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

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只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账，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咤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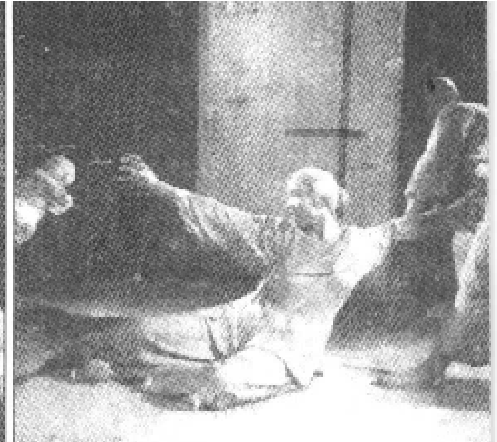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着"坐老虎凳"、"背火背篼"、"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

监狱）。于是，随着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着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第四章

千古绝唱《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




徜徉在一百多尊泥塑雕像组成的"黄色"人流之间，贵宾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兴致越来越浓……

1964年改馆给庄园陈列馆带来了空前繁荣。从开馆到1962年三年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共六十二万人次，而在第二次改馆之后，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每天都有数万之众，三五个月的游客量就超过前三年游客量的总和。陈列馆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许多游客踩落了鞋子、挤坏了挎包、碰掉了眼镜，仍兴致盎然地流连忘返。白天的时间不够用，陈列馆就昼夜开展，一到晚上，几盏特制的探照灯把展厅照得雪亮雪亮。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也被惊动了，挎着照相机三三两两地结队而来，让当地人大开眼界。

与此同时，小册子《地主庄园陈列馆》公开发行，发行量达十万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并发表了评点这部片子的专题文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

庄园陈列馆如日中天。

面对空前繁荣，主管部门固然有一种成就感，但更多的还是危机感、紧迫感。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布七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就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文件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其中有"四类分子"的反攻倒算、伺机破坏；社会上新出现的投机倒把、放高利贷等现象。文件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

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成了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动员令。1963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央又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规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农村贫下中农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领导，其中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内容。“后十条”同时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阶级斗争正式确定为党的工作重心。

阶级斗争形势一日千里。形势逼人，形势就像汹涌的洪水在屁股后面追着跑。除了比洪水跑得更快，没有别的办法。

刚刚取得改馆成功的庄园陈列馆，不敢故步自封，必须开始新的冲击。便有了大型泥塑《收租院》。

1964 年秋，庄园陈列馆负责人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交租情景的建议，在得到温江地委宣传部认可

后，即派出调查组，到当地农村访贫问苦，收集素材。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庄园美工初步形成了创作《收租院》的构思。1965年5月，陈列馆一方面致函四川美术学院党委，请求技术支援；一方面将《收租院》陈列计划方案报送省文化局审批。5月28日，陈列馆又函请省文化局火速调配创作人员。省文化局特事特办，调派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四川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组成《收租院》创作组。一干人马于6月初开到安仁。

人员调配特事特办，其他方面概莫能外。创作《收租院》一经定案，就被当作四川文化界的头号重点工程，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稍有差池就是政治事件，谁敢掉以轻心？也就是说，创作《收租院》所享受的礼遇，是庄园陈列馆开馆以来所有展览设计中规格最高的一次。

和制作蜡铸模型、《百罪图》、“水牢”的指导思想一样，创作《收租院》的指导思想也是“阶级斗争为纲”。区别在于，无论是蜡铸模型、《百罪图》还是“水牢”，虽然其内容大多出于后人加工，但仍号称“史实”。即便是纯粹的虚构，也要煞费苦心地掩饰其虚构内幕，而以“真人真事”名义展现出来。换句话说，内容上“真人真事不必要”，形式上却是非“真人真事”不可。《收租院》不然，虽然主管部门也不承认《收租院》的内容不可信，但毕竟承认它是艺术作品，作为艺术作品，它可以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夸张、虚构等等，为它的主题服务。也就是说，《收租院》中的刘文彩，是艺术化的“刘文彩”，而不是历史中的刘文彩，人们犯不上和它较真。它没有也不需要“史实”作

面具。另一个区别在于创作宗旨的差异。《收租院》的创作宗旨也是“阶级斗争为纲”，但它上纲更高——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创作宗旨是：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的是一个收租院，想到的是整个旧社会。也就是说，《收租院》要代表整个旧中国。《收租院》主角刘文彩，自然也就是旧中国全部邪恶势力的象征。

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然后进行分段设计。每段从中心思想、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依靠集体力量。《收租院》114个人物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谁独立完成的。施工中，往往是这段我上大泥，你上细泥，而由第三个人来刻画形象。一段或一组塑像落成后，由整理小组作最后修改；无论作者是老师还是学生，其作品都要接受修改，以求得风格的统一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创作过程往往是一波三折。创作“风谷”塑像时，有个旁观者说看不出有风。创作组马上修改，通过老农在风谷机旁顶风而进的姿势和飘扬的衣襟来表现风。美院创作人员当模特，擅长做衣纹的民间艺人上衣服。衣服上起后，风感倒是有了，但衣服太过柔软，飘然潇洒，使那位老农看上去像个散仙。这当然不行，美院创作人员和民间艺人继续修改，加重衣服质地，“风谷”塑像这才过了关。塑像“拉壮丁”也是三易其稿才通过验收的。

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1965年国庆，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118米空间布满了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条伸着长舌的恶狗旁站着一个汉子，他头戴草帽，身

穿绸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里挎着驳壳枪。他的对面，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儿童替大人拉着鸡公车……灰色的人流向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去……

手拿念珠的刘文彩，硬说他面前的那位老大爷没交够租子，叫管账写了一张卖儿当壮丁的文书强迫老大爷按手印。老大爷不答应，刘文彩就一脚踢倒了老大爷，儿子见了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跟狗地主拼了！但寡不敌众，被国民党匪兵、袍哥打手一涌而上抓了起来，老大爷愤怒地指着刘文彩骂道："你这个吃人野兽，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逼得我无路可走。今天，凭着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爷，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妇也被地主抢走给活活地折磨死了，全靠小孙女服侍他过日子。小孙女就是他的命根子。老大爷倾其所有仍过不了验租关，刘文彩便硬逼着老大爷在一份卖身契上按了手印，上面写道："只因无力缴纳所欠刘家三斗租子，现将孙女儿抵押……"亲生骨肉就这样被刘文彩分离了。

这又是一家人的生离死别。他们把辛苦了一年打下的粮食全都缴了租子，刘文彩硬说他们没有按期缴纳，指使狗腿子、保长、乡丁把他们的家给抄了，就连切菜刀、饭锅都给抢走了，狗腿子还拉走了这孩子的爸爸去当壮丁，这孩子紧抱着爸爸的腿，哭喊着："爸爸呀！爸爸！你还能不能回家呀！"妈妈抱着不到满月的孩子，焦急的追了出来，狗腿子保长却一脚就把她踢倒在地……

一群拿着扁担的农民正要离开收租院。走在最后的一个壮年农民，忽然转过身，放下箩筐扁担，双手握拳，瞪着刘文彩，像要冲过去和他算账。一个青年农民抓起一把斧头，弓步俯身，双眼直视飞轮风骨机，恨不得砸碎这吃人的虎穴

狼窝。一个农民抡起扁担向着刘文彩正要冲过去，旁边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左手按住他的肩头，示意他不要蛮干。在这两人的前面有五个农民，走在最前头的较年轻，他左手提着扁担，右手握着拳头，迈着坚定的步子，像是下定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他的后面四人，有的边走边谈，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回头怒视，神态不同，但都紧跟着最前面的青年。

如果撇开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内涵，纯就艺术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还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当时的政治宣传品普遍存在“假、大、空”，“直、粗、浅”等通病，《收租院》在艺术上精致得多，必然从一大堆简直就是文化垃圾的宣传品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事实上，《收租院》尚未定稿，就已经引起了高层的热切关注。1965年9月的一天，作者们正在收租院现场进行最后一道泥塑改工，便有一群贵宾不期而至。经介绍，作者们才知道，来宾中为首的两位，一个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编委兼副刊主编华君武，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美学家王朝闻。陪同他俩的则是四川省美协主席、版画家李少君。作者们莫不喜出望外，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三位来宾充当“导游”。徜徉在一百多尊泥塑雕像组成的“黄色”人流之间，华君武等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兴致越来越浓。休息时刚在藤椅上落座，华君武就代表他所在的《人民日报》拍了板，说：“很成功，很成功！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雕塑方面的创新，值得向全国宣传。”又说：“这种宣传不是一般性的点点滴滴的新闻报道，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深入地宣传，来一个‘万炮齐发’。”“我在《人民日报》管‘半边天’。这次我来当‘托拉斯’，你们有关《收租院》的稿件只能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能给其它报刊。”

果然，华君武返回北京不久，《人民日报》就在显要位置刊登了欢呼大型泥塑《收租院》创作成功的文章。《文艺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美术报》、《中国青年》、《四川文学》等大报大刊随即响应，由此引发了“万炮齐发”的强大宣传攻势。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华君武发表在1965年第11期《文艺报》上的文章——《雕塑界的大革命》。自此以后，“雕塑界的大革命”便成了艺术家、政治家评价《收租院》的口头禅。

继“水牢”之后，地主庄园陈列馆再度震惊全国。

康生见到《收租院》，首先击掌称赞：“塑得好！很好！这比巴黎卢佛宫的雕塑好得多！”并说：“这是一个创造，是雕塑艺术的一次大革命。”

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租院》的政治影响，主管部门决定，组织《收租院》进军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复制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翘首相盼的北京观众蜂拥而至，《收租院》热至此进入高潮。仅仅过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门票就已预定到1966年2月底，以致于官方不得不于1966年1月初暂停团体预订。2月21日重新开始团体预订，当天就来了一千多个单位。只给这一千多个单位发号登记，就登记了一个星期。虽然从第201号起，限制每个单位的团体票不能超过二百人，也一直登记到9月份。以后再来登记的单位均没有时间安排，令他们大失所望。团体票人数过多，个人售票不能不相应压缩。星期日售个人票，许多工厂、机关就在星期六下午派人来排队，等着买次

日早上9点发售的个人票。他们轮换值班，排一整夜的队。馆方常常通过扩音器向排队购票的观众宣布个人票限额发售办法，劝没有希望购到当日门票的队伍后面的观众离去，以后再来。但排在后面的观众仍然固执地原地守候。馆方后来总结说，这种情况“是举办任何一次美术展览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发的“《收租院》泥塑群像展览反映简报”则称，“《收租院》泥塑自展出以来。到3月6日为止，共接待观众47.35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在两百万左右”。“观众的迫切需要和展览厅所能容纳的人数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业务上也将美协、美术馆大批人力卷了进去，造成的压力很大”。

轰动北京，实则是轰动权力核心。还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收租院》群像之前，就已经有一批高级干部闻风而至，先睹为快。12月18日，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前来参观，他大发感慨：“这个展览很好，是雕塑的一个大革命。不知道你们做的泥塑能保存多少年？辽代的泥塑至今还很完好，已经保存了一千年。应该好好研究传统泥塑的经验，把这样的作品长期保存下来。”这位著名的革命文豪还饱蘸激情，当场为泥塑《收租院》挥毫题诗：

> 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
> 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

12月19日，中国美术馆更是冠盖云集，前来一睹《收租院》风采的高级干部成群结队。

中宣部负责人周扬、林默涵来了。周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收租院》作者说：“我很赞成，很拥护，我要替你们宣传。你们为中国的雕塑打出了路子，这既是提

高，也是普及。”“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这批雕塑是有具体内容的，不像过去有些雕塑只反映抽象的反抗和压迫。你们做得很生动，很有情感。”周扬还询问了作者继承了哪些传统和四川民间艺人的情况，说：“《收租院》加上《反抗》部分很好，将来可以多搞些斗争题材，搞些革命历史题材。”“没有文物价值的庙宇可以改造，可以利用；我看岳庙就没有什么价值。”“搞村史很好，大有可为。天津《三条石》资本主义剥削很残酷，也可以搞，这是一件大事。我看将来雕塑家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搞，像《红灯记》一样去推广。《收租院》搞的是解放前的生活，以后还要多搞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的英雄人物。”陪同的四川省美协主席李少言插话：“将来可以利用这些人物作为美术院校的教具。”周扬说：“对！将来可以不画希腊鼻子了！”周扬还兴奋地说：“除年画、连环画外，也要雕塑，也要幻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涌现千万个美术工作者。我过去总觉得中国雕塑落后，而且不易普及，现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大将来了，他的讲话很有军人气质，他说：“方向对头。长征故事也可以塑成泥塑。旧泥塑也有群像，罗汉就塑得很多，但你们是新内容，比罗汉好多了。祝贺你们的成功！”

正式展出前夜，即12月23日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来了。他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看到《过斗》部分母女抬箩筐的泥塑，邓拓说：“这一组最好！”当时，泥塑要不要上颜色美术界有争论，邓拓主张稍加一点淡彩，做成比较旧的沉着些的色调，而反对用鲜艳的颜色。最后，他建议作者再创作一些反映工农现代生活题材的泥塑。

《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后，党政高层人士继

续纷至沓来。

12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参观了《收租院》。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参观了《收租院》。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参观了《收租院》。彭真对《收租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一进门就对《收租院》作者说："我看了你们的《简报》，群众反映这样强烈，我主要是来向你们祝贺的！"他评价说："这真正是民族化的创造，是多快好省的好办法。我国最早的雕塑和绘画都产生在民间，泥塑更是民间的艺术。这次你们使它与西洋的结合起来了，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很好！道路走对了。今后雕、塑、画都应该与民间传统结合起来，与西洋的好东西结合起来。"接下来，《收租院》作者向彭真汇报了四川美术家如何"深入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情况后，彭真说："不下去就出不来这么好的东西。艺术作品也不能一接触生活就出东西，必须有较长的时间深入生活。地方上为什么比北京好一些？甘肃为什么能搞出来《向阳川》？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下边。省里的同志和工农群众更接近一些，更熟悉一些，这一点很重要。"彭真将《白毛女》和《收租院》并列为反映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最好的作品。他提出一个观点："反映地主阶级压迫的作品有了一些了，但反映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作品还很缺。应该搞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剥削的东西。开始可以从小说、戏剧方面找材料，也要搞调查研究，先把情况摸清楚。这些事要抓紧办，过多少年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他并借题发挥，便有了以下一段长篇大论：

"现在国家是无产阶级当家。社会主义的舞台谁来当家？美术谁来当家？哲学界、史学界谁来当家？整个教育界

谁来当家？难道这些都让别人当家么？上层建筑一定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艺术过去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过去有一些民间文艺，对地主阶级压迫也只表现了一点挖苦。农民当时文化水平低，只在民间故事、传说中有些反映，也只流露出一些不满罢了。”“《红楼梦》也是把封建、奴隶主美化了的。当然也揭露了一些封建的残酷剥削，揭露了一些当时社会的黑暗。如当门子的小和尚就说出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内幕。王夫人手里就断送过几条人命，可是在京戏里是作为正面人物以青衣出场的。民间传说中，海龙王最富，《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比龙王还富，龙王还要向王家借白玉床。……研究红学的人不注意阶级分析，搞艺术、美术不注意阶级关系是不行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关系很多，最根本的关系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为什么要搞哲学，搞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搞阶级关系。过去的文艺作品把地主美化了，把农民丑化了。现在你们也没有故意把地主丑化，只是还他以本来面目，只是把他们脸上的胭脂、粉洗去了！把他们身上的画皮剥去了！这就是让历史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在贯彻方向上，你们打开了突破口，开辟了一条道路。就是要这样搞下去！几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成就。这个问题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没有解决。”

彭真这些话，大概是有意说给别人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与毛泽东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彭真对这些当然不会没有觉察，因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参观《收租院》大概被他当作表态拥护毛泽东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绝好场合，于是乎谈性大发。

时为中共意识形态主管之一的康生，在艺术上还算是一个行家，对《收租院》在政治上高度评价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他首先击掌称赞："塑得好！很

好！这比巴黎卢佛宫的雕塑好得多！”并说：“这是一个创造，是雕塑艺术的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胜利，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大学毛主席著作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向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这是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用泥塑不但可以反映阶级斗争，也可以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昨天我看了《北京农业大跃进》这部电影，南韩继大队怎样改造自然就很有意义。可以搞大寨、搞大庆等先进集体的事迹。我们新社会题材很多，天地很广阔，你们这次开头开得很好，我看可以大大普及。两面都搞：一面搞反映阶级斗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搞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搞新人新事，新的精神面貌。”康生很细致地对比了复制品和原作的照片，认为有的不如原作好（如大狼狗），有的则超过了原作（如推车老人、背口袋老人、抬筐的小女孩等）。原作在风谷机前的谷子中有许多草，康生看了照片大摇其头，说：“吹出来的谷子不应该有这么多草，农民不敢交这样的谷子，这是一个漏洞。”原作带孝寡妇，康生认为塑得“有些像男人”，建议“最好再改一改”。抄家部分，母亲把小孩丢在地下，康生觉得不大合理，建议修改或把小孩去掉。

泥塑要不要上彩？邓拓主张上淡彩，康生不同意，说：“还是不上颜色好。”但他认为保长头上的国民党党徽可以例外，“上一点颜色可能好一些”。他还看了正在制作的泥塑，指出：泥塑骨架上绑稻草不妥，在北方最好改用粗麻，因北方天气干燥，用稻草容易裂缝。他还建议：“《收租院》泥塑也可以烧成陶器，可以上釉，也可以不上釉。我看不上釉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在休息室，康生特别打听了《收租院》的宣传动态。

问：《人民画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对外发行的外文期刊是否都介绍过《收租院》？又说："《红旗》杂志也应该介绍一下，登一批照片，写一篇文章，文章要写得通俗一些，生动一些，多用群众的语汇，不要用学生腔。"坐在一旁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赶紧响应："专业用语也要少一些。"

康生对《收租院》固然非常关爱，他的夫人曹轶欧则比他的热情更高，曹轶欧看了一次不足意，很快去看了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她都要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但她远远不具备她老公那样的艺术鉴赏力，对《收租院》也就不可能从艺术角度去品评而只会抛售政治术语。庄园陈列馆档案也保存着她当年的一些高论："这些泥塑真实感很强，政治和艺术结合得很好，所以才这么感动人。""这是一个进行阶级教育的课堂，国内可以宣传，对国外也可以宣传。如果能到各地去展览一下才好，恐怕运输不大方便。""用这种方式反映阶级斗争很合适，也可以搞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嘛，也可以搞党领导的各种斗争嘛！这确实是个很大的创造和革新。""搞艺术的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你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这是很对的。你们打破了许多框框，这都很了不起，这是一次雕塑的革命。"

创作《收租院》的本意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路线，它的功能因此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美学的。政治家们去观赏《收租院》，当然也就不会是去消闲，去附庸风雅。对《收租院》态度如何，在文革前夜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坛正在发生大分化、大组合，政治家们需要一定的场合来亮相、来表白，来说明自己的抉择。《收租院》展览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

场合。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亮色逊于他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调门低于他人，于是无论主观感受如何，都得对《收租院》大唱赞歌，而且要比别人唱得动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人后。领导人对《收租院》的表态成了赞歌大联唱，大赛唱。《收租院》就在大联唱、大赛唱不断高涨的声浪中冉冉上升，直逼云霄，成了中国文艺界的霸主。

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历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的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不共戴天之敌蒋介石也不过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偏远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土老冒，却可以压倒历代枭雄，雄踞中国三千年罪魁榜首。

偌大一个中国，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的当代文艺作品，除了江青势力范围内的“样板戏”，就只剩一个《收租院》。《收租院》便从此打上了“钦定”的印记，与江青的样板戏平分秋色。

北京《收租院》的观众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殊照顾的观众”，一类是普通观众。所谓“特殊照顾的观众”首推党政军领导人，其次是各界名流，如全国劳动模范、文革时被破格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李素文，全国劳动模范、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作家魏巍等。再次则为外宾。中苏论战后，因为昔日的“老大哥”苏联已蜕变为“苏

修”，中国理所当然地晋升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世界人民昂首阔步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北京就仿佛是红色“麦加”，国际上一大批左倾人士来这里“朝圣”。《收租院》刚刚进京，就被当作对毛主席的洋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基地。1965 年 11 月 22 日，《收租院》尚在复制之中，日本青年关东代表团就来参观了。团员石崎泉是个画家，也擅长雕塑。她详细询问了制作《收租院》的全过程，拍了许多照片。她说："看了你们的美术，我知道了回去之后应该怎样工作。这些作品使我非常吃惊，简直不可想象！你们塑这些像竟没有使用模特儿，我做一个头像也要用模特儿。日本的美院学四年，四年都是做模特儿。你们这样搞集体创作，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曾自动组织起来集体创作，做到中途打一架就散了，因为日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美术家的生活也没有保障，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这样做。”日本摄影家代表团、日本美术家代表团也参观了《收租院》泥塑展。日本美术家代表团的反映尤其强烈，12 月 22 日晚中国美协设宴招待他们，主持人刚刚介绍李少言是四川美协主席、此次为《收租院》展览筹备事宜来京，会场上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收租院》泥塑成了整个宴会的主题，李少言则成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团长鹤田吾郎希望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一整天的时间，他要把所有塑像都画下来。他说："我去过许多国家，这样的塑像，世界各国都没有，只有中国才有。只是为了看这个展览到北京来也值得！”他还向《收租院》作者要了一些做泥塑用的土、棉花和稻草留作纪念。大概是比邻而居的缘故，前来参观的日本人特别多。除了文化界人士之外，工业界、政治界人士都有。与文化界人士对《收租院》有节制的评价相反，其他方面的人士对《收租院》评价很高。日本

工业界人士玖村芳男说："今天看了许多美术展览，其中我特别喜欢四川大邑的泥塑。日本的美术和中国的美术相比较，我对中国美术的兴趣更大。"他还告诉接待人员："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收租院》泥塑照片，已剪下来寄回了日本。这是很好的阶级教育，希望介绍到日本去。"随同参观的日本客人东卯助表示希望通过《人民中国》杂志，把《收租院》介绍给全世界。日本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公一和夫人观赏《收租院》群像时，展厅里发生了一点波动。一机部四局一个叫罗俊英的女干部看了老大爷卖孙女的泥塑，只说一句"和我一样！"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号啕痛哭起来。大家赶紧扶她到休息室，她已走不动路了。西园寺公一夫妇目睹了这件事的全过程，触动很大。他对陪同人员说："我非常感动！这是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材料，艺术上也很成功。可惜我不能看到全部的泥塑原作。你们的艺术具有惊人的感动人的力量，刚才那位女士大哭，就证明你们艺术的感人力量是多么大。"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意义上比邻，远在天涯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则在心理意义上与中国比邻。阿尔巴尼亚方面派《人民之声》记者贝特莱拉到《收租院》展览现场采访，贝特莱拉看了之后说："很好！这不仅是雕塑界的大创举，也是革命工作的一件大好事。这个展览会是教育青年的一个很好的学校，使青年们知道过去的生活，在今天更好地工作和学习。"

《收租院》在京展出时，适逢印尼新闻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闻讯赶到中国美术馆。团员蒂都特女士参观时始终非常激动，直至涕泪滂沱。她抽泣着说："看了这个展览，就想到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也有可能被出卖做人家的童养媳。那个地主刘文彩早死了，太便宜了他！应该让人民斗

争他，一片一片地割他的肉来泄恨！”团员拉斯基德则热情赞扬：“展览会的水平很高，符合艾地同志所说的评价文艺作品的两项标准——政治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品完全达到了所要求的水平，给人民的教育意义很大。”团员罗恩唐女士气愤地说：“地主剥削太厉害了！决不能容许这样的地主存在，一定要打倒！”这时别的几个团员小声议论起来，有的说：“这是中国的情况。咱们国家没这么大的地主。”有的不以为然：“中国有，咱们国家也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智利画家、亚太和会副秘书长万徒勒里，叙利亚记者阿布库斯，澳大利亚《前锋》报记者罗素夫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巴西专家马尔丁斯，《北京周报》社智利专家埃尔南·佩拉尔塔等外宾在参观《收租院》时都从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万徒勒里对《收租院》作者说：“你们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这一点你们已经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罗素夫人一边看一边大叫“黑暗！”“黑暗！”马尔丁斯则夸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在艺术上虽然很好，但都是宗教内容；你们在艺术上和它一样好，却有更好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你们已经超过了他们。”阿布库斯也表示：“看这个展览比读一千本书、一万本书的收获还要大。”埃尔南·佩拉尔塔在回到宿舍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参观时作者不在场，未能向作者当面致谢，因而引以为憾。便半夜披衣起床，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周报》领导的信。信中赞扬《收租院》“把卓绝的社会意义、教育意义与难以形容的艺术性结合在一起”。请《北京周报》领导“向作者转达一个拉丁美洲人的热烈祝贺和感谢：祝贺并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艺术做出了贡献”。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外宾都认为《收租院》真的就是白璧了。日本美术家和平会议国际交流部部长西常雄就很客气地讲过：“这些塑像如果在日本展出，可能有人觉得艺术水平低一点。但它的内容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完全可以弥补艺术方面的不足。”换句话说，《收租院》的轰动效应主要是因为它的社会政治内涵，而并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说西常雄的评论颇为圆滑的话，“初生牛犊”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越南留学生阮秦亨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了。他在和同学们议论《收租院》时提了如下三点意见：

1. 这批雕塑是作者以先进的思想反映过去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在创作中注意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方法，在继承和革新方面作出了成绩。作品在阶级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得到领导和群众的帮助，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但四川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原作，可能比北京的部分复制品有更大的教育作用。

2. 美术界过去还没有过受到如此重视的大事，不知是否有些过分了？虽然这批雕塑创造了很好的经验，但它们所表现的还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解决雕塑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更需要大力解决。根据我看到的一些材料，似乎说《收租院》泥塑的经验解决了一切问题，没有提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这是否合适呢？

3. 泥土本身的颜色还嫌太浅，在艺术上给人们一种不完整的感觉。讲解员在栏内讲解，留下许多脚印，也很不好看。

其实，即便是在国内，《收租院》在艺术上的“顶峰”地位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质疑。《文艺报》一篇文章就说：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组泥塑的群像中，我以为某些反面人物的刻画还是不成功的。有些人物如刘文彩和账房先生，有点像文明戏里的人物，形象刻画过于夸张，近乎滑稽。这就削弱了使人们对这些吃人野兽的本质的真正认识……”但这样的声音是太微弱了，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铺天盖地的颂歌很快就将它们淹没，连一点泡沫都不留下。

《收租院》展出轰动权力核心，最终得到最高决策者的认可。

北京展出尚未结束的1966年2月2日，“旗手”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一个特殊的座谈会——只有她一个人谈的“座谈会”。她向到会的几位军队文艺工作者唠叨了整整十八天。谈话记录稿经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前前后后改了八次，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又亲自反复修改。4月1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引起一场剧烈震荡——“政治新星”江青开始崛起于中国政坛。

这份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的红头文件，有这么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话：

>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

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偌大一个中国，得到肯定的当代文艺作品除了江青势力范围内的"样板戏"，就只剩一个《收租院》。也就是说，《收租院》是惟一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的江青势力范围之外的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收租院》便从此打上了"钦定"的印记，而与江青的八个"样板戏"平分秋色。

《收租院》主角刘文彩之为中国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中国头号政治恐龙的身份，也就是"钦定"的了。

从1966年3月2日起，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泥塑《收租院》照片发行全国。上海市美术工厂并根据泥塑《收租院》的主要情节印制了丝漆"《收租院》阶级教育图片"。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及上海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杭州市阶级教育展览馆、长沙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沈阳故宫阶级教育展览馆相继印行《收租院》画册和连环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收租院》纪录片在全国上映。和"水牢"故事一样，《收租院》也写进了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并开始走向世界——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出版《收租院》画册。《中国文学（英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中国建设（英文版）》都对《收租院》作了专题报道。1968年，《收租院》更远渡重洋，赴阿尔巴尼亚展出。越南河内也曾以隆重礼节迎候《收租院》的光临。

重洋可以远渡，巡游近在咫尺的兄弟省市，自然不在话

下。北京展出《收租院》复制品后，其他中心城市竞相仿效，《收租院》在全国开花结果。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南京、南通、杭州、太原、沈阳都展出了《收租院》复制品。文革期间，泥塑《收租院》更是红得发紫——《收租院》的创作本来与江青无关，但在文革中，却干脆把《收租院》和样板戏一起归属于江青的旗下。沈阳故宫博物馆编写的《收租院》序馆前言称：

> 泥塑《收租院》，是遵循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创作出来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雕塑艺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上海市阶级教育展览馆《收租院》解说词称：

> 革命泥塑《收租院》是江青同志所肯定的革命雕塑作品，她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产物，是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革命创举。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文艺工作者，在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对四川省原制的泥塑《收租院》又作了三次重大修改和创作，使她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似此，《收租院》就不仅是钦定，而且简直就是“御制”了。

本来草胎泥身的《收租院》，就这样被赋予“神性”，在腾腾烟霭中领受无数善男信女的虔诚膜拜。对它稍有冒犯

便是亵渎天条。当《收租院》部分复制品在京展出时，鲁迅艺术学院雕塑系学员参观后有过一番议论：不能跟在四川屁股后面跑，我们不要做泥塑，做出了也不是创造而是模仿；我们还是要通过做纪念碑的雕塑来创造。这番议论对《收租院》并无不恭，辽宁美协一位负责人听了却大不高兴，断言“这实际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反映”。文革初期，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把地主庄园陈列馆闹了个天翻地覆，对《收租院》却一根毫毛也不敢动。

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一代“拳头产品”；靠着这批“拳头产品”，地主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水牢”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二代“拳头产品”，靠着“水牢”，地主庄园陈列馆誉满全国。《收租院》则是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三代“拳头产品”，靠着《收租院》，地主庄园陈列馆终于博得最高决策者的青睐，并开始“走向世界”。进入文革之后，庄园陈列馆绝大多数陈列内容都被打成妖魔鬼怪，只有“水牢”和《收租院》才符合极左政治的标尺而得以生存下来。“水牢”和《收租院》便构成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两大奇峰——一个是“史实”方面的奇峰，一个是“艺术”方面的奇峰。两大奇峰并列，作为主角的刘文彩也就成了举国瞩目并享有“世界声望”的中国头号历史名人。

曾经有一所学校在庄园陈列馆组织忆苦思甜报告会，邀请了许多记者参加。会上，某报记者与一个五年级学生之间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问：“什么是地主阶级？”

答：“刘文彩。”

问：“什么叫剥削和压迫？”

答：“刘文彩就是剥削和压迫。”

问："为什么解放前会出现刘文彩？"

答："因为他有钱。"

问："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社会又是为什么？"

答："为了打倒刘文彩……。"

地主阶级、剥削、压迫、旧社会……刘文彩成了这一切邪恶的代名词。

第五章

聪 明 的 代 价





1. 郭沫若参观收租院
2. 据说外国人身后的汽车为刘文彩当年所用
3. 刘氏庄园陈列馆

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

地主庄园陈列馆，在极左政治达于巅峰之时，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遭致灭顶之灾，差点被它自己呼唤出来的极左狂飙所吞噬，这是主管部门做梦也不会料到的。

《收租院》复制品正在北京展出的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开赴北京，又从北京开赴四面八方，开赴韶山、井冈山、延安，也开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毕竟不是韶山、井冈山和延安，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刘文彩的“老巢”，是“阎王殿”。红卫兵也就不可能像去“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样诚惶诚恐、顶礼膜拜，而是以审判者的姿态来的。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一向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一向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哪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新锐、更“革命”的。在这些更新锐、更“革命”的小将们面前，他们不仅是过时了，而且构成了他们所批判的旧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没有“革命”的权力而是和整个旧世界一样成了革命的对象，只有被审判、被拷问、被打倒的份了。他们便不能不和被他们下了地狱的刘文彩一样也被下了地狱。

陈列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1966年10月，第一支红卫兵队伍抵达庄园陈列馆。仅

仅两个月之后，到庄园陈列馆安营扎寨的成建制的红卫兵队伍已达数十支之多。计有：

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

“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 11·3 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

北京师范大学“平型关”战斗队

北京师范大学“红雷战斗组”

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

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

北京机械学院“战犹酣”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轰轰轰”战斗队

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浪”战斗组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北京共产主义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队

首都黄继光远征队

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

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

新疆大学“南征北战”战斗队

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

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

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

哈尔滨抗大中学“长征串联队”

成都工业学院 4221“长征宣传队”

成都无线电机学校“东方红公社”

成千上万红卫兵包围着庄园陈列馆，以天之骄子的傲岸气度拷问着庄园陈列馆。庄园陈列馆呼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红卫兵小将尚方宝剑在手，当地政府吃了豹子胆也不

敢开罪他们。更何况当时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当地政府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为庄园陈列馆一援手呢？从前被当地政府当作“特保儿”的庄园陈列馆，现在成了没娘的孩子，独立寒秋，在红卫兵小将的围剿中苦苦熬煎。

第五展馆是为配合中共八界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

最早受到红卫兵小将拷问的是庄园陈列馆的名号。小将们一见到陈毅元帅手书的门牌，便大为光火：“竟敢叫地主庄园陈列馆！这不是给刘文彩办纪念馆吗？”就地开了一个声讨会。庄园陈列馆只好检讨：陈列馆三个字，确实不足以反映革命者应有的阶级立场。“名不正言不顺”，名字都没取对，还谈得上什么阶级教育呢？立马改正，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小将更加斗志昂扬。登堂入室，用“毛泽东思想照妖镜”扫描陈列馆的每一幅画、每一行字、每一件陈列品。这一照，果然照出了一大堆的妖魔鬼怪。庄园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成千成万的红卫兵战友、革命师生和工农兵群众来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时，贴出了千万张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展览馆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千万张大字报太过夸张，但大字报像雪片一样地纷飞，大有将陈列馆淹没之势，这倒是事实。除了最高决策者充分肯定的泥塑《收租院》，公开展出的五个馆全遭到红卫兵大字报

地毯似的密集轰炸。

对第一馆即序馆，红卫兵驳斥说：

几乎整个序馆都是介绍反动恶棍刘文彩的发家史，而没有反映农民的反抗史。不但没有概括二、三、四、五部分的内容，而且抽掉了要害部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及广大贫下中农的反抗史。这究竟给观众是什么样的阶级教育呢？过分地宣扬反动地主的“能干”，一下子把三十亩地发家为一万二千余亩，地盘多么大，佣人那么多；更严重的是本馆没有揭露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没有揭出他们的家业是建筑在贫下中农的尸骨堆上的阎王殿；还歪曲历史美化地主，丑化贫下中农。例如：在序言中竟出现“豢养……雇工”，在统计刘文彩的剥削量时，胆敢歪曲历史说一般贫下中农每年除交租外还可剩“600”斤谷子。真是这样吗？《收租院》中那位瞎了眼睛的老大爷，除交租剩下的就是一张卖身契。这一切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一馆实际上是在给地主刘文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红卫兵据此断言：

序馆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红线，而突出的是地主阶级发家史的黑线，没有突出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斗争，而突出了地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没有突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突出了刘文彩的“能干”；没有突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突出了地主刘文彩“四位一体”的黑势力。总之，序馆没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突出党的领导，没有突

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们自己的威风。

这样的大字报贴出后，陈列馆立即进行相应修改，把原文“豢养大批爪牙和雇工……”改为“剥削雇工”，在“电工”穿的衣服上加了几块补丁，增加了几条“最高指示”。但还是过不了关，红卫兵说：“这都掩盖不了这一馆的严重问题。”

第二馆即“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馆，红卫兵的评价更为低调。虽然红卫兵说：“第二部分中的《收租院》，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这是必须肯定的。”但除此而外的其他陈列内容，则几乎一棍子打死——对前半部分，红卫兵的评价是两个字：“放毒”。红卫兵举例证明：

本馆当门匾额：“刘文彩的腐朽生活”就是宣扬刘文彩腐朽生活的“好”题目。

从汽车到书房，按照刘文彩的大管家的回忆原原本本陈列出来，活像一个“纪念馆”。我们认为，那些腐朽糜烂、反动透顶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陈列出来，而不加任何批判或者加上几句装腔作势的假批判，实质上是在宣扬这些东西，公开放毒，腐蚀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青年。多少反动透顶的匾、对联、诗画按原样陈列，不加任何批判，不正是说明吗？像刘文彩的狗窝、王玉清（刘文彩的小老婆）的妖洞及中西式客厅等，虽加上了点批判，革命群众一眼就看得出来，它实质上在宣扬刘文彩的豪华奢侈、糜烂透顶的生活。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对我们革命青年进行了腐蚀。据我们亲眼所见和本馆革命同志反映，有些同志在刘文彩的狗窝前，

欣赏不已，在王玉清妖洞前赞不绝口。甚至有个别同志还说什么："刘文彩的床好安逸哟！在上边睡一下死也值得。"

第二馆后半部分是"水牢"、"地牢"、《收租院》。用当时的眼光看，这些陈列内容按说无可挑剔，但红卫兵看了反而万丈怒火。红卫兵大字报称：

本馆后部分把非常能教育人的"水牢"、"地牢"搞得简直不成话，既没有详细说明，又没有讲解员，那轻描淡写的几句解说词，根本没有揭露出刘文彩的罪行，不能激发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我们要大声质问办馆的主要负责人：你们有那么多的经费、时间去复原刘文彩的庄园，而为什么不复原水牢的原样？你们又为什么不在水牢边设制详细的解说词？为什么不安排讲解员？《收租院》揭露、控诉了万恶的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这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收租院》，本馆本应突出表现它，可是它在本馆中却占了极少比例，本应有解说员进行比较详细生动地解说，可是连一个解说员也没有，本应把《收租院》、水牢、地牢放在前面，使人一进馆就激发起强烈的阶级感情，然后带着对剥削阶级的强烈憎恨来看前半部分的陈列品。可是《收租院》却被办馆的人安排在最后，企图让人在前部分中毒后再看《收租院》，以削弱《收租院》应起的教育作用。看！其用心多么恶毒！

还有红卫兵补充说，他们采访了当地一个姓肖的老大

娘。那位老大娘告诉他们：水牢是解放军打开的。打开时里面全是血肉酱和人骨头。解放军从水牢里掏出血水十三挑（二十六桶），人骨七大箩筐。而在陈列馆的水牢现场却根本感受不到这些，也不介绍。他们进而质问："展览馆的负责人不如实地介绍水牢的情况，这难道不是在为大地主恶霸开脱罪责吗？这难道不是在美化地主阶级吗？"

于是，红卫兵理直气壮地给第二馆挂上"剧毒院"的牌子，匾额、对联和其他"复原展出"展品，也被红卫兵悉数封存。

第三馆"剥削手段"馆，第四馆"反抗斗争"馆，对这两个馆红卫兵定的罪也不轻——第三馆"为反动派涂脂抹粉。如'高利盘剥'塑像那个守监牢的国民党兵，塑得衣衫破烂，低着头，似乎很同情被关押的农民。又如'杀害李家硕'塑像那个刽子手，低着头，好像对被害的共产党员有无限的同情，这是作者别有用心，美化敌人。"而且塑像"艺术性也差，制作粗糙"。第四馆"无视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看不出大邑县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怎样与敌人作斗争的革命斗争史"。"把广大贫下中农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英勇反抗斗争描绘成无组织、无领导的那种只为眼前利益而作的反抗。"第五馆是整个展出内容的点睛之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馆。该馆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都存在剥削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而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应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为配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特意制作的，陈列馆一向视为得意之作。用当时的眼光看，也应该说是无懈可击。但让陈列馆大跌眼镜的是，五个展馆中，恰恰

第五展馆遭受的拷问最严酷。陈列馆当时的一份内部材料自己也承认："对这一部分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笔者统计了一下，庄园陈列馆现今保存的二十九篇红卫兵大字报中，以抨击第五馆为主题的红卫兵大字报就有十一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他大字报没有一篇不涉及第五馆。主要罪名有如下几项：

1. 没有以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阐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没有反映解放以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取得的光辉成就，没有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现在展出内容，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2. 没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全馆贯穿的是阶级敌人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杀人、放火、投毒、拉垮干部、腐蚀青少年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长了阶级敌人的志气，灭了人民群众的威风。把一部无产阶级的专政史，搞成一部阶级敌人的复辟史。

3. 把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家谱、变天账、反动日记、反动对联、反革命遗嘱、国民党歌等不加批判的展出，有的放大数倍。把一些反动家伙的照片原样展出。这是在传反革命的经，是煽动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和呼吁书。

4. 黑话黑画满馆。大量绘画，尽量画的是阴暗的东西，只见敌人的嚣张气焰，看不见广大工农兵粉碎敌人破坏的伟大力量。是在歌颂敌人，美化敌人，丑化工农兵形象。黑话很多，如"把孩子从阶级敌人手中一个个夺回来"、"念念不忘腐朽生活"、"积存历年盘剥账本"等等。

这些罪名，没有一个不骇人听闻。庄园陈列馆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散发名为《揭露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活动真相》的传单，为第五馆辩护。传单说：第五馆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原本是"揭露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各种破坏的罪恶活动，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青年一代，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阶级教育作用。"北京少数南下串联学生"对第五馆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无法接受。但这张传单非但没有说服红卫兵小将，反而是火上加油，招来更多红卫兵大字报的围攻。庄园陈列馆便多了一条罪状：不谦虚。陈列馆从此只得忍受乱箭穿心的痛苦，免开尊口。

"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开初，在陈列馆安营扎寨的红卫兵山头林立，各自为阵。为了统一步调，共同对付陈列馆，1966年11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轻骑兵战斗队"、"百万雄师"北京师范大学11·3战斗队、中央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北京政法学院"长征战斗队"、浙江嘉兴一中"长缨在手"战斗组、内蒙"八一"中学"主沉浮"战斗组、北京矿业学院、山西矿业学院、焦作矿业学院"联合战斗组"、山东肥城一中"南下串联组"、西安石油学院"赴蓉战斗组"等十一个红卫兵组织在第五馆出口设立联合办事机构——"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就称："我们是毛

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坚决拔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要大造其反，一反到底！不取得彻底胜利，誓不罢休！"联络站调度数万外地红卫兵，对庄园陈列馆展开有组织的轮番围攻。大字报贴满了墙、贴上了门，实在没有位置可贴了，就在陈列馆大路边牵起一根根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上，像万国旗一样哗啦啦地随风飘扬。高音喇叭也被"革命造反联络站"控制，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喧嚣。陈列馆的大院里，天天都有红卫兵主持的盛大集会。所有大字报、广播和集会，主题都是声讨陈列馆；给陈列馆定的罪越来越高："黑馆"、"黑店"、"修正主义展览馆"、"要害问题是夺无产阶级的权"。红卫兵进而要求"抓鬼"——不仅对事，更要对人。"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一篇大字报就表示："到底办馆人是什么样的办馆指导思想？到底在办馆中重用了哪些黑五类分子及他们的孝子贤孙，并且他们在其中大伸黑手，搞了些什么名堂？我们都要追根查源，统统将其揪出来示众！"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武汉大学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揪出主谋者。合肥工业大学红卫兵一张"投枪"似的大字报，标题就叫《抓鬼》。大字报说：

> 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没有反映出阶级敌人的丑恶本质，而是为恶霸地主办展览馆，是宣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第五馆，是为阶级敌人展览成果。总之，此展览馆是一毒草展览馆，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我们认为此馆的负责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此馆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个活鬼。有鬼就抓。我们衷心希望此馆的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抓出活鬼，彻底整顿此馆……

清华大学红卫兵想得更深更远："阶级教育展览馆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本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四川省难道与此没有关系吗？"并向四川省委提出质疑，责令"立即回答"。华中师范大学红卫兵则表示："我们要一直往上追，追到成都市委、四川省委，乃至西南局！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红卫兵无往不前，"鬼"果然让他们给抓出来了。陈列馆馆志记载："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被揪来批斗游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那些"曾经为陈列馆的筹建、改馆出过力的省、地、县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戴上高帽子挨斗时，在面对本来应该是纯朴善良而现在却凶狠好斗不可理喻的孩子们时，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否想到，对于他们来说，这未必就是什么委屈，而是一种报应：本来应该是纯朴善良的孩子们变得如此凶狠好斗，甚至变得残忍嗜血而完全泯灭人性，这其中不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吗？——孩子们今天所实践的，正是他们昨天向孩子们所灌输的！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庄园陈列馆是没法办下去了。1967 年 2 月，一直强烈呼吁"赶快闭馆、重新整理"的红卫兵，终于将庄园陈列馆封闭了——仅《收租院》和"水牢"例外。

陈列馆蒙羞含垢。陈列馆元老们的遭际更是一个比一个惨淡——直接领导《收租院》创作的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马力成了"走资派"，《收租院》主要作者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则被打成"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收租院》扶摇直上九天，《收租院》创始人却打翻在九地之下。这真是历史的绝妙讽刺。1971 年大邑阶级教

育展览馆的一份文件，就断然否认《收租院》创始人对《收租院》创作有过贡献：

> 革命泥塑《收租院》的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广大工农兵积极要求和供给素材，革命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绝非这样那样不三不四的人物脑壳里臆造出来的。

接下来，文件详细记述了“围绕着《收租院》泥塑成果”而展开的三次“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

> 《收租院》刚一展出，刘少奇、周扬的走卒、旧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窜来《收租院》大放厥词，说什么泥塑《收租院》是六十年代的“文艺复兴”，“现代的敦煌”，将革命泥塑《收租院》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把泥塑《收租院》的报导控制在他们这伙黑帮手里，不准抢发消息，要由他们控制的报纸、刊物来一个什么“鞭炮齐鸣”！他们这是什么“齐鸣”，就是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周扬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的反革命伎俩，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所戳穿，反革命阴谋宣告破产了。
>
> 但是，阶级斗争仍激烈地进行着。他们的第一套班子被打掉后，他们又组织第二套黑班底，变换手法，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入中央文革的王、关、戚一伙反革命分子，窃据了中央文革部分大权，戚本禹指使其

黑弟子赵树桐，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打着《收租院》被刘、邓篡夺的幌子，炮制了美其名曰“揭露刘邓篡夺革命泥塑《收租院》的大阴谋”的所谓控诉材料，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假借揭露控诉之名，行王、关、戚及其赵树桐的反革命阴谋篡权是实。“五·一六”支队长反革命分子赵树桐，大卖力气，八方呼应，策划密室，点火基层，打着《收租院》作者受迫害的旗号，把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产物革命泥塑《收租院》的伟大成果又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以此作为飞黄腾达的反革命资本，混入了中央文革掌握美术口的大权，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随着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覆灭，戚本禹和其黑弟子赵树桐之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的第二套班子又彻底完蛋。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继续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实正是这样。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徒子徒孙，温江地区旧地宣部的叛徒马力，紧步后尘，投靠戚本禹，与赵树桐狼狈勾结，互相吹捧，把革命泥塑成果《收租院》，厚颜无耻地又一笔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又是什么“上京告状”，又是什么所谓“控诉发言”，挖空心思，炮制了连篇累牍的臭文，什么“一场大迫害”，什么“篡夺《收租院》泥塑成果的大阴谋”，等等欺世盗名的罪恶材料，大量付印，广为散发，妄图欺骗群众，愚弄人民。在刘（结挺）、张（西挺）统治的三十个月中，叛徒马力拜倒在刘、张门下，由于都是一路货色，受到了刘、张的罪恶支持，刘、张控制的旧四川日报，将叛徒马力炮制的黑文贯上通栏标题，大版大版地登载，为叛徒大开绿灯，

呼风唤雨，摇旗呐喊，反革命舆论流毒全川，风行一时……他们使用种种反革命伎俩，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饱经沧桑的赵树桐先生，现在是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作为《收租院》主创人的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他多次到地主庄园陈列馆故地重游。1993年美国波士顿内森媒介公司电视摄制组赴地主庄园陈列馆拍摄泥塑《收租院》纪录片，赵树桐先生是随行者之一。在《收租院》展馆现场，望着浸透了自己心血的泥塑群雕，赵树桐心潮难平。那边，一位外形酷似白求恩大夫的美国摄像师正聚精会神地拍片，赵树桐突然灵机一动，对他的助手喊：“快找些材料来，黄泥、稻草、木条都要，我现场示范一下这些中国泥塑的制作过程，在这114个塑像后面加上第115个。”不一会儿工夫，腐朽化为了神奇，一堆平平常常的黄泥被赵树桐赋予了生命——一个谢顶、高鼻的美国人活灵活现地矗立在《收租院》群雕中，它以美国摄像师为原型。而那位美国摄像师对此却浑然不觉，不知自己已经被永远“留下”了，仍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摄像，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个奇迹，大叫“OK”，赶紧托同伴用照相机拍下自己和“自己”的合影。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陈列馆元老还为数不多。随着文革不断深入，阶级敌人不断“自我暴露”，赵树桐的难友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1970年1月24日中午12时30分，陈列馆广播员张同松打开扩音机跑到外边吃饭，哪料到扩音机来了个自动跳台，跑到“苏修”那边去了。15分钟的“敌台事件”换了张同松的15年有期徒刑，全馆81人有33人被株连，罪名分别是“收听敌台者”、“对抗红色政权指示者”、“大搞右倾翻案者”……

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

刘文彩的“看守人”被打翻在九地之下，刘文彩亡灵也面临一场新的灾难。

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会批准了四川省文化局“关于整顿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意见”，据此，陈列馆开始历史上的第三次改馆，“去掉了原展品中有严重问题和破破烂烂的部分，使展品较为集中了，内容充实了，参观的时间也相应的缩短了”。但没能通过验收。省革委会认为，改馆后的陈列内容“与当前蓬勃发展的革命大好形势，与广大工农兵的要求还很不适应，仍须进行较大的整顿和改革”。即使是泥塑《收租院》也不例外；省革委会政工组指令：“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映，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经过大改，所有展馆都添加了配合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收租院》则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六个部分，同年秋正式对外展出。

大改之后的刘文彩，其形象更为荒诞不经。最荒诞的是对刘文彩结局的处理。刘文彩本来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馆却说刘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岂料“吓死”说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驳。四川医学院几位红卫兵就在大字报中指出：“整个展览馆有几处都提到刘文彩是解

放前夕被吓死于成都，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他是怎样死的，就应该如实揭发出来，而决不可能被吓死。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决不会一吓就死。'刘文彩是被吓死的'这种说法只能为掩盖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阶级本质帮忙。"红卫兵的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吓死说不能沿用了，但真的把刘文彩之死"如实揭发出来"，更会授人以柄——让刘文彩不受任何惩罚地自然死亡，怎么能大快人心？又怎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作为"胜利结局"的高潮，安排了刘文彩被枪毙的情节。在这组泥塑中，已在1949年10月自然死亡的刘文彩复活了，而在1949年12月大邑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获。解放军战士身材高大（比大个子刘文彩大出约二分之一），并且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一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不是这种装束）。总之是充分体现江青艺术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对刘文彩之死的解说词则更令人喷饭：

> 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的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

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文革初把刘文彩打成刘少奇的同党，枪毙刘文彩时要打倒刘少奇；到了林彪垮台之后，刘文彩又成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同党。枪毙刘文彩那段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

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

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按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漫画刘文彩，就连对刘文彩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外国人都看出了破绽。1974 年，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参观团到陈列馆参观后感到太离谱了，直接向四川省革委会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国内一些观众意见也很大。在国内外舆论的介入下，四川省革委会下令：《收租院》增塑部分暂停开放。但这并不可能使陈列馆就此走上实事求是的正轨，陈列馆门前的广场仍旧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和课堂，常常有人山人海到这里“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就在这一年，陈列馆设计师舒志斌奉命到兄弟省市的地主庄园参观，“博采众家之长”，为进一步改馆作准备。途

中眼疾发作。回陈列馆后又在五百瓦大灯泡下连夜赶制展具，终致双目失明。

1976年“四人帮”倒台，刘文彩又被绑到“四人帮”的战车上。四川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到陈列馆视察时，曾就这个问题作专门指示：

> 刘文彩是一个吸血鬼。他强迫奶妈挤奶给他吃，直到吮吸出血来，这个内容，展出中应有。刘文彩是个吸血鬼，“四人帮”也是吸血鬼；刘文彩反共反人民，“四人帮”也反共反人民。“四人帮”“无本万利”，刘文彩也是“无本万利”，他是靠枪杆子、军阀势力上去的。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刘文彩的社会基础。出现“四人帮”，说明刘文彩的阴魂不散。“四人帮”完全继承了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衣钵，一定要把“四人帮”和刘文彩挂起来，也完全能够挂起来。（庄园档案67宗B10卷）

根据这个指示，陈列馆所有展馆都添加了控诉“四人帮”的内容。《收租院》解说词就有如下一段：

> 同志们，像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水牢”部分的解说词则说：

“四人帮”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千万个冷月英将被重新推进水牢，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又会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决不能答应！

刘文彩就这样“忙”个不休，一会儿为刘少奇陪斗，一会儿为林彪、孔老二陪斗，一会儿为邓小平陪斗，一会儿又要为“王张江姚”陪斗。真个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川剧中的“变脸”令人叫绝——演员甩一次头就可以变换一个脸谱，1958年“出土”的刘文彩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但是，刘文彩个人的“变脸”，还不足以构成这场闹剧的全景。整个刘氏家族如何因刘文彩“出土”而历尽劫波，暂且不去说它。更可笑可悲的是多少与刘氏家族并无瓜葛的无辜者，竟然也被卷进那场闹剧中。这里不妨当次文抄公，照搬《地主庄园沧桑录》（周东浩著，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的几大段：

故事一：刘文彩“老婆”的不白之冤

曾有一个妇女叫滕光华，四川省永川县小南乡人，生于1931年，其父曾在二刘大战中被拉去当兵。从战火中逃出后，其父便带着妻子、女儿滕光华和一个儿子，到西昌做盐生意；不久，又把滕光华送到雅安市学川戏。哪知戏班班主凌学良（国民党二十四军副官凌耀尧的儿子）心怀不轨，伙同帮手凌少安，把滕光华骗到大邑县韩场藏匿。滕光华的母亲和弟弟到韩场寻找，被

凌砍死。

1961年，滕光华在贵州省川剧团当演员。剧团却无端吹出了一股风，说她是刘文彩的小老婆。人们有意无意地开始疏远她，常有人暗地里对她指指戳戳，还有人当面骂她是“恶霸地主的小老婆”。昔日的朋友都离她而去。她满腹的委曲无处申诉，辛酸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

这还不够，开会“斗地主”、“斗地主老婆”时，总有人把她往台上揍；平时走在街上，身后总跟着一群小孩向她扔石头、吐口水……

滕光华不明白，她连刘文彩长得什么样子都未见过，怎么会是刘文彩的小老婆呢？怪只怪刘文彩的名声太臭，像狗皮膏药，粘到身上就别想脱掉。她知道自己有口难辩，于是，她走了，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她背着母亲和弟弟的尸骨到北京告状去了。她告到公安部，回答不好处理；又告到文化部，文化部认真做了调查后，终于给滕光华的一家洗却了冤屈。

滕光华终于笑了！她又孤身回到大邑县，适逢大邑县韩场乡批斗凌少安。满腔怒火的滕光华赶到会场，抽出准备好的菜刀，对准凌少安劈头就是一刀……（凌少安当时没有被砍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摘了帽子）。

故事二：刘文彩“妹妹”泪流如注

她叫刘文英，江苏省某县农民。

文革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刘文英所在地尤为激烈。有人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恶主意：把本村农妇刘文英抓出来批斗，原因是她不仅与刘文彩“同姓同宗”，还与刘文彩同“辈”。因而

强迫她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妹妹”。

就这样，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村干部早早在会议室里烧起大火，召拢全村群众，惟独不叫刘文英。全村商妥后，派了两个平时与刘文英关系较好的妇女敲开刘文英的家门，然后由躲在暗处的两名男子突然上前绑捆刘文英，押赴会场批斗。

刘文英当时已四十八岁，身体瘦弱。被当作“刘文彩的妹妹”批斗后，使她惊恐不已，心口常常作痛，然而对她的批斗愈演愈烈，强迫她坦白交代剥削罪行。一次，几名男子拿出粗铁丝，捆住刘文英的两个大拇指，然后将刘文英吊起毒打。大半夜过去，刘文英的丈夫跪在地上乞求放下刘文英后，一看右肋骨断了三根，左脚小腿骨折，大拇指吊断一只。刘文英昏死在地，达两个小时之久……

刘文英祖宗的祖宗都是本县人，只因1958年兴修水利时，刘文英家从另一个乡移民到了该乡，很多人都知道刘文英的来历，却无人出来作证！

故事三：刘文彩做媒留下的……

大邑县唐场乡曾是刘文彩控制的地盘。在那里，有一张姓人家，父辈与刘文彩关系较好。张家惟一的儿子张某长大后，刘文彩做媒将安仁一位姓刘的姑娘嫁给了他。

解放后，随着刘文彩的名声越来越臭，张家人也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但若仅仅是被人瞧不起倒也罢了，殊不知恶运还在后头——“文革”一开始，村里便首先将已四十多岁的张某揪出来游街批斗，原因当然是张某与刘某的结合乃是刘文彩做的媒。在一次批斗中，张某实在忍无可忍，便问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法？”愤怒

的批斗者们听了这话，好似火上浇油，大骂张某“死不悔改”，随之将张家的房子拆毁，将张某的妻子一同绑来批斗。不久，张某病故，丢下其妻继续接受遥遥无期的“戴高帽子”批斗。一次，张妻正跪在台上接受“深揭猛批”，突然想到丈夫已惨死，房屋又被拆，自己无依无靠，便忍不住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有人便说她这是对批斗的一种反抗，于是，砍来酒杯粗的带刺木棍抽打她，一夜下来，张妻浑身血淋淋的动弹不得……

如今，张妻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过去受冤屈被批斗，给她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不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去，默默地干着该干的事……回首往事，她无言以对。

故事四：“女刘文彩”背毛主席语录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大别山脚下山凹里的村庄。

这个村里本没有地主，所以当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风潮刮来之后，其他村因有地主，批斗会一个接一个开得红红火火，游行示威一轮接一轮搞得热热闹闹，墙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嘴上喊着长长短短的口号，惟独这个村的人“无事可做”。看着公社大会小会都表扬那些村，那些村的人走在路上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个村的人羡慕不已。

终于，村里有几个“积极分子”耐不住寂寞，想方设法要赶上形势，于是搜肠刮肚也要在村里寻找出个把“地主”。

她姓汤，没有读过书，老老实实的一个农村妇女。娘家是地主成分。她嫁到这个村整整二十年了，靠种田得工分养活着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前年因与他人打

架而跳塘死了。人们都喊她“汤婶”。厄运降临到她头上时，她尚丝毫不知道。一天夜里，村里突然开大会批斗她，她瞪大惊恐万状的眼睛，瘫坐在地上，讷讷地问：“我是地主？”

“你还狡辩？你是女恶霸地主刘文彩！”一个粗声莽气的男人，瞪着一双铜铃似的眼睛盯住她。

此后，天天开会，让她戴尖高帽子下跪，坦白交代剥削事实；夜夜开会，让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天夜里，一个年轻后生捏着一根大木棍又让她背“毛主席语录”第×条，这条“语录”其中一句是“我们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女刘文彩”脸色惨白，嘴唇发乌，颤巍巍地跪着。她没有读书，让她背这些“语录”比让她登天还难！但为了免打，她不睡觉地硬是让女儿教她背。她本来勉强可以背下来的，但经过一吓后又忘记了，此刻，她在脑海中边搜寻边背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脱了气的人。”

立时哄堂大笑！笑毕，那年轻后生对“女刘文彩”头部奋力一棍：“你胆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好大的狗胆！”“女刘文彩”只扑通一声，便倒地昏迷过去，差点真做了一个“脱了气的人”。

她那十八岁的大女儿不忍看到母亲受辱，心痛如绞，乃于夜深人静时悬草绳子于屋后的树杈上自缢而亡。

而在同一天，公社开会表彰批斗五类分子先进村，这个村的名字终于登上了光荣榜。

村里有的人在笑，有的却默不做声……

因姓名、出身与刘文彩相似而备受摧残，甚至家破人

亡，这看起来是奇闻，实际上平淡之至——文革十年，冤狱遍国中，连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致死；相形之下，刘文彩“亲戚”们的不幸遭际，不过是滔滔冤海中的几束小水浪罢了。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作为享誉中外的“阶级教育基地”，在整个60、70年代，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仅一直是门庭若市，而且简直就是门庭赛市。1964年改馆之后，游客更蜂拥而至。从1964年国庆到文革爆发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就达数百万，几乎是此前五年游客总量的十倍。但和“水牢”主角“冷妈妈”冷月英一样，庄园陈列馆最“辉煌”的时期还是十年文革。文革初，前往庄园陈列馆“取经”的红卫兵和“工农兵群众”，每天都有两三万。文革十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总量达数千万之众，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名人游踪，是文革前夜郭沫若的到访。

郭沫若与地主庄园陈列馆结缘，始于1965年12月泥塑《收租院》进京展览。那次参观，郭沫若留下了“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的诗行，博得观众一片叫好之声。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更偕同夫人于立群，亲往《收租院》之家——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考察。

此次考察，颇具声势。由四川省副省长张力行、四川省

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作陪，乘坐大红旗轿车，浩浩荡荡，从成都直抵庄园陈列馆。到陈列馆已经是中午时分。陈列馆方面早得到通知，派工作人员何进先在广场迎候。郭沫若一行下车后，先到“小姐楼”接待室休息，负责陪同的何进先汇报了地主庄园的历史和陈列馆筹办经过。郭沫若听了指示：“这里是阶级教育的阵地，一定要把它办好。”

午餐后开始参观。郭沫若逐个瞻仰了老馆和刘文辉新馆的全部展出内容。在匾对、字画和古董面前，郭沫若总要停下步来，仔细端详。《收租院》是郭沫若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缓步穿行在 114 尊泥塑组成的长长的围廊里，时而俯身察看，时而偏头凝思，意味深长。

回到接待室，郭沫若像是有些累了，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稍事休息。他的夫人、书法家于立群则在卧室外挥笔疾书：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于立群刚写完，何进先就进了郭沫若的卧室，代表陈列馆“请郭老题词留念”。郭沫若略费踌躇：“写什么呢？我写不好。”他用带着乐山口音的普通话推辞说。

中国第一文豪哪有“写不好”之理。在何进光的坚请下，郭沫若还是应承了。他缓缓踱出门外，提起狼毫，在早已备好的四尺宣纸上挥就了他生平中的一阕名作。词云：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竞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

“水牢”“地牢”今天已不复有了，而郭沫若的那阕《水调歌头》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的高墙上，任后人品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二十年极左政治的终结。庄园陈列馆的畸形繁荣随之永远地终结了。尽管又挂上了陈毅元帅题写的“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门牌，尽管正式封闭了《收租院》增塑部分，尽管大门钢架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金属大字被清除了，墙壁上“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水泥铸字也被铲得不见痕迹，但还是不能改变被冷落的局面。车马零落，连小鸟都来筑巢。就像洪水消退，留下的只是满目荒凉。

庄园陈列馆何处去？

1980年5月，困惑的陈列馆请来二十多名文史哲专家，对这座一直是“阶级教育大课堂”的庄园进行“诊断”。专家们的目光掠过《收租院》，掠过“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落到了这座雕梁画栋的精致的庭院里，落到了2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这座庄园保存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封建地主阶级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一个缩影，是近代地主阶级在四川生活的形式和风貌的典型反映，是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断面——因此，无论在文物、科研和教育上都有重要价值。”

专家们同时郑重呼吁主管部门：

“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

从此，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主要属性不再是“政治思想工作机构”，而是“历史性的文博单位”了。但要实现从“政

治思想工作机构”向“历史性文博单位”的转移，并不是说一说就能做到的。为此，庄园陈列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冲破重重阻力，澄清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的真相。对其它展出内容也作了调整——“以复原展出为主，避免漫骂式语言，让事实说话。”庄园陈列馆不再歇斯底里。

陈列馆已不复为昨日的陈列馆，那么刘文彩还是不是昨日的刘文彩？“水牢”、“地牢”撤消当年，大邑县政府就接到一封群众来信。来信全文如下：

大邑县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来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刘文彩？换言之，刘文彩究竟是开明地主，还是恶霸地主？我想你县的历史档案和县志资料是可以查出来的，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不久前，我市东城区曲艺组去你县安仁镇公演。回蓉（后）其中有一位评书艺人赵××讲评书时，曾公开向听众宣讲刘文彩的生前情况。他说：

“我们这次到大邑安仁镇等地公演时，曾听到当地不少农民说，刘文彩待人是很厚道的，不像有人说得那么坏，说他用大斗小秤剥削农民，哪有这回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我越听越糊涂了。我开始怀疑我过去对刘文彩这个血债累累、残酷剥削农民的吃人野兽是否看法有错。

接着，我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不能解答。

1. 我当年看过《人民文学》关于刘文彩的专题报导，文中引用了许多史实、材料和广大农民的控诉、揭发，证实了刘文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霸地主。《人民

文学》是我国的权威杂志，难道是捏造事实吗？

2. 我们由单位组织参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不下十次，根据展览馆（陈列馆所展出）的实物资料（和）罪证（特别是水牢），解说，当时农民的控诉，冷月英和受害农民坐水牢的图片与宣讲……激起了参观群众的无比愤怒。难道（这些在）今天全部是假的吗？

3. 我深信地主庄园的筹建和无数资料的提供主要靠你县。难道你县在党和领导下还敢弄虚作假吗？肯定是实事求是的。

4. 如果说历史应该恢复本来面目或重新评价刘文彩，那么我认为很有必要由你县撰文刊载川报或晚报上，这样才能澄清是非、说服群众。

5. 如果说今天刘文彩应列为统战对象，那么要有必要将刘文彩的生平事迹公诸于世，决不能含糊下去。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在这一大问题上应旗帜鲜明。

6. 如果说刘文彩是开明地主，那么过去对他强加的不实之词应一个一个地解释、说明，不能支吾或含（缄）默。

7. 如果用“文革”时期的一切来为刘文彩辩解、申明，还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为刘文彩这个恶霸大地主的结论是“文革”前的事，我不知道怎样为刘文彩落实政策，理由又是什么？俗话说：“道理动明公，空话哄愚人”，只要做到求真二字，那就是以科学态度来正确对待历史。

8. 至于你县少数农民的反映和赵××的传播，我认为这不是第一手材料，是道听涂（途）说，不应轻信。可是已公开由赵××传播出去，或多或少地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我认为说话应负责，特别是在公共场

所内。

以上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者说是跟不上当前形势的一种看法。

来件有错，请批评指正！

此致

敬礼！

成都市一市民求真寄

（1988/）11/13

这封信反映了一个客观情况。刘文彩固然是一个土老冒，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土老冒，而是一个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一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的土老冒。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了公共人物。因此，他的形象的任何一点变化，都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刘文彩历史主要内容的“水牢”、“地牢”、“行刑室”、“刑具室”被证明为后人虚构，在社会上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过去塑造的刘文彩形象并不确切，确切的刘文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公众不能不质疑，不能不多所猜测。以致流言纷起，莫衷一是。

现在，我们就走进历史，去探索刘文彩的确切形象吧——这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团乱麻，但愿还不致全无头绪可寻。

上篇

乱世春梦

第六章

家　世　渊　源





1. 刘文彩侄子刘文瑄，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在寓所接受记者采访
2. 安仁镇街景
3. 儿子刘文华、刘文富、女儿刘婉兰、刘婉慧、女婿田明谦合影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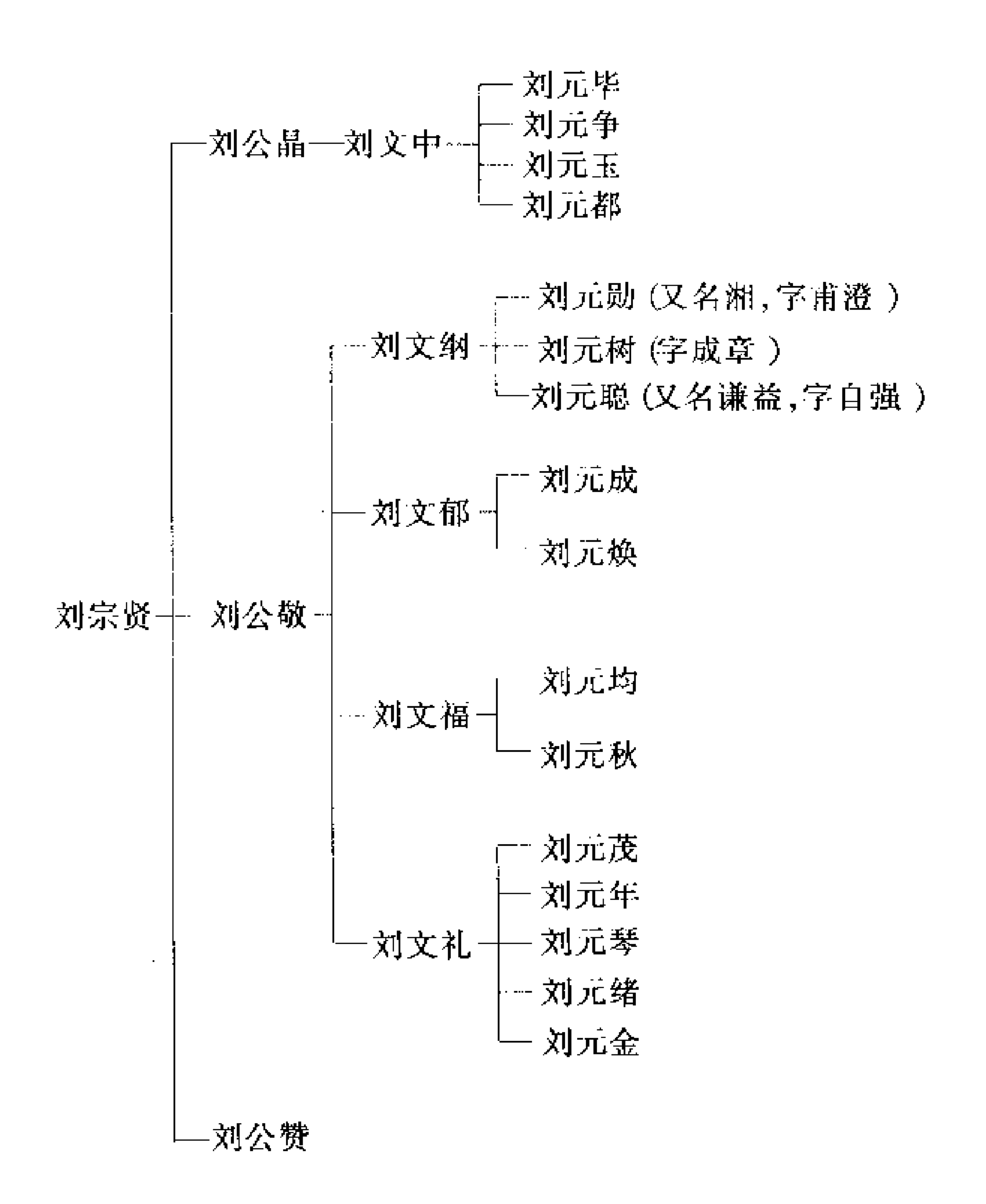
刘文彩先祖是出自安徽徽州的移民。

明朝末年，张献忠率数万大军、十余万饥民骤然入川。既无银饷筹措，亦无军需供给，哪有粮食就去哪。边走边吃，边战边抢，以至农田荒芜，兵匪横行，川人逃亡殆尽，由此引发了“湖广填四川”这股气势恢弘的移民潮。刘文彩的先祖便被这股移民潮裹挟而来。最初落脚四川省名山县，迁到大邑县安仁镇的第一代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婚，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衍，胡家却无后嗣，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墩子”改称“刘墩子”。1958 年平毁刘家祖坟，坟地中还有一座“外始祖胡公荣贵老大人之墓”。

刘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农，没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国时期，风云突变，刘氏家族群雄并起，给小镇安仁平添了万种风情。

以刘应良为第一代，安仁刘墩子的第五代传人为刘智。刘智生男刘仕识，刘仕识生男刘宗贤。刘宗贤娶陈氏为妻，膝下共有三“公”：长男刘公晶，次男刘公敬，老幺刘公赞。刘氏家族发展为一个大家族，肇始于此(见下表)。

三“公”之中，刘公晶一支最弱——其子孙生平均湮没无闻。刘公敬一支则有声有色。刘公敬，字玉麟，曾中武举。其长子刘文刚专营贩谷生意，有水田四十余亩。刘文刚次子刘元树、三子刘自强才皆不足应世；长子刘湘（即刘元


刘宗贤
刘公晶
刘文中
刘元毕
刘元争
刘元玉
刘元都
刘公敬
刘文纲
刘元勋（又名湘，字甫澄）
刘元树（字成章）
刘元聪（又名谦益，字自强）
刘文郁
刘元成
刘元焕
刘文福
刘元均
刘元秋
刘文礼
刘元茂
刘元年
刘元琴
刘元绪
刘元金
刘公赞

勋）却是刘氏家族第一颗将星，官至川军总司令、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旧病复发，殒于汉口。国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赠一级上将，并在成都南门外武侯祠侧举行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刘湘是公认的抗日爱国将领，殁后哀荣备至，但这仍然不能庇佑他的亡灵——“甫澄纪念公园”在建国后易名“南郊公园”，文革期间更是毁墓掘尸，80年代中期修复陵墓，但刘湘遗骨已无从寻觅。刘湘在安仁有座公馆，占地十余亩，中式房舍数十间，全系群板砖瓦结构，馆内楼台亭阁，曲桥水榭，尚有小溪贯通全境，幽静典雅。文史专家确认其为“具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恢弘住宅”。但现在几乎说得上“惨不忍睹”了——馆内一排平房被用作茶店、餐馆、录象室，一幢中式木质结构的楼房被出租，办起了旅馆，旅馆设施和卫生状况很差，小溪变成了废水沟，废水的臭味令人作呕。公馆有不少房间根本无人居住，门窗、地板早已腐朽，当年“小姐楼”甚至被管理者租让给“牛贩子”当牛棚，昔日青砖绿瓦、富丽堂皇的风貌荡然无存。

刘湘幼年读书之余，常推车运送谷米。1909年依父母之命，与大邑县苏场周姓女子结婚，岳父务农兼做裁缝。刘湘妻后来取名刘周书，先后生下三子一女，1927年丧去二子。1949年秋，刘周书携子济殷、女蔚文去香港，后移居文莱。1971年刘周书在文莱病逝，刘济殷现为美国洛杉机某公司职员。大邑县政府数度与刘湘后裔联系，邀他们回乡一晤，迄无回应。

三“公”之中，刘公赞一支最为繁茂：生有六男，五男、六男之间还有一女，长成后嫁与安仁乡民廖尊三为妻，其姓名和生平今天没有谁说得上来了。家谱如下表：

刘公赞
- 刘文渊
  - 男：刘元珩　刘元琥　刘元璪
  - 女：刘元庚　刘元愉　刘元恒　刘元苍　刘元宪　刘元怜　刘元慎
- 刘文运
  - 男：刘元璋　刘元瑭　刘元琮　刘元瑞　刘元珅　刘元瑜　刘元璜　刘元珽
  - 女：刘元玖
- 刘文昭
  - 男：刘元树
- 刘文成
  - 男：刘元珝
- 刘文彩
  - 男：刘元龙　刘元华　刘元富　刘元贵
  - 女：刘忆云　刘婉蕙　刘婉兰
- 刘文辉
  - 男：刘元彦　刘元琛　刘元琦
  - 女：刘元恺　刘元悌

关于刘公赞，最早的完整描述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 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起初只是一个拥有三十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
>
> 但是，刘公赞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秀才）]，又出生于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他的政治野心要比一般财主大得多。他亲自监督雇工每天起早摸黑地替他耕田烤酒，在榨干雇工血汗的基础上，年年谷物满仓生意兴隆，家业倍增，土地增加到一百多亩，烧房两个冲，雇工十几个，成为安仁镇一带有名的大财东。但是，这一切仍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对那些不但直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能夺取其他剥削者的剥削成果，因而财富大大越过一般地主的军阀官僚，垂着长长的涎水，千方百计想挤进他们的行列。为此，他对他的六个儿子进行了精心安排：让老大、老四进成都法政学堂，学成后挤进官府去；让老幺十四岁就去四川陆军小学"习军事"，在军队弄个一官半职；让老二、老三、老五（即刘文彩）留在家里充当剥削助手。

这里的刘公赞形象，毫无美学意义可言。

需要说明的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不是个人著作。还在1965年，四川省主管部门制定《收租院》创作规划时，就提出了撰写小册子《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任务，当作《收租院》的配套工程，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川大学和庄园陈列馆。四川大学党委奉命从中文系、经济系、历史系抽调教员组成大邑工作队，到庄园陈列馆搜集相关资料。工

作队刚进入状态，文革就爆发了，全体工作队员撤回川大"闹革命"，小册子无人问津。这一搁就搁了整整十年。1977年，撰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再度提上议事日程，次年即告杀青，作者署名"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编写组"。小册子无疑是职务作品，所代表的也就不是什么个人观点而完全是"组织结论"。

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真正的个人著作、曾任民盟西康支部主委的刘文辉故旧彭迪先等撰写的《刘文辉史话》，刘公赞这才以正面形象出现：

在居民房舍中间，有一土墙围绕的宅院，十分显眼，院内两株银杏耸立，春季花开鲜艳，引人注目。居住院内的人口众多，行人经过围墙，总会听到欢声笑语洋溢墙外。

宅院主人姓刘名公赞，……县志还载：

太翁（即刘公赞——引者注）生而颖异，独嗜文学，……年十二…塾师以君子乎其政试之，太翁对句云："宇宙竞争之习，牵扶不正之气以俱来"。师异之，谓其见理独真。

刘公赞聪敏过人，富有才华……可惜的是，他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家世农业，不克竟其学"。

那时侯，他并不算富足，只是一个自耕农，直接参加田间领导："有田一顷，承而自耕；风雨胼胝，不稍荒怠，岁获恒丰"。

刘公赞颇有远见，不单经营农田，还重视工业和手工业……。熟悉稼穑，性格质朴，对农业生产十分认真，除在农田领导和在茶馆小憩外，绝少到处闲荡。而

且他“喜近文士，遇乡里贤达，敬礼尤挚。诸子成立，各命之（以）职，某也耕，某也读，孽孽焉不稍纵逸。灼先（大儿文渊）姓笃而能文，入学……声誉俱起”。刘公赞自审所学不如长子，就指派长子做诸弟的老师，督促诸弟学知识，使诸弟“益勤奋无旷废”。

刘公赞既有这么几个儿子，加上自己的素养，在安仁镇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威信，乡里有什么争端，往往请他出面决裁。“太翁刚直著于乡里，遇有争端，一言而决”。后及暮年，声望更高。有人甚至说：“刘太公，生佛也，宜为善属长。”

“儿子英雄爷好汉，儿子反动爷混蛋”。这种反溯式“血统论”，其余响至今未绝。于是，同一个刘公赞，便有两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以刘文彩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小丑；在以刘文辉为传主的著述中，他是“生佛”。其小丑形象虚妄可笑，其“生佛”形象也未尽可信——刻画“生佛”形象，多援引旧《大邑县志》，而旧《大邑县志》成于1930年，正逢刘墩子第九第十代传人权势最盛之时，县志作者对刘公赞自不能不多所溢美。客观地讲，刘公赞不过是一个本分的中国农民，其生平既无什么劣迹可数，也没多少侠义行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刘文彩兄弟后来的成败荣辱与他何有哉！

刘文渊出世不久，刘公赞就与两位兄长分了家，“有田一顷”，家境尚可，刘文渊才有机会背起书包上学堂。其后文运、文昭、文成、文彩、文辉连翩出世，众口嗷嗷待哺。刘湘之父刘文刚有水田四十亩，兼做贩谷生意，仍然“家非素丰”，刘湘在四川速成学堂就读时，不能不常常接受同窗刘炳勋资助。刘公赞地仅一顷，人丁却比刘湘家多出一倍，

要解决全家温饱问题，已属不易，再无力供养孩子上学。文运、文昭、文成不得不跟老父亲一起躬耕田垄。文彩尚幼，留在家中照看老幺刘文辉。往后文渊考取功名，文运、文昭、文成相继成人，劳力充足，家境稍纾，所以文辉又有机会读书。但文辉也只能到刘家祠堂改建的义塾就读。稍长，报考成都陆军小学，也并非如《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所云，是刘公赞有意培养军人，而是因为陆军小学学生享受公费，刘家可免去一笔开支。如果套用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刘公赞应算作“富裕中农”。

1919年，刘公赞及其妻高氏双双溘然长逝。这时他们的六儿一女都茁壮成材，有的还崭露头角，刘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已指日可待。刘公赞和高氏如愿以偿，应该是面带笑容跨鹤而去的吧。

书生老大，农夫老二，老三神仙，老四财神……几兄弟流品不一。

刘氏兄弟中，最早出息的是老大刘文渊。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上，安仁街头突然锣鼓喧天，一直鼓噪到刘墩子。没等刘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报喜的人就推门而入。原来，长于文史的刘文渊中了秀才。

顿时，刘家满门一片欢腾。

再后来，刘文渊考入四川绅班法政学堂，仕途得意，曾任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从未利用乃弟乃任权势谋取显位，亦未问舍求田惟利是图。……为人正派，不事蝇营狗苟”（《刘湘》第2-3页）。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颇受乡邻尊崇。晚年退隐林泉，乡邻皆以“厅长”称之，其本名反倒为人淡忘。此风在安仁乡间至今犹

存。

对刘文渊最尊崇的则是弟男子侄。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重点是读古文、讲修辞。“他常说：‘盖人皆有表达情意之愿望。如欲尽情表达，除通修辞别无法门’。果然，在他的教诲下，弟侄们读了许多篇古文后，就着笔写了一些短文”（《刘文辉史话》第11－12页）。不仅在辈分、年龄上，在学业上、精神上，刘文渊也堪称弟男子侄的导师。其与老幺刘文辉的关系尤为密切。《刘文辉史话》载：

> 刘文辉不仅在与同年儿童嬉戏时发号施令俨然如官长，在作文上也能遣辞巧妙，胜过群儿。这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大嫂听到后，喜在心头。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我的奶喂大的孩儿莫有不是好样的。”大嫂的话不是矜夸，的确有卓见特识。她从刘文辉幼年表现的性格、动作、气度就看出他不是平凡之辈。《刘母陈孺人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兄（指刘文渊）读书，诸弟皆幼……其最幼者（指刘文辉）孺人尤奇重之，常谓‘大吾列宗必小郎’……”。刘文辉后来的发展应验了她的预言。

1908年刘文辉投考陆军小学，即由刘文渊陪送。那时家里经济还谈不上宽裕，交通又不方便，坐滑竿、乘马车当然没他们的份。兄弟二人只好徒步跋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走一百多里路，难度可想而知，实在走不动时，就由刘文渊背着走。

既有学问人品，又有恩于族中弟侄，刘文渊在刘氏家族必然领袖群伦。刘公赞夫妇去世后，刘文渊被尊为族长，即

刘文辉、刘湘两员封疆大吏，对之亦敬信惟谨，奉之若父。刘文彩对刘文渊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四十年代刘文彩在川西农村地区已经是“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但刘文渊要他朝东他仍然不敢往西；刘文彩一位随从回忆，有一次兄弟俩下馆子，“刘文彩对他长兄非常尊敬，他亲自给厅长添饭”（庄园档案67宗D12卷）。刘文彩后裔则告诉作者，不管刘文彩在家干什么，只要刘文渊进门喊一声“老五”，刘文彩都得放下手中的活计，大步流星地出去迎接。

老二刘文运，与老大刘文渊适成反比。乡民以其为举人之弟，戏称二举人，实则没读什么书，一直在家务农。小农出身的刘文运，终身不脱小农习性，心眼很窄。二十年代中期六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六弟兄中，他的儿子最多，劳力最强。总认为合在一起过，别的弟兄占了他的便宜。于是协议分家。协议时他又节外生枝，反对平分家产，说他负担重，要求多分一份。好在其他五弟兄都很爽快，各从自家名下划出一些田产，凑足六百亩送给他，才把这事搁平。刘文运自觉难与其他五弟兄相处，遂迁居唐场。其后仍时有龃龉。据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1980年12月8日回忆：“有一年刘文辉从西藏出来，给刘文彩带的鸦片烟。由于交通不便，有一连的士兵每人背了一包，一包一百多两。走到唐场被二哥的儿子掏了心子。心子更值钱”（庄园档案67宗A37卷）。刘文彩一点办法没有。据说刘文运还曾惹出一桩风流案。《百罪图》有个案例——《派机枪逼死农民》，词云：

安仁陈君山，平日全靠帮人过活。1947年11月，被刘季珍强派机枪一挺。陈君山家贫，无法缴纳，只得在刘季珍弟兄开设的“同庆钱庄”抬了二十块大洋的高

利贷，把机枪费交清。到期时，本利已滚到几十倍。陈君山无法付还，被刘季珍弟兄绑来关起，加以拷打，不给饭吃。陈君山足足饿了六天，悲愤已极，终于吐血而死。

除了陈君山吐血而死是真的，再没一点真实内容。熟知内情的当地农民陈春山告诉陈列馆：此案与刘季珍弟兄无关，而是刘季珍父亲"刘二举人"造的孽。案由也不是什么估派机枪而纯粹是桃色纠纷——刘二举人"见陈君山大婆子陈汤氏生得漂亮，和汤氏有关系。是二十几年的四月间某日，刘二举人又在陈君山家和陈汤氏发生肉体上关系，当时被陈君山的二婆子看见，后她马上给陈君山说。陈君山因原来身体就不好，又有'痨病'，加上这一点，当时吐血而死"（庄园档案67宗A37卷）。陈君山有姨太太，说明他并非是什么贫苦农民，陈列馆一份内部材料也承认，陈君山实际上是"小土地出租"、"以前开过烟馆"。烟馆老板陈君山当然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向刘家借什么高利贷，刘家也犯不上为二十几块大洋逼他——恰恰相反，正如那份内部材料所说："刘因和汤的关系，对陈很好"。所谓《派机枪逼死农民》，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

惹出这么一桩案子，刘文运声名多少有些不堪。但说也怪，膝下"八虎"中的头三只"虎"却真的不乏"虎气"——大儿子刘元璋，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二儿子刘元瑭，曾任刘文辉部师长。三儿子刘元琮，曾任刘文辉部师长、副军长。一门出了三个将军，这在将星如云的刘氏家族中，也是仅见的一例。刘文辉二十四军，大半兵力掌握在"刘二举人"的"虎子"之手。因此之故，"刘二举人"怎样天马行空，别人也都睁眼闭眼。

刘文彩不大喜欢他二哥。据其贴身管事刘泽高回忆，

“两家基本上没有往来”（庄园档案67宗D12卷）。

老三刘文昭，则又是一种类型——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文昭右腿略有残疾，行动不便，以裁缝为业。成天伏案缝纫，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其行状很少刊诸史籍。膝下仅有一子，叫刘元树，建国后曾任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及四川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晚年组织“公益协进社”，请刘文昭坐头把交椅，自己屈就副职。素来不问红尘之事的刘文昭这次竟也欣然应允。

老四刘文成，在刘氏兄弟中算得上一方人物。早年经营烧酒坊，家境不过小康。1925年刘文辉升任四川军务帮办，入据成都。刘文成这才发迹——机械修理厂厂长、二十四军机械所所长、四川省戒烟总局会办，一项又一项肥差落到他怀里。最让人眼红的肥差是“机械修理厂”厂长——这机械修理厂原本叫作四川兵工厂，为杨森私有。1925年杨森败逃，四川兵工厂成了“弃婴”。各路军头刚开始打它的小算盘，刘文辉就眼明手快地把它抢了过来。为了平息各路军头的怒气，刘文辉宣布，四川兵工厂转产——不再制造武器而是用来修理机械。厂名相应更改。后来武器倒真的是不再造了，但机械却并没有修多少，所谓“机械修理厂”的主要产品其实是一种半元银币，实际上成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更何况刘文成虽然是个老粗，但“粗中有细，一样善于经营”（《刘文辉史话》第66页）。因此很快告别小康，跻身“大款”行列。有了钱他马上开办银行，取名“成益”，请一个姓陈的商人当总经理。据说他对那位“陈总”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撤换过，而且从来不查“陈总”的账，让“陈总”捞足了油水。刘文成最热衷的则是置田买房，扩大不动产。在成都买的房子为数

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在晚年谈到刘文成时承认：“在其他几个弟兄中，他还算是比较富的。”后来刘文辉退守西康，刘文成官当不成了，便回家享受他的万贯家产。他在安仁有座公馆。如今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序馆，就是当年刘文成晾谷子的晒场。但下野后刘文成大多住在距安仁二十来公里的崇庆县城。一般人叫他刘会办，也有人叫他刘四老爷。有论者称，刘文成田产达四万余亩之多。此说虽不免夸张（据有关资料，崇庆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一万亩，大邑最大地主的田产仅三万亩），但说“刘会办”良田万亩，街房成群，当不为过。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刘文成只有一个儿子，孙儿却有一大堆，每年春节都要用大客车拉他的孙儿们出去，唐场、崇庆、成都到处拜年。

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仍旧不放过一个铜板。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讲过这样一则见闻：1942年夏，幸氏结束公干，从成都返回崇庆。车子还没开到廖浦场，好好的天突然变得乌云滚滚，接着电闪雷鸣，哗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四周顷刻间白茫茫一片。那时的所谓公路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满路泥泞。幸蜀峰在颠簸中隐约看见不远处有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个大个子，还驮着两只大皮箱，明显超载。车夫拉得非常吃力。两车相会时，幸蜀峰吃惊地发现，坐在黄包车里的竟是“刘会办”。幸蜀峰问：为什么不多雇辆车，一车载人，一车载物，走得轻快些？“刘会办”一脸尴尬，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雇的，还要雇的，只是没遇上多的。到廖浦场再找吧”。过了廖浦场，幸蜀峰停下车来，叫一个随从下车到场上看看，“刘会办”是否真的多雇了车。随从回来报告：“刘会办”是多雇了一辆，但和车夫讲了好久

的价。幸蜀峰晚年谈起这事时感叹："如此四万多亩田的刘彦儒如此吝啬！"这则回忆未必可靠——堂堂"刘会办"带那么多行李出门，应该不至于没有一个随从。但刘文成吝啬倒是不假。他的孙子们出去拜年，个个都有赏钱得，但别人家的小孩子给他拜年，却很难指望从他手中得到几个赏钱。

幸蜀峰还称，崇庆有句谚语："美国有钢铁大王，崇庆有粪大王。"这"粪大王"就是堂堂"会办"刘文成——县城四门的粪便全部由他承包专卖。真可谓生财有道。

老五即为本书传主。1887年生，名文彩，号星廷。其早年经历，坊间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刘文彩自小就不务正业。虽然刘公赞对他十分宠爱，刻意调教，不到七岁就送他到私塾馆读书，指望刘墩子再出一个秀才。刘文彩却无心向学，连《三字经》都没背熟就逃学了。刘公赞选送孩子进城读书时，只好惋惜地把刘文彩留了下来，让他跟自己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但刘公赞很快又失望了：只要离开一步，刘文彩就跑得无影无踪。

刘公赞大为恼火，把刘文彩叫到跟前，训斥他说：

"你这个不肖之子，既不读书，又不务农，要走哪一条路？"

刘文彩却抬起头，望着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奇怪地问道：

"天底下就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啦？"

刘文彩选择了一条自己要走的路。

一天，刘公赞忽然发现儿子从安仁镇桥头店的赌场里钻出来。恍然大悟，气得两眼发红，举起手中的旱烟管就要往刘文彩头上砸。刘文彩反应极快，嗖的掏出一大把铜钱，笑嘻嘻地说："赢的"。刘公赞的旱烟管终于未能打下去，只

言不由衷地骂了一声："败家子！"此后，刘公赞天天清点钱罐罐，未见一个铜板流失，就不再责骂刘文彩了。

刘公赞开始注意刘文彩的行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发现刘文彩对周围几十个场镇的行情了如指掌，跟货贩子、袍哥大爷也混得很熟。并且精于算计，见风使舵，在奸诈的赌场里左右逢源，吃不了亏；就特意给他买了一匹马作运输工具，给他一笔本钱，让他在附近场镇做生意。

不足二十岁的刘文彩，从此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赶着马，把家里的烧酒驮到崇庆、三江等地去卖；又从那里贩运货物到大邑、新场出售，换回玉米、煤炭，没一次亏本。

稍后，刘文彩结了婚。仍不改通宵狂赌的恶习。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刘公赞早上起来吩咐雇工备好马，然后告诉老伴叫刘文彩妻子吕氏催"老五"起床，吕氏才埋怨说："他还在桥头店呢！"但刘文彩从不耽误上路，他被叫回来后，简单地吃上几口饭，就牵马上路了。在路上，他才开始舒心地睡觉——在马背上睡。起初，刘公赞还有些不放心，可刘文彩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乐得刘公赞的满嘴花白胡子颤悠悠地抖了半天。

原来，因刘文渊考取功名，刘文彩跟着沾了光——人称"五举人"。刘湘升任团长后，连县衙的官员都要巴结安仁刘家，更不用说乡下的土豪劣绅。刘文彩利用这些人的趋炎附势，很轻松地和当权不当权的地方恶势力攀上了亲。当时，大邑和四川其它地方一样盛行袍哥。大邑袍哥的"总舵把子"是人称"牟二蝗"的牟秉年。牟秉年对刘文彩很赏识，收他为拜弟，并封为小舵把子。刘文彩就以"五举人"和牟二蝗亲信的双重身份，出入大邑和附近各县的场镇，所到之处，备受当地袍哥关照。刘文彩赶着马，一进场镇，自有兄弟伙接应。或买或卖，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在烟馆、赌

场里吩咐一声就行。刘文彩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收了经商的厚利，家里的烧酒房愈来愈兴旺，赚来的钱买了一大片土地。刘公赞对刘文彩也就愈加器重，每次给在外地当官的刘文辉写信，总免不了夸奖刘文彩几句，说他有“经纪之奇才”。

这是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官方版本，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另一个版本是初始文献，见诸庄园陈列馆档案 D1 卷 67 宗。一说刘文彩不擅学而擅商：

> 十一十二岁开始读书，读书很累，坐凳子常东倒西歪。爱爬房子，瓦扣得密的地方还上房顶跑。七八丈高的房子他都跳得下来。先生打他，他跳起来，篾条子飞过去打不上他。先生把他唬来跪倒。平时爱欺侮小同学，读书读不起来，只读了两三年就停了学。在家劳动、扯蒡等。再过两三年家里开起烧（酒）房，他就跟他的三哥刘维三跑，要（吆）牲口，生意开得红火，两匹牲口在外天天驮炭，买玉（米）、麦（子），见米生意等好做就去做。

但这份文献有误——刘文彩不可能与刘文昭合营烧酒房：刘公赞之“别创酒业”由刘文成继承，刘维三只开过裁缝铺。

另一份文献则说刘文彩嗜赌如命：

> 刘文彩自幼习赌，技俩过人，少壮时靠赌为生，夜间常到邻近桥头店作通夜赌，体高大，声音粗莽，呼卢唤雉，扰及邻家，为人所厌。白天农事多，赌不易组

合，只好做一些驮运业务混日子。他买有小马，马房运米入城，因夜赌通宵，每于归途横坐马背上，眉闭眼合以补睡眠，行人见其头俯胸前，随马蹄起落点点摇动，如将脱项，均以为怪。曾在长途贩运时数次坐下马，仍浓睡不醒。幸马力倦怠，亦图休息，停步不前，刘文彩从未受伤。一般人说其为"命大流氓"。

关于刘文彩早年经历的这两个版本没有太大区别——官方版本的主要情节都出自庄园陈列馆两份初始文献。只不过对两份初始文献作了一些"艺术加工"，比如，把刘文彩的入学年龄由"十一十二岁"改为"不到七岁"；把刘文彩"在家劳动、扯薅"改为"到田间地头或烧酒坊当监工"。两则初始文献本来就未尽可信，经过这么一番"艺术加工"，所谓官方版本实际上不过是野史。

那么，刘文彩的早年经历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刘文彩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贫失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文辉与其他几个兄长年龄相距甚大——多则二十三岁，少则十几岁。只与刘文彩年龄相近，而且自小朝夕相处。所以兄弟俩的感情非常特殊。刘文辉最推崇两位兄长，一个是大哥刘文渊，再一个就是五哥刘文彩。但刘文辉对刘文渊敬爱而不"亲密"——"奉之若父"，敬畏大于相知。刘文彩则不同——刘文彩不仅是他的兄长，更是他的儿时玩伴，相知极深。刘文辉得势后，对刘文彩畀倚最重，这是一个基本因素。

年龄稍长，刘文辉到刘家祠堂读书，刘文彩负责陪送，跟着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拣了几个字。一年半载之后，刘文辉能够自己上学了，刘文彩的陪读生涯也就到了头。那时他已经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刘公赞不能不为他考虑出路问

题。刘公赞几个儿子，或充士，或务农，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刘文彩能经商，开爿门面，士农工商不就样样齐全了吗？而且刘文彩虽学识不多，但不乏机敏，经商未必会处下风。就让他农闲时走街串巷卖烧酒。跑了几年，刘文彩入了门，便与族中别的人家合资开办烧酒房。烧酒房而外，还曾与刘湘父亲刘文刚合营水碾一座。

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就是刘文彩早年经历的大致情形。他的这段早年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余。其长成后操"十万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单是凭借乃弟刘文辉的权势，也是凭借他早年的摸爬滚打。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阴阳互补，珠联璧合。正因为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三十年而不倒。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

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舰长无疑是老幺刘文辉。刘氏兄弟中，对刘文彩人生轨迹影响最大的也是刘文辉。撇开刘文辉，刘氏家族和刘文彩个人的历史都将无处落笔。

刘文辉生于1895年。老来得子，刘公赞对他宠爱备至。虽然在他之先，刘文渊已功成名就，但刘文渊仅仅给刘家带来名望，而没能带来权势。刘家既要名望，更要权势，中间四条汉子都不足膺此重任，刘文辉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公赞最后的希望。所以刘文辉自小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确实卓尔不凡，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十三

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就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而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另发议论——

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

离题万里，夸夸其谈。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果见品貌不俗，当场破格录取。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 年毕业时，军阀混战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毕业回川，第一个给刘文辉接风的是邓锡侯团长。邓锡侯也曾就读于成都陆军小学，比刘文辉高两级，在陆小过从颇密，知道刘文辉非等闲之辈，有意挽留，又总觉得自己的池子小，养不住刘文辉这条大鱼。刘文辉也觉得在老同学手下干不光彩，就找了个理由，说他要先回安仁拜见父母，谋职一事从长计议，靠这番话从窘境中脱了身。回安仁住了七八天，便在大哥刘文渊的陪同下，到成都拜访刘湘。

此时的刘湘，已升任川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四川政坛初露头角。按理，看在族长刘文渊的面子上，怎么着也该给小叔刘文辉一个美缺。刘湘对一表人才的刘文辉确实赞赏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刘文辉在自己麾下，却叫两位堂叔去见第二师师长刘存厚，随即用电话通知刘存厚关照刘文辉。刘存厚接到电话，不敢怠慢，军校毕业生到职，最多给个中尉；刘存厚却马上下条子，委任刘文辉为第二师上尉参谋。这不能不说是破格提拔了。事后兄弟俩分析刘湘用心，刘文辉说："说真心话，纵然他留我在他的部队，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碍手碍脚，不是个

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还说是抱了粗腿凭门子。我就要自己闯，哼，我才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挡了他一下：“年少意气盛，固属自然，虚心谨慎，却至关重要。”

刘存厚是个有眼力的人，看出刘文辉是个将才，不禁喜气洋洋。他并不体会刘湘不用刘文辉的苦衷，反而讥笑刘湘有眼无珠。这话不知怎地传到刘湘耳朵里，刘湘只装作没听见，暗想：“既是将才，我用不成，你也别用了吧！”便对刘文辉的前程表示格外关心，一纸引荐信，把刘文辉支到了乐山。刘存厚一场空欢喜，气得跺脚大骂。

刘湘的面子又起了作用。刘文辉刚到乐山，就被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委为二十九团二营营长。陈洪范很快发现，他没用错人，过了一年，再给刘文辉提了一级。既因家族关系而得刘湘臂助，又因才气过人而得上峰赏识，如此双翼齐展，刘文辉扶摇直上，毕业不到三年就当了团长，升迁之速，川军中绝无仅有。刘文辉因此自视更高。急于扩展个人势力。他与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三十团团长胡执中、筹饷处处长张荣芳等实权派军官义结金兰，形成一个六人小团体。第八师精锐尽在六人手中，坐大之势，隐约可见。

1920 年 5 月 24 日，夏麦登场时节，川军发起驱逐滇军之战。刘文辉部进入作战序列，其指挥有方，令军长刘成勋赞叹不已，不和陈洪范商量，就径直封刘文辉为少将衔独立旅旅长。陈洪范岂能容忍，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质问刘成勋：

“勋公，你身为长官，竟越级提拔我的部下，这不是挖我的墙角吗？这合乎情理吗？”

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为了稳住刘文辉，陈洪范只能顺水推舟，委刘文辉为旅长。刘文辉知道陈洪范不过是虚与委

蛇，实际上已对自己心存疑忌，不敢驻足陈洪范卧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以战备行军方式，率部从原驻地乐山直奔青神。但青神仍距第八师太近，随时有遭人暗算的危险，究竟何去何从？刘文辉大费踌躇。召集谋士计议。谋士异口同声地怂恿他移师叙府（今宜宾市）。

“旅长，到了叙府，陈洪范就莫奈我何了，我们就真正独立了。”

“自乾公，叙府可是胜地，我不取之，人必取之，先下手为强啊！”

刘文辉听着谋士七嘴八舌的议论，终于下了决心：

“叙府确实是扩大部队的好地方，我们就去叙府吧！”

此时，刘文辉虽与陈洪范不欢而散，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还存在。遂呈报陈洪范，“仰请赴叙整顿”。陈洪范明白刘文辉已经是一只留不住的孔雀，便送个顺水人情，划行同意。刘文辉师出有名，兴冲冲望叙府而去。叙府原本由滇军驻守，滇军势单力薄，闻风而退，刘文辉不战而胜。

叙府是长江起点的第一个都市，幅员辽阔，物产丰饶，又当云南、贵州入川孔道。在没有铁路交通的情况下，构成水陆交通枢纽、云贵货物的集散中心。据有叙府，自会财源滚滚。就军事角度而言，叙府依山傍水，可战可守。如此胜地，轻松得手，刘文辉喜上眉梢，在旅部聚众摆筵，好不热闹。

与此同时，刘湘升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文辉是打着陈洪范的旗号去叙府的。刘湘有意再拉他幺爸一把，遂委任刘文辉为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完全脱离陈洪范，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我们今天所知的军阀，莫不青面獠牙。其实不尽然，吴佩孚、陈炯明都有些清名，刘文辉的老上司陈洪范也算一个

好军阀。与刘文辉义结金兰的三十二团团长冷寅东回忆：“陈崇尚儒家学说，强调以孝治军。”军民关系也不错——“当时全川防区制已经形成，陈八师驻防的乐山地区，地广产丰，山区多种烟土，但陈洪范本人廉洁克己，约束部下严格……因此老百姓说，其它防区是地狱，陈八师防区是天堂。”就陈洪范与刘文辉个人关系而言，陈洪范不仅于刘文辉有知遇之恩，在和刘文辉分手时，也还表现得相当宽容，有长者气度。刘文辉却似乎深得曹孟德心传，不念旧谊。后来陈洪范被逼下野，刘文辉则蒸蒸日上，出任四川省军务帮办。冷寅东认为刘文辉和自己一样受过陈的提携，恳请刘文辉以军务帮办身份，保荐陈洪范作四川盐务使，刘文辉完全听不进去，坚决反对。陈洪范失兵权于前，又痛人心不古、被人落井下石于后，遂返回大邑，隐居陇田，心情抑郁，终致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活画出一幅人生悲剧图。

自承风华正茂，刘文辉高视阔步，壮志凌云。他的一个部下讲：“我们的旅长胸怀广大，见解卓越，深得官兵信赖。来到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他简直平步青云，更富有自信心，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刘文辉史话》第44页）刘文辉通过其切身体验，深感“事在人为”，决心进而统一全川，策源地则为叙府。为此他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旧时无官不贪，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与刘文辉并肩而舞。

从1920年起，刘文辉开始其军阀生涯。刘文辉的军阀

统治不同于一般的军阀统治，而带有浓厚的家族印记。刘文彩作为聚敛大员，竭尽罗掘之术，从经济上充分保障了刘文辉的军事和政治需要。这种以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家族政治特色，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真正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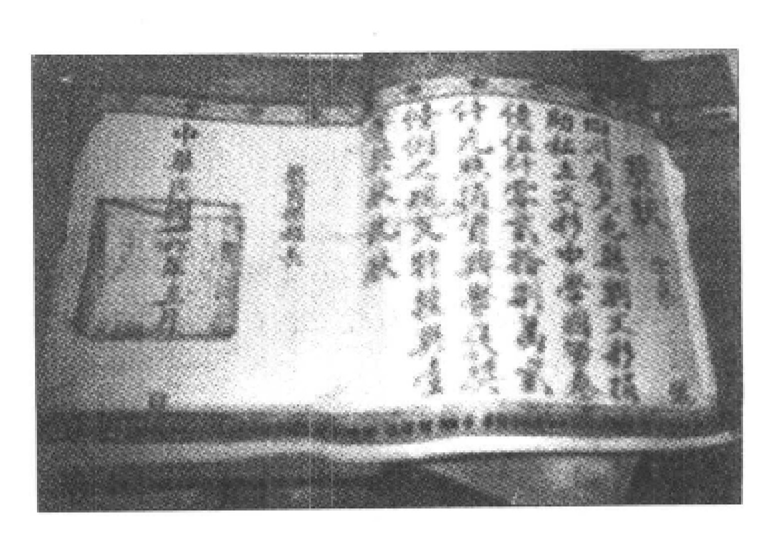
刘文辉对刘文彩的推崇，其部属早有领教。1919年刘文辉驻防乐山，副团长辜勉之住在刘文辉官邸对面。有天中午，辜勉之突然听到对面房间喊“接客”，喊“上菜”、“摆饭”，人声鼎沸。过了许久听说“送客”。辜勉之不知何方神圣驾到，就到窗前打量。但见客人头缠蓝布包头帕，身穿蓝布长衫，套一件陈旧的青布背心，脚蹬粗草鞋，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辜勉之大惑不解，问弁兵此人姓甚名谁，弁兵说：“是团长的五哥五老师。”及至后来于叙府相遇，“五老师”刘文彩已赫赫煊煊是什么“长”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

第七章

权　力　学

务勉日新志共
守歲寒心
四川大邑私立文彩中学
第一屆畢業同學錄
孫科題

1. 孙科（孙中山之子，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为文彩中学题辞。
2. 国民政府颁给刘文彩的奖状



隔三差五，兄弟俩都要在此一聚……

刘文彩到叙府是1922年冬，这时，乃弟刘文辉在叙府已经营了整整两年。

当时情景，《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有如下描述：

> 初出茅庐的刘文彩，头戴瓜皮小帽，身穿洋缎马褂，一到叙府，就立刻被它热闹繁华的景象迷住了：宽阔的江面上船来船往，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街道上商旅、游客熙熙攘攘，茶楼酒肆里顾客满堂……。这一切使刘文彩格外眼热，不住地赞叹说："好安逸的地方，早晓得该把烧酒房搬来开！"

烧酒房当然没能搬来，因为对此后的刘文彩来说，烧酒房赚的那点钱已是蝇头小利，不足挂齿了。

刘文彩先住在小北街的新盛旅馆。刘文辉的旅部则设在城内的府城坝。翠屏山和真武山像两扇屏风峙立在城外，林间空地既是刘家军演练之所，也是刘氏兄弟漫步闲谈之处。隔三差五，兄弟俩都要在此一聚，踏满地落叶，听一川怒涛。许多兴家立业的大计，都发端于此。

到叙不足两月，刘文彩即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春，杨森挑起"统一之战"，为杨森所迫，刘文彩兄弟退集重庆。8月杨森败逃湖北。刘文彩返叙，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收编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扩展到乐山、眉山、仁寿一带。年仅三十岁，即身兼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

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天各一方，但却“天涯若比邻”——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

捕虎设阱，驭牛加轭，这便是所谓权术。刘文彩《三字经》都没读完，按说不懂什么治乱之道，对权术却能无师自通。

先讲一段故事。

叙府东岳庙街有家玉器商店，老板邱少云，在商界小有名气。虽然兵荒马乱，一般商家只能勉强维持，邱少云的玉器商店却始终是红红火火。半辈子下来，很积攒了一些家产。这邱老板财大气不粗，处世谨小慎微，从来没有过仇人。可突然有一天，他的两个小儿子失踪了。一家老小敲锣打鼓满街找，连影子也见不到。邱少云早就入了袍哥，这时便拜托“码头”代为打听。到底是“码头”神通广大，几天之后就送来消息——两个小孩藏在凉水井附城乡团总李清和家。原来，李清和是袍哥“合叙同”大爷雷辛之的拜弟。雷辛之则是叙府头号恶少，酷好烟赌，赌场上亏红了眼，就勾结李清云和另一个“合叙同”兄弟伙、团练大队长赵兰亭胞弟赵幺和尚，打伙“抱童子”，盯上了邱少云的两个小孩。趁两小孩在东街玩耍，没大人照看，雷辛之用糖把他们哄到西门外洗脚桥下，一把抱走了。邱少云得知内情，自认倒

霉，愿出两千大洋赎回人质。哪知道雷辛之贪得无厌，嫌两千元少，仍扣住人质不放。邱少云急了，请“码头”出面与雷辛之交涉。“码头”派大爷张麻脑壳，带上七个兄弟伙去李清和家说情。其中一个叫安子成的兄弟伙，是鸦片经纪商，途中突然想起有笔生意没落实，就折了回去，侥幸拣回一条命。

一行人匆匆走过较场坝，碰到了雷辛之。彼此都是江湖上的老相识，不免攀谈几句。雷辛之听他们说要去李家，很诧异：赎金还没谈妥，怎么就去李家领人呢？大怒，转身就派兄弟伙通知李清和“了断“。七人赶到李家，见邱少云的两个儿子正在院子里游戏，活活泼泼，一个个都放了心。李清和早在家恭候，杀鸡炖膀，款待来客。席间李清和许愿，吃了饭就让他们把邱家小孩带走。然后一巡一巡地劝酒。客人信以为真，全无防备，敞开肚皮吃喝。喝到太阳落山，不胜酒力，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这时李清和先摇醒张麻脑壳，“请张大哥到外面讲话”。张麻脑壳晕晕糊糊地跟着出去，赵幺和尚已经手提马刀，站在茅坑边等着了。“请张大哥这里来说，”张麻脑壳不疑，走上前去，一刀劈进茅坑里。其余六人同样处置。接着把邱家两个小孩也拉来杀了。附近一个老太婆听见声响，赶来查看，也被赵幺和尚砍倒在地。一共杀死十人。最后用门板盖住茅坑，再用泥土埋住门板，栽上青菜，仿佛真是一块春意盎然的菜地。

但到底是纸包不了火。七人有去无回，少不得又要惊动“码头”四处打探，一打探便真相大白。仇家咬牙切齿，死者冯子通的父亲冯孝先更是印了一大抱“冤单”上街散发。“叙荣乐”大爷田心初收了几份“冤单”给雷辛之父亲雷东垣看，雷东垣对儿子闯祸早就习以为常，不怎么放在心上。稍后便满面春风地在客厅宴请宾客，庆祝乃母七十大寿。可

就在这时，愤怒的仇家敲锣打鼓找来了，堵在雷东垣门前呼天抢地，大把大把地撒黄钱。市民闻讯，纷纷赶来观看，雷家门前一时人山人海。雷东垣万万没料到会有如此风景，暴跳如雷，当着众宾客的面，拔枪要杀雷辛之。老母亲赶紧将他拦住，众宾客也苦苦相劝，客厅里顿时乱成一团。雷辛之则趁机脚底下抹油——开溜了。

“九人头案”轰动全城，雷家极为被动。叙府城防司令覃筱楼之妻也姓雷，认雷东垣为义兄。覃筱楼亲自出马，劝雷“大哥”大义灭亲，“绑子上殿”，免得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此时雷辛之音信全无，哪里去绑？纵然找得着，雷东垣又何尝真的愿意去绑！无奈仇家天天喊冤，社会各界群起抨击，雷家成了千夫所指，简直度日如年。雷东垣不能不硬着头皮出来收拾残局，托人劝慰仇家，并答应赔偿经济损失。花费好一大笔钱，总算将仇家的口暂时封住。后来死者家属到案发现场掘尸，门板上的青菜都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庄园档案 67 宗 D16 卷）。

这桩凶案，刘文彩似未与闻。六十年代宜宾市政协编写的《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却指控刘文彩“不惜枉法以买雷心”——“尸家屡屡告状，刘文彩暗中竭力包庇，使此案久不得伸”（庄园档案 67 宗 D2 卷）。此说未必可靠——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刘文彩对“九人头案”施加了个人影响。不过，即使刘文彩没有插手，也不是毫不相干——1925 年刘文彩接管叙府，“九人头案”已成旧闻，却是余响未绝；死者家属并不情愿“私了”，只不过慑于雷家权势，而不得不暂且委曲求全罢了。倘刘文彩与雷家有隙，完全可以当个“清官”玩玩——怂恿死者家属把雷家送上法庭，来次“包公审案”，让雷家家破人亡。所以，刘文彩没有插手“九人头案”，不等于插不上手。插不插手，究竟怎

样插手，全取决于刘文彩的好恶。换句话说，“九人头案”实则是雷家授人以柄，刘文彩从此挟持了雷家，客观上成了“九人头案”最大的受益者。

但雷家的心病并非只此一桩。雷家既强横，且贪婪。近十万大洋城工局经费，雷东垣长期挪用，在当地几乎是人所共知。凭这一条，刘文彩就可以让雷东垣下狱，却毫无动作。甚至在军费紧张而不得不将防区所有“公田”“公产”作价变卖时，也没有过问雷东垣挪用的近十万大洋。刘文彩当然不会不把那十万大洋放在心上。有则插曲很说明问题。二刘大战后期，刘文彩准备放弃叙府，便认为没有必要笼络雷东垣了，一天数次派人催交城工局经费。雷东垣无法推脱，又实在舍不得交还，就问了一卦，想从神灵那里预卜刘家军的胜败。若是胜，他自然惹不起刘文彩，怎么着也得交；若是败，他就没什么好怕的，暂时出去躲一躲，等刘文彩败退后再回叙府不迟，十万大洋就可以一毛不拔了。雷东垣一卜大喜。据曾在刘文彩幕府任科长的张衡先回忆，他奉刘文彩之命到雷家催款，正碰上雷东垣问卦。雷一脸灿烂地告诉他，卦文是“伤悲，伤悲，此时尚能插翅飞，烽火流连三五日，一片洪水往西归”。并解释说：“这卦之明文道破刘文彩三五日就退回大邑老家去。我决定避避了事。”第二天一早，雷东垣果然跑到天池乡躲了起来。张衡先是雷东垣的门生，自然要为他的老师守口如瓶。刘文彩岂能看不出雷东垣的用心？气得大骂：“这两个老杂毛(另一个指杨惠泉)躲着不见我，总有一天要碰在我的三尖石上。”

官场之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雷东垣与刘文彩也仅仅是互相利用而已。“九人头案”和城工局公款事件，在雷东垣是作茧自缚，生杀予夺，莫不操诸刘文彩之手。雷东垣受制于人，甘拜下风，对刘文彩曲意逢迎。

这雷东垣究竟何方神圣，值得刘文彩如此用心？他本名雷士奇，因在家排行第四，故人称“雷四爷”，清末即统领叙府团练，历二十余年，当地民团莫不奉他为马首，门生故旧更是遍布城乡。防区时代的川军到了叙府，都要先拜访他，聘为顾问官或谘议官，尔后筹粮措饷，才有着落。雷东垣之于叙府地方势力，犹如纲之于网、领之于衣、枢纽之于机器。刘文彩也就把驾驭雷东垣视为控制叙府的先着，不惜血本。

刘文彩的苦心没有白费。宜宾县九十多个乡镇，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四路团总都是雷东垣的心腹，“刘文彩勾结了雷，所谓宜宾的四路诸侯也就直接作了他的爪牙。”一个个加官晋爵。东路区团总曹荣光做了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北路区团总虞汉逵做了宜宾县财务局局长。南路区团总肖席珍更得意。云南盐津烟土销往四川腹地，必经宜宾横江。刘文彩便在横江特设禁烟查缉处，收取巨额烟税。肖席珍人枪数百，实力居四路诸侯之冠。而且盘踞横江镇，专门护送往来烟客。稳住肖席珍，横江通道就能万无一失，刘文彩在横江的巨额收益就有保障。何况肖席珍常常代烟客上缴“特税”，出手就是数万大洋。刘文彩对肖席珍自不能不另眼相看。虽然肖目不识丁，后来仍安排他做了筠连、屏山两任县长，是四路团总中官位最高的。

四路团总中，最不得志的是西路区团总李国卿。李国卿认刘文彩为干父，因而有“御儿干殿下”之称。名分不轻，仕途却并不因此看好。曹荣光当了征收局长，他很眼红，想捞个财政局长当，向“干爸爸”伸手要官。据说刘文彩已经答应了，揭榜时，李国卿的大名却换成了虞汉逵。原来虞汉逵早在不动声色之中打通了门路，李国卿一场空欢喜。李不干，找“干爸爸”说理。刘文彩劝他不急，“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局长也会有的，只是要等一等，让虞汉逵做满一届再说。李国卿听了转忧为喜，老老实实回家等。但他实在是缺乏耐心，天天望眼欲穿，离虞汉逵届满还差好长一段时间，就按捺不住了，几度致函虞汉逵：打算何月何日何地办理交接手续？同时大张旗鼓地“组阁”，到处物色科秘人员。虞汉逵做财政局长刚刚做出感觉，哪里愿意交接呢？但李国卿毕竟是“御儿干殿下”，轻易冒犯不得。就向“老师”雷东垣和宜宾县县长沈眉荪求救。大概他烧香比李国卿烧得周到，雷东垣和沈眉荪都愿意为他两肋插刀。两位“元老重臣”一起找刘文彩，说李国卿仅有匹夫之勇，粗率无文，可以在乡下称王称霸，却不配当堂堂财政局长。最好马上收回给李国卿的许诺，免得成天纠缠虞局长。刘文彩想想也是，但又不愿直接出面收回承诺——那岂不成了自打耳光？雷东垣见刘文彩犹犹豫豫，猜破了刘文彩的心思，便问：总办是不是说话不方便？那好办，只要总办点了头，这事就由我和沈县长去办好了。过了些日子，虞汉逵根据雷东垣的授意，在府中设宴，主宾李国卿，特邀刘文彩、雷东垣、沈眉荪到场作陪。席间，虞汉逵言辞恳切地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自己书读得不多，这财政局长当得太累，做完这一届就不做了，还是请几位老前辈物色饱学之士来担当此任吧。雷东垣、沈眉荪听了大摇其头，都说虞汉逵过谦，其实书读得已经不算少了，人才难得，下一届财政局长，仍非虞汉逵莫属。李国卿听了暗暗叫苦，想直说又不敢驳老师雷东垣的面子；于是坐立不安，频频用眼角瞟刘文彩，盼望刘文彩为他力挽狂澜。刘文彩吃得津津有味，不发一言，好像根本没看见李国卿的眼色。那边厢，虞汉逵在雷东垣、沈眉荪的“苦苦挽留”下，终于答应勉为其难，再做一届财政局长。至此大局已定，李国卿的局长梦又一次泡了汤。

李国卿是典型的黑李逵，没多少城府。虽然官场上不甚得志，因刘文彩私下待他不薄，他对刘文彩也就始终忠心耿耿。二刘大战后期，雷东垣等人对刘文彩避之惟恐不及，李国卿却仍然一门心思为刘文彩卖命；刘文彩从叙府撤退时，李国卿率部保驾，一直护送到犍为才依依惜别。因他跟刘文彩太紧，与雷东垣渐渐疏离，刘文彩退居安仁后，就再没靠山了，不久即遭月波乡土豪吴炯臣杀害。

曹、虞、肖、李四路“诸侯”是雷东垣的主要班底，现在为刘文彩所用，刘文彩也就底气十足，着手全面改组叙府民团。他把原有四路改为东一区、东二区、南三区、南四区、西五区、西六区、北七区、北八区、北九区。总的原则是化整为零，以便分而治之。每区置团总一人，团总初选名单由雷东垣和沈眉荪提出，最后由刘文彩圈定。计有韩泽生、何惠清、李徽林、梁吉之、李国卿、吴炯臣、江少甫、郭翘楚等。九位新团总除韩泽生外，都是雷东垣的门生。而韩泽生也不是外人——刘文彩最宠爱的姨太太凌君如，原本是财政局长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拱手相让，可见曹刘关系之亲密。韩泽生则是曹荣光的儿女亲家。

区团总都是有枪有钱的实权人物，刘文彩对他们不敢小觑。《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他知道每个区团总进城都要拜访雷，就吩咐雷：‘只要有区团总进城找你，都可领来与我会面。’而这些区团总只要与川南王见了面，就感到无比荣幸，更体贴地为刘办事，还到处宣扬说：‘总办硬是好，他事必躬亲。’”这样，受益于雷东垣的臂助，刘文彩将叙府民团牢牢抓在了手中。抓住了叙府民团，则退可以保境安民，巩固刘文彩对叙府的统治，从而稳定刘文辉部队的财政基地；进可以冲锋陷阵，配合刘文辉部队攻城略地。及至后来刘文彩就任“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辖

下三千兵马，仍多源于叙府民团。俗语云强龙不压地头蛇，刘文彩这条“强龙”却压得住地头蛇，从1925年冬到1932年冬的七年间，刘文彩与地方实力派一直相处甚洽，地位从无动摇之虞。如此殊绩，不但靠刘文辉撑腰，也与刘文彩老辣的政治手腕有关，尤其与降伏雷东垣有关。

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刘文彩收容了雷东垣的全套班底，在枪杆子方面没什么隐忧了。便腾出手来，向叙府文化界渗透。

刘文彩结交的文化界名流，首推杨惠泉。《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大劣绅杨惠泉，是清朝的举人，孔孟之道的信徒，常以‘清高’沽名钓誉，在叙府地区有些名望。刘文彩自知才疏学浅，要在这里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这可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帮凶。刘文彩说服二老婆杨氏，从保险柜取出银圆五千块，为了不伤害杨惠泉的‘清高’，用‘上会’的名义送给他。后来，又赐给他商会文牍、伪十八团顾问一类拿钱不干事的闲职，就把他收买过来，做了自己的狗头军师。”实际上，杨惠泉为刘文彩究竟帮了哪些“凶”，《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和其它揭发材料都语焉不详。杨惠泉就一点虚名，本来也帮不上刘文彩什么忙。刘文彩待他不薄，主要是出于对文化人的敬重。但杨惠泉最终和雷东垣一样让刘文彩大失所望——雷东垣挪用的十万元大洋，杨惠泉也分润了一些。听说刘文彩催款，杨惠泉心虚了，去找雷东垣商量对策。途中碰到雷的一个门生，得知雷已逃走，不禁气急败

坏——怎么招呼都没打一个就自己先溜了？马上朝那位门生指示的方向追去，找了两个地方都找不着；还不死心，又去雷家，碰巧遇到雷的弁兵回来取日常用品。弁兵见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可笑又可怜，就把他带到雷藏身的地方，这才避开了刘文彩的风头。刘文彩气恼之极，把杨惠泉也臭骂了一顿。

刘文彩结识的另一个文化界名流，是叙府联立中学校长邓迪斋。邓迪斋不仅在叙府文化界呼风唤雨，还是个典型的政治活动家——于"党"，他是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商人部部长；于"军"，他可操纵宜宾西路民团，"这一路有许多条团枪，邓可召之即来"。刘文彩对他也就格外器重。1925年，厚黑教主李宗吾以四川省视学身份，到叙府联立中学主持毕业考试，因考试过严被学生饱以老拳。刘文辉极度震怒，下令将联中校长邓迪斋撤职查办。但仅仅几年后，邓迪斋便东山再起——刘文彩自作主张，要邓接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按常规，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应由省府委派，邓迪斋并未接到省府委任，不免有些犹豫。刘文彩则成竹在胸：所谓省府无非是刘文辉的同义词；他出面斡旋，刘文辉还会不给面子吗？因此要邓大胆接任，一切由他担待。邓迪斋对刘文彩感恩戴德，从此亦步亦趋。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曾散发小册子，揭发二十四军劣迹；联立中学、中山中学并爆发反刘学潮。身为国民党宜宾县党部负责人的邓迪斋却站在刘文彩一边，镇压学潮，开除学潮领袖，因此而被县党部撤消党内一切职务。邓迪斋怀恨在心，不久，中共地下党员、中山中学校长吕一峰遇刺，逃到覃筱楼家里才得脱身；刘文辉部团长蒋东海则率部捣毁县党部和中山中学，时人多指该两案为邓迪斋策划。其说虽无凭据，但邓迪斋在这些冲突中继续旗帜鲜明地支持刘文彩则属

确切无疑。吕一峰遇刺后他曾在县党部墙上赋诗一首，冷嘲热讽：

打倒何如倒无凶，狐假虎威一般同；
未拿卢布先尝味，覃筱楼高锁一峰。

刘文彩结交文化界名流，有多种动机：既出于一个半文盲对文化人的敬重，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和绝大多数四川军阀一样，刘文彩兄弟竭泽而渔，激动民愤。因此必须在文化界物色“头羊”，从而掌握“舆论导向”，扭转在舆论界的被动局面。

此外，刘文彩还仿效雷东垣，广为罗致门生。最早罗致的是清末秀才黄少波。黄少波在府道衙门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投身秘密社会，成了叙府袍哥的风云人物。叙府袍哥最大的山堂“叙荣乐”有三个总舵把子，一是刘文彩心腹曹荣光，次为同样与刘文彩私交甚笃的宛玉亭，再就是黄少波。作为袍哥头目，黄少波耳目极多，对社会动态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刘文彩报告。实际上成了刘文彩的“包打听”。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正准备上街散发声讨二十四军的小册子，黄少波就已经向刘文彩告了密。因为“政绩”不凡，黄少波官运亨通，拜门不久即出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继他之后，拜门者纷至沓来，最受赏识的有刘馥光、裴子宽、虞浩初。据说刘馥光很会“体贴”人，尤其会“体贴”刘文彩，刘文彩也就常常牵挂着他，“当时只要是地方人请刘文彩作客，刘必问：‘有馥光没有？’”后来安排刘馥光任宜宾县禁烟査缉处处长，让他很捞了一把。裴子宽“体贴”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前程似锦。裴与富商何耀光竞选商会会长，何腰杆很硬——既有城防司令覃筱楼

做后台，又有商界同仁捧场，因而志在必得。殊料裴子宽虽名不见经传，却气势更足——“老师”刘文彩撑腰，城防司令覃筱楼何足畏哉！刘文彩“钦定”裴子宽，但并不直接表态，只让雷东垣在前台助威。自己以中立姿态，在护商处召见双方，名为调停，实则暗示何耀光自动放弃竞选。何耀光不知底细，坚持要奉陪下去。结果名落深山。裴子宽“当选”后兴高采烈，到处炫耀：“我早知道一定成功，两位老师哪会让我失败呢？”这年刘文彩过生日，裴子宽特地订做了一块金匾，用门生名义送到刘文彩公馆致谢。

说到虞浩初的拜门，就不能不说到刘文彩的赌。据说早年刘文彩已是嗜赌如命，到叙府后发扬光大，更赌得昏天黑地。他赌技过人，但牌风很不好。一次，南三区团总李徽林和雷东垣、刘馥光一起陪刘文彩搓麻将，开始刘文彩手气不顺，好长时间没糊过牌。李徽林则如得神助，打一局糊一局。刘文彩正在没精打采的时候，下手打出一张二条。刘馥光是刘文彩的上手，但刘文彩不等刘馥光出牌，就把手中的牌一推，大叫：“啊哈，糊了！”原来他清一色的二条。这时刘馥光悄声对刘文彩说：“总办，你看我的牌才好哟！”刘文彩偏过头一看，刘馥光也是清一色的二条。两人不动声色，马上和了牌。这一局按理该刘馥光赢，结果因为刘馥光的“体贴”，刘文彩“一捆三”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新上任的兴文县县长梁祝三陪刘文彩在护商处打牌，梁祝三初来乍到，不懂刘文彩打牌的规矩，偷看了刘文彩一手牌。那一局梁祝三赢了刘文彩两百大洋，他觉得自己的牌够大的了，没多赢刘文彩算是客气。哪知道回兴文不久就遭刘文彩撤职。刘文彩败退安仁后，梁祝三一家还客居长宁县安定桥，贫困潦倒。谈起和刘文彩打牌之事，气不打一处来。

虞浩初到刘公馆拜门，时机很不凑巧——刘文彩正在护

商处打牌，因此不能不费些周折。刚得到通报，刘文彩根本不挪窝。虞浩初等了一阵子没动静，千言万语地央求弁兵催禀。催一次不挪窝，催两次三次还是不挪窝。再催，刘文彩火了，桌子一拍说："来拜我的门，学什么？学打牌吗？我还没学好呢！我不高兴去！"弁兵吓的再也不敢吱声。又打了两局，牌友雷东垣停下来，对大家说："浩初也是一片诚意，倒不好拒绝。我们都随五哥回公馆打牌吧。"这才一同上路。虞浩初在刘公馆坐等了好几个钟头，若非雷东垣圆场，纵有诚心也不得其门而入。但入门后刘文彩确实待他不薄——很快出任宜宾县教育局局长。岂料虞浩初官瘾还没过足，四川省政府就派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岷江大学教授梁士夔接任，虞诚惶诚恐，求助于刘文彩。刘文彩要他沉住气，拒绝向梁氏交印。按当时惯例，初到叙府的大小官员，均须先向刘文彩报到请示，否则不能到差接事。梁按例造访，刘文彩避而不见。却托人转告梁："教育厅委你，你找教育厅当局长去。"并扬言：若梁氏"耍赖"不走，就派警察将他"护送出境"。梁氏只好卷起铺盖走路。虞浩初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刘文彩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在他权势最盛时，社会上传说他有所谓"四熊"、"二壶"、"四副官"。"四熊"即"人熊"雷东垣，"马熊"杨惠泉，"猪熊"梁益州，"狗熊"张汝贤。"二壶"都是在经济上为刘文彩充当智囊的实业界头面人物，即"茶壶"李北衡——亚细亚公司经理，"夜壶"陈秀山——宜宾县商会会长。"四副官"则都是刘文彩的贴身随从（庄园档案67宗D16卷）。其实刘文彩的班底比传说的还庞大。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群从昆弟，咸据要津，号令

一出，莫不风从。《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每次派款，刘文彩也亲自到场，但只把派款数目、期限和上峰命令不可违、否则严办几句话说完就走了，以后就是雷（东垣）经手。而每次无论摊派多少，总是通过以雷为首的这伙土劣搜刮，如期完成交给刘文彩。"群雄拱卫之下，刘文彩盘踞叙府之势，自难移易。有他盘踞刘文辉部队最重要的财政基地，刘文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从容坐镇成都，与其他"军头"斗智斗勇。刘文辉对其五哥的"政绩"非常满意，因而不断地委以重任。数年之间，刘文彩由叙府船捐局局长而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而叙南护商事务处处长，而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而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直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宜宾等十三个叙府辖县，及非叙府辖县的江安，全部归刘文彩主治；二十四军防区的其它数十县，所有税收一律送缴"川南税捐总局"转解；各县对"川南税捐总局"均用呈文；各县征收局局长、禁烟查缉处处长等财政要员的任免经刘文彩认可才算有效。实际上，刘文彩的辖区并无一定，二十四军军旗插到哪，他的权杖就指到哪。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构成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没有到手；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没有降服。

刘文彩仍然要面对挑战。

覃筱楼，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少时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尤好赌博，赌技平平，却屡败屡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无力偿还，干脆投身为匪，啸聚数百人马，出没于川滇交界的莽莽群山之中。他比刘文彩小一岁，但比刘文彩发迹早。1920年，刘文彩还在大邑走街串巷卖烧酒，覃筱楼已接受陈洪范的招安，被任命为支队长，驻防屏山县城。覃筱楼从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温文尔雅的陈洪范哪能奈何得了他。身上那套军官服还没穿暖和，他又落草为寇。这次落草为寇是"官逼民反"——当上了"官军"的覃筱楼支队匪性不改，时常打家劫舍，老百姓怨声载道。一次，覃筱楼盟弟周某行劫被捕，覃出面保释，县知事正想杀一儆百，哪里肯从，随即将周某枪杀示众。覃又羞又恼，寻机报复。稍后，即派部属石肇武途中设伏，生擒知事，在中都场将知事斩首。陈洪范再怎么大量，也咽不下这口气，派了两个团前去围剿。覃筱楼打不赢就跑，又躲进川滇边界。但这次他只当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山大王——1921年刘文辉升任混成旅旅长，混成旅只是个招牌，刘文辉的实际兵力仅一个团。因此急需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文辉有个智囊叫宁子州，正好和覃筱楼有些私交，自告奋勇去招安。覃筱楼就这样投奔到刘文辉的麾下。因他勇猛剽悍，打仗很卖力，深得刘文辉器重，不久就当上副官长。后来刘文辉升任川军第九师师长，又提拔覃为骑兵团团长。1925年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已升任第六混成旅旅长，全权负责叙府城防。

刘文辉麾下的覃筱楼，依旧桀骜不驯。他对刘文辉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也只服一个刘文辉，别的都不放在眼里。刘文辉移师成都，覃在叙府便百无禁忌，为所欲为。第六混成

旅又成了穿制服的恶棍。该旅有四个侦缉队，四个队长都有自己的雅号：第一队队长杨绍林雅号“胖官”，第二队队长潘海云雅号“鸡脚神”，第三队长陈德芳雅号“吴二爷”，第四队队长卢雨三雅号“小鬼”。军需处处长罗吕三也有一个雅号：“疯子”。这五人都是覃筱楼的亲信，他们仗恃覃筱楼的权势，摆赌抽头，奸淫妇女。甚至设厂制造吗啡，运销上海，再从上海购回军火倒卖给土匪。借口清共敲诈勒索在他们更是家常便饭。高县地主魏长顺之子魏起功本是纨绔子弟，却被杨绍林的侦缉队认作“共产党”逮捕。除在押解途中敲诈四百元免上脚镣手铐外，又通知魏长顺送去一万元赎金。刘文辉本来对覃筱楼属望甚厚，要他好好为刘文彩保驾护航。哪知道本应是保镖的覃筱楼，反而成了刘文彩的心腹之患。

刘文彩覃筱楼积不相能，叙府因此暗潮迭起。覃筱楼和刘文彩都是戏迷，各有自己的一套戏班子——覃筱楼的戏班子是凡尔登戏院，刘文彩的是崇大戏院。一次，双方为聘请名角张德成发生争执，张去了凡尔登，没去崇大戏院。据说刘文彩很恼火，派人将凡尔登戏院经理尹岐山暗杀，吓得张德成连夜逃走。1926年农历腊月三十晚上，刘文彩伙同师长胡若愚暗杀中山学校校长吕一峰，当时吕一峰正坐黄包车回家，暗中一声枪响，没打中。吕一峰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掏出一把银元撒在地上。见钱眼开的杀手忙着拣钱，吕一峰乘机跑出了老远一段路。但杀手身手敏捷，不一会儿又赶了上去。眼看距离越来越短，情急之中，发现已到覃筱楼公馆，大喜，一猫腰就翻了进去。覃筱楼明知不速之客是刘文彩追杀的冤家，竟也收留下来，吕一峰这才幸免于难。

最激烈的交锋则在经济利益方面。替刘文辉集团聚敛钱

财是刘文彩的主要职责，叙府这块大蛋糕当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楼却明知故犯。其太太和军需处长罗吕三、副官黄云章、曾铸九，都是叙府最大的“军倒”，经常水运大批煤炭、香烟等紧俏物资到叙府倒卖。水运物资都要抽税，但每当刘文彩的护商队检查覃筱楼的船只，准备课税时，覃筱楼即派一连兵力荷枪实弹跑步赶到码头，强行提货，一文税金不交，刘文彩的护商队只有干瞪眼。

虽说积不相能，起初双方还较克制。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覃筱楼则是刘文辉的爱将，在刘文辉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能调停尽量调停。有刘文辉的苦口婆心，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会走到极端，桌子底下你踢我我踢你，桌面上还能相安无事。就这样同床异梦达两年之久。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矛盾日积月累，最终仍免不了要爆发。1927年的一天，覃筱楼到成都出差，赌瘾复发，便于当天晚上，与成都三大军头之一的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三军统率办事处挑灯大战。但他仍旧技不如人，一夜之间，竟输了整整二十七万大洋，创造了四川近代赌博史的一大奇观。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输到这种田地，钱没带够，只好将随身携带的若干箱鸦片、数万斤硝磺折价抵押；还不够，便向裕通银行总经理文和笙借了五万大洋。覃筱楼在赌场上一贯屡战屡败，但败得这样惨则是生平第一遭，又气又急，第二天天没亮就火速赶回叙府，把部队拉出来，沿街挨户连搜带抢，一时鸡飞狗跳，天怒人怨。刘文彩“龙颜”大怒：这不但糜烂地方，也是公开抽他的耳光。本来是万难容忍，但覃筱楼已经红了眼，在这种情况下出面拦阻只会逼出个狗急跳墙。万难容忍却又不能不忍，刘文彩如鲠在喉。

经过这番刺激，刘文彩不满足于单单控制叙府民团。必须拥有正规武装，才能高枕无忧。就去成都向刘文辉诉苦，

要求在叙府组编军队，终获刘文辉首肯，

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

令箭在手，刘文彩不稍迟疑，立即设法购置枪械。

1927年，经覃筱楼引荐，刘文彩结识了出生于宜宾县曹场的投机商刘玉山。刘玉山与覃筱楼私交极厚，早年跑江湖，两人同为袍哥大爷李德学的拜弟。后来两人同时“得道升天”——覃筱楼受招安当了军官，刘玉山则告别匪棚做起了投机生意。刘玉山主要从事长途贩运，往返于重庆、上海之间。其亲信朱光德的儿子朱大文1976年5月24日供称：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刘玉山叫作“刘大王”。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生意做得大，在日租界开设四川土产商店，在法租界开设百货公司，在霞飞路办招待所，此外还在上海开了家四川饭店。在南京也有两个企业，一个同样叫四川饭店，另一个是五洲农场。但他做得最大的还是吗啡和军火生意，他周游于四川各派军阀之间，为他们在上海代销吗啡，再用吗啡款代他们购买军火运回四川。覃筱楼侦缉队制造的吗啡，就托刘玉山在上海售出，再换回枪械。“刘大王”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他大有来头，他在上海的后台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杨啸天，四川军阀更是大多与他称兄道弟。他在霞飞路办的招待所就专门接待来上海的四川军阀，吃喝玩乐全包在他身上。覃筱楼下野后去上海滩玩，就住在那家招待所，杜月笙还在其私宅浦东杜家祠办了一桌酒，为覃筱楼接风，朱德光和刘玉山作陪。因覃筱楼带去了川剧名角周慕莲，杜月

笙便请来京剧大师梅兰芳与周慕莲相会。后台硬，路子野，所以刘玉山什么生意都敢做，什么生意都好做。生意上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

刘玉山极力笼络四川政要，对刘文彩当然也不会放过，尤其是听覃筱楼说，刘文彩手中积存了大批公土，对刘文彩就更心驰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门去，劝刘文彩把积压的公土制成吗啡，交他带到上海高价售出，再为刘文彩购回轻重武器。这正中刘文彩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刘文彩说干就干，聘范少云为技师，秘密制造吗啡。吗啡厂设于今宜宾市正气巷人民银行宿舍。二三十年代，这里是一个名叫简国光的吗啡商的住宅。简国光与刘玉山同乡，也是刘玉山的至亲。吗啡生意而外，在宜宾栈房街还有川山货店。简胆小怕事，把吗啡作坊开在自己家里，规模很小，而且很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吗啡运往上海，由他在上海中华路开百货店的侄儿简锡恩代售。刘玉山做中人，要简国光把吗啡作坊转让刘文彩。简老大不情愿，但刘文彩是父母官，惹不起，只好转让。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安排他的两个侄儿在作坊当工人，二是他原来每月生产多少吗啡，以后还要每月送他多少吗啡。这些条件刘文彩都满足了。一切布置妥当，刘玉山便返回上海，由他的亲戚、宜宾裕华布店经理林月华取货。一个月取一次。交货的两个人，一个是护商处科长、刘文彩亲戚吕润斋，另一个也是刘文彩亲戚郑鼎臣。刘文彩本人不出面，只负责暗中保护。

世故很深的刘文彩，对刘玉山疑心重重，便想“摸着石头过河”，最初每天只生产三五担。过了一些时日，确实赚了些钱，才放下心来，每天产量增加到十担以上。所有货款均由刘玉山代购短枪。短枪从司机出身的军火商陈宗廉手中买。陈宗廉则从日本军火商手中买，全是比利时、英国、德

国造的短枪，簇新簇新的。运输主要由两艘船负责，一是法国刚健号。刚健号是一种小兵轮，吃水浅，马力足，速度快——比一般兵轮快一倍以上。二是挂英国旗的蜀通轮。这两艘船可以在重庆口岸免检。还有少量短枪交普通船只运送，但都把枪拆了，零件分开存放。重庆有专人接货。每次运枪数额不低于 2－3 打，多则 100 打。刘玉山的进价是每打 220 元，卖给刘文彩是每支 120 元。每卖一批枪少则赚两三千元，多则赚上万元。刘文彩吃了老亏，却毫不知情，以为价钱公道，在刘玉山精心设置的骗局中愈陷愈深。

刘玉山用的是诱敌深入之计。最初很讲信用，吗啡成交快，售价也高，让刘文彩尝了些甜头。每次回叙府，还要给刘文彩送礼，而且送的都是厚礼。有一次竟花费数千元买了部当时最豪华的轿车送上门，亲信说他出手太铺张，他只一笑，说：有什么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刘文彩觉得刘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来越欣赏他，竟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吗啡因此越来越多，并一再请求刘玉山代购一些重武器。等到刘文彩完全上钩，刘玉山就不那么客气了，货款压一笔又一笔，重武器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起初刘文彩不知有变，耐心等，时间太长了才发封电报催。这时刘玉山发了话，说刘文彩交付的吗啡质量太次，堆在上海的仓库里卖不掉。刘文彩并非行家里手，信以为真，转而追究技师范少云的责任。范少云不服气，和刘文彩一同找专家鉴定。专家告诉刘文彩，他的吗啡是绝对的上品。刘文彩这才大呼上当，气呼呼地马上打长途电话要刘玉山回叙结账。刘玉山远在上海，本来就鞭长莫及；更何况有堂堂杜月笙撑腰。所以对刘文彩懒得理会。用刘文彩的吗啡款做本赚了好几个来回才还款，但利息是分文没有。

真个强中还有强中手，刘文彩商海生涯几十年，什么样

的风浪没见过？却仍然被刘玉山扎扎实实地玩了一把。刘文彩和刘玉山合作，是覃筱楼牵的线，刘文彩不能不怀疑覃筱楼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对覃更恨得咬牙切齿。刘玉山其实也过得不轻松——有家不敢归，甚至在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之后，仍心有余悸，留沪观望。直到上海沦陷才返回宜宾。约在1948年病故，弥留前良心发现，捐资创办“玉山中学”（庄园档案67宗D16卷）。

虽然吃了大亏，刘文彩也不是一无所获。刘玉山代购的大批短枪，在当时算是精锐武器。1929年刘文彩就任“川南水陆护商处处长”，马上用这批武器组建了护商大队和手枪连。手枪连连长吕实英，为刘文彩发妻吕氏之弟。护商大队大队长则为刘文彩侄辈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刘文渊长子刘元瑄。那时刘元瑄不仅是长房长子，而且是长房独子：继刘元之后出生的刘元愉、刘元恒、刘元苍、刘元宪、刘元怜、刘元慎都是女流，次子刘元琥和老幺刘元璪则尚未降临人世。刘文渊对刘元瑄瞩望之厚，也就可以想见了。刘文渊敢把刘元瑄交到刘文彩手中，而不是径直交给位高权重的刘文辉，说明他对叙府时期的刘文彩还是基本信任的。刘文彩不敢辜负长兄的厚望，对刘元瑄关爱备至，刻意提携。刘元瑄吃住都在粮房街刘文彩公馆，他刚从军校毕业，不过十七八岁，和刘文彩的几个孩子年龄差距并不太大，玩得拢，以致刘文彩最小的儿子把他当成亲兄弟，口口声声叫他“大哥哥”。作为刘文彩的头号统兵大员，刘元瑄在叙府干了五个春秋。“二刘大战”中刘文彩下野，才把他带到雅安面交刘文辉。四十年代刘元瑄曾任二十四军代军长，统揽西康全省军务，算是不辜负他五爸的栽培之心。1995年3月笔者在成都采访，刘元瑄老人还一再慨叹：“刘文彩是个好人，大好人啦！”可见叔侄感情之深。

1930年春，以刘元琮的护商大队为基干，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刘元琮任第一营营长。第一营武器源于前护商大队，第二、第三营的武器部分系刘文彩从刘玉山手中购得，部分借自宜宾商会。这是刘文彩统辖的第一支正规军。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这时他与刘玉山的关系已经破裂，从外界购买军火的渠道完全中断。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刘文辉选派的刘慎言任第四十一团团长，第一营营长为刘慎言胞弟刘从周，第二营营长刘荣久，第三营营长余师柳。两团而外，另设特科营。所部合计3048人。

组军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原任第十八团团长一职由刘元琮接掌。司令部参谋长沈眉荪。下设六处，副官处处长曹灿如，军需处处长戴孟才，军械处处长吴梓愚，军法处处长许绍松，军医处处长张志良，秘书处主任吕润斋。叙南清乡司令部不仅全面接管宜宾城防，而且负责整个叙南地区的防务。

直到"二刘大战"前夜，刘文彩仍在尽力扩充所属部队，打算将叙府民团改编为二十四军第四十八团，宜宾县公安局局长张伯英任团长，曹荣光为第一营营长，李国卿为第二营营长，宜井保商大队大队长罗鹤臣为第三营营长。但因时间关系，只下委而没有实际编成。稍后刘文彩退居安仁，曹灿如率第一营追随，但部下沿途逃散，到安仁时已所剩无几。李国卿的第二营只将刘文彩护送到犍为，罗鹤臣则是典型的骑墙派，口惠而实不至，到部队集合出发之日，第三营一条人枪也不见。四十八团名存实亡。刘文彩的本意是编三

个团，凑足一旅。这个意图最终没能实现。

对刘文彩的定性，迄今仍是所谓“四位一体”，即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其它定性姑且不论，至少“军阀”定性难圆其说。刘文彩固然当了一年多“中将司令”，但这位“中将司令”对他的部队只在名义上统辖而不是实际上的统帅，平时的管理训练，战时的运筹帷幄，他一窍不通，想统也统不起来。所谓“中将司令”不过是刘文辉送给他五哥的一个虚名，并无实际意义。史家公认军阀必须具备三大要素：第一必须是职业军人；第二必须有独立的军队；第三必须有独立的地盘。这些刘文彩完全不沾边。

但在相关著述中，刘文彩不仅是军阀，而且是个嗜血成性的军阀。《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

> 刘文彩在叙府的街头巷尾滥杀无辜，来显示他专制独裁的淫威。有一次，在街口上，刘文彩的汽车被一堆人群挡住了去路。原来，这是一个士兵和一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起来。刘文彩顿时生了杀人的念头，叫他的卫兵把两人捆起来，不由分说，立刻一起枪杀。刘文彩在他的伪十八团成立的时候，抓来一个无辜群众，砍下脑袋祭他的军旗。还把一个农民抓来，用剑砍头，以试剑的锋芒。刘文彩使用“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等惨毒手段，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

刘文彩嗜血成性，并非仅此一例。“水牢”故事说他将水牢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金库”故事说他将金库设计师和建筑工人全部杀害，这两个故事都是虚构。所谓“杀人祭旗”、“砍头试剑”的可靠性又如何呢？《刘文彩罪恶的一生》问世十多年前，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曾派人

采访宜宾市一批文史老人。熊瑞文老人答复来访者说：

> 肖友仁有一个材料，据说，在一个面馆里的事情。（死者）姓周，一个司号，在（面馆）里面吵架，看的人多，把街口轧了。这时刘文彩经过，见了很冒火，眼红了就要杀人了。这个司号估计是个逃兵。雷士奇（即雷东垣——引者注）参加过打门捐，他证实是个十八团的，不知因啥事闹架。这些资料交与资料室（统战部），不知在不在？祭旗问题，记不清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听说。（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就这么一份证词。这份证词也仅限于提供资料来源，并且特别强调是“据说”，并未肯定确有其事。至于所谓“祭旗”“试剑”，则不仅熊瑞文“没有听说”，所有接受调查的宜宾文史老人，都说“对这个问题没有印象”，“没有回忆起来”。连调查者自己也作了如此结论：

> 关于刘文彩“杀人祭旗”问题，没有线索。（同前）

明明查无实据，相关著述仍要全盘照录。

通过种种渲染，本来连立正稍息都不会的刘文彩，就这样跨入将星闪耀的军阀行列。其实，终其一生，刘文彩从未自行其是，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所以，尽可称刘文彩为军阀帮凶，但说他本身就是军阀，则不免过甚其辞。

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本来已经有第六混成旅负责叙府城防，刘文彩却要在第六混成旅之外另起炉灶，明显是对第六混成旅的不信任。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

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许多军官或直接或间接与刘文彩暗通款曲。连第六混成旅主力团团长、早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就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蒋东海，也“身在曹营心在汉”。覃筱楼眼看就要沦为光杆司令，绝望之余，派人行刺蒋东海，以求杀一儆百。杀手毛炳荣在叙府石灰巷（今宜宾市新生路下段）设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料蒋东海机警过人，听见异响回身就跑。两个弁兵反应慢了半拍，被当场击毙，一个从戏院出来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误杀。蒋东海人高腿长，杀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见不到蒋的影子。这一下覃筱楼非但没能杀一儆百，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蒋东海一跑跑到了刘文彩家里，当晚刘文彩就用电话向刘文辉通报此事。第二天蒋东海又亲往成都控告覃筱楼。事态恶化到这种地步，再不作出决断，必定祸起萧墙。刘文辉只好割爱，托人代信，要覃筱楼自动离职。对上司素来薄情寡义的刘文辉，对下属始终宽大为怀，正如他自己所称，他一直坚信：“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所以很注重对下属的感情投资，即便分手也不会过河拆桥，而往往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安排好退路。对覃筱楼就是这样。覃离职时，刘文辉赠以巨款，资助他买田置宅和出川“考察”。所以，覃筱楼虽去，第六混成旅却未伤元气。覃筱楼的主要干将仍心无二志。和蒋东海一样在川滇边界流窜时已经是覃筱楼结拜兄弟的另一位主力团团长石肇武，更是认刘文辉为义父，后来在“二刘之战”中为刘湘所擒，枭首示众，死前还骂声不绝于口。虽然石终身不改匪性，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民愤极大，但从刘文辉个人的角度来说，足可称忠烈之士了。覃筱楼下野后也没作对不起刘文

辉的事，1933 年从上海回川后在刘湘幕府中任了个闲职。建国初因其血债累累，虽有保护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之功，仍遭枪决。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第八章

为 谁 辛 苦 为 谁 忙



1. 刘文辉
2. 刘文辉新公馆
3. 刘文辉新公馆示意图。现为庄园陈列馆一部分。

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

今天，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依旧游人如织。有怀旧而来的，有好奇而来的，更有游人直言不讳：“我是来西天取经，向刘文彩学习怎样发财致富。”

刘文彩的确是赚钱能手。

刚到叙府，因为是初进官场，百端待举，刘文彩无暇他顾，以致太太杨仲华和管家都认为“五老爷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实际上，刘文彩对其“经纪奇才”未曾一日忘怀。日常行政刚刚走上轨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万大洋，兴办他的第一家企业——“义和”银号。太太杨仲华说他拿钱打水漂，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刘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谋略，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多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

“义和”生意兴隆，业务繁忙，刘文彩就把他的知交彭栽扬从大邑叫来，初任高级职员，暗中监视“义和”经理。原经理作古后，即由彭载扬接印。1925 年，根据彭载扬的提议，刘文彩将“义和”改为“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仍由彭载扬任总经理。早期“人和”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款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

但是，刘文彩的“阳光生意”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

云的急剧变幻，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辉反蒋，刘文彩全力支持。为了应付反蒋可能导致的的巨大灾难，刘文彩作了周密准备……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蒋介石最强劲的对手不是刘文辉，但最难缠的军阀则非刘文辉莫属——北洋军阀早被大革命的狂潮所吞噬；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或无可奈何花落去，或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只有刘文辉顽抗到底。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文辉集团，最后还是大吃其苦头。

刘文辉反蒋有他的思想渊源。1920 年他不过一旅之众，一个县的防地。不出十年，竟发展到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兵员在十四万以上，防地达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属人口稠密、物产富庶之区，无虞兵源军需。从来年少气盛的刘文辉，这时更踌躇满志。他曾盛气凌人地宣称："我们要有远大目标，我们的路要分几步走。先要统一四川，后要问鼎中原。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把持中央政府的蒋介石，是他问鼎中原的最大障碍，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潜在对手。其次，蒋介石力图铲除地方势力，真正一统天下。1929 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将"削藩"声浪推向巅峰。或自动解除武装，或拒不从命而成为"讨逆"目标，地方实力派的选择似乎只有这样两种。自动解除武装不是刘文辉的风格，即便刘文辉没有问鼎中原、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蒋介石强大的"削藩"攻势下，仅仅为了守成，也必须与蒋介石对抗。这就是说，刘文辉是蒋介石天然的政治反对派。正因为如此，改组派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刘文辉积

极响应。晚年刘文辉曾这样追述：

> ……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而我呢，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讧，从内讧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群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4页）

不出一月，唐生智即告战败，所谓“护党救国运动”烟消云散。刘文辉的反蒋图谋大白于天下，与蒋介石的关系如其晚年所云：“已经是水火不容。”只不过因蒋介石忙于对付阎、冯，无力西顾；而刘文辉也因向中原小试牛刀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暂时不了了之。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文辉再度赤膊上阵。当时，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尚能与蒋介石较量，政治上却被动挨打，因为蒋介石据有“合法中央”，又打着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旗号，对蒋介石政治上的“讨逆圣战”，他们无从招架。要弥补这个不足，必须联合以汪精卫为首的“正统孙中山”去对抗蒋介石的“正统孙中山”，用改组派的“合法中央”去对抗蒋介石的“合法中央”。反蒋必须拥汪，刘文辉别无选择。汪精卫刚从法国回到香港，刘文辉即派秘书罗承烈前去输诚；继又赠汪一笔活动经费。刘文辉主动投靠，在汪精卫当然是求之不得，大表欢迎。同年7月，汪精卫从香港抵达北平，组织政府，即推选刘文辉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刘文辉惟恐附和落后，派代表段班级北上与阎、汪直接联系。接着刘文辉找僚友胡子昂

密商如何反蒋联汪。刘对胡说："此刻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蒋介石方集中力量对付冯、阎，如果现在出兵进攻武汉，配合冯、阎，将使蒋介石首尾不能兼顾，可以迫其下台。我知道你对蒋介石不满，敢不敢一道出来反对蒋介石？"胡允诺，刘说："好！我两兄弟就这样干。"刘、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军讨蒋檄文通电全国，史称"鱼电"。

此番讨蒋又归失败。事后，刘文辉部属大骂胡子昂闯祸，非枪毙不可。刘文辉坚决不要替罪羊，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说：

"这件事，大家对我一定很有意见。但这是有根源的。1929年12月东、冬两电我反对蒋介石，今天我还是反对蒋介石。我有一二十万军队，蒋要吃掉我不那么容易；如果我的部属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谁也吃不掉我们。大家追问电报是谁搞的，那是出于胡子昂之手，但他一个人怎么干出这件大事呢？是我同他商量干的。你们不要责难胡子昂，要指责就指责我，我是一个汉子，敢作敢为，我是不怕蒋介石的。"

这番话掷地有声，与会者长时间热烈鼓掌，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在刘氏家族几十年的苦斗史中，仅刘文运之子刘元瑭一度投蒋，此外，在重大政治决策方面，在历史转折关头，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分歧，从来都是精诚合作，患难与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蒋介石费尽心机，始终未能瓦解刘氏家族集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刘氏家族的团结，尤其在于刘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刘文辉和刘文彩的团结同样体现于"联汪反蒋"。刘文辉赠汪精卫那笔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

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刘文彩在宜宾垄断市场官僚资本》，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反蒋屡遭败绩，刘文辉仍未“悬崖勒马”，公然声称：“我是不怕蒋介石的”、“我还是反对蒋介石的！”而此时蒋介石刚刚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其势如日中天，许多反蒋“英雄”都深感后怕而退缩了，刘文彩对刘文辉坚持反蒋却未有异议，兄弟俩依旧同进退。

那么，刘文彩是否不清楚反蒋所蕴含的巨大政治风险？答案是否定的。蒋介石生性残暴，对政敌素来毫不手软。一旦秋后算账，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刘文彩不仅地位不保，而且可能家破人亡。对此刘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还有周密的组织准备。

这直接导致了刘文彩商旅生涯的转折。

“联汪反蒋”失败不久，“人和”银号即宣告停业，实际是改头换面。何以改头换面？过去的解释是刘文彩要隐蔽其官僚资本的真面目，此说难于自圆。旧中国官僚资本非常猖獗，以本名本姓投资商业金融业的军阀政客大有人在。刘文彩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阳光生意”，又何惧之有！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刘氏家族“联汪反蒋”所带来的惨淡前景。刘文彩曾召开会议，与会者是以彭载扬为首的“人和”高级职员。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因汪倒台，蒋介石得势，刘怕自己垮台财产被没收”，急于确定对策。据目击者回忆：

> 刘文彩向彭提出幕后最重要的指示，指出当前情况变化原因，决定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那次幕后指示的概要有：

1. 资金雄厚，以后还要源源增加，无所谓固定资本，日日改资。不做存款，不指望招牌起作用，尽量隐蔽名声。

2. 刘文彩自称："我弟兄占据防区虽大，但一时不能突破渝万（即重庆万县地段，均为刘湘防区——引者注）封锁。故在国内地位提不高。目前中央各派系以内（居于）二三等地位，作轻视的看待，仅有微小的利用、互相牵制的关系，并且中央极混乱，无法求得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

3. 无力吞下云南。以前想从云南打通国际线，求得英国或法国的援助已成泡影。

4. 因此，处于闭固无援中，所占地盘均不巩固，做生意不能永久做下去，新兴厂矿更不能做。

5. 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同前）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刘文彩不能不偏重短期效益，捞一把是一把，而几乎完全放弃长远打算——"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这便是刘文彩"经营工商业的重要路线"的精髓所在。

彭载扬得到指示后，立即实行体制转轨。所有"人和"银号一律取下招牌，向当地政府报告歇业。实际上更名换姓——"人和"总号与创办于1926年的"长春"银号合并，改称"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另在宜宾设分号"长发元"、"树记"、"吉祥"，在乐山设分号"同庆元"，

在叙永设分号“商贤”，在五通桥设分号“天福”，在成都设分号“全福永”，在重庆设分号“同发源”、“涌源鑫”，在昆明设分号“炳鑫公”，在上海设分号“吉庆”。自贡、纳溪、昭通也设有“庆源”分号。各地分号招牌不一，经营项目也不尽相同，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实则统一管理，牢牢控制在刘文彩手中。长线项目如贷款不复存在，全部经营项目都是“短平快”。

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人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人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权力开道，刘文彩尽可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抗衡。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依仗印把子枪杆子，实施不正当竞争，由此牟取暴利，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脸。作为官商的刘文彩，自难例外。

“人和”改为“庆源”，金融为主、贸易为辅变成贸易为主、金融为辅。为适应“体制转轨”，刘文彩随即派“庆源”总经理彭载扬外出考察。彭载扬用了半年时间，近到成都、重庆，远到武汉、上海、昆明乃至越南海防，走街串巷，了解商情，在此基础上拟定新的经营方案，返叙后交刘文彩审批，即付实施。

此番“体制改革”大见成效，《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达1060万元。这些暴利来自如下几类。

第一大宗是盐巴。刘文彩在五通桥设有“天福”商号，

以胥星桥为经理，主营盐巴。每年在当地购盐两千引（每引一万斤），销往叙岸、滇岸、永岸。当时四川最大的货船不过百吨左右，两千多引盐巴足足装近百艘百吨大货船。事实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大船专门给“天福”运盐巴，两千多引盐巴大多是用小吨位的普通木船运出的，“天福”每年需要数百艘甚至近千艘盐船，占五通桥盐运大部分运力。为了保障“天福”盐巴的运力，刘文彩与当地盐运业头面人物侯树荣、陈容兴时常过从，陈容兴更被他认作“干儿子”。所以，“天福”盐巴的运输总能做到“先我后人”，从无半点纰漏。两千多引“天福”盐巴销往叙府、永川和云南，对三地盐市构成了巨大冲击——一般盐商根本不可能有刘文彩那样大的经营规模，无法与其竞争。滇东盐市因此几为刘文彩垄断。为确保在叙府盐市稳执牛耳，刘文彩扶植其亲家姜伯年（姜伯年次女嫁给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为宜宾盐业行商公会会长，并开办“信义源”盐号。刘文彩因此从盐市中获利甚丰。即便撤出叙府那年，因战争关系盐业利润已经锐减，姜伯年仍向他一次上缴了七十多万元盐市收入。

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刘文彩对此非常重视，投入巨额资金。他派人到云南、川西和宜宾，提前把产地买断，完全垄断货源。其他批发商到产地采购时，已经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要么接受刘文彩商号供货，要么卷铺盖走路。但刘文彩最看好的还不是坐地批发，而是季节性囤积。叙府水洞口（今将军街）、中西医院（今人民医院）全部街房都作了刘文彩的药材山货仓库。他还延请大批技师将药材加工为成品，据说出售成品获利最大，个别品种的利润率可达百分之百，一般的品种利润率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第三大宗是棉纱。川南棉纱商不算少，但谁都没有刘文彩那样雄厚的资金，经营规模也就没法和刘文彩比。刘文彩

的棉纱大多是从上海买出。如果遇到洪水季节，刘文彩还会大胆向厂家订期货。所以刘文彩总是稳操川南棉纱贸易的胜券，年销量往往最大。有一年重庆报关入口统计，刘文彩订购的棉纱几占重庆口岸棉纱入口总量的一半。

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刘文彩在自贡开设商号，专门收购扣息的期票和期汇票，此项利润率达百分之四。刘文彩有资金保障，经常投放到一百万元以上。更于月半、月底比期，从宜宾武装保运毫洋到自贡扣洋水、交汇款，每次十几万至几十万。洋水有百分之一到一点五的收入，加上买入期票或期汇票扣入的利息，其暴利几乎与经营烟土相等。据说刘文彩商号遇到贷款户倒账时，从不与诸多债权人平均承担损失。自贡曾有家贷款户倒账，一得到消息，刘文彩马上派军警武装护送自己商号的人前去抢提底货，抵清放款；其他债权人敢怒不敢言。

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三百万元，控制市场"银根"。

刘文彩并插足川江航运。1927 年之后，宜宾的商品流量急剧萎缩，航运业转趋萧条，船主之间因争抢货源时起纠纷。为了平息"抢货大战"，各船主在重庆集议，禁止私下揽货，设置航运办事处，统一掌握和分配货源。办事处主管由刘文彩委派，实际控制在刘文彩手中。以刘文彩之精明，不难看出客货调度权的含金量，遂于 1930 年独资创办以航运为主业的"新华实业公司"。聘张挽澜为总经理，购置四艘轮船："老蜀通"100 吨，经理叶元宗；"元通"50 吨，经理周志勇；"昭通"40 吨，经理陶伯宝；"南通"50 吨，经理肖景伯。于是，刘文彩又当裁判又当球员，"公平分配"货源也就无从谈起了。如鸦片、白蜡、虫草、贝母等类贵重物资，分量轻，运价高，各船主从来都是在所必争。

刘文彩凭借调度大权，将它们统交“新华实业公司”承运；当货源急剧短缺、其它船主只能“待业”时，“新华”船只仍能满载。据称，刘文彩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十万元左右”。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刘文彩从事投机贸易的情形大致如上。而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从事投机贸易的同时，刘文彩仍“放长线钓大鱼”——办了几家加工作坊，如打金厂、猪鬃厂、丝厂等等。“工人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每月工资才五六元。刘文彩的商业利润中也包含了对这部分工人血汗的直接榨取”。实情如何？60年代，调查人员曾专程前往宜宾，与当事人座谈。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刘文彩办过哪些工厂？和这些工厂的情况？

周一宽：龚瑞珍是姜伯年的徒弟，姜与刘文彩是亲戚关系。我听龚说，刘文彩投资银行，办工厂方面听说不多，主要是通过金融，如“长春”、“人和”，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

熊瑞文：主要是钱庄、商业。

李国章：打金作坊，我在里面作过伙计。龙继云是老板。另一个是龙海东。刘文彩与这些厂是间接关系。“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的官僚资本，这些银号有分号。打金作坊作料是响铜，是好锡，能刷成很薄的东西，刘文彩是间接利用，不是直接。

周一宽：那时规定搞金融的不能办厂，办厂就不能合法化。刘文彩就搞地下的，搞秘密办法。“人和”、“长春”是刘文彩直接经营的。（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刘文彩办打金厂、猪鬃厂、丝厂，没有得到当事人确认，也不符合刘文彩“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的经营方针。把那几家加工作坊归诸刘文彩名下，似过牵强。

但无论如何，作为企业家的刘文彩绝不可能离开印把子枪杆子而生存，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不可能都是干净钱。换句话说，“经纪奇才”刘文彩之手的确是一双脏手。其实这也难怪，古往今来的官商，又有谁的手称得上清白呢？

1959年，刘文辉向记者坦承：“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但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驻叙期间，刘文彩先后兼职十余种，除“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一职外，其余本兼各职，均与捐税相关。而其最重要的职务，则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仅此一项，即足以奠定刘文彩在刘文辉防区内的最高税政长官地位。这就意味着，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刘文彩的搜刮手法，与四川其他军阀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为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以1935年为基准，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

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9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竟预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1935年刘文彩没能征到一个铜板的田赋，因为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的惨败迫使他中途退出了这场田赋预征大赛，大赛桂冠也就与他无缘了。1932年他弃官回乡时。川南田赋征到1949年，多征了二十七年。

第二种搜刮手法，是统税杂捐。四川最大的盐场及产糖区，均为二十四军据有。盐税糖税虽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二十四军自然油水最多。叙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织，百货云集，也构成一个重要税源。刘文彩简直是坐在聚宝盆里，哪能闲得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关卡林立，往来客货均须缴纳所谓“护商税”。“不论是经水路还是陆路来的货物，动辄纳税十余次或数十次。如水路从乐山至叙府，仅二百余里，有关卡三十多处，价值五百元的山货，要纳税四百多元。陆路由内江至成都仅四百公里，有关卡五十余处，价值三百多元的货物，要纳税三百元左右。宜宾县一地设有关卡五十多之多。宜宾城中心设城验卡，东门、大南门、铜湾头设四门关卡。各关卡由乡兵把守，‘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使得商民畏兵若虎。”四川军阀莫不滥设关卡，盘剥商旅，甚至“不十里而设关两道”。30年代中期全省推行“一税制”，废除的苛杂即达120余种。刘文彩兄弟强征暴敛不比别的四川军阀逊色，由此看来，《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这段描写，应该不会距史实太远。

“护商税”而外，还有户口派款、临时派款。户口派款按月征收，下达指标后，“一伙爪牙又加额分派，从团、保

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润”。原定税额因此在征收过程中如雪球越滚越大，民不堪负。临时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谓“公路费”、“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国防捐”数额最大——派款总数达一百万元，约等于宜宾全县五年粮额。刘文彩为此专门设立“征收委员会”，以宜宾县县长张伯英为主任委员，张衡先为副主任委员。召集全县民团首领和商会会长在中山街抚州馆开会，刘文彩亲自到场，宣布各乡镇派款比例：城区二十万元，由工商户分摊；剩下八十万元，由各乡镇按田租分派，每担田租派捐一元。准许经手人从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仅过月余，二刘大战爆发，叙南动摇。除城区二十万元经刘文彩天天催逼，商会会长鄢之敏、副会长汪体泉不能不提前交清外，各乡镇都借故拖延，直到刘文彩败退时才交足半数，其余一半装进了各乡镇官绅的私囊。

刘文彩征税的具体数目，《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说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元。此说不可信——四川头号苛杂刘湘，最高年度税额也才一千一百万元（黎英：《军阀刘湘的财政搜刮》，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倒是《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较为实事求是：“要统计刘通过税捐方面到底每年在宜宾－川南搜刮了多少钱财是不可能的”。虽然已不可能统计具体数目，但二十四军之兵强马壮曾居川军之首，所需军费主要出自刘文彩征收的川南税捐。据此算来，刘文彩川南年度税额当仅次于刘湘的年度税额。约近一千万元。

如此竭泽而渔，必然激起公愤。1927年刘文辉讨伐刘成勋，理由便是刘成勋“苛政扰民”。在攫取刘成勋防地后，他更装出一副“关心民瘼”的姿态，训令双流、彭山、新津、邛崃等县知事，教他们“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罢除，以

示更始”。还示意宁雅属官绅散发宣传品，颂扬刘文辉的“仁德”，说什么“二十四军真是四川革命军队”，“刘军长真是革命军人”，他的官兵“毫不扰民，军粮自备，不拉一夫，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农民不辍，行旅如常，田夫荷锄，颂阛阓之有序；行人待路，让央央以先征。古所谓归市不止，耕者不变也”。把刘文辉防区简直说成了桃花源。但这只是宣传而不是事实。就在刘文辉对刘成勋用兵之际，《国民公报》不时披露因战争负担奇重，加以旱魃为虐，四川农民“罗根掘草，人自相食”的惨状。1927 年 4 月 23 日，二十四军防区下川南某县旅蓉同学会在报上公开吁请取消苛杂，称该县“就客岁言，所捐数目，可以稽者，亦远在五十万元以上。计征粮四季，每季十六七万元。烟税及灯捐万余元。而去腊新任征收局长，又向人民借垫五千元。此外，指名押缴之特别捐，除照常征收外，复预征三年之粮税，并勒筹革命费五千元。同人不胜惊骇……”。宜宾留省学会也常常仗义直言，在其会刊上揭露刘文彩兄弟的劣迹。对此刘文彩兄弟颇有自知之明。刘文辉在告诫其防区各县局长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本军戍地共二十余县，初未尝有公然反抗行为，独宜宾、荣县两处，掀起轩然大波，竟至先后崛起，显与政府为敌。”仿佛火山就要在脚下爆发，战战兢兢。

刘文彩在川南不遗余力囊括民财，竭泽而渔，无疑是罪责难逃。但将川南苛杂仅仅归罪于刘文彩一人，则显然有失公允。刘文辉故旧编写的《刘文辉史话》就有如下一段描写：刘文辉刚刚回家坐定，夫人杨蕴光便从内室姗姗走出，面色阴郁，失去平日那种喜笑盈盈的风彩。刘文辉感到奇怪，正要开口问，杨蕴光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递过去。原来这是一封控告信，说刘文彩如何把征税衙门变成聚宝盆，瘦天

下而肥自己。刘文辉看了问杨蕴光：“你有些什么感触？”杨答：“是不高兴嘛，五哥发横财，你给他担过失，你可会为人作嫁裳。”刘文辉只能仰天长叹：“亲兄弟嘛，叫我咋办？”据此看来，川南苛杂当然是刘文彩的个人行为，刘文辉不过是代人受过。这样描写，似非史家笔法。刘文彩是川南苛杂的具体执行者，但算不上最高决策者，其受益更非刘文彩一人独享。从本质上说，川南苛杂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整个刘氏家族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作为刘氏家族集团的主帅，刘文辉所负罪责更在包括刘文彩在内的所有其他家族成员之上。以刘文彩为川南苛杂元凶，为刘文辉开脱。其实是自作多情。刘文辉从来都不买账，从来都不推卸他对川南苛杂应负的罪责。晚年自述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

> 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

1959年，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开张。某大报记者就此专访刘文辉，刘文辉坦承：

“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

但当然不会让他负责——他是著名起义将领，公开清算

他的历史，是现行统战政策所不容许的！刘文辉能不能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时已身不由己了。

话说回来，承认刘文辉为川南苛杂“元凶”，这于刘文辉形象并无丝毫损害。刘文辉在当时尚未走向“人民阵营”，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一个与其他军阀“互争政权、大起内讧”的政治野心家。刘文辉晚年也说当时的他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只是到后来，才“因时势推移由假导真而导致了起义。”既然如此，刘文辉在川南“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又何足怪哉！刘文辉其实相当的光明磊落，对其早年经历一贯秉笔直书，比如说他当年反蒋“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早期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说他如何种植和贩运鸦片，等等。在这点上为尊者讳，既违背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也与刘文辉的初衷不合。

刘文辉苛杂扰民，其实也是非他所愿。他的长子刘元彦后来追忆说：“他却经常叮嘱，要好好念书，以后学一门专长。还不止一次地说：将来不要搞政治，政治很肮脏，没意思。”如此痛切之言，应该说是发自肺腑。刘文辉之所以厌恶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官场上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另一方面，也是因时势所迫而不能不“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既厌恶政治，又无力从政治的泥淖中自拔。现实利益的需要和不泯的良知时时刻刻都在内心剧烈地冲突，刘文辉非常痛苦。而到晚年，这种痛苦对他来说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早年的痛苦，原由之一是对在其统治下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黎民百姓深深的负咎感；而在晚年，又多了一种负咎感，那就是对他五哥刘文彩的负咎感。早年刘文彩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的崛起呕心沥血，死后又为家族集团尤其是刘文辉本人担待了那么多的骂名。刘文辉后来固然走进了

"人民阵营",他的五哥却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以致毁碑掘墓，尸骨无存。九泉之下，他该如何向他的五哥相告呢?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

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如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而一旦实力充足，羽翼丰满，军阀就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抢占更多的地盘，并在扩大了的地盘上种植更多的罂粟，征收更多的烟税。烟税——武装——地盘就构成军阀割据的三大法宝。军阀与鸦片共存共荣，无论是北方的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陈济棠、龙云，还是以合法中央自居的蒋介石，莫能例外。甚至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也对鸦片产业名义上寓禁于征，实际上征而不禁，因此不但国产鸦片充斥广东，印度和波斯土也源源不断地从澳门、九龙等地输入。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楼，摆满烟灯烟具。中华国民拒毒会负责人往见陈友仁、恽代英等，要求禁烟，却无功而返。

聚敛快手刘文彩，同样视鸦片为至宝。

刘文彩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税政首长，也是刘文辉防区的最高禁政首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那时所谓“禁政”，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销“公土”，目的都是维护军阀政权对鸦片的垄断经营，使鸦片贸易这个利润最大的产业，完全掌握在军阀政权的手中，最大限度地从鸦片中攫取财富。其他军阀的禁政如此，刘文辉防区的禁政也是如此。

“川南禁烟查缉总处”设在叙府禹王宫。最初有五十多个辖县，按县份大小设“禁烟查缉处”或“禁烟查缉所”。乡镇设“禁烟查缉分所”。禁烟机构有如网罗密布，刘文彩借助这些网罗，推行“禁政”不遗余力。

1927 年夏，刘文彩在叙府中山街旧抚州馆正殿召开“川南禁烟会议”，对川南鸦片产业作了总体部署。

会场布置庄严隆重。大门前竖立着雄伟的柏枝牌坊。上嵌八个金字：“川南禁烟会议会场”。武装士兵守护在大门两旁，与会者都要佩戴出入证。主席台上，大会主席刘文彩端坐正中，左右依次为沈眉荪、刘馥光。台下则为各县县长，各禁烟查缉处处长，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刘文彩在会上少言寡语，据说“刘的作风，常喜欢幕后活动，面子上总是绷起不做声”。这可能是个原因，但还有个原因：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不善言辞，为了少出洋相，遇到大场面尽量不开腔，当袖手观音。所以会场上风头最劲的并不是刘文彩，而是沈眉荪和刘馥光——实际上是他的这两个助手代他主持会议，他只要到到场就行了。所谓开会不过是个形式——“会前啥事都支配有人，啥事都采取分头个别接洽，每一县县长、处长等到来，先期就与有关科长或负专责的人员等按照计划洽商停妥，自然各有好处。……明明暗暗都已搞得清清

楚楚”（《刘文彩“川南禁烟会议”的一幕滑稽剧》〔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这时才聚集一堂，所谓开会，也就不过是认可幕后交易，使幕后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合法化罢了。

会议精神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川南鸦片由禁烟查缉总处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定价，批发给各县禁烟查缉处（所），禁烟查缉处（所）批发给各乡镇禁烟查缉分所。再由分所批发给小贩或吸烟户头。

2. 各级“禁政”机关必须按期缴款，说到做到，不许亏欠。

3. 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销货多、缴款快的，回扣就多，否则回扣就少甚至是没有回扣。

4. 禁绝私土。偷运“私土”及买卖“私土”的烟商烟民，严惩不贷。

“川南禁烟会议”开了两天，两天中，刘文彩一直金口难开。每个议案都是先由提案人说明意义，再由沈眉荪评点，然后沈向刘文彩说：“请总办提议表决”。刘文彩不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慢腾腾地站起来，问：“大家是不是赞成？赞成的起立。”于是全场起立，提案就算通过了。不过刘文彩实际上是很高兴的。会议闭幕时和大家拍了一张集体照，另给每个与会者送了一张自己的标准照，标准照还有上下题款。分手前刘文彩又举行盛大酒筵，和与会者喝了个天昏地暗。席上大家竞相站起来给刘文彩敬酒，但大个子刘文彩酒量并不大，每次干杯都是蜻蜓点水，后来仍旧招架不住，就把护商处科长、亲戚吕润斋拉来当替身。

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

度。由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

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

当时四川，头号烟城是刘湘卧榻重庆——重庆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烟帮之盛在重庆商帮中名列前茅，烟税成了刘湘二十一军的主要税源。第二号烟城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盘踞的成都。成都有八千多辆黄包车，分上下两班，共有车夫一万六千人，这一万六千人差不多都是瘾君子，走不了多少路，就要停车吸"松香"（川人将烟客称作松香客）。到青城、峨眉的路上，春天罂花遍野，平日烟土盈市；无论城乡，十里之内必有烟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烟馆中都挂孙中山遗像，久而久之，连孙中山遗像都被熏得黑不溜秋，似乎国父孙中山也变成了老枪。

如果说重庆、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烟城，叙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烟城了。叙府城区人口不过万户，开设的大小烟馆却多达一百余家。私灯尚未包括在内。烟馆越多，刘文彩财源越广——川南各级禁政机关公开征收"红灯捐"，烟馆只要照章纳税，就算是合法经营。每月每盏烟灯收税三元五毛；私灯可予优惠——税金减半，但有一个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违者，轻则处以罚金，重则逮捕"法办"。有资料称，仅"红灯捐"一项，刘文彩可在叙府每年坐收数十万元。

另一项更大的收入来自"公土"勒销。烟馆不仅要缴纳"红灯捐"，还要定期认购县府配售的"公土"。"公土"价格畸高——市价每两一元，官价每两二元一角。差价太过悬殊，"公土"自然没有多少烟客问津。烟馆认购"公土"实际上是为禁政机关作"奉献"的赔本买卖。若不设法"曲

线救国”，烟馆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风。好在烟馆老板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如‘北园’的老板侯次修，就是一个官僚地主，‘同乐’的老板田心初就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把头；‘三层楼’的卓云台就是一个资本家”。能量极大，“他们可以用种种方式打通官府，互相勾结，譬如他们的烟灯定额是三十盏，可以临时增加一、二十盏，这一、二十可以买私烟出售”（《刘文彩宜宾时期的红灯捐》〔未刊稿〕，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如此堤内损失堤外补，烟馆老板不愁没有油水捞，烟馆也就可以维持下去。“公土”勒销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上缴刘文彩主治的“川南禁烟查缉总处”。余下百分之四十算作县长个人的回扣。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向烟馆摊派“公土”，一方面实行“利益均沾”原则，用高回扣刺激部属推销“公土”。双管齐下，“公土”内销渠道自无堵塞之虞。

“公土”内销带来的惊人利润并没有使刘文彩有所满足。他的“气魄”实在是太大了——据称，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由他包销。而云南则是世界主要鸦片产地，1931 年，全省产烟达五万余担。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输出。这就意味着，刘文彩每年采购的云土在万担以上，此外，每年采购的川土也在万担以上。如此巨量的“公土”，绝非川南市场所能消化，必须进军重庆市场。但烟帮云集的重庆，竞争非常激烈。刘文彩在其卧榻百战百胜的霸权推销术，在重庆完全不能使用。一时又发明了新的招数，外销因此连连受挫，到 1930 年下半年，烟土积压已多达四千担。“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军阀政府大力扶持，西南烟土连年丰收，终致供大于求，重庆烟价随之猛跌，鸦片市场一度冷落。这直接影响到刘湘的税收，刘湘急了，下令二十一军防区各县压产，称：“近年以来，烟土产

量过剩，不惟大有影响于烟价，抑且扩大四川全省不景气之恐慌，故惟有减低烟苗之产量，方足以救济四川经济之危机。”但从产的角度减少重庆鸦片流通量毕竟是远水不解近渴，要立竿见影就要从销的角度下手。而重庆鸦片相当数量出自叙府刘文彩之手，刘湘便派人与刘文彩协商，请暂停鸦片出口。刘文彩不负厚望，顾全大局，一方面下令阻关，所有经叙府运往重庆的云土川土一律就地入库；一方面开设吗啡工厂，将积压烟土尽量转化为吗啡销往上海。叔侄配合默契，重庆鸦片经济危机始得纾解。待烟价逐渐上扬，刘文彩才开放叙府烟土输渝。

在刘文彩统一领导下，川南“禁政”和当时全国的“禁政”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的同义语。刘文彩所辖的“禁政”机构，和当时全国的“禁政”机构一样，成了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

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不限于贸易领域。资料记载：“为了扩大税收，在刘管区内金河、府河两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种烟。……按窝征税，取名‘窝捐’；不种则抽‘懒捐’，税率重于‘窝捐’。”成烟上市，另收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真是欲收其税，何患无辞。总而言之，川南鸦片的种、运、销、吸，每个环节都给刘文彩带来巨额收益。《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称：“刘文彩在叙府一地，从鸦片上面掠夺的捐税，每年约有800万元。”这个数目未必准确，但刘文彩大发鸦片财，为集团私利不惜毒害社会，则是历史事实。“鸦片大王”之谓，刘文彩当之无愧。

但是，从根本上说，鸦片垄断经营乃军阀混战催生的“恶之花”——军阀混战愈升级，常规罗掘愈发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经费，只能不计后果地借鸦片牟取暴利。谁心慈手

软，谁就会被无情的竞争所淘汰。其次，刘文彩的鸦片垄断经营与川南苛杂一样，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团行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刘氏家族集团主帅刘文辉。对此，刘文辉老同学、老“战友”冷寅东有过精到的评述。1976 年 5 月 12 日，他在成都新开寺 74 号寓所中告诉来宾：

>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宜宾地区是川南富庶之地，物产丰富，又是云南入川口子。当时云南鸦片盛产，大量运入四川出售。川南各地也盛产鸦片。这样，刘文彩就以种种名义，课以重税，并且大做军火、鸦片买卖，所以搜刮了不少的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
>
> 刘文彩刘文辉大种大卖鸦片的结果，弄穷了农民养肥了他们刘家。刘文辉的钱多，刘文彩的钱多，刘氏家族的钱都多。刘文辉至解放还存外汇、金条。刘文辉的钱用来培养了他的势力，收买了一部分他的人材。例如他在“二刘之战”时，曾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的师团长。又如，他给二十四军的军官，都发以高薪。我在刘文辉手下任师长时，就每月领活动经费（工资）七千元，生活费根本用不完。（庄园档案 E3 卷）

“刘文彩是给刘文辉搞钱、守家的。”刘文彩“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这才是刘文彩刘文辉相互关系的本质所在。包括鸦片经营在内，刘文彩的所有聚敛行为莫不服从和服务于刘氏家族集团的政治需要。《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川南“鸦片流毒蔓延的祸首就是刘文彩”。这样评断也就颇堪商榷了。

事实上，鸦片垄断经营一直是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摇钱树。随着军阀混战的渐趋沉寂，鸦片产业渐趋凋零。1936－1937年，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迭次严令禁绝鸦片。二十四军占据的西康，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之行，必有瘾民”。甚至妙龄女子也不例外：“十指尖尖弄玉笛（烟枪），红罗帐里香雾腾。”刘文辉一位旧部追忆：

> 四川军阀都要贩运烟土，刘文辉搞的特别好，原因是他占据了叙府、宁县（西昌）、西康（康定）三个口子。云土质量好，外销都要经过宁县、叙府。凉山少数民族倮倮种的烟，就是从宁县运出来的，以田坝（场镇）为中心进行鸦片买卖，以枪支弹药换取少数民族种的鸦片。那时田坝是鸦片的大市场，外面有什么样的武器，田坝亦有。彝族土司（知识分子）岑光电是田坝人。
>
> 刘文辉的禁烟处长胡子运是专门替刘文辉办烟的，住在西康。刘文辉派兵从九龙斗云南西部的中甸去接烟，有专门给他运烟的军队，把烟土折成驮子运到康定，胡子运就帮他运到成都。刘文辉在（成都）武侯祠住了一营人，没有人敢检查。又由这营人运到刘文辉在方正街的公馆，公馆里面设有烟库，由他的三太太杨蕴光经手分配。方正街公馆里还建有金库银库。解放前夕，胡宗南部到成都时，刘文辉部属都跑了，曾查了他的金银仓库，抄出了几万两金子，几万两银子。卢子鹤等曾对我说起过，胡宗南在成都的部属，八个月的开支可用抄出来的金银解决。我亦曾到方正街刘文辉的公馆去看过，仓库是造得很好的。
>
> 鸦片的利润高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职员要搞烟，只

要对禁烟处招呼一声，说我这个月的工资要买烟，一个月就能获利一倍，两个月又翻了一番，即由一变二由二变四。一年做几趟，就能获利许多倍。我听说刘文辉的顾问刘衡儒曾对我说过，他交了四十元钱给唐文辉（即唐英，刘文辉部师长），几年后就搞了许多钱，上百万元，人称他为“刘百万”。刘衡儒还劝我搞鸦片，但我不干。那时要发财容易得很。刘文辉部下的许多文武官员，都是靠鸦片发财的。刘文彩的一大财源也是搞鸦片。

刘文辉从云南运烟土，是与龙云接的头。龙云是一直在云南种烟、运烟的。（庄园档案D4卷）

冷寅东则称——

刘文辉退居西康以后，还是大量提倡种烟，利用刘元琮为贩烟，到成都的武侯祠，是他鸦片生意的据点。西康大量的烟土，由刘元琮部下武装贩运，或由袍哥贩运，集中到成都武侯祠刘家军的黑窝。在成都又有鸦片投机经纪商人周培山为其销售。因此，后期成都大部鸦片来自西康……

刘文辉实行的是多头政治：联合一切势力、利用一切矛盾、争取一切党派、采取一切手段以对抗蒋介石，以自保实力。他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他的这些钱，都来自鸦片收入。（同前）

称“都来自鸦片收入”，似过绝对。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回忆，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只是两大支柱产业之一。但冷寅东等

当事人的基本评断则属无误，鸦片垄断经营确实是刘文辉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1939年黄炎培作客西康，目睹鸦片泛滥之惨状，曾赋诗两首。过越隽诗云："红红白白回望平，万花捧出越隽城；此花何花不忍问，我家即倾国亦倾。"过西昌诗云："我行郊甸，我过村店。东有载，载鸦片；西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而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来都不见，勿忘敌骑已过湖湘线。"社会各界对刘文辉愤激之辞，屡见报章。

对此，刘文辉有过交待。他在晚年说："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页）。并不否认主其事者是他本人。他在这里谈的是西康时期，但川南时期又何尝能够例外。

1932年刘文彩退居安仁，刘氏家族的鸦片垄断经营托拉斯由刘文辉亲自主理，刘文彩则出任"大邑县清剿禁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其兄长刘文渊），同时兼任"大邑县查禁种烟第二小组组长"，下辖大邑南部唐场、安仁、上安、苏家、董镇、韩场、龙泉、沙渠等九乡。刘文彩仍为"禁政大员"。此时的"禁政大员"刘文彩依旧名实相乖——身在安仁，却充当西康鸦片产业的"开路先锋"。刘文辉副官陈耀伦供述：当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罂花遍地时，荥经县却没有一朵罂花——地方人士反对种烟。就在这时，经刘文彩引荐，其亲信唐登汉出任荥经县县长。唐登汉一上任就厉行种烟，并由刘文彩从云南、西昌引来烟种。"刘文彩是刘文辉的五哥，也就是刘文辉有意要种，不

过当国民党中央正在禁种之际，不便出头而通过刘文彩来作一种非正式的劝种鸦片而已，地方人士也就无可奈何”（《西康鸦片流毒造成荥经事变的经过》）。这是刘文辉刘文彩兄弟“两位一体”关系的典型体现：“党国要人”刘文辉不便做但又必须做的事，就由刘文彩代劳。犹如“双簧”，刘文彩台前亮相，暗中操纵则为刘文辉。刘文彩实际上终生扮演刘文辉替身的角色。

不仅西康种烟赖刘文彩“开风气之先”，贩烟也须仰仗刘文彩。刘文辉从西康向成都武侯祠贩运鸦片，其中一个中转站便是安仁刘文彩老公馆。刘文彩本人也常常投资鸦片贸易。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谢藻如晚年追忆：

> 1938年，贺国光当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住渝不住蓉。行辕事务由我代行。行辕有个参谋长，叫刘倚仁。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准备派人去接他母亲，由安庆来川。为避免沿途检查，请我发他一张空白护照，由他母亲自己去填。我就叫管护照的陈尧卿发他一张，但嘱护照上编号码，登记下来，并另记载是刘参谋长要去。两个月后，我接贺国光由渝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刘文彩贩运鸦片，所持护照为成都行辕所发，已被军统截获，戴笠把这张护照交给他了。这事极关重要，嘱我乘飞机明天赴渝。我到重庆后，贺把那张护照给我看，就是刘倚仁拿去那张，有号码为凭。护照内容是刘文彩自己填写的。贺经多方向戴笠解释才得下台。事后调查，知是刘文彩出钱，刘倚仁出护照，合伙做烟生意。（谢藻如：《苦忆四川烟祸》，见《四川文史资料》第10辑）

此事不了了之，刘文彩毫发未伤。

戴笠对鸦片大王刘文彩都不能不网开一面，还有谁能太岁头上动土！刘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贩烟不已”了。创办“文彩中学”是其个人史册中最亮的一笔，但甚至这一笔也没能挣脱贩烟的阴影。其五太太王玉清回忆：“（文彩中学）修了一段时间，钱也比较紧，刘文彩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刘文辉做了几转鸦片生意，又做了一转谷子生意，才修完的。”终其一生，可说与鸦片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溺于鸦片贸易的刘文彩也染上了烟瘾。不仅自己吸烟，而且款待部属用烟，结交朋友用烟。吸烟成了他在叙府时代的主要社交手段。他曾自称：其烟枪“编一个连还用不完”。但他颇有毅力。退居安仁后，虽然未能根绝烟瘾，却已大为节制，每天七口，绝不超量。他的长子刘元龙却不像他那样乐而不淫，过而不留。终生嗜烟，每日烟榻横卧，云遮雾罩。刘文彩恨铁不成钢，真是害人又害己。

作为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不可能不富有。那么刘文彩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

刘文彩家产主要源自他在叙府的十年聚敛。一是投机贸易所累积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积的薪金。前者的具体数目已无从统计；就后者而言，驻叙时刘文彩兼职近十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二万元，合计每年薪额当不下十万元，十年薪额当在百万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刘文彩家产中应该说处于辅助地位。刘文彩之富有也就

可以想见了。

尽管如此，刘文彩仍算不得富甲四方。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共八十五人“金榜题名”。刘氏家族共有八人入榜：刘文辉居第2位，刘湘夫人刘周书居第22位，刘湘部属刘树成居第24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瑭居第25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琉居第26位，刘文彩侄子刘元琮居第27位，刘文彩侄婿伍培英居第28位。刘文彩本人仅居第33位。在刘氏家族八位“大款”中，他是倒数第一。

刘文彩家产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田产、房产和珠宝。

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地主阶层在中国农村迅猛崛起。拥地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的军阀－官僚大地主，不乏其人。刘文彩是他们中的一员。其占地情况，1959年有关部门曾公布如下：

大邑县：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

以上合计：12063亩。

其后，刘文彩的田产记录不断刷新：12530亩，见诸《刘文彩罪恶的一生》；15000余亩，见诸《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真个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么刘文彩的田产总额究竟是多少？刘文彩内管家薛畴久六十年代有过明确交待：八千多亩。八十年代，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大邑县志》确认为8091.43亩。

第二大宗是房产。据有关部门1959年统计，其房产分布情况为：

温江县：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1座。

这些统计数字也未必准确。成都市“公馆四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三座——文庙街公馆、陕西街公馆和湖广街公馆。大邑县“公馆3座”，刘文彩家人只承认一座，即安仁老公馆。刘文彩一个儿子回忆，正因为刘文彩在县城一座公馆也没有，所以抗战期间，他的两个小妹在县城读中学时，都住在西濠沟刘文渊公馆里。

另据庄园档案67宗D16卷，刘文彩退居安仁后，仍在叙府拥有巨额房产——街房380多间，独院30多个。合计约六万平方米。刘文彩派人常驻叙府收取房租。每月收房租约大米八十石（每石约400斤），全年应收入大米一千石。

在所有这些房产中，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刘文彩老公馆。二十年代兴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是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座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六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独领风骚。1992年5月7日，专家实地考察，送了八个字：“当代文物，无价之宝。”这样一尊无价之宝，在当年无疑是刘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显赫的象征。

刘文彩家产从来众说纷纭。至少有三大谜团，即：庄园新公馆之迷；新公馆金库之迷；象牙塔之迷。

新公馆在刘文彩老公馆对面约300米处，呈正方形，面积比老公馆大一倍。这是典型的中西和璧的近代庄园建筑，房屋轩敞，布局对称，既有封建豪门府邸的特点，又兼取西方城堡建筑的某些形式。共有27个天井，160余间房屋，4

个花园、花圃，2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戏台等。比刘文彩老公馆更豪华更气派。有关部门统计的大邑三座刘文彩公馆，就包括它在内。

关于新公馆的真正主人，王玉清早就讲得很清楚：

刘文彩说我们家发迹，主要是我们老幺（即刘文辉——引者注）出世后发迹的。我们几弟兄都有住的，以后老幺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刘文彩在民国二十六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在毗卢寺修刘文辉的公馆，用了二年多时间修成的。这些开支都是刘文彩一人承担的。（庄园档案67宗D9卷）

另一位知情人对新公馆来由陈述更详——

这个新公馆，在解放后的极左年代里，搞地主庄园展览时，被说成是刘文彩自用的，作为他奢侈腐化的罪证之一。尽管有相当多的人知道是刘文彩修来送刘文辉的，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修成一式两座紧紧挨着的连体公馆。于是有人猜测是刘文彩准备送文辉一座，自用一座，实际并非如此。当年刘文辉有两房太太，都有权势，各有一个儿子，这两位太太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成都亦是各住各的公馆。因此，刘文彩在构思为幺弟建房时，就考虑到这个情况，索性造成一式两座，两边都好看。由此，也可看出刘文彩的性格，也可看出他俩的弟兄情。谁也想不到却无心造就了一座古今中外罕见的连体孪生建筑。（衆子：《刘文彩的后半生》〔未刊稿〕）

为了接收新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专程返回安仁，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云南王”龙云送去一块大金匾；刘文辉自己也作了两块大金匾，一题“沛然堂”，一题“致远堂”，均为刘文辉手书，两院各一个，挂在大厅正墙上。这些金匾和公馆中的其它金匾一样无一留存：1950年春，有些精明的漆匠知道大户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就到各地给大宅院的匾对洗金，洗下来的金粉自得，按金量多少酌给户主一点钱。漆匠有利可图，户主也可以变出活钱来缴纳派款。刘氏庄园的匾对就是崇庆县西街一个漆匠洗的金，洗后的匾对都论斤缴了柴火任务。现在游客看到的庄园匾对，是庄园陈列馆建馆时重新制作的，当时已无金粉生产——从前生产金粉，大多供匾对、招牌、佛像及家具装饰之用，建国后这类用户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已经实行金银国有，即便有个别金粉用户，弄不到原料也没办法做。所以有关部门制作的庄园匾对，都没有像原有的那样大量使用金粉，看起来远不如原有的气派堂皇。除了龙云赠金匾，包括崇庆县长幸蜀峰在内的四川各界名流，也都送礼庆贺。刘文辉眷属随后入住。新公馆归属刘文辉无疑，却被有关部门划归刘文彩名下，至今未予澄清。

刘文辉新公馆“易帜”，其中的金库也就随之易主。

刘文辉新公馆有间中式客厅，四周用木板镶成板墙，挂上名人书画，座椅茶几摆放整齐有序；来往宾客在这里品茗叙谈，却无人知晓那道风流儒雅的板墙并非板墙，而是一道夹墙，用二尺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更不知道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秘密。

夹墙后三道铁门紧锁着的是金库，库房呈“M”形，总容积576立方米。走进铁门，有三条宽大的长方形甬道。整个金库密不透气，仿佛与世隔绝，给人一种阴森压抑之感。

开国初解放军打开金库，里面已空无一物——胡宗南溃兵路过大邑，曾在此驻扎，从夹墙的厚度看出了蹊跷，便用刺刀乱戳木板，终于发现金库。于是，新公馆金库和刘文辉成都金库一样遭洗劫。当年板墙上留下的刺刀痕迹，现在还清晰可见。

新公馆金库遇劫内幕，1992年4月25日《天府周末》发表的贵州财经学院王尚端老先生的一封来信，有过详细介绍。开国初王老先生在“西南军大川西分校”政治部任秘书，该校设于新都县城，距安仁很近。成都地区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士官生，一律编入该校学习改造。结业前夕，学员们分三次自动上缴了大量黄金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并交待，这些黄金大多是在安仁刘家公馆抢的。校方即派王尚端将这些黄金解送当时的川西军区政治部。据此，抢黄金的就不只是胡宗南溃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校等经过安仁的国民党部队，都曾染指。

金库遇劫内幕至此大白于天下。但金库和金库中的珍宝何人所有仍需索解。《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宣称：金库及其中珍宝属刘文彩家产：

> 这里曾经储藏着刘文彩的万贯金银。刘文彩建这个金库非常秘密，连经管修建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设计师则在金库完工后就失踪了。

这不过是照搬“水牢”笔法。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其实另有来历。

这就必须说到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开采。

西康时期刘文辉有两大支柱产业，鸦片而外，就是黄金开采了。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对川康地区

的黄金资源作了实地考察。近年来我国政府根据任教授通过他的学生罗瑞卿将军转呈国务院的《采金刍议》，发现了一些大中型金矿。任教授对刘文辉西康时期的黄金开采情况知之甚详，在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的前几个月，发表了题为《“黄金大王”刘文辉》的文章，回忆说——

> 他以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的名义，派军队进驻隆达，首先将停废多年，年产万两的隆达金库恢复起来，财政逐渐宽裕。
>
> 1937 年……成立金库局，监理隆达、色尔西两厂和一些小矿区的采金税收。金库局也直接雇工开采，供给采金工人食品、衣物和工具等必需品，折合黄金予以借贷，吸收课税以外的黄金。利息比土司、头人、寺庙均低，矿工们都乐于贷用，也乐于交售金子。十几年来，川边（即西康地区）开采的黄金几乎全归金库局掌握。
>
> ……刘文辉还用西康土货，与比邻产黄金云南丽江、永昌交换产品，每年进行 4 至 6 次交易，广开黄金渠道。据初步估计……到 1949 年解放止，15 年中刘文辉从川边地区用陈旧土法采出的黄金，约有 100 万两左右。（《民盟史话》第 346—347 页）

这些数目惊人的黄金，分别储存于西康和四川。在四川有两个储存点，一个是成都方正街刘文辉公馆，再一个就是安仁刘文辉新公馆。

新公馆金库是在新公馆落成付用之后开始修建的。1942 年春刘文辉回安仁接收房子，三太太杨蕴光选定了一套院落。杨蕴光娘家几个亲戚不久就搬了进去，为他们守房。另

一套院子归刘文辉二太太李氏，但李氏撒手不管，只好托一位给刘文辉管田产的何姓管事照看。1943年，刘元龙对弟弟发牢骚，说："费钱费事修房送人，人家还不满意。"弟弟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便说出原由：杨蕴光派了几个外省工人，到安仁改建新公馆。但刘元龙弟弟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很高，看不惯新公馆的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不过就连刘元龙弟弟也承认，这使他们面子上过不去，因为改建之前并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直到几十年之后，报刊将新公馆金库炒得沸沸扬扬，刘文彩后裔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蕴光请外省工人改建的房子是金库密室。也就无怪乎新公馆金库之设，"连经管新庄园的总管家都不知道。"其实岂止是总管家，刘文彩五太太王玉清几十年来也反复声明："（新公馆）里面的金库我不知道。"新公馆金库之设无疑属于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的绝对机密。

很明显，金库和金库储藏的"万贯金银"与刘文彩家产无涉。

刘文彩家产的最后一个大宗是珠宝古玩。这方面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不难窥见其大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一直辟有专室展览"庄园文物"。展品据说为刘文彩生前所有。如金佛、金兽、金杯、金圈、金项链，如银龙、银兽、银盘，还有美丽的珊瑚、发光的宝石、底部可露出美女头像的美人杯、能像鸟儿那样嘤嘤作声的鸣壶，莫不异彩纷呈。其中，最精美同时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象牙塔十三层，六角形，尖顶。塔高46厘米，台基四周有六根扶栏，内有阶梯七级至第一层亭阁；阁内一佛像盘地而坐。象牙球全高32厘米，球直径7.5厘米，球座高24.5厘米。球体镂空，也有十三层，表层大如皮球，里层小似豌

豆。雕刻着游龙、云彩；有十三个孔，可分别从表层看透里层。球座雕刻着脚踏莲花的仙姑和对她顶礼膜拜的善男。象牙塔、象牙球均系纯牙雕，属国家一级文物。其身世有两种说法。

一是有关部门所持的买赃说。

说是194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邑发生了一起轰动四乡的盗窃案，十多个蒙面大盗从县城北门城墙翻入一座别墅，别墅主宾猝不及防，被蒙面大盗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楼上楼下，抄了个一片狼藉。包括象牙塔、象牙球及白狐裘在内的所有贵重衣物和首饰珠宝，被蒙面大盗洗劫一空。就连女眷口中的金牙齿，也被悉数拔走。蒙面大盗得手之后，从容而遁。别墅隔壁的东岳庙有一连驻军，但驻军并无反应，一枪未开。

别墅主人姓刘，名成勋。

民国时代，大邑出过三大军阀，这三大军阀都当过军长和省主席——两个出自刘氏家族，即刘湘和刘文辉，再一个就是刘成勋。刘文辉还在陈洪范的十八师当团长时，刘成勋就已经是川军第三军军长。在驱滇之战中越级提拔刘文辉、气得陈洪范跳脚的"勋公"就是他，算得上刘文辉的老前辈，于刘文辉也有知遇之恩。孰料刘文辉丝毫不念旧情，在1927年把"勋公"打了个落花流水，一点老本不给。刘成勋只好宣布下野，灰溜溜地返回大邑。刘文辉仍不放过他，公然任命大邑袍哥头子牟二蝗为独立团团长，监控"勋公"。刘成勋不能不磨灭志气，颓废沉寂。为防不测，连县城也少进。只在大邑牟家坝附近修了座公馆，与个别士绅交往，把酒论盏，赏花弄月。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其活动空间才稍有扩展，常去银屏乡绿云馆，和士绅詹敬中等种植树桐树，培植果园。此外，在大邑县城关皇城修了个小巧雅致的

别墅。1944年，刘成勋六十大寿，县城士绅前往贺寿。在任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刘文辉、邓锡侯等“党国大员”都送了贺礼。并邀川剧名角廖竟秋等到别墅演戏，盛况空前。刘成勋心花怒放，哪知道他已经来日无多，不出一年就因高血压突然去世。去世不久，蒙面大盗就光临了他的别墅。

此案非同小可。案发第二天，大邑县长何正明即宣布戒严，挨户搜查；同时前往别墅，向刘成勋夫人问安请罪。刘夫人大发脾气，把何县长骂了个狗血淋头。消息传到成都，新任省主席王陵基极度震怒，责令何正明限期破案，何县长查了很久，仍无头绪。王陵基遂将何正明撤职，另调青神县县长杨荫池接任。杨荫池不敢怠慢，但最终还是弄成了一桩无头案。

所谓无头案，并非真的“神龙见头不见尾”。其实杨荫池是破了案的——1947年某日，王安懋的妻子办寿酒，邀请刘成勋夫人孙茂林赴宴。请柬送到时，孙茂林正在床上吞云吐雾，不愿赴宴，就让侄女代行。侄女要打扮一番，但没有合适的首饰，孙茂林打开自己的珠宝箱，叫侄女挑选。珠宝箱琳琅满目，在一旁服侍孙茂林抽烟的何松廷简直看呆了。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侄儿，他的侄儿又转告了邛崃县大新场匪首侯泽。侯泽便在8月26日夜下了手。后因分赃不均，有人把内幕说了出来。杨荫池把侯泽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孩子传到大堂上审问。侯泽的妻子很老练，矢口否认家里有什么刘成勋遗物。杨从她那里掏不出实话，转而以孩子为突破口，孩子经不起几颗水果糖的引诱，老老实实供出家里确实有象牙球和象牙塔，所述形状与失物相符。劫案告破，但案犯之一何松廷是刘成勋亲戚，考虑到刘成勋家族的声誉，杨荫池没有公布案情。部分赃物被追回，象牙球、象牙塔和白狐裘却不知所踪。但据有关部门称，建国初这几件

宝贝突然亮了相——“大邑县解放，群众在刘文彩老公馆清理物什时，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人们惊异，刘总司令的失物为何到了刘文彩的家中呢？”（《地主庄园沧桑录》第202页）对此有两种解释。或称刘文彩早就喜欢上了那几件宝贝，多次求购，都遭刘成勋拒绝。无奈之下，铤而走险，串通侯泽行窃；或称侯泽抢了那几件宝贝，见官府追查甚急，便投奔刘文彩老公馆，将赃物拱手相让，以换取刘文彩的庇护。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关部门认定，刘成勋的宝贝落到了刘文彩手上。据说这点还得到了刘成勋后裔的确认——1960年，正在大邑县城读初中的刘成勋小女儿刘培英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参观，看到了象牙塔。回家告诉她母亲说，那象牙塔就是她爸爸的象牙塔。因为她亲眼看见象牙塔底座上有孙中山刻的字。但她嘱咐母亲不要声张，她家是地主，怕说出来影响不好……

买赃说的内容大致如此。此说跌宕起伏，颇具戏剧色彩。但失之于只有“大胆假设”，而无“小心求证”。按说求证并不难——刘成勋的象牙塔为孙中山所赠，底座确有孙中山题字。所以，只须将象牙塔底座审核一番，即可真相大白。如此简单的求证手续，几十年中竟未着手。直到引出一桩官司，有关部门这才不能不着手——90年代初，定居美国的刘成勋后裔到庄园参观，得知象牙塔系刘成勋所有，便一点不客气地要求陈列馆奉还“祖上遗物”。对海外华侨的呼声，有关部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随即将象牙塔送法院鉴定。鉴定结果，庄园展出的象牙塔其实是仿制品。这一来麻烦了——不是说早就“发现刘禹九家丢失的象牙塔和白狐裘及象牙球完好无损地放在刘文彩的卧室内”吗？果真如此，有关部门就应该拿出真品，物归原主；如果拿不出真品，说

刘文彩窝藏象牙塔及其它刘成勋遗物又有何依据？于是，尽管刘成勋后裔一再上诉，有关部门也只好“忽然闭口立”了。所谓“买赃说”，实际上不攻自破。

另一说为刘文彩后裔所持的自购说。刘文彩后裔只承认象牙球为刘文彩遗物，但断言此象牙球非彼象牙球，而是刘文彩夫人杨仲华在上海购得。1937年，刘文彩刚满九岁的三儿子刘元富患脑膜炎，医生用药过量而致耳聋。杨仲华带刘元富去上海求医，逛商店时看中了象牙球，标价五百大洋一个。开初杨仲华不敢买，因为刘元富在上海治疗无效，马上要去北平求医，估计去北平还要花很多钱。没想到北平之行花钱不多——医生判为不治之症，不同意住院治疗。适逢“七七事变”爆发，战云笼罩北平，母子俩快快返沪。抵沪又逢“淞沪抗战”，交通中断，困了一个多月。闲来无事，杨仲华又带上孩子逛商店，这才下决心把象牙球买了下来。因旅途险恶，杨仲华不敢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就托商店代办托运。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婚礼期间，杨仲华曾把象牙球从成都带到安仁，在老公馆大厅展出，供来宾观赏。一同展出的还有珊瑚树、金丝猴皮垫。刘元龙婚礼在先——1938年，刘成勋别墅被盗在后——1945年，可见二者本来毫不相干。刘文辉长女刘元恺以亲见亲历向笔者证实这种说法。并有如下补充：

> （杨仲华）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象牙球）多好看。我就问五爸（刘文彩），我说你给我嘛。他说二天（四川话，意思是将来）给你买一个，不要闹不要闹，二天结婚的时候给你买一个——买一个娃娃。他（指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说啥子从刘成勋那儿抢来的，还有个貂皮大衣。我当时就给他说你要改，这个事我清清楚

楚。我跟他说了，他又问王玉清，王玉清也这样说。转过来问刘元华（刘文彩次子），刘元华也是这样说……那你（指地主庄园陈列馆）还把它整到那儿做啥子？他（指陈列馆工作人员）还来喊我录音写证明入档。我说入啥子档？你那个档是要取消的档。我说你（指陈列馆工作人员）关到录音机啊，我说马上把你吆出去……。他（指陈列馆工作人员）经常到我这儿来，你跟他说的话他又不听，我说没有啥子意义嘛，我们晓得真实情况，而且这个象牙球我清清楚楚，我还问他（指刘文彩）要过。这个东西（指象牙球）还硬到说是从刘成勋那儿抢的，为五百块钱。刘文彩原先那么多钱，去抢五百块钱的东西，那太出格了嘛，你就一般推断都不会这样做。

岂止是怀疑在象牙球问题上栽赃。其它庄园文物，刘文彩后裔也认为大多是栽赃。庄园陈列馆曾收到一封刘元富来函，来函在说明象牙球身世后笔锋一转，称：

我现在证实了这个象牙球是我母买回家的，但不能因此而推论其他一切“珍宝”都是我家的。首要的根据是我父亲生前根本不喜欢收集珍宝玩器。家里女眷们当然各有几件，也是普通的饰物，够不上珍奇的标准。对于馆里那些“珍宝”，我想起两个线索：

1. 文革前，我有个朋友在寄卖行管买卖电器。有次他告诉我，珍宝部的同事说，有人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发票开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

2. 文革初，我被红卫兵关在一个教室里；难友中有个电车公司的人，三十岁左右，问我：“庄园摆的那

些名堂是不是真的?”我说没见过，不知道。他说一定是假的。我问何以见得，他也说在寄卖行看见有人采购珠宝开庄园发票的事。

可见陈列馆曾经大量采购这类东西。那时全国都没有经营这类东西的商店了，只能在仅有的几家寄卖行去找。再就是土改时地主们上交退押的、政府还没有处理完的，也可能送到陈列馆里去充实刘文彩的“代表性”。

从这几种来源来看，我认为不会有什么真资格的珠宝。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有个远亲在香港做生意，香港沦陷时，他回到成都，有次来看我母亲，闲谈中说起宋蔼龄曾在香港买过一对镶钻手镯，价格六万美元。与目前国内新闻报道的，二十万元买一条狗，几万、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拿馆里所吹的刘文彩的豪华享受，比得上吗?

九二年秋，×××曾问我馆内某处是否原样，并说要恢复原样；我认为不可能。首先那十几个猪圈和猪圈下面的七、八个大茅坑就不便复原，还有不少地方已改建得很美观，更没有必要去复原了。当时我说了一句，如恢复原样，就没有看头了，这是包括“人”的原样来说的……

九三年初开始，报纸上又重新大量渲染刘文彩的“豪华腐化”，什么“欢喜楼”、“逍遥楼”这类古小说中才有的名词，又出现在庄园里了。我知道这不是现任领导们创造的，而是不自觉地继承了过去“左”的时期的那一套……

联想到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

化局负责人到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一位负责人曾批评：“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指示陈列馆“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刘元富来函所反映的情况，实在是情理中事。但陈列馆及其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对刘元富来函所提出的问题作任何解释。

刘文彩家产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作为当时川康两省的一流豪门，刘文彩及其家族不可能不富有。究竟富有到何种程度，除田产、房产比较肯定外，其余的就只能推演其大概，无法得出具体数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从前清算刘文彩历史，完全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宣传，耸人听闻之辞不可能反映真相。刘文彩固然是聚敛大王，但在四川军阀的聚敛大赛中还算不得独占鳌头；刘文彩固然是财富巨亨，但并不像相关著述描绘的那样富可敌国。

第九章

祸　兮　福　兮



1. 历史老人刘有江
2. 乡亲们在谈往事



虽是同根生，相煎仍须急。叔侄之间仍要大打出手。

1932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清风习习，萤火点点。重庆李子坝刘湘寓所的树丛里，突然跳出几个身藏短枪的蒙面人。刘湘卫兵一拥而上，蒙面人束手就擒。不待动刑，蒙面人就已坦白：他们是刘文彩从叙府护商大队手枪连选派的，此行目的是暗杀刘湘。在树上埋伏了三天三夜，伺机下手，但刘湘公馆大概听到了风声，防范甚严，不仅找不到下手机会，而且连出都出不去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实在熬不住，只好下树自首。

这是"二刘大战"前夜的一桩著名的悬案。此外还有一案——说刘文彩在叙府家中设坛，立草人，上书刘湘姓名及生卒年月，插刀于草人头部、腹部，念经念咒，企图借巫蛊之术置刘湘于死地。

这两桩悬案是否确有其事，至今无解。但刘文彩兄弟与刘湘反目为仇，则是历史事实。

刘文彩兄弟与刘湘何以反目为仇？就说来话长了。

刘湘刘文辉，本来是四川政治舞台上一对最好的搭档。刘文辉从保定军校毕业，前去投奔刘湘，竟遭刘湘婉拒。其实刘湘那时已别有深意——刘文辉年少气盛，且有堂叔之尊，不可能长期听他使唤。倒不如让刘文辉另谋出路，他则从旁提携。这样，倘或刘文辉失意，他可问心无愧；倘或刘文辉得志，他与刘文辉有亲亲之谊、提携之恩，自不难与刘文辉联手，共同对付异姓诸雄。后来"二刘"关系的发展，与刘湘的这个思路基本吻合。因为刘湘的殷殷关照，刘文辉很快脱颖而出。刘文辉的发迹有赖刘湘，但文辉也待刘湘不

薄。1922年倒刘湘之战，1928年下川东之战，为刘湘成败所系，刘文辉都曾出兵援湘，其它经济上、政治上的援助更是所在多有。刘文辉曾这样评价“二刘”早期交往：“辉与吾侄，幼同门户，长共戎行，纤芥无嫌，耘锄无隙，自信无一负侄之事，无一不可对侄之言”（《刘湘》第121页）。此说倒也不都是夸张。正是由于相互倚重，精诚合作，“二刘”才能越战越强——四川异姓诸雄要么被“二刘”打垮，要么对“二刘”表示臣服而偏处一隅。“二刘”迅速崛起为四川两个最大的军阀集团，到1928年，终于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

“二刘”关系由此发生逆转。

刘文辉素来野心勃勃。当他作旅长师长时，无论实力怎么膨胀，毕竟只是个二流将领，对刘湘尚能听命。一旦羽翼丰满，就不免顾盼生风，不甘维持与刘湘一主一从的旧格局。用晚年刘文辉自己的话来讲，当时他是“少年得志，不可一世”——“我那时的主意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去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贵州，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但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终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围内扩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3－4页）。

刘文辉固然不可一世，刘湘之志也不在刘文辉之下。有一则传闻很说明问题。

说是刘湘在安仁读私塾，某日午后上学，同学都没到，老师还在午睡。刘湘照例临摹字帖，失手碰倒墨瓶。老师在梦中见到一条乌龙从天而降，豪光四射，张口吞吸四溢之墨。一觉醒来，正好看见刘湘俯首舔吸桌上的墨汁，满脸漆

黑，有若乌龙。老师大惊，不禁讲出梦中故事，认定刘湘为乌龙星下凡，从此对刘湘格外钟爱。

这则传闻在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去核实它的真伪了。但无论真伪，刘湘心中，都一定有一场乌龙星之梦。正是在乌龙星之梦的鼓舞下，刘湘屡仆屡起；正是在乌龙星之梦的鼓舞下，刘湘刚刚取得下川东之战的胜利就公开扬言："中国历史上，四川还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颇有舍我其谁之慨。

"二刘"合作，其政治前提是联手对付四川异姓诸雄，现在异姓诸雄都已慑服，四川成了"二刘"的天下，合作的政治前提不复存在。"二刘"都不甘人后，都要独霸四川，进取中原。两雄不并立，昨天的亲戚加盟友，在今天则成了惟一的竞争对手。"二刘"合作必然转化为"二刘"对抗。

但毕竟有"亲亲之谊"。兵刃相见，感情上一时难于接受，开初还想通过协商平衡双边关系。曾用一主军、一主政的方式解决矛盾。刘湘于 1928 年 11 月当上四川善后督办；刘文辉于 1928 年当上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 年 2 月省府改组仍任主席。但在实际上，"主军"的善后督办刘湘管不了刘文辉二十四军，"主政"的刘文辉也管不了刘湘防区的政务。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并未稍稍缓解。协商不能解决矛盾，只好疆场上见高低，成王败寇。于是，虽是同根生，相煎仍须急。叔侄之间仍要大打出手。

叔侄对垒，堂侄刘湘总兵力合计十万余人，堂叔刘文辉总兵力合计十二万余人。刘文辉在军事上略胜一筹。

但在政治上，刘文辉却处于绝对劣势——他所面对的不只是刘湘，而是一个强大的反刘文辉同盟。

反刘文辉同盟包括一批落魄军阀。历年兼并战争中，杨森、罗泽州、李家钰在二刘联手打击下迭遭重创，蹙处营

山、蓬安、岳池数县之地，度日维艰。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只有在乱局中才可找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及见二刘交恶，喜出望外，竭力从中推波助澜。二刘都是他们的宿敌，但两害相权，则刘湘为轻。他们都以四川军界前辈自居，却都输给"乳臭小儿"刘文辉。眼见刘文辉蒸蒸日上，趾高气扬，不禁又羞又妒，亟思报复。刘湘不然，他们与刘湘平辈，而且在战败之后，刘湘对他们常有周济，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刘湘结盟，自告奋勇，愿为前驱。

但在反刘文辉同盟中，几个破落户是扮演不了重要角色的。反刘文辉同盟之所以强大，主要还是因为它汇集了别的几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蒋介石"合法中央"。

刘文辉才华横溢，连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但早年刘文辉的过人才华，主要表现于军事，政治上则身手平平，远不如刘湘老辣。早在中原大战前夜，刘文辉刘湘已在政治上过招。改组派反蒋，刘文辉惟恐丧失先机，刘湘却隔岸观火，不动声色。刘湘看得很清楚，蒋阎冯大战，成败系于张学良一身。张学良的地位，就仿佛韩信在楚汉之争中的地位。张与蒋则蒋胜，张与阎冯则阎冯胜。张学良究竟如何动作，当时并未明朗。刘湘便不作决断，而是先派谋士邓汉祥去沈阳打探虚实。蒋阎冯这时也都派出代表到张学良行营游说，沈阳热闹非凡。邓汉祥曾在二十年代初作为段祺瑞的政治代表多次出使东北，与张学良交情较深。所以张学良虽对各方代表含糊其词，却对邓汉祥分外关照，特意约见邓，说他决意与蒋，现在正电召东北四省军政长官来沈阳作最后决定。并嘱咐邓汉祥不要外传。邓汉祥探得天机，马上电告刘湘，同时请刘湘立即转告刘文辉。邓原以为二刘一体，殊不知此时二刘已经分心。刘湘生怕刘文辉不去跳崖，便对刘文

辉秘而不宣。刘文辉也就不可能悬崖勒马，在云里雾里懵懵懂懂地发出了反蒋通电。通电发出时，邓汉祥还没有离开沈阳，读电大惊。所幸蒋介石的使节张群正好也在沈阳，邓与张是至交，就去请张群设法为刘文辉斡旋。张不负所托，回宁后一再向蒋进言，说刘文辉不过是误上“贼船“。蒋介石这才没有追究刘文辉。

刘湘既得天机，马上对蒋介石一边倒，不仅口头拥护，还出兵相助。其实刘湘和刘文辉一样视蒋介石为潜在对手。但刘湘认为，进取中枢是第二步的事，现实目标必须是自保。何况蒋介石无暇西顾，与自己暂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相形之下，同榻而卧的四川诸雄，对自己的威胁反倒大得多。从此他积极向蒋靠拢，使自己退无外忧，可集中精力解决四川问题；进可得到蒋介石“合法中央”的承认，拥有“正统性”，政治上居于主动。刘湘投准了赌注，虽非蒋介石嫡系，仍为蒋介石所眷顾。刘文辉则以牛犊之勇一再犯上，为蒋介石所恶。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没有追究刘文辉，但也没有原谅刘文辉，不过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暂持包容态度，以免刺激刘文辉走入极端，转生祸害。若能借助他人之手教训刘文辉，在蒋介石自是大快朵颐的上上之策。刘湘号准蒋介石的这个心病，对症下药，于1932年春夏之交制定所谓“安川计划”。要求蒋介石“假以我以全责，对邓锡侯、田颂尧两军畀以相当利益”，以夹击刘文辉，“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取掉其主席”。刘湘此计果然得售，蒋阅后喜形于色，立即亲笔复函刘湘，备加慰勉。另由亲信曾扩情以个人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内解决刘文辉，大可便宜行事。有蒋介石“合法中央”的幕后支持，刘湘气壮如牛，对刘文辉用兵也就无所忌讳。

即便如此，刘文辉还谈不上陷入绝境。“二刘”之外，

四川最强大的军阀是邓锡侯、田颂尧。邓、田当时的地位，就好比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地位，与刘湘则刘湘胜，与刘文辉则刘文辉胜。而刘文辉本来得天独厚——与邓、田是保定同学，1925年之后又同驻成都，在群雄角逐、玩弄学系帮派之时，刘、邓、田是天然盟友，时人称之“保定系”，以区别于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保定三雄，刘文辉实力最雄厚，邓、田自愧弗如，奉刘文辉为保定系核心人物。二刘交恶，刘文辉仍有邓、田可资联络。无奈刘文辉气势太盛。这里有个故事。说是刘文辉有个保定同学，名叫余安民，毕业后一直不得志。一天，余应邀出席同学会，刘文辉见了大叫：“你不是在家卖酱油吗？怎么也来了？”余安民在家开酱油铺是实，但在大雅之堂如此戏谑，余安民哪能受得了！余从此对刘文辉恨之入骨，发誓要搞垮刘文辉。可见少年得志的刘文辉，完全没把老同学放在眼里。对学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同样没有谦谦君子之风，不作精诚团结、共同对外的打算，反而在和刘湘明争暗斗的同时，大挖两位学兄的墙角。邓锡侯二十八军主要将领陈书农、杨荣向都接受了刘文辉的津贴。彭诚孚、邓国璋两旅干脆脱离二十八军而投奔刘文辉。刘文辉认为邓锡侯已元气大伤，不足为虑，转而加紧分化田颂尧二十九军。便有了王思忠事件——1929年冬，二十九军教导师师长王思忠因与刘文辉暗中勾搭而触田颂尧之忌，被田扣留。部属帅国桢乘机将部队拖到二十四军防区双流、新津屯驻，为刘文辉收容，编为二十四军第十三旅。田颂尧和他的部下非常愤慨，开会决议，要刘文辉“拿话来说”。刘文辉不理不睬，继续加紧分化二十九军。于是，王思忠事件余波未平，又发生寇博渊事件——1931年春，田颂尧计划整编寇博渊旅。寇博渊担心整编后不能维持旅的名义，也投奔了刘文辉。但寇博渊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

人——一来考虑到二十四军与田颂尧的关系已经很紧张，再挖田的墙角，无疑是火上加油。二来考虑到寇旅人枪不多、没什么战斗力，犯不上为了它去进一步激怒田颂尧。所以二十四军将领大多反对收容寇旅。刘文辉一意孤行，仍将寇旅收容。田颂尧忍无可忍，竟至要向刘文辉开战，拼个鱼死网破。刘文辉见势不好，这才答应妥协，退还寇旅枪支。但田颂尧对几条破枪兴趣不大，坚持遣返寇博渊，要把寇送上军事法庭，杀鸡给猴看。寇博渊家属吓坏了，天天缠着刘文辉哭闹，求他给寇一条生路。刘文辉左右为难：拒绝遣返，和田颂尧的关系就会一直僵下去。同意遣返，寇博渊肯定性命不保，此例一开，以后还有谁敢拖队伍投效自己？想来想去，刘文辉最终还是拒绝遣返。二十四军与二十九军的裂痕也就完全没有指望弥合了。刘文辉欺人太甚，邓、田均阽阽自危。和刘文辉相反，刘湘很能容人。虽然速成、保定两系时有摩擦，但身为速成系首领的刘湘，从未与保定系干将邓锡侯、田颂尧撕破脸皮。邓、田见刘文辉不是个好相与，刘湘却始终留有余地，只好转而联合刘湘以求自保。田颂尧派代表密谒刘湘，自称与刘文辉终难两立，愿共图刘文辉。刘湘大表欢迎。田颂尧随即向邓锡侯征求意见，邓锡侯完全赞同，也派代表赴渝，向刘湘输诚。刘文辉为渊驱鱼，众叛亲离，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正如前面所讲的，单就军事实力而言，刘湘未必是刘文辉的对手。但在政治上，刘湘却是占尽风流。刘湘素来稳健，深知仅仅二刘相争，绝无便宜可拣，反而两败俱伤，让异姓诸侯坐收渔利。这在他是在所不取的。他之所以敢与刘文辉交战，就是因为他确信自己已左右逢源，非以一己之力，而是挟天下之怒诛讨刘文辉，自可无往不利，一鼓而荡平之。

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必然导致军事实力对比的变化。反刘文辉同盟除刘湘十万大军外，还有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二十军、四川边防军、二十三师等部，合计二十四万兵马，为刘文辉总兵力的两倍。在各路诸侯合围夹击之下，刘文辉已成瓮中之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

反刘文辉同盟的具体组合经过，刘文辉不一定了解得很详细。但凭直觉，对其孤军境地，刘文辉还是有所体察。所以，虽然刘文辉坚信叔侄终不免兵刃相见，但马上开战，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1931年、1932年，刘文辉两次赴渝协商，希望缓和二刘关系。但胜券在握的刘湘，岂能给刘文辉以喘息之机、养虎遗患？因而对刘文辉盛气相凌，辗转推延时日。刘文辉不仅不得要领，反而备受刺激，怏怏而返。1932年夏，刘文辉一面调集部队，主动撤离顺庆、遂宁等地，一面致电刘湘表示拥护。但刘湘对刘文辉来电竟只字不复。所以，就直接因素而言，二刘大战当为刘湘挑起，刘文辉纯粹是硬着头皮上阵。

车辚辚，马萧萧。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第一次大劫难转瞬即至。就在这时，出现了刘文彩派人行刺刘湘和设坛巫蛊刘湘的传闻。

这两则传闻不是空穴来风。如果确有其事，应非刘文彩一人主使。刘文辉多次向刘湘屈尊求和，都被拒绝。情急之下，很难说不会走入极端。主帅不好出面，便由刘文彩"代劳"。这样，一旦得手，树倒猢狲散，刘湘集团溃不成军，刘文辉自可横扫四川如卷席。一旦失手，则不妨以"事不关己"相推托。但毕竟是传闻，虚构可能难以排除。二刘之战，刘湘主动。一方面时不我待；另一方面，堂侄打堂叔，在传统伦理仍处强势之时，刘湘没办法向社会交待。刘湘的参谋长钟体乾就始终反对刘湘用兵，苦谏无效，不辞而别，

息影省门。后来刘湘凯旋成都，第一个先拜访钟体乾，见面就说："钟先生，你一气便走了，哪知道我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事已至此，光生气有什么用？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如何挽回吧。"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并没有解决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刘湘在舆论上仍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他既要挑起战争，又不敢开第一枪；而是表面中立，幕后操纵罗泽州等落魄军阀打头阵。但幕后中立不会持久，最终还是要走上前台。正因为如此，刘湘亟待制造事端，将"六亲不认"的罪状加于刘文辉，"你不仁我不义"，为攻打刘文辉提供借口，推卸战争责任。刘文彩暗杀刘湘、巫蛊刘湘的传闻不难应运而生。而在事实上，刘湘也确实利用这两则传闻做够了文章，"叫嚷不休"，派员"往返诘责"，生怕知道的人不多、事态扩大不了。虽"终无结果，成为悬案"，但有无其事对刘湘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了由头，可借此渲染"亲亲之谊"已绝的氛围，关闭和谈大门。当最后关头，刘文渊以族长之尊赴渝调停时，平时对刘文渊奉命惟谨的刘湘，这次却理直气壮地把刘文渊给顶了回去。于是，两则传闻，终于"进而为大战的导火线"（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见《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1932年10月1日，战争爆发，驻武胜的罗泽州二十三师率先向二十四军防区南充进犯。24日，刘湘部与刘文辉部正式交火。四川近代史上最大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内战，至此进入高潮。

刘文彩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战争初期，联军分道攻取，所向势如破竹。24日克遂

宁，31日克荣昌，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富顺、内江。但刘湘与刘文辉直接交手的第一仗泸州之役，却打得很艰苦。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外加“神兵”围攻逾半月，竟未得手。只是因为邻县相继失守，泸州孤陷重围，守将杨尚周、田冠五才不得不于11月21日树起降旗。

泸州沦陷，通向刘文彩卧榻叙府的门户就无遮无拦了。

但刘文彩不死心。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还有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旅，论兵力也不单薄。所以刘文彩认为胜负未定，还可与刘湘一较短长。他不怕陆战，就怕水战——刘湘据有重庆、万县等重要口岸，又拥有铁壳商船改装的三艘炮艇。二十四军却没有水上武装与之抗衡。万一刘湘逆流而上，水路进取，他岂不是要徒手应敌？出于这种考虑，刘文彩下令：堵塞水上要道——李庄镇筲箕背漕口，使二十一军炮艇无法上溯。新华公司所属“元通”、“蜀通”两轮，在李庄镇水域往返穿梭，把装满石头的木船拖到江心，再将木船凿孔沉水。两天共计沉船四十到五十艘。水上交通果然为之中断。

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军不走水路走陆路，绕过筲箕背轻取南溪县李庄镇。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叙府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刘文彩叫苦不迭。

此时，枪声炮声声声入耳，刘文彩不能不作弃城之想了。他给叙府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庄园资料记载，刘文彩在叙府搜刮的钱财早就陆陆续续运回了老家。二刘大战爆发不久，他的“义盛”商号又赶制四千五百多个木箱，每箱装大洋二千元，总计八百万元，也

运回了老家。但据《刘文辉史话》，刘文彩运回的钱财不是八百万而是“屡年搜刮的银元一百四十几万”。这些数字其实都是臆测，所以各说不一。不管刘文彩是否运走了钱财，运走了多少钱财，反正叙府沦陷前夕，他手中的银子已经不多了。叙府城有高育琮的一个旅，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团。加起来五六千人马，一日三餐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撤退还需要路费。所有这些费用都归刘文彩筹措。刘文彩不能不捉襟见肘。他的商号倒是有批实物，如云土、吗啡、棉纱、食盐，等等，据说值好多好多钱，但一时半时脱不了手，变不出银子，仍解不了燃眉之急。只好先找关系将实物分别寄存，再发起“打门捐”。

军阀部队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找商会承头。刘文彩这次撤得急，便由部队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匆匆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当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即宣布全城戒严，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上军队到各户收取。《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称：

> 收款队伍形同虎狼。时有南街“泰丰隆”绸缎铺老板段叔平，因见派款过重，又见来追款的连长雷丕成系雷士奇之孙，遂仗其与雷士奇相熟，态度比较强硬些，雷丕成立命士兵将段捆绑，将刘文彩的手令示段，并声言立地枪决。把段老头吓坏了，手上的水烟袋也掉在地上，当即跪地求饶，限期一日内交清。除了开铺坐店，一般居民即便富有，也未必如此方便，合江门街一家彭姓，派额600元，只交150元，立被追款，官兵翻箱倒柜，拿去了玉圈首饰等物，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头天还照名单行动，次日就完全让刘文彩的军队自由行动了，所到之处，不管你大门、房门、箱箱柜柜都得打开，让他们“检查”。如敢抗拒，有的是刘的手令——立予枪决。不仅银元、毫子，即使铜元也照拿不误。不仅是钱，别的值钱的东西也照拿不误。这已非派款，亦非“打门捐”，而是明火执仗大洗劫了。

11月25日，刘文彩带着二十万元“打门捐”，在二十一军步步紧逼之下，撤离叙府。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年，在这里发家致富，在这里与爱妾凌旦相识……对这座富饶繁华的城市，对这座镌有他生命足迹的城市，他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刘文彩退据大邑时，“二刘”都已精疲力竭，不能不休战。元气恢复之后，刘湘又挑起战端。

1933年7月4日，刘湘亲自指挥的“安川战役”揭幕。这次战役是二刘之间的最后一搏。刘文辉在将有二心、士无斗志、四面受敌的险境中，自知没有取胜希望，便在7月8日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一线。“安川军”锐不可当，15日强渡岷江，连下乐山、眉山、新津、崇庆诸城。二十四军十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刘文辉无计可施，率残部向雅安退却。本来打算固守雅安，岂料“安川军”李注东旅追到雅河，在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刘文辉行营轰击。一炮击中刘文辉卧室；刘文辉正在酣梦之中，幸亏炮弹钻进床头墙壁，不曾伤及刘文辉身体。刘文辉大难不死，惊魂未定，狼狈撤离，钻进气候苦寒的不毛之地，先退荥经，再退汉源场。

有好事者作诗讽刺刘文辉，诗云：

自乾手腕素高强，此番计划欠周详；
惹得全川都是敌，而今只好赶乡场。

刘文辉几乎绝望。他对随同退却的师长陈能芬、旅长高育琮说："宁属地方苦寒，大家进去粮饷无着，你们可以向外自谋前程。"多年旧谊，一朝分别，那情景真够凄凉的。刘文辉自己则打算出川流亡。当时他一文莫名，托副官长陈耀伦筹集出川路费。陈耀伦弄到七八两沙金，制成小金条拿去见刘文辉，刘文辉谆谆嘱咐：放在身边好好保存，千万挪用不得。风流云散路茫茫，曾经不可一世的刘文辉，似乎真的气数已尽，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刘文辉刚刚落入命运的低谷，便奇峰突起，马上把他托举起来——虽然天下共讨刘文辉，却没有谁真的想把他置于死地。在蒋介石来说，如果刘湘独霸四川，必成坐大之势。所以一方面要教训刘文辉，另一方面又希望刘文辉拥有一定限度的实力，用以牵制刘湘。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蒋介石多次电令刘湘结束"安川战役"，转而"剿赤"。在刘湘来说，则有双重顾忌。一是政治上的顾忌——如果邓锡侯、田颂尧等异姓诸侯崛起，将来必是竞争对手。与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给刘文辉一条生路，用以牵制他们。再则是亲族层面上的顾忌。虽然刘湘在战前竭力营造"亲亲之谊已绝"的氛围，但实际存在的亲族关系，任谁也无从改变。战争期间，二十四军官兵就一边打一边骂刘湘："龟儿子，连你幺爸都不认！"刘湘始终承受着沉重的舆论压力。所以，纵然刘文辉有一万个不是，但倘若刘文辉真有个三长两短，无论他刘湘权势多么显赫，都将无颜见江东父老。刘湘到成都第一个先拜访主和派钟体乾，就是要钟

为他设法弥合亲族裂痕，挽回自己在舆论上的被动局面。钟体乾告诫说："你对自乾适可而止，不应过甚。"刘湘赶紧表白："我对幺叔，哪能有消灭他的心意，不过予以惩创，削弱他的力量，使他经营西康。幺叔长于政治，我长于军事，今后我们还是要合作的啊！"此后刘湘确实是把"适可而止，不应过甚"八个字当作他处理二刘关系的指针。在成都召见已经下台的刘文辉部将冷寅东时，刘湘又表白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低他的气焰。还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待将来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冷寅东听了趁机进言："甫公的安川军已占雅安，刘自公已让出汉源，他这个样子已不成气候了，安川军还是退出雅安，让自公回来吧？"刘湘给了冷寅东一个顺水人情，说："好吧！"随即下令"安川军"全线撤退，让刘文辉重返雅安。同时拨给刘文辉军服万套、大洋十万余元，以纾其难。刘文辉回头有岸，急忙自我转圜，向堂侄刘湘通电认错，拥护刘湘统一四川。1933年9月6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二刘之战"至此终于划上句号。

"二刘之战"，刘文辉丧师逾四分之三，失地近五分之四，停战时手中不足两万残兵。1933年10月底在雅安立定脚跟，把二十四军残存的十二个团整编为两个师，自兼第一师师长，辖刘元瑭、刘元琮两个旅。原副军长向育仁兼第二师师长，辖徐光普、李玉书两个旅。另委刘元璋为西昌屯垦司令，唐英为康属屯垦司令。就这样又拼凑起一个军政班子，在刘湘与蒋介石及刘湘与四川异姓诸侯权力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惨淡经营，徐图东山再起。

一场劫难就此平息。刘文辉集团堪称创巨痛深，却也获益非浅。满则溢，骄必败，刘文辉集团的遭际给这个古老的

警句作了最好的注脚。刘文辉少年得志，不可一世，骄狂轻躁，急功近利。毫无宽以待人的大家风范，以致见绝于人，自取其败。经过“二刘之战”，刘文辉迷途知返，不再咄咄逼人，四面出击，而是与人为善，八方交友。联合一切势力，利用一切矛盾，采取一切手段对付主要敌人蒋介石，构成刘文辉集团总的战略原则。刘文辉“多宝道人”之誉，即由此而来。刘文辉集团的军事势力虽已大不如前，政治上却日臻圆熟。这种政治上的日臻圆熟，是刘文辉集团走向复兴的关键因素。

“二刘大战”不仅导致刘文辉集团对外战略的根本转折，而且导致刘文辉集团内部组织的重大调整。刘文辉特别看重团体凝聚力，对下属一贯刻意笼络，“当时凡是与刘文辉相熟的人，都认为刘文辉对于部下宽厚，有一个基本态度，即'不为已甚'”（《刘文辉史话》第134页）。但收效并不显著。“二刘之战”中刘文辉对邓锡侯用兵，想先消灭邓，再回头对付刘湘。可愿为刘文辉阵前卖命的只有弟男子侄和义子石肇武，其余部将都作壁上观。师长张志和、林云根甚至擅自与邓锡侯部将在三河场秘密谈判，达成两项密约，一是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二是假若刘文辉拒绝停战议和，则脱离刘文辉，另树一帜，并逼迫刘文辉退驻西康。前一项密约可以公开，在集体进谏时面交刘文辉。后一项密约不可告人。但在进谏时，林云根阴错阳差地把后一项密约摸了出来，刘文辉看了如遭雷击，愣了半天。林云根发现弄错了，赶紧将和约交出，刘文辉连连摇头，说：“还有什么话说！”第二天一早，刘文辉召集全体将领在西御街公馆谈话，痛哭流涕，大家不欢而散。“安川战役”爆发前夕，刘文辉召开军事会议，席间，张志和公开叱责：“我们的头不会开车，把我们都开来陷起了。”林云根更是一捶桌子说：

“喊打仗，又不肯拿钱出来，这个仗怎么打！”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刘文辉竟然还是哭了起来，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同事，这个时候闹得这样不和！”一方面是强敌压境，一方面是悍将抗命，刘文辉内外交困。这才忍痛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以便整理内部。布置岷江防线时，他把异姓部将张志和、林云根、冷寅东放在第一线，而把弟男子侄和义子石肇武放在第一线之后，“名为预备队，其实是暗含监视之意。因此，上下怀疑，无心作战”（陈光藻：《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混战》，见《全国文史资料》第33辑）。实际上已经没办法打下去了，岷江之溃也就毫不足怪了。“二刘大战”中刘文辉惨败，内部不和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刘文辉对此刻骨铭心，从此坚信“非我族类，其心难同”；异姓部将只可共欢乐，不可共患难，对他们不再信任和重用，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他们排挤出去。冷寅东晚年回忆，当时他还有一点力量，曾电请刘文辉，“准我将尽量保存下来的部队拉到雅安，与军部共处。……到雅安与他共生死、同始终，以表示我的一片赤诚。他都无词，又坚决不同意”（《冷寅东回忆录》，原件藏庄园陈列馆）。迫使冷寅东于1933年通电自动离职。旅长夏首勋的命运大致相同。异姓部将多挂印他去，二十四军的权力真空，则由刘文辉的弟男子侄填补，弟男子侄成了刘文辉在二十四军的主要依靠对象。发展到后来，二十四军军师旅团四级实职，多为刘文辉的弟男子侄所占据，异姓部将很难问津。二十四军家族色彩之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成了刘氏家族的子弟兵。对此，西康地方人士朱世正回忆说：

西康是刘家的天下。这个刘家天下是怎么拼凑起来的？大家熟知的就是“十团九大邑，一师五个元”；

“二元七角半”的家当。何谓“十团九大邑，一师五个元”？就是十个团长中有九个大邑人，一个师中有（刘家）兄弟五人……。何谓“二元七角半”？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瑄、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是两元；参谋长伍培英是大女婿，女婿半子，只能算五角；参谋长妹夫是副参谋长，再打五折，只能算二角五，总计“二元七角半”。这个家天下，是舅子的舅子，老表的老表，妹夫的妹夫，大姨妈小姨妹……（庄园档案D5卷）

也就是说，以“二刘大战”的结束为起点，刘文辉开始实行直接的家族统治。这种家族统治，在中国近代军阀史上是不多见的。

刘文辉的这些政策调整，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应该说是卓有成效。对内主要依靠弟男子侄，二十四军从此排外性更强，内聚力更强。二十四军才能在此后十多年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暴，始终保持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绝对忠诚。刘文辉也才始终拥有与蒋介石周旋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对外实行与人为善的“多头政治”，刘文辉才能把川康实力派组织起来，形成巩固的政治同盟，从而在川康两省一呼百应，对蒋介石颇具威慑力。蒋介石也才对刘文辉不致轻举妄动，而是在表面上长期优容。没有“二刘大战”中的惨败，刘文辉的这些政策调整是无法想象的，其政治结局也就不堪设想。所以，“二刘大战”对刘文辉及其家族而言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祸兮福所倚”，诚哉斯言。

牟二蝗刚走近脸盆，埋伏在隔壁房间的杀手即从板壁上的小孔开了枪，牟二蝗应声倒地……

1932年12月刘文彩重返大邑。“叙南清乡司令部”随之迁到县城文庙；刘文彩还是堂堂“中将司令”，刘元瑄所率第十八团，刘慎言所率第四十一团，都归他指挥。此外，大邑还有二十四军独立团团长牟二蝗所率的地方武装、石肇武所率的警卫旅。总兵力合计一万以上。此时正是“二刘大战”间隙，双方都在利用喘息之机，厉兵秣马，准备投入更大规模的厮杀。刘文彩也就没有轻松日子过，在老家调兵遣将，筑垒固守。

但没来得及与外敌交锋，就已变生肘腋。

这次大闹天宫的主角，是独立团团长牟二蝗。牟二蝗原名牟秉年，字遂芳，大邑圆通寺人。牟家在大邑算是名门，从清朝中叶起，出了不少文官武将。后来家势衰败，成了破落户。牟二蝗小时读不起书，便投到大邑袍哥头子陈华斋门下，很快在江湖上出了名。大邑、崇庆、邛崃等县袍哥，莫不知牟二蝗其人。辛亥革命中，四川同盟会以袍哥为纽带组织同志军发动反清起义。牟二蝗则是大邑同志军首领，“为推翻帝制而奔走呼号”。这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同志军进攻大邑县衙，牟二蝗“冲锋在前，毫无惧色，其胆量之大，实有过人之处”。光复后论功行赏，当上了大邑县警备队队长，人称“牟总爷”。在江湖是袍哥大爷，在官场是辛亥功臣，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牟二蝗负责大邑治安，确实是再好不过。当时四川兵荒马乱，大邑尚称安宁，不能不说是牟二蝗的功劳。20年代初，牟二蝗被刘成勋收编，最初当营

长，不久就升任团长。刘成勋被刘文辉击败后，牟团为刘文辉接收，编为独立团，直属二十四军军部，回驻大邑。

绿林出身的牟二蝗，豪侠仗义，在地方上口碑甚好。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记载：1925年，"驻军团长牟遂芳，以关岳庙产为资金，在东街设无利贷款局，凡贫苦户，觅具妥实铺保，可无利借贷少许款项。后每年除夕前，牟氏对贫苦民众发放赈济米"（《大邑县志》第245页）。对隐居大邑的落魄军阀陈洪范、刘成勋，牟二蝗也不以势利眼相看，而是与他们过从甚密。对老上司刘成勋，更是"三日去一见，五日去一访，事之若父，敬之若师"。当作他生平惟一的知己。刘文辉要他回驻大邑，一是要他继续维持大邑治安，再则是要他监控刘成勋。他这样执行"监控"任务，刘文辉当然不满意。所以牟二蝗在二十四军吃不开，不仅没有升迁，反而被刘文辉釜底抽薪，相继调走两个营。牟二蝗实际统率的仅一个营外加一个机枪连。

一方面是因为不得志，一方面也是因为刘成勋的"熏陶"，牟二蝗积怨越来越深。只不过迫于时势，隐忍未发罢了。既然如此，要牟二蝗在刘文辉穷途末路时同舟共济，也就无异于痴人说梦。当时驻防大邑的石肇武，一贯声名狼藉，早年驻蓉，成都人"无不恨之入骨"，刘文辉则处处曲加庇护。后来刘湘将石肇武"正法"，成都人拍手称快。石肇武驻防大邑，匪性依旧，奸淫妇女、抢劫烧杀无所不为，民怨沸腾。牟二蝗很气愤。他本来负有维持治安之责，义不容辞，便应地方人士之请，派兵巡逻，同时发动自卫团队和袍哥武装站岗放哨。因为防范严密，兵痞再不能横行无忌，发案率有所下降。但牟二蝗与驻军之间的摩擦却越来越频繁。一次，驻军某营抓了几十个民夫，关在县府大院里。民夫不都是无权无势的农民，还包括一些学生、商人和袍哥兄

弟伙。因此地方上震动很大。牟二蝗亲自出面保释那批民夫，驻军完全不予理会。牟大怒，带着队伍闯进县府大院，把民夫放了出来。牟与驻军的冲突愈演愈烈，完全无法调和。正当用兵之际，刘文彩哪敢开罪驻军，只能站在军方一边，牟二蝗更是憋了一肚子火，对刘文彩常有微辞。两人的关系趋于紧张。

就在这时，刘文彩得到情报，说牟二蝗经由其儿女亲家、邓锡侯部将黄泽甫引荐，暗投邓锡侯二十八军，受封旅长。牟家已备好旗帜，伺机而动。考虑到牟二蝗是地方实力派领袖，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开初刘文彩不想把事情闹大，打算和平解决。便责令牟二蝗交出兵权离职。但牟二蝗犯了牛劲，一口回绝，等于是关闭了和平解决的大门。刘文彩盛怒之时，又听说牟二蝗在县城东街所设的“五一钱庄”，常有二十四军重要干部进出，牟二蝗可能以“五一钱庄”为据点，策反二十四军驻大邑部队。任何团体对叛徒的仇视都超过对敌人的仇视，刘文彩也不例外，因此杀机横生。

牟二蝗不同常人，从小就在刀丛中打滚，养成了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的本能，要杀他不是那么方便。刘文彩曾派杀手在路上狙击，牟二蝗似有耳闻，绕道而过。转眼已到1933年夏，刘湘发动了“安川战役”。二十四军节节败退，大邑眼看也要变成“前线”了，如果还不除掉牟二蝗，势必要首尾两顾。刘文彩真是心急如焚，决计采用诱杀手段。便借口共商征粮筹款事宜，请牟二蝗到“叙南清乡司令部”开会。牟二蝗知道刘文彩别有用心，非但托词不去，反而打算到鹤鸣山“休养”。刘文彩得到这个消息更着急了，那么大个鹤鸣山，牟二蝗躲了上去，刘文彩哪里还找得到着。就向大哥刘文渊求助，由刘文渊出面，给牟二蝗写封

信，邀他到司令部会谈。这一招果然管用。牟二蝗不买刘文彩的账，对刘文渊却非常敬重，认为刘文渊是忠厚长者，断断不致欺他；于是答应赴会。到了“叙南清乡司令部”，刘文彩亲自出迎，笑容满面，似乎前嫌尽释。两人携手向会客室走去，牟二蝗的卫士都留在门外。进了会客室，刘文彩请“牟团长”先洗帕热水脸。牟刚走近脸盆，埋伏在隔壁房间的杀手即从板壁上的小孔开了枪，牟应声倒地。门外卫士听见枪响还没反应过来，也被刘文彩的伏兵射杀。

牟二蝗刚刚毙命，“叙南部队”就全部出动，全城戒严。驻在北门外的二十四军独立团苏龙光营、驻在城内北街陈家寺的独立团机枪连同时被包围缴械，排长以上军官全部扣留。经一天一夜审讯，最后由本县士绅一一保释。牟二蝗私宅和“五一钱庄”被“叙南部队”洗劫一空，圆通寺老家也未能幸免。完全控制局面后，刘文彩始向各方宣布：牟二蝗通敌，图谋临阵倒戈，证据确凿，奉令法办。牟二蝗余党作鸟兽散，牟二蝗之妻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投水自尽。族人拿出一千大洋，才将牟二蝗尸首赎回。

一场内乱至此总算平定，但刘文彩仍然无暇安枕——二十四军岷江之溃，一泻千里，大邑势若危卵。8 月 15 日，石肇武旅率先撤离。还没有撤完，二十一军两架飞机就已“光临”大邑，在县城西门外丢了两颗炸弹。“叙南部队”第一次目击飞机参战，军心惶恐，毫无斗志可言。刘文彩只好让出县城，退往安仁。但安仁也不保险。“安川军”一个连曾开到安仁，就从刘文彩家门前经过。刘文彩事先得到情报，早带着十来个亲兵跑了出去，趟过门前小河，钻进自家的祖坟林。“安川军”旌旗猎猎，军号嘹亮，真是耀武扬威。刘文彩气不过，一时性起，拔枪要打，旁边一个姓廖的亲兵眼疾手快，把他的枪下了。可能是刘湘有过吩咐，不许

"安川军"在安仁胡闹，"安川军"的那个连只在镇外呆了两个多钟头就开走了，对刘文彩公馆毫无滋扰。刘文彩家眷这时也都跑出去躲了起来。长子刘元龙躲在一个开瓦窑的姓徐的老板家中，三儿子刘元富由刘文彩新娶的姨太太梁胖带着，躲到十里外的一位亲戚家里。怕途中遇上"安川军"，大人小孩都经过化妆，穿着叫化子似的烂衣裳。梁胖避难，正好碰上刘湘的红尾巴飞机"光临"。农民好奇，聚在一起指指点点。梁胖毕竟见过世面，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赶紧喊老乡散开，以免飞行员把围观者误认为军队而投弹轰炸。时隔未久，又有"安川军"经过安仁镇，刘文彩和家眷再次逃难，三个儿子都由梁胖带着，穿上烂衣裳，住在刘墩子附近开烧酒房的亲戚家中。亲戚辈分低，大人都把刘文彩几个孩子叫"老辈子"。这次避难还闹出一场火灾。当时梁胖带刘元富住内房，刘元龙、刘元华两兄弟住外房。午夜时分，外房蚊帐突然起火，幸亏屋外有人看见，大声呼救，房东连忙赶来泼水灭火。刘元龙却浑然不觉，直到被水泼醒，才迷迷糊糊地爬起来，不解地四处张望。众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后院尽落敌手，刘文彩万般无奈，带着两团"叙南部队"撤往雅安，交给刘文辉收编。1933 年 9 月 6 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刘文彩便又回到安仁。但安仁物是人非，他只能深居简出。这样的日子也过不安稳——

1934 年秋，刘湘回家省亲。当天早上，一员乡丁手持大红帖子，代表乡公所在上场口迎接。乡亲们则在公路两旁伫望。七辆黑色轿车鱼贯而来，乡丁举着帖子向第一辆轿车迎去。车中卫兵一摆手，示意"督办"在后。乡丁又向第二辆轿车跑去，如前。第三辆轿车才停下来，从车中走出四

人，当头一位中等个儿的壮实汉子便是刘湘。他头戴灰呢博士帽，身穿长衫，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缓缓步入安仁镇。此后数日，前来拜谒刘湘的宾客络绎不绝。每到黄昏，刘湘总要在安仁镇背后的河坝漫步，走累了就在上场口的麦地旁，搭张木板凳坐下小憩。卫兵分三角形，隔丈把远默默拱卫。刘湘老家和刘文彩老家相距不过里许，刘文彩却闭门自守，叔侄咫尺天涯。刘文彩明白，随着刘湘凯旋归里，大邑将完全置于刘湘股掌之中，他将成为"内控"对象，只要刘湘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能重返政治舞台。果然，不到一年，刘湘的二十一军就接替了邓锡侯二十八军，正式驻防大邑。二十一军刚开进来就大开杀戒，第二旅旅长饶国华坐镇大邑指挥剿匪，在县城处决了匪首张子英，在灌口场处决了匪首杨子清，在两河口处决了金堂帮匪首严茂生。张子英的后台是刘湘胞弟、大邑县保卫团团长刘自强，地方政府一直拿他莫可奈何，这次竟也难逃法网，震动极大。在刘文辉家族的另一个据点、距安仁镇仅数公里的唐场，刘湘更是重兵把守，每逢集日，都有一批土匪被二十一军五花大绑地押到场口枪决。饶国华还在各场镇设告密箱，鼓励老百姓举报流氓地痞。这一方面固然是强化地方治安，但也不能排除另一个用心：向安仁刘文辉家族显示铁腕，警告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否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文彩也就只能养光韬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一意置产兴业。

刘文彩的日子难过，刘文辉在雅安也是备尝艰辛。和成都相比，雅安简直就是一个小村落。哪里去找喧嚣热闹的皇城？哪里去找富丽堂皇的春熙大舞台？但经济上的破败凋敝还在其次，最让刘文辉头痛的是雅安复杂的政治环境。雅安驻有蒋介石派的别动大队，队长叫马维冀；还有一个西康宣

慰使，叫诺那。这些人都是不好惹的。此外还有一个更不好惹的——蒋介石以追击红军为名，调中央军十六军入康，十六军军长李韫珩野心勃勃，总想取刘文辉而代之。刘文辉处处受制。四面烧香，八方叩头，这才“感动”蒋介石，答应调出十六军，刘文辉才在雅安勉强站稳了脚跟。

中篇

川西教父

第十章

重　出　江　湖





1. 刘文彩为安仁镇修建的“星廷戏院”，建国后易名“同庆茶楼”。
2. 当年的星廷戏院后为“公益协进社”办公大楼。

刘绍武的白马根本不停蹄，嗒嗒嗒地步步紧逼。一万多安仁农民便也毫无畏惧，踩着赵洪顺的锣声继续向水碾涌去。眼看就要接近碾门了，雷家再也不敢硬撑下去，几百名士兵掉头就跑……

二刘之战是刘文辉集团由盛到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刘文彩个人使命的一个转折点——战前，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搞钱"，"为刘文辉的军事经费以根本的保证"。战后，刘文彩的主要职责是"守家"，以解除刘文辉的后顾之忧。兄弟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驰骋官场，一个纵横江湖，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自此形成，一直维持到刘文彩去世。

一位知情人谈到刘文彩退居安仁时，这样回忆：

一般的说法是文彩随着文辉的失败而垮台，实际上文辉虽败未垮，文彩若留在西康，何愁没有一官半职。他之弃官回乡，实际是他两兄弟的筹谋。原来他们的家乡也是刘湘的家乡。此次双方打红了眼，结下仇怨。世态炎凉，难免没有趋炎附势之辈来落井下石，若是弄得他们这支刘家在家乡站不住脚，老家不能归，祖墓不能扫，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看来，是很悲惨的事。故此，两弟兄商量好，文辉在外开创局面，文彩则回家搞好人事关系。

如此安排，并非刘文彩兄弟多虑。"万人抬尸闹公堂"

就是一例。

60年代初，庄园陈列馆制作了农民反抗刘文彩的八台石膏模型，“万人抬尸闹公堂”是其中的一台，解说词称：

1936年，灌溉安仁、安顺等乡农田的“万成堰”头河水，被刘文彩的亲戚、崇庆县恶霸地主雷少华派人截断，去冲自己的水碾。没有水，无法插秧。“饿死不如造反！”一句话激动了广大农民。在青年农民赵洪顺带头下纷纷跳下水去挖雷少华的堰埂。

雷的狗腿子企图鸣枪威胁，结果被愤怒的人群痛打了一顿。在狗腿子抱头逃命之际，甩出一个手榴弹，正中赵洪顺。赵当场牺牲。

上万的人群抬上赵洪顺的尸体，去到崇庆县伪县府告状。不见狗官出面，群情激愤，蜂拥而进县衙门，锄头、扁担一齐出动，把个“崇庆正堂”打得稀烂。狗官儿吓得翻墙逃跑了。

此案情节基本属实，除了刘文彩的角色之外——这场“农民斗争”并不是冲着刘文彩或刘文彩的什么亲戚而去的，恰恰相反，没有刘文彩鼎力支持，没有刘文彩运筹帷幄，这场“农民斗争”的结局就该是另一种写法。

事情的缘起得从万成堰说起。

安仁原本是干旱地区，只有一条桤木河流过，桤木河发源于文井江，由崇庆流经大邑，再流入邛崃，全长一百二十多华里，流程长，滩而大，水量严重不足，安仁一带年年歉收。当时曾流传一句民谣：“有女不嫁桤木河，脑壳就像抱鸡婆。”1931年春，正在四川省政府主席任上的刘文辉下令开堰引水，灌溉安仁一带，由他本人出资，并指派他的部

属、崇庆县烟酒局局长余栋廷全权指挥。4月16日开工，以田定夫，一人一锄。根据崇庆县隆兴乡木匠邓云山的建议，从桃子湃起水，当天成渠，渠口三尺宽，三尺深。9月加修，拓到一丈二尺宽。渠长五华里，引西河水入桤木河，常年浇灌三县六乡即大邑的安仁、唐场，崇庆的隆兴、中和，邛崃的付庵、冉义。受益地区共计四十余万亩农田，开堰后年年丰收。1940年，受益农民自发集资，委托余栋廷侄儿余治安，在安仁镇裕民街口建造了一座"刘公自乾开渠凿堰纪念碑"。文革中，在北京的刘文辉被红卫兵追得东躲西藏，虽因周恩来保护而幸免于难，纪念他的引水之功的那座碑却是无处藏身，被愤怒的"革命群众"砸毁。据传，崇庆县人民公园曾发现碑石十四块，碑面已被水泥涂盖，用作茶桌。文献记载，碑文云："……兴其事者，有公升廷（即刘文渊）、弟永央（即刘文运）、维三（即刘文昭）、星廷（即刘文彩）以及余栋廷、邓云山。"80年代，安仁一批耆宿请求修复纪念碑，至今没有回音。

堰渠落成时，由书生安湘霖撰名，取"万成者，集万人一日而成"之意，谓之"万成堰"。邓云山木匠献策有功，刘氏家族特意给他送了一套四合院，并赠金匾一道。

万成堰开通，受益农民当然是欢天喜地，但有人欢喜有人愁——万成堰从崇庆西河引水，崇庆虽有两个乡受益，其它乡镇却吃了亏——五十多条堰渠水量锐减，崇庆大户因此视万成堰为眼中钉，主持修堰的余栋廷竟遭暗杀。刘文辉事前估计有麻烦，开工时专门从二十四军调了一个连到现场，架起机枪保护民工。慑于刘文辉的权势，崇庆大户不能不忍气吞声。1933年刘文辉退据西康，刘氏家族似乎是一蹶不振了，崇庆大户便认为再没什么好怕的，打算在万成堰上修碾截流，把万成堰变成一条枯堰。打头阵的是雷绍华，此人

大有来头——因在家开酱油铺遭刘文辉当众取笑的保定校友余安民，愤而投奔刘湘，很快升任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雷绍华则是余安民的儿女亲家。雷本人也是大地主，家里有一千多亩土地。被万成堰分了水的五十多条堰渠，其中一条便是他的雷家堰，雷绍华因此早就怀恨在心。1936年春，他指派管事杨子昆在万成堰上修碾，把万成堰的水引了回去。

消息传出，受益农民群情激愤。大家知道雷家有恃无恐，如果刘文彩坐视不管，万成堰就完了。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刘文彩身上。雷绍华刚在万成堰下手，堰长郑少华就飞马禀报刘文彩。在刘文彩则多一层考虑：这雷绍华岂止是冲着万成堰而来，分明是冲着刘氏家族而来。如果不及时还击，给蠢蠢欲动的地方豪强一个下马威，则无异于承认刘氏家族真的一蹶不振，软弱可欺。地方豪强将气焰万丈，一涌而上。刘文彩别无选择，当即吩咐郑少华：

"你马上下令，要各沟长出夫，明天一早以锣声为号，由刘绍武带队，踏平雷家碾。"

刘文彩终于挺身而出，受益农民极度亢奋，摩拳擦掌。雷绍华很紧张。他手下的几个家丁哪能抵挡刘文彩的攻势？急忙向余安民求助。余安民不稍迟疑，派了几百个士兵前往雷家碾布防。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受益农民手执锄头、扁担，齐聚安仁街头。郑少华作了简短的讲话，便下令开拔。刘文彩侄子刘绍武骑着一匹白马，冲在最前面，一万多青壮紧随其后。郑少华公馆的杂工赵洪顺也在队伍前头，把一面簸箕大的铜锣敲得震天响。队伍直奔雷家碾。雷家碾这时已经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支支长枪短枪指向蜂拥而来的人群。当人群快接近水碾时，雷家管事在碾上大叫：

"站住，站住，只准派一个人过来交涉，其他的原地不

动。”

刘绍武的白马根本不停蹄，嗒嗒嗒地步步紧逼。一万多青壮便也毫无畏惧，踩着赵洪顺的锣声继续向水碾涌去。眼看就要接近碾门了，雷家再也不敢硬撑下去，几百名士兵掉头就跑。农民涌上了水碾，仍不止步，呐喊着乘胜追击。赵洪顺依旧冲在最前面。对方完全失去方寸，一名士兵转身投出一颗手榴弹，正好落在赵洪顺脚边，赵应声倒地。农民怒不可遏，一半人留下来，锄起锹落，把雷家堰砸了个稀巴烂。另一半人则由一个叫傅德盛的堰长带领，抬着赵洪顺的尸首，到崇庆县政府示威。示威农民把尸首放在崇庆县政府门前，高喊口号，要县长交出凶犯。县长胆小怕事，知道冲突双方都得罪不起，便从后门溜出去不再露面了。

赵洪顺之死，使雷绍华在舆论上陷于被动。刘文彩那肯错过这个机会，刚刚听取了刘绍武的报告，便请来大哥刘文渊和安仁其它头面人物，商定了两项对策：一手文，一手武；文则打官司，武则准备打仗。因为崇庆县县长开了溜，在崇庆打官司不会有什么结果，就由刘文渊出面，直接上书刘湘。估计刘湘不会不给父老乡亲主持公道。只要刘湘发话，余安民就再不敢当雷绍华的后台老板了，雷绍华也就没有本钱和刘氏家族对峙了。作为万一之备，各乡镇调集民工，加紧操练。如果刘湘真的置之不理，就和雷绍华开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看他刘湘还能不能坐视下去。大家议妥，便分头行动。

半文盲刘文彩深谙权谋机略。他不会轻易出手，而一旦出了手，也就不会轻易收手。针对雷绍华的这一拳是刘文彩长时间蛰伏之后打出的第一拳，可说是万众瞩目。这一拳扑了空，岂止是把刘文彩的老脸丢了，整个刘氏家族都要为天下人笑，这比不出拳还糟。所以刘文彩这一拳必须打出威

风，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刘文彩因此下定了孤注一掷的决心。雷绍华服硬不服软，听说刘文彩要来真格的，马上慌了神，赶紧找余安民商量对策，余安民当初派兵本来也只是想吓吓安仁，原以为一出兵对方就会缩头，结果非但没能吓住对方，反而弄出了人命。正担心刘湘追查呢，哪还敢再给雷绍华撑腰！雷绍华孤苦无助，凄凄惶惶，跑到外面躲了起来。但躲不是长久之计，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最后雷绍华只好托人给刘文彩捎信，说他愿意让步。刘文彩得到口信，提了三个条件，一是雷绍华必须亲自到安仁赔礼道歉，二是用上好棺材厚敛死者，灵柩送回安仁安葬；三是抚恤遗族良田十亩零二分。这些条件对雷绍华来说倒还不算苛刻。雷绍华满口应承，一一照办了。

雷绍华诚惶诚恐地赶到安仁向刘文彩负荆请罪，那些打算步雷绍华后尘的地方豪强莫不倒抽了一口凉气。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刘文彩坐镇安仁，谁也别想动刘氏家族一根毫毛；地方豪强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知难而退。

刘文辉后院从此平静下来。

初试锋芒，即获全胜，但刘文彩不敢张扬，马上退守庭院，以免触人之忌。两年之后，刘湘去世，刘氏家族峰回路转，刘文彩的留守生涯才有了一个根本转折。

二十四军两万多人枪，对付境内草寇绰绰有余，对外则只有象征意义。蒋介石真要吃掉刘文辉，二十四军无异以卵击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单单凭借有形实力……。

1937年11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部出川，投入

南京保卫战。但还没来得及施展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抱负，便旧病复发，于次年1月20日下午8时与世长辞，终年四十八岁。

刘湘之死，是四川近代政治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谜案。有人说是吓死，有人说是毒死，有人说是气死。无论哪种说法，都以蒋介石为祸首，而且都出自刘湘旧部。这些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却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刘湘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并没有因刘湘去世而稍有缓解，反倒不断升级，在四川政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刘湘去世当晚，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开会，筹划如何以刘湘之死为契机，完全控制四川。蒋介石以为四川已是群龙无首，传檄可定，当即下令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仅隔一天，又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地方实力派主掌的川康绥靖公署，蒋介石也准备宣布撤销。

蒋介石大刀阔斧，四川地方实力派人人自危。刘湘旧部组成的"武德学友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大家团结一致，抵制蒋介石图川。同时与刘文辉、邓锡侯两部切取联络，互为依存。会后，刘湘生前的高级幕僚张斯可即专程谒见刘文辉二十四军驻蓉代表，邀请刘文辉速往成都，共图大计。刘文辉大喜过望，即刻动身。

刘文辉就此重返四川政坛。

抵蓉第一步，是与刘湘旧部达成完全和解。刘文辉一身素服，出席川军纪念刘湘大会，并登台演说。刘文辉善于辞令，又长于揣摩人情事理。驻防叙府时，他的宪兵队曾逮捕一批号召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各校师生派代表向刘文辉请愿，要求放人。形势本来于刘文辉不利。但他竟能以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满堂喝彩，一场眼看就要烧到他身上的熊熊烈焰被浇灭了。现在他当然更要使出浑身解数，用滔滔雄

辩来征服台下的刘湘旧部。他引用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诗作为演说开头，表达对刘湘的追思。缕述他与刘湘一度乖异，有如“君子之过如日之蚀”。希望今后与刘湘旧部友好合作。他自己讲得热泪盈眶，台下的刘湘旧部也唏嘘不已。“一席演说，大受欢迎，‘甫系’军人，自是对刘文辉多表好感”。双方完全捐弃前嫌。那段时间，刘文辉、邓锡侯和刘湘集团主要政治代表潘文华“每日无不聚会，遇事无不共同商量。”主题当然都是如何对付蒋介石。刘文辉晚年追忆：

> 我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没有我们的话说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计到，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们一致反对，他就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主川政。在我们坚决反对下，蒋被迫改变了主意，向我们讨价还价：一面答应保留绥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人员的条件下，派张群独自一人来接省主席。我们认为这是诱鱼上钩，只要张群一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所以还是不让步。蒋见计不得售，便自我转圜，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一人暂代省主席，才了此一桩公案。（《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14页）

这场风波，史称“百日政潮”。

“百日政潮”最大的赢家是刘文辉。如刘文辉晚年所述，“因为四川是西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和西康的门户，同

时又是我出生和发迹的地方，所以我人在西康，而心实未尝一日忘情于此。”但刘湘在世时，无论他怎样跃跃欲试，对四川都只能隔岸观火。刘湘去世后，蒋介石加紧图川，为了自救，四川地方实力派不能不与刘文辉联手，促成刘文辉重返四川政坛。刘文辉从此与四川地方实力派主要代表邓锡侯、潘文华结成巩固的政治同盟，走出了孤军境地。

但这还不是刘文辉从“百日政潮”中得到的惟一好处。刘文辉从“百日政潮”中得到的最大的好处，还是西康建省。

“二刘大战”后期，刘湘就已再三表白：他不想消灭刘文辉，只不过要削弱刘文辉，一旦时机成熟，就把西康全境交给刘文辉治理，使其仍为封疆大吏。1935 年春，中央政府果然发布命令，组建“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刘文辉家族人人称庆，哪知道刘湘并非真心相与，蒋介石也不是乐观其成，西康建省迟迟不能兑现。“百日政潮”中，蒋介石被迫对四川地方实力派让步，不再坚持以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而同意由四川将领自行推举。刘湘部将王缵绪认为机会来了，便到处活动，希望大家推举他。他知道西康建省是刘文辉的当务之急，为了得到刘文辉的支持，就向刘文辉许诺：事成之后，决将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交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以补助。蒋介石见川局动荡不已，怕刘文辉推波助澜，对刘文辉的建省要求，也马上点了头。1938 年 8 月，王缵绪如愿以偿，登上四川省政府主席宝座。9 月即践约将雅安（除名山县外）、西昌两个专区移交刘文辉。加上康区原有 19 县和一个设治局，西康终于粗具规模。1939 年元月 1 日，孕育整整四年的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下辖 33 县另 3 个设治局，还在宁属彝族聚居地设有 24 个政治指导区。总面积达 53.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在二百万以上。对当时情景，曾任西康省政府代主席的张为炯有过如下叙述：

> 西康是新建省份，境内只有刘文辉统率的二十四军部队，别无敌对的实力集团，这就造成了他一人独霸的条件。蒋介石在建省之初，认为西康边僻贫瘠，人口稀少，人力财富可供搜刮的不多，而刘文辉又只剩下很少一点军队，人枪不满两万，并不构成对他的威胁。同时蒋又有分化川、康势力和利用刘防范西藏内犯的种种企图，因之对他的笼络多于限制。……关于西康的用人行政，大体上都循从刘的意见，没有大加干涉。于是，刘得以把西康军、政、党的领导权力集中于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第151页）

刘文辉在中国政坛上又能拥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合法地位。刘文辉家族集团又可以重建其独立王国。在“二刘之战”中一落千丈的刘文辉家族集团，至此终于恢复元气，东山再起。

虽然东山再起，刘文辉早年那种不可一世的豪气，却是一去不复返了。历年厮杀，证明天下枭雄都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战时体制更强化了蒋介石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中央集权逐渐趋向稳固。由浪漫激进转为沉稳务实的刘文辉，不敢再和蒋介石互争雄长，不敢再以中原为逐鹿目标。在“天子”卧榻之侧建立自己的家天下已属不易，守成就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主要的政治追求。

守成需要足够的实力。实力分为有形和潜在两种。早年刘文辉侧重发展有形实力，对潜在实力用心很少。就像一个笨拙的画家，总想把整个画面填满，而不懂得虚实相间。结

果，虽然有形实力——军队、地盘等等——发展迅猛，仍在“二刘之战”中一败涂地。一则是吸取了这个惨痛教训，再则是因为在“天子”卧榻之侧，有形实力的扩张空间有限；而且一旦真的扩张起来，非但丝毫无助于改变“天子”“诸侯”的实力对比，反而招风惹眼，为“天子”所忌而受重创，得不偿失。所以，刘文辉虽然急于扩充自己的力量，对有形实力的扩张，尤其是对军队的扩张，却不能不特别谨慎。旧时崇庆县县长幸蜀峰回忆：“1942 年冬，刘元琮在崇庆县对我说，你不要看我们二十四军现在只有两个师，我们可以自己出钱，买一二十团的武器。……我说买武器恐怕不那么容易吧，他说从云南进口是有办法的。”有扩张军队的物质基础，二十四军却没有再扩张，西康时期始终不过两万多人枪，说明刘文辉没有把经营重点放在有形实力方面。

西康时期刘文辉最重视的是潜在实力。二十四军两万多人枪，对付境内草寇倒是绰绰有余，对外则只有象征意义。蒋介石真要吃掉刘文辉，二十四军无异以卵击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单单凭借有形实力，机械防御。必须主动出击，编织庞大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严密护卫刘文辉家族集团，而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蒋介石入川所控制的只是上层政治架构，地方力量、民间力量是蒋介石的薄弱环节。土生土长的刘文辉，完全可以在这些方面与蒋介石较量。“多头政治”也就必然构成刘文辉拒蒋图存的主要对策。

刘文辉的“多头政治”，概括起来不外两头。一头是体制内，一头是体制外。刘文辉长期从政，在官场上自是应付裕如。40 年代，他以侄儿刘元瑄留守西康，而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外交，仆仆奔走于蓉雅之道上，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先是川康合作，组织刘、邓、潘三角同盟；接着与龙

云握手言和，形成川康滇三角同盟。至此，其潜在实力在体制内也就发展到了极致。但体制外发展，即联合川西民间力量，尤其是联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则非刘文辉所能为、所应为。

久作困兽的刘文彩于是破门而出，大闹江湖。

“本来他们（即刘文辉刘文彩——引者注）两兄弟呢，经济上政治上都互相依靠。刘文彩要依靠我父亲，我父亲也要依靠刘文彩去耍袍哥。”

——刘文辉长女　刘元恺

袍哥俗名“嗨皮”，一般称为哥老会，是中国秘密会党洪门的重要支派，以农民、手工业者、挑夫、水手、商贩、下层衙役和无业游民为基本群众。平时实行生活互助，社会动荡时揭竿而起。有会众百余人，就可以开山设堂，推举坐堂大爷（又称舵把子）。同一地区内，也许几个大爷并存，他们中威望最高的，即为各大爷之首，叫“总舵把子”。

刘文彩涉足袍哥甚早。民国初期，安仁五个袍哥公口——安仁公、敦仁公、集成公、利安公、义兴公——都由地下转向公开，“在王冕臣当总舵把子时，即粗具规模，日趋庞大”。青年刘文彩就是王冕臣的“兄弟伙”（刘有江：《安仁哥老会管窥》〔未刊稿〕）。驻叙期间，因叙府民团基本上是袍哥队伍，为了控制民团，刘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亲自整编叙府袍哥。叙府袍哥三十四家，叙荣乐、合叙同等等，莫不鼎鼎大名。后来改组为“大同会”、“和平会”、“乐和会”三堂；“大同会”有二十个公口，最盛时，仅上层会众就有一千多，遍及军政商学各界。“和平

会”和“乐和会”则主要由普通劳动者组成。刘文彩最推崇“大同会”，指定沈眉荪为大同会首届会长，亲信汪金山为大管事，自己挂了个“名誉会长”的头衔。并在叙府中西医院举行就职典礼，设宴招待大同会各家舵把子（庄园档案67宗D16卷）。

刘文彩整编叙府袍哥时，四川哥老会已普遍与军阀合流。“许多军事首领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袍哥队伍，争夺地盘。因为袍哥队伍比一般的帮会组织更为严密，既有兄弟关系，又有上下关系；既有袍哥的家法，又有军队的军法，是拆不开打不散的。因而有的利用袍哥队伍得到了好处”（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活动》，见《帮会奇观》）。“哈儿”范绍增的部队更是全由袍哥组成。刘文辉却斤斤计较军队、地盘，对袍哥不屑一顾。刘文彩整编叙府袍哥也是1929年的事，为时已晚。别的军阀都尝到了抓袍哥的甜头，刘文辉一点便宜没占。退据西康之后，痛定思痛，决心抓住袍哥这一宝。1934年，刘文辉请刘文彩到雅安开山立堂，并指定军部副官长陈耀伦、旅长袁国瑞、杨升武，财政厅厅长文和笙等四人协助。准备停当，刘文彩派特使前往叙府，请来仁字旗叙荣乐大舵把子宛玉庭、义字旗大爷李绍修，主持成立叙荣乐雅安总社。但刘文彩出师不利——叙荣乐只在雅安成立了总社，没能向基层发展。因为陈耀伦想组建自己的公口，对叙荣乐暗中抵制。叙荣乐也就没办法在基层立足。1935年，刘文彩和文和笙相继离开雅安。叙荣乐雅安总社无形解体。

后来局势的发展，更加烘托出袍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川康军人，国共两党都开始争取袍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四川“袍运”开展得轰轰烈烈，涌现了大批“红色

袍哥大爷”。蒋介石也力图驾驭袍哥，但收效甚微。袍哥的存在本来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这就注定了从整体而言，袍哥不可能为蒋介石中央政府所用。而且四川袍哥早就与地方实力派合流，地方实力派对袍哥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袍哥争夺战中，蒋介石远不是地方实力派的对手。百日政潮刚刚发生，四川袍哥就扬言：“要组织川康民众百万武力”，与蒋介石中央政府对抗。《哥老会组织大纲》更毫不掩饰地宣称：哥老会以“团结川人、拥护建设四川事业、培植四川青年、恢复四川地位”为目的，严厉警告亲蒋分子：谁要妨害“吾川团结”、破坏“吾川事业”，则“由委员会集中全力，以正布歼灭之。”组织上更力求与地方实力派两位一体——“成都设委员会，以川军将领之高级者任委员长，以总其成。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设总社，以川军之戍区将领任总社长”（《袍哥探秘》第176－180页）。“合叙同”成都总社总舵把子，就是潘文华部属、川军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四川袍哥事实上已演变为地方实力派抵挡蒋介石来犯的一面盾牌，成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四川民间社会最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蒋介石深感惊惧，竭力查禁袍哥。但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1943年春，成都万人集会，庆祝“合叙同”成都总社开山立堂。省会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目方超手执国民党成都行辕密令，率大批武装警察前往，打算将与会袍哥骨干一网打尽。但袍哥早就严阵以待，会场附近各街口和其它交通要道由彭焕章一六四师官兵荷枪实弹，层层防守。方超见势不妙，只得偃旗息鼓。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刘文辉极度振奋。这时，西康鸦片产业已经如火如荼，种烟、运烟都依靠武力保驾，于是大批军火流入西康各县，地方武装迅猛发

展。这些地方武装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缓。刘文辉也就鲜有顾忌，二十四军各师旅长都直接插手袍哥。仅雅安一地，1941 年起就成立了九道公口，完全民间性质的只有一家，其余公口都由二十四军高级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刘文辉的弟男子侄——直接主持。一位当事人称："当时的雅安已经是一个公口林立的袍哥世界"（《西康雅属的袍哥》，见《帮会奇观》）。和别的地方的袍哥不同，西康袍哥不仅对民间，而且对官场也有强大的支配力。二十四军不用讲了，袍哥还"扩充到反动派的党政团参各界，甚至中小学教师、中医生等"（同前）。国民党雅安县书记长邓守勋、天全县三青团干事长刘茂松，都是荥宾合的三牌；天全县书记长熊大武是荥宾合的大爷，宝兴县县长权光烈、芦山县县长杨方叔、丹巴县县长段崇实、泸定县县长陈叔才，统统是袍哥。王达生当了天全县县长，感到不是袍哥吃不开，赶忙跑回雅安向陈耀伦叩头，请求"栽培"，陈耀伦封了他个三牌，他就感激不尽，说是"恩同再造"。唐湘帆当荥经县县长，带的卫队是袍哥便衣队。别人叫他县长他不高兴，总要人家叫他"唐大爷"。

刘文辉对西康袍哥的驾驭不可谓不成功。但这种成功既是因为刘文辉灵巧的驾驭手段，更是因为西康特有的社会生态。刘文辉在西康发展袍哥，驾驭袍哥，主要是凭借他的政权力量，尤其是凭借二十四军。他实际上是用印把子、枪杆子来造就袍哥世界，然后借助袍哥既渗透西康民间社会，强化刘文辉家族集团对西康民间社会的统治，而且反过来渗透西康党政军参各系统，强化刘文辉家族集团对西康现存政治架构的控制。用政权孵化袍哥，用袍哥巩固政权，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为我所用，这是刘文辉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西康行得通，在刘文辉股掌之外的川西，则绝对

行不通。也就是说，在川西组织刘氏家族的“隐形军队”，刘文辉的印把子枪杆子完全派不上用场，必须另做打算。

“公益协进社”由此拔地而起。

到现在为止，主管部门一直称“公益协进社”为刘文彩的“黑暗王国”。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就说：

> 刘文彩于1932年由川南退回大邑老家后，凭借刘氏军阀的枪杆子、印把子和为患川南时的余威，以安仁镇为中心，不断扩张势力。经过一系列排除异己、拉帮结派的活动，到1937年，刘文彩以安仁镇原来的四个袍哥组织为基础，网罗川西、川南等地十八个县市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等社会黑势力，并裹挟部分群众，组成了一个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封建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这样，“公益协进社”的触角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刘文彩的势力范围。

其实早在文革期间，冷寅东就对“公益协进社”的本来面目有过明确交待：

> “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指使下搞起来的，其目的是以地方这一……袍哥组织，对抗蒋介石。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手中的一大资本，蒋介石对之无可奈何。（庄园档案67宗卷）

原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老先生，1995年3月29日在成都寓所接受笔者采访时肯定冷寅东的评价，并告诉笔者：刘文彩死后，刘文辉曾要他接管“公益协进社”——

刘文彩费了那样多的心血，才把那些地方力量团结在刘文辉的影响下，刘文彩死后，如果不继续抓好，就容易散掉，或被其它政治力量的利用而变质。李育滋（公益协进社副总社长——引者注）声望不够……。所以，刘文辉在痛惜刘文彩病故之时，考虑叫我去挂个名字把“公益”领起来，因人们都知道我的背后有他，这才可以继续拉着那批人。

但刘文辉的这个设想没能实现，一则是因为刘元瑄父亲刘文渊坚决反对——刘文渊以其书生眼光，认定堂堂中将军长混迹袍哥，实在有辱身份，因此竭力阻挠。再则是因为时局变化太快，刘元瑄还没来得及接手，人民解放军已席卷川康。设想虽未实现，但“公益协进社”系刘文辉授意组织、间接操纵，刘文彩不过奉命代为主持的历史事实，却是昭然若揭。

刘文辉长女刘元恺则告诉笔者：

本来他们（即刘文辉刘文彩——引者注）两兄弟呢，经济上政治上都互相依靠。刘文彩要依靠我父亲，我父亲也要依靠刘文彩去耍袍哥。如果说没有袍哥支持你还麻烦，你党、政、军是要，但是袍哥势力你也得要。如果刘文彩不把那半边（即袍哥——引者注）抓到，你就很可能把那半边弄丢了。

这就是说，晚年刘文彩与刘文辉的关系，依旧是相辅相存、两位一体的关系。代为主持“公益协进社”，则是这种关系的具体写照。“公益协进社”事实上是“多宝道人”刘

文辉手中的一“宝”，是刘文辉对付蒋介石的一张政治王牌。

“公益协进社”初创于1941年冬，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初创时并未大张旗鼓，规模和影响都有限。1942年2月，刘文辉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谈，跨出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乡省亲。刘文辉此次回乡，排场不小，出动了两辆轿车，刘文辉夫妇和孩子们坐一辆，五六个随从坐一辆；此外还有一辆大卡车，供警卫排乘用，警卫排一色黄呢军服，荷枪实弹，煞是威风。行前先期通知雅安军部调来十多匹战马，在安仁歇息几天后，刘文辉全家和保姆、随从等骑上战马，浩浩荡荡到安仁惟一的正规学校光相寺小学参观，当场捐赠大洋四千元，以示对家乡教育的关心。据说刘文辉此行专为接收新公馆和上坟祭祖，但一位知情人称，实际上是向刘文彩通报联共内幕，同时授意刘文彩以公益协进社为依托，与蒋介石逐鹿江湖。当时情形，据说是这样的：

在卧室中，两人对躺在烟榻上，边抽大烟边谈话……文辉向文彩谈了他近年的困难处境，西康地瘠民贫，财政困难，民族豪强各据一方，矛盾复杂，蒋介石更是处心积虑，总想把他搞垮。而今全国的反蒋力量都让蒋收拾得差不多了，只有中共能与蒋唱对台戏。所以，只有靠拢共产党，互相支持，才有出路。并将上月在重庆秘密会见周恩来以及周对他的指教，告诉了文彩。文彩顾虑，过去在防区时代，二十四军在川南一带曾经压制当地共党活动，红军长征时，二十四军也曾奉命堵截，现在去靠拢共产党，今后会不会有妨碍？文辉说，中共上层领导人心胸宽敞，目光远大，对一切抗日反蒋力量都

采取既往不咎的团结方针。并说，周还说过：不管什么人，只要对人民做过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五哥不必顾虑，现在就可以利用袍哥这种形式把公益协进社扩展成为团结民间力量的组织，逐步把（大邑）县内外以致川西地区的民间力量掌握起来……”

文彩对他这位幺弟，素来是爱佩有加、言听计从的。经过文辉这番深谈，文彩领会到反蒋亲共和抓地方力量的重要和必要，思想意识有了一个飞跃。（粟子：《刘文彩的后半生》〔未刊稿〕）

这段描写固然是一家之辞。但刘文辉回乡省亲确实成了公益协进社的一个转折点。刘文辉刚刚返蓉，刘文彩就将公益协进社扩大规模，升格为总社，日常经费由他的账房按时拨给财务股，特殊开支通过他，需要多少，解决多少。这个总社就成为联络、争取、团结其它袍哥公口的总机关。

袍哥大爷都设有自己的茶馆，又叫茶社，名为“立码头”，把茶馆当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动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刘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馆，叫作“同庆茶楼”，是一栋全砖结构的三层洋楼，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头。1942 年 8 月，刘文彩在新落成的“同庆茶楼”为公益协进社举行隆重的开山典礼。开山那天，司礼如仪。刘文彩敬重三哥刘文昭，请刘文昭就任公益协进社总社长，坐在主席台正中；他自己任副总社长，与另一位副总社长、二十四军退职团长刘体仁分坐刘文昭左右。刘体仁在会上致词。一位有心人作了记录，致词原文如下：

今天公益协进社正式成立，这是全安仁镇的盛事、庆幸事。这是刘总办的德望所致。数年来，总办对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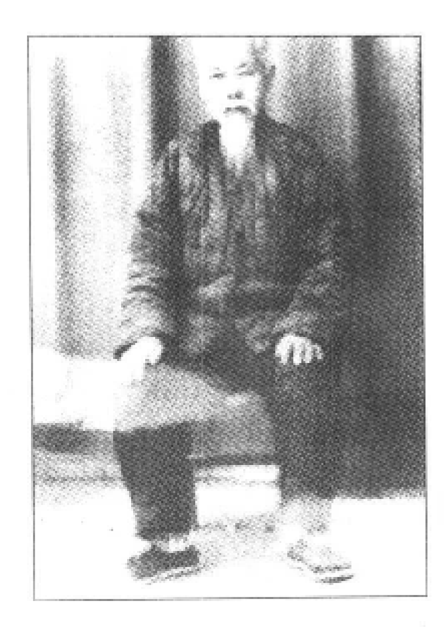
作了许多好事，有的多年纠纷，经总办一言数语即解；本息事宁人之愿，总办不吝垫钱垫米，济贫扶困。有好多本不该发生的事，然而却蕴藏着一场人祸，由于总办的关系，都化为无形。

过去，我们安仁镇人的子弟读高中，要徒步涉水到成都，明后年就近在咫尺了。这是总办为地方造福培养人才的一大善举。体仁忝居荣位，愿大家在总办领导福荫下，和睦团结互助，共同协助政府，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群策群力，造福桑梓，为幸为盼。（刘有江：《解放前安仁公益协进社》〔未刊稿〕）

不几日，刘文彩独资兴建的星廷戏院又告落成，特聘“新又新”剧团来作庆典演出。附近各县袍哥公口都派代表向公益协进社致贺。庆典持续达一个多月，极尽铺张。因贺礼贺彩太多，刘文彩专设礼品登记员四人，经收员十余人；另设招待组，员工四十余人，厨师、帮办更多至二百余人。“同庆茶楼”天天都是旌旗招展，熙熙攘攘，简直挥臂成林，挥汗成雨。每日中午仅宴席就达五百余桌（同前）。如此气派的庆典，在川西农村地区是绝无仅有。它无疑是刘文彩复出江湖的一个响亮的“开场白”。继后陆续加入公益协进社的袍哥码头，仅大邑县南部地区即多达一百余处。其它地区，如崇庆、新津、温江、邛崃、彭山、会理、成都，共计三十多个县市，也为公益协进社所蚕食。公益协进社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袍哥探秘》第171页）。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

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刘文彩也就不再只是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留守大员”，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前敌总司令”，与蒋介石在川西农村展开拉锯战，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出出连台好戏。



第十一章

回首一啸八面风

文彩中学同学録

互助

于右任

1. 刘文彩内管家在狱中
2.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文彩中学题辞

大家长刘文彩声望之隆，神通之广，对普通老百姓诱惑力之大，川西农村其他袍哥大爷何能望其项背！

1942年正月二十日，新津县张场先主寺弦歌悠扬，人头攒动。公益协进社“协进剧部”应邀来此演出。

“协进剧部”是个新班子，却“飞机上面安喇叭——名声在外”：它是刘文彩亲自组建的。

刘文彩是个半文盲，但这个半文盲竟还很有一点文艺细胞。叙府时期，有个外省杂技团来叙演出，刘文彩看魔术表演完全看入了迷，用千元大洋的高薪聘请魔术师马守义当他的私人魔术老师，他还真不笨，三两个月就把“马老师”的全部手艺学到了手。然后添置了一套和杂技团一模一样的魔术道具。平时在家，如果他高兴了，还会表演一两个折子逗逗乐。败退安仁时据说是用来装银元的木箱中，就装有这批杂技道具。但这批道具运回安仁就再没派上用场。大概是折戟沉沙，心情抑郁，再没有当年的那份兴致了。道具被刘氏家族的孩子们当成玩具，丢的丢坏的坏，刘文彩根本就记不起他还有这么一笔“家产”，提都不提。

刘文彩更爱好川剧。他爱听川剧坐唱（清唱，土话叫“打围鼓”），擅长打“响器”和“帮腔”。叙府时期，常邀约一些玩友到家里清唱同乐。晚年风头尤健，川西农村习俗，正月初九到十五都要在集镇上搭台唱戏。叫作春台戏。安仁每年的春台戏，刘文彩都要扮演一个角色。说不上观者如堵，但以他的知名度，他一登台，台下确实是热闹非凡。他在安仁从事公益建设，特意兴建戏院，并以他的字号命

名。农村小镇拥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正规戏院，这在今天也不多见。组织公益协进社，他也没忘记配个戏班子，派专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员），高薪聘来宋戈田、张新伟、刘金龙、菊芬等川剧名角。袍哥公口办剧团，也算是中国帮会史上的一个创举。

刘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个创举，差点引来一场刀兵之灾。

戏班子跑码头，受地头蛇刁难是常有的事。但协进剧部应该可以例外——毕竟有刘文彩作靠山。先主寺一个叫张汉卿的小混混，却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这天他酒足饭饱之后，在几个兄弟伙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了剧场。正好菊芬登台。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台唱戏，刘文彩许诺“一不陪酒，二要保证安全”，才说服她加盟“协进剧部”。安仁谁都不敢轻薄她。张汉卿不知轻重，见菊芬天生丽质，而且演技过人，就动了邪念，赶紧到台角守候，演出结束时把菊芬拦了下来，一嘴酒气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动起了手。公益协进社管事李沛成闻声赶来，把菊芬拉到身后，警告张汉卿：

“我们总办讲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啊！”

李沛成原以为“总办”两个字会把张汉卿吓跑，哪知道张汉卿听了反而勃然作色，指着李沛成骂：

“总办算个球！阎王老子都不怕，你吓唬谁你？”

其他人知道大势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张汉卿想追，被李沛成拦住去路，气急败坏，一边咆哮一边对李沛成拳打脚踢。公益协进社另一个管事王子元吓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如梦初醒，跑回安仁向刘文彩报信。

刘文彩拍案而起，马上召来上安乡乡长李席珍、安仁乡乡长刘绍武。指令：

"能和则和，能打则打，总归要张汉卿认罪才罢休。"

并点兵点将：上安、韩场、沙渠、董场、蔡场的公益协进社分支社，各派人枪若干，由李席珍统一指挥。当夜三更造饭，五更出发，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赶到蔡场会合。

总指挥李席珍，是大邑有名的绿林豪杰。精通武术，更有一百多个"贴心豆瓣"召之即来。早年在李家钰部队作战，即以勇猛著称。刘文彩对他很器重，提拔他当了上安乡乡长。这次有他出马，自可稳操胜券。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李席珍的人马团团包围。当地袍哥大爷李元亨刚开门，就见四面山头人山人海，一个个枪在握，弹上膛。大惊。他知道是张汉卿闯下大祸了，赶忙回头，拉上张汉卿就去向李席珍道歉。但李席珍无权收兵；李元亨只好又拉上张汉卿，亲自赶到安仁，当着刘文彩双双跪下，恳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刘文彩则端坐不动，一声不吭。李元亨到底见识广，马上明白过来：张汉卿冒犯的不只是刘文彩，而是整个公益协进社。因此不能单单向刘文彩讨饶，必须同时向公益协进社全体会众讨饶，大家说过关才算过关。没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设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协进社会众赔不是。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汉卿，这时一边尾随着大爷李元亨，一边紧张地环顾左右，生怕有人报复他，两条腿直打抖。

辱人者最终自取其辱。

刘文彩能够聚合十万会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该出手时就出手。

袍哥之兴，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极端无能和法制的极度颓败，无法扬善惩恶，有效地保护社会成员，公众在物质上精神上极度不安，不得不归属于"异姓兄弟"这个新的世俗共同体，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纽带，在帮会中实现自我复仇和

自我救助。《哥老会组织大纲》第七条就规定："若社员有是非口舌斗争等，不问理之曲直，本社得全力扶助，理直者（伸）其正义，理曲者尽力照护，务使社员得享本社之保障。"一致对外是袍哥的信条，在团体内部，拜弟必须对拜兄绝对服从，会众必须对大爷绝对服从。作为交换条件，拜兄必须庇荫拜弟，保障拜弟"不受外力之摧残"；大爷必须庇荫全体会众，保障全体会众"不受外力之摧残"。

公益协进社也是家庭式人身依附的帮会组织。同庆茶楼二楼陈列着两个木牌，上面题有公益协进社社规：

1. 同心同德同肝胆，结仁结义结金兰。

2. 本社讲仁义，讲忠孝，不准对父母忤逆，不准对拜兄失礼。没有不是的拜兄，只有不是的拜弟；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尊重妇女，不许串灶；如若串灶，抛江扑灰（庄园档案67宗F5卷）。

"梁山根本"、"桃园聚义"，袍哥的这些传统价值观，也为公益协进社所奉行。在公益协进社内部，刘文彩就是大家长，所有会众必须绝对效忠，"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刘文彩在享受大家长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大家长的义务，为会众两肋插刀，"救民若渴，赴义若饥"，维护和扩张会众的生存权利。

刘文彩确实不负会众厚望。先主寺事件，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另一个例子是"陈飞刀事件"。无独有偶，这个事件也由看戏引起。

1947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是崇庆县王场乡的集日，照例搭台唱戏。头面人物坐内座，普通观众坐外座。锣鼓已经响了两巡，别的桌子座无虚席，内座第一桌却还是空的。刚刚赶到的公益协进社隆兴乡分社社长陈敬之便大大咧咧地

在第一桌坐了下来。隆兴乡和王场乡相邻，陈飞刀常来常往，很随便，这次看戏也只带了几个兄弟伙。刚坐下戏就开演了，正看得上劲，有人拍陈飞刀的肩膀。陈飞刀回头一看，身后站着几条大汉，中间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满脸怒气地瞪着他。他认出那女人是王场乡乡长、会道门唐安总社王场分社舵把子赵华九的姨太太，就问：

“么事？是不是赵乡长有请？有请等我看了戏再说。”

“请你妈个鬼请！你晓不晓得你占的是谁的位置？你占了老娘的位置！走开走开！”

陈飞刀没想到那女人如此张狂，火了，桌子一拍：

“老子今天偏不走！凭啥说这桌是你的？未必你家赵华九把这个戏园子买下了不成？”

姨太太听了，一巴掌也拍在桌上：

“你这个二杆子，耍横耍到我们王场来了。老娘今天就不信你这个邪！”

然后朝几个大汉一指：

“弟兄们，把他给我甩出去。”

身后几个大汉一涌而上，真的把陈飞刀拉了出去，一把推倒在门坎下面。陈飞刀寡不敌众，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隆兴乡，陈飞刀马上召集兄弟伙，讲了自己“王场蒙难”的经过。兄弟伙义愤填膺。陈飞刀讲完了大声问：

“弟兄们，这事你们说咋办？”

陈飞刀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现在陈飞刀要复仇，兄弟伙哪敢不效命前驱！于是都回答要和赵华九干一仗，给大爷出了这口鸟气。陈飞刀便下令各自回家待命，然后亲自去安仁向刘文彩汇报，请求援助。刘文彩不含糊，告诉陈飞刀：

“好，我支援你们。如果你们赢了，自然有奖励。如果

你们输了，我给你们200挺机枪，1000支步枪，还给一笔经费，你们再给我打回来！”

陈飞刀喜气洋洋地返回隆兴，加紧调兵遣将。

听说在戏园子和陈飞刀吵了一场，赵华九开始不怎么放在心上。及至探子来报，说刘文彩支持陈飞刀攻打王场，赵华九这才慌了神，一方面调集兄弟伙在王场四周挖战壕，修工事；一方面用重金委托崇庆县参议长黄润琴调解。黄润琴怕刘文彩不买自己的账，便游说崇庆县最负盛名的士绅、刘文彩儿女亲家张星初，请张星初向刘文彩求情。刘文彩当然不能不给亲家面子，但还是坚持赵华九必须当面向陈飞刀赔罪。最后商定，由田颂尧部将王耀祖以唐安总社舵把子的名义，邀请公益协进社总社派代表参加，公开调解赵、陈纠纷。调解之日，王耀祖和赵华九本人说尽好话，双方才握手言和。

江湖是典型的强权世界，通行铁血主义。非铁腕不能庇护会众，非铁腕不足以震慑群雄，大家长的地位也就无以维持。刘文彩本性强悍果干，除牟二蝗，惩雷绍华，从来是斩钉截铁，毫不拖泥带水。主持公益协进社，更是有胆有力。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以豪侠形象驰骋江湖。大家长刘文彩声望之隆，神通之广，对普通老百姓诱惑力之大，川西农村其他袍哥大爷何能望其项背！一位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晚年回忆，大邑民间枪支很多，“有民团武装，袍哥武装，土匪武装，烟帮武装”。真是遍地兵匪。大邑如此，川西其他地区鲜有例外。乱世之中，普通老百姓根本无力自保；拉帮结派，依附大爷；崇拜豪侠，以求庇荫，是他们共有的心理。所以，“那里的老百姓没有参加袍哥组织的很少”（《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第16页）。而在当时的川西农村，没有比公益协进社更强大的袍哥组织，托庇于公益协进

社，确实能够得到刘文彩的庇护，身家性命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公益协进社十万兄弟伙，绝大多数都是被刘文彩这样吸引过来的。

流传至今的《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称刘文彩“慷慨好义”，“能急人急，有燕赵豪侠风”。以之概括刘文彩一生未必妥当，以之概括刘文彩晚年，则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

以铁腕震慑江湖的同时，对内刘文彩主要是强化感情投资，以此聚合人心。《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有如下一段描写：

> 他的主要欺骗手段，就是掩盖阶级关系，鼓吹“公益”、“协进”，散布“同心同德”、“结仁结义”的慌（谎）言。他甚至趁别人死了亲属没棺材，来了亲朋没酒肉招待的时候，用急人所急、解人之困的办法，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和亡命之徒笼络过来。

刘文彩“急人所急、解人之困”是否属于“欺骗手段”，这在今天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急人所急、解人之困”事实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则是没有争议的。

至今健在的刘泽高老人便是受益者之一。

刘泽高自立很早，十九岁便与父母分了家，搬到安仁新街开了爿干鲜店。不幸遭逢大旱，农民歉收，刘泽高的干鲜店也就没生意可做，一家人好不容易有口稀饭吃，哪还赚什么钱。后来同庆茶楼落成，楼裙刚好跨街而过。刘泽高家在

楼西，店在楼东，每天早出晚归都要从楼洞过，与刘文彩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这么点缘分，没想到刘文彩还把他给记住了。父亲病故时，刘泽高仍然穷得叮当响，无力敛尸。正在发愁，刘文彩派人把他叫了去，问他：

“你父亲的木头找着了吗？”

“没有。”刘泽高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这里有，抬回去用就是了。”

刘泽高以为刘文彩是要卖棺材给他，赶紧说：

“算了算了，我买不起。”

“嗨，谁说要你买了！”刘文彩瞪了他一眼。想了想又说：

“不过呢，也是不能白送给你。我倒不在乎你那点钱，但真白送给你，别人会笑话你没本事，连老人的棺材都置不起。这样吧，你从我这儿抬一副最好的木头回去，干打价（四川土话，意思是随便怎么给钱）就是了。”

刘泽高果然干打价，象征性地付了点钱，就抬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回去，父亲入土为安，刘泽高这才了却了一桩心事。

刘泽高本人还曾向笔者讲过他亲见亲历的一件事。

一个叫钟选廷的崇庆农民，从外地回家时，受人之托，给刘文彩带去一千块大洋。收款之后刘文彩问他：

“你在老家有没有田地？”

钟选廷回答说没有。刘文彩又问：

“那你有没有店铺？”

钟选廷说也没有。刘文彩摇了摇头，就让人领钟选廷去饭厅吃饭。

钟选廷在老公馆住了一夜。第二天辞行时，被叫到刘文彩账房里。账房先生一见他就说：“恭喜你啦！”

钟选廷莫名其妙。账房先生招呼他坐下，然后抱来几个钱坯子堆在桌上，说：

"这是总办送你的，要你回家买点铺子和田地，好好过日子。你点个数吧。"

当场点验，刘文彩送他的是整整三千大洋。

真是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钟选廷乐颠颠地回到家，买田置地，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财东。

刘泽高和钟选廷对刘文彩当然感激不尽，后来一个做了刘文彩的内管事，一个做了刘文彩的外管事。

一副棺材，三千大洋……这些在刘文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仅仅其九牛一毛，已足以解除受施者的燃眉之急，赢得受施者的拥戴，刘文彩何乐不为！但刘文彩久经商海，效益观念很强，绝不盲目施舍。用刘泽高的话来讲："他对施舍做善事也很有讲究，比如农民盖房子，如果大部分成功了，只剩瓦没有钱买，他可以帮助你；如果房子根本没有开始修，找他，他绝不会帮助你一分一厘。"要"急人所急、解人之困"，但不当冤大头。这是刘文彩布施的一个基本原则。

流传至今的《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称刘文彩"慷慨好义"，"能急人急，有燕赵豪侠风"。以之概括刘文彩一生未必妥当，以之概括刘文彩晚年，则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晚年刘文彩不同于早年刘文彩。暴发户诸多不良习性，早年刘文彩确实沾染不少。但经历了"二刘之战"的痛挫，经历了冷落萧条的留守生涯，现在复出江湖，刘文彩的价值观已有所转化。刘文彩次子刘元华讲的一段见闻，比较能够反映晚年刘文彩的为人：

那是 1942 年夏天的事，我马上就要从军校毕业

了，母亲开始为我筹办婚礼。一天下午，她忽然吩咐说："你还是回安仁一趟，接你父亲来当主婚人吧。"我骑上自行车就走。成都到安仁一百多里路，才走到半路的中和镇，天就黑了。那时社会上很乱，路上常有土匪打劫，一个人摸黑走远路，确实有些害怕。我就请了一个打更人送我，两人推着自行车步行，到安仁已经是深夜了。我给打更人几块钱，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就敲门。这时父亲已经睡下了，听说我回了家，赶快披衣起床，见到我就高兴地问："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的？"我说："请一个打更人送我回来的。""人呢？""我让他回去了。"父亲一听，脸马上沉了下来，气呼呼地说："你咋这么霸道？人家送你，你还让人家走那远的夜路！家里空房子多的是，又不是安排不下他，让他明天再走不好吗？"

可见晚年刘文彩确不乏人情味。

晚年刘文彩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用钱要会用"；另一句是："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同前）。如果说早年刘文彩是一切向钱看，那么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刘文彩最看重的已经不是钱而是"名"了，所讲究的已经不是如何敛钱，而是如何用钱——如何用钱博取名声，重塑自我形象。晚年刘文彩"急人所急、解人之困"，自不足为怪。

晚年刘文彩"急人所急、解人之困"，不仅仅出于精神需求，也是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刘氏家族与蒋介石集团的较量中，安仁既是后院，又是前沿，首尾兼顾，不容稍有闪失。即便是刘文辉严密拱卫的卧榻西康，仍因苛政多多激起荥经民变，为蒋介石集团所乘，派特务纠集数千民军进逼雅安，刘文辉地位一度动摇。安仁镇则孤悬在蒋管区的

汪洋大海间，刘文彩要确保万无一失，铁腕震慑江湖的同时，必须加大对会众的投资力度，攻心为上，通过"急人所急、解人之困"，实现袍哥内部自我救助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同心同德同肝胆，结仁结义结金兰"。这样才能做到"舵把子有事，兄弟伙要打就打，要拼就拼"；刘文彩也才能退以维持安仁大本营的安定团结，进则登高一呼而应者如云，从而在民心向背上占据主动，要挟蒋介石集团。

不仅急会众所急，解会众之困；对地方所急、乡邻之困，刘文彩也常常予以帮助。"哥老会组织在本地区亲朋故旧多，一般不干坏事。为了能得到故土人们的称颂，往往还要倡办一些慈善事业"。公益协进社尤其如此。笔者在安仁采访，一些老人对晚年刘文彩"积善行德"的故事津津乐道。说他每逢隆冬年节，都要向穷乡亲发放钱财衣物，实在揭不开锅的还能分到大米两石。《地主庄园沧桑录》也承认："有个别受天灾人祸打击的穷人被免租的情况。"公益协进社总社设有慈善股，专人处理慈善事宜。

诸多慈善事宜中，刘文彩最热衷的是地方公益建设。他的袍哥公口没有沿袭传统名号，而叫作"公益协进社"，就蕴含了刘文彩以公益建设为旗帜号召父老乡亲的意图。

安仁镇是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为了使安仁镇的气度能与公益协进社的显赫地位相匹配，在老公馆落成后，刘文彩集中精力扩建安仁街区。他不惜巨资，修了仁和、裕民、维新等好几条新街。街道平坦笔直，街道两边是清一色的两层木结构店铺。当年安仁镇的许多集市，比如肥猪市场、米粮市场、禽蛋市场等等，也由刘文彩独资兴建。在刘文彩带动下，其他绅商纷纷投资安仁，使安仁街区面积数年之间增加了四倍。刘文彩退据安仁之前，安仁在大邑境内仅为三流小镇，数年后就跃为仅次于县城晋原镇的一流大镇。安仁到成

都数十公里的公路，刘文彩也是主要投资者之一。《地主庄园沧桑录》也说："刘文彩连年大兴土木，致劳民伤财；但从这些工程本身而言，于今却不乏长远效益矣。"《公益协进社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即称，该社"遵奉三民主义，协助政府，以促进地方公益事业为宗旨"（刘有江：《解放前公益协进社》〔未刊稿〕）。所谓"遵奉三民主义，协助政府"，不过是虚应文章，"促进地方公益事业"的口号，则有实际行动印证。

刘文彩"急人所急、解人之困"，受益的不只是公益协进社十万会众，地方上和普通民众也曾受益。对此，《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无法全盘抹杀，便有了这样一段记述——

> 刘文彩装着一副积善行德的面孔，他把他庄园后面的毗卢寺作为家庙，养着一批和尚，夜以继日地替他念经。他还在庄园内，离水牢不远处，设置了佛堂，烧香拜佛。一张张斗大的"善"字条幅，挂满庄园，甚至连专搞收租逼债的账房门口都贴上了。刘文彩平时更是佛珠不离手，善字不离口，逢年过节或饥荒年景，粮仓里发了霉的米有时他也拿点出来熬成稀粥，"施"给穷人……刘文彩做的这些"善"事也可数上一串串。并且，这部分"施舍"一般都不列入账簿，放进他的账房。他只是把受施者的名字写在一本黄表纸的册子上，焚香祈祷后，就加以烧毁。死者装进他"施舍"的火匣子以后，他还特意在尸体旁边放四只木碗和一束麻。这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教义"来施行的，据说那意思是通知"天"、"神"，他"今世"作了"善事"，种下了"来世"富贵的"因"，死后当升入"天堂"。而名册上的穷人则欠了他的"债"作了"恶"，死后当下地狱，并且来世还得偿还。

本段记述破绽甚多——毗卢寺并非刘文彩家庙，而是尼姑庵；“木碗束麻”更与刘文彩无关，而是北京功德林遗俗——明、清之际，功德林破败不堪，太原人王先（后改名王元璋）出家为僧，云游到此，见庙宇败落，周围又有北邙荒地，就修了一座济养院，赈济贫饥，病者给医，死者给棺。传说凡死于功德林者，除给棺木外，并置四个大碗于棺内四角，象征四个马蹄；又放蝇帚一把，代表马尾，意为死者来生变马，以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全盘抄袭这个传说，移植到刘文彩头上，借以否定刘文彩“急人所急、解人之困”的历史，维护刘文彩“人间阎王”的既定形象。但欲盖弥彰，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晚年刘文彩并非一无是处。

身为公益协进社当事大爷，排难解纷也是刘文彩的重要职责。“哥老会大爷地位既已形成，在地方上是有一定权威的，社会上各种人事纠纷，常常在哥老会茶馆中求得解决。大爷虽不是法官，他的威信有时比法官还高。有的在法院打了几年的官司得不到终结的案子，只要哥老会大爷出面，对闹事双方东说西劝，也能定下一个结果而平息”（蔡墩：《哥老会内幕大探秘》）。晚年刘文彩在这方面同样堪称典范。刘泽高回忆，公益协进社刚问世，刘文彩就主动过问当地一桩有名的积案：

> 时间是1942年。刘文彩写了封信给在西康省康定县的冉俊生，叫他到安仁镇。冉俊生回安仁镇后，第二天，刘文彩上街，就在同庆茶楼叫住我：刘泽高，你送封信到三岔乡去，送给魏俊三魏乡长。你给他说，冉俊生昨晚回来了，就在我们安仁镇。喊魏乡长今天来，他

们对个面，我给他们调解纠纷，把他们的疙瘩解了。

我把信拿到后就坐个鸡公车，到了三岔的场口上，刚刚下鸡公车，他们三岔街的人就看出我是外面来的了，我就把信拿出去，说我从安仁镇来，要见魏乡长。魏乡长把信看了以后，我就问他，是我们同路去呢，还是我前里走。他说你前里走。我回安仁不久，他也带了几个兄弟伙到安仁了，也上了同庆茶楼。事先刘文彩已经和冉俊生谈好了，现在又来单独和魏俊三谈，在同庆茶楼二楼。刘文彩说：你们是和为贵，冉俊生他是我的拜弟，你呢是我的朋友，你们都听我一句劝。

魏俊三和冉俊生的矛盾闹了好几年了，是魏俊三仗着乡长的身份，先欺负了冉俊生的父亲。冉俊生的父亲是个教书匠，前清秀才，冉家丢不下面子。冉俊生在家排行第二，绰号冉二哥，冉老二，血气方刚，就带了一二十个青年人，把乡公所砸了一通。魏乡长后来发话，以后冉俊生要是让我再碰上，我非把他搁平不可。冉俊生毕竟不像魏俊三有权势，就跑到西康去了。

刘文彩把冉、魏纠纷解决了之后，他还给我们摆过这个情况。他说我给人家解决事情要做到一劳永逸，我这个人以心德对人。开始我就把魏俊三当朋友，其实我在这之前还只是听说过魏俊三的名字，这次我们是初次见面。冉老二以前我也没见过面，这次写信喊他回来才见了面，我把他当作我的侄辈。我这样一来，冉俊生就不好再和魏乡长闹了，因为闹了他就对不起我，我的拜弟怎么能对不起我呢？冉俊生既然是我的拜弟，你魏乡长就不能再欺负他，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就对不起我，不够朋友。

这是刘文彩调解民间纠纷的独到之处：与双方交朋友，再以朋友身份居间调停。谁要再闹下去，首先就对不住刘文彩，纵然依旧心存芥蒂，也只能和平共处。但这种手法不是对谁都适用。有一定地位的人，刘文彩才会和他交友。比如魏俊三是一乡之长，冉俊生是秀才之后，和他们交朋友，刘文彩认为值得。刘文彩认为不值得交友，就用经济赔偿解决问题，如果双方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意见，当然是皆大欢喜；如果实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差额部分就往往由刘文彩掏腰包。也就是"花钱买平安"。刘文彩既有权势，又有的是钱财，情感手段和经济手段都能运用自如，别人调解不了的难案、疑案，到了他手中总是迎刃而解。《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说刘文彩："乡居喜排纷难，倘有构衅，经年法庭不能判决者，得公片语立释，地方讼事赖以消化殆尽。"这段记载基本属实。从魏俊三、冉俊生握手言和那天起，公益协进社调解股的招牌就打响了，前来请求调解的会众、乡亲接踵而至。王玉清 1980 年 12 月 26 日供称："街上打架、掉鸡都要找他解决。他在茶馆里给人家解决。他解决问题要把两方面都问清楚，人家都听他的。刘文彩一上街他大哥就要骂他爱管闲事，我也经常说他爱管闲事。"刘文彩一个儿子回忆：实际上"空下来他还是觉得累，大伯（即刘文渊——引者注）就经常劝他不管那些闲事。可人家找上门来，有时几十里跑来，你总不能把人家推出去，所以又不能不管"。1947 年，刘文彩年满六十，身体状况堪称危机四伏。这年过生日，刘文渊授意儿子刘元琥、刘元璪、女儿刘元慎，给刘文彩送了一幅寿联——

五叔近数年来，为梓里兴革排解，劳苦极矣。余等犹子也，时深系念。今值诞辰，本拟登堂拜祝，均肄业

大学，不克言旋。特寄数语，藉以上寿，并寓谏于中云尔：

万事劳形，纳诸恬静；

三多祝嘏，养以太和。

但要凝聚十万会众，确保刘文辉家族集团始终叱咤江湖，刘文彩必须胜任繁剧，事实上不可能"纳诸恬静"，"养以太和"；病情只会加重，终至不救。刘文彩为了家族利益，说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刘文彩眼里，他的公益协进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而他自己，则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

对公益协进社十万会众来说，他们的大家长刘文彩并非总是慈眉善目。

1938年8月的一天早上，几个便衣悄无声息地溜进雅安中大街青年会馔芬餐厅的一个雅间，雅间用四张方桌拼成一张大桌，桌上的火锅煮得咕嘟咕嘟响，青烟袅袅而上，香气四溢。食客们正在斗酒，谁也没发现来了不速之客。突然一排枪响，坐在上席的军人应声倒地。其余食客吓得喊爹叫娘，直往桌子底下钻。杀手们却已经收了枪，大喊："大家不要怕，不关大家的事。"并声明："杨炳元带了总办的

过，我们是奉总办之命处决他。”然后从容不迫地撤出餐厅。等他们走远了，才有人战战兢兢地从桌下钻出来，用电话报了案。二十四军军部马上派人赶到，将杨炳元送往医院救治。杨炳元中了整整一梭子弹，胸脯被打得像个马蜂窝，哪还救得过来。

雅安街上经常发生凶案。前几年就有一个穿狐皮袄子的人在大北街治安旅馆门口饮弹身亡。此人叫赵家馨，成都南门一带的袍哥舵把子，人称赵四哥。当年二十四军驻蓉时，赵家馨是三军联合办事处稽查长，曾为了抢占一个妓女而与杨炳元争风。杨炳元吃了亏，怀恨在心。后来赵家馨来雅安为刘文辉祝寿，杨炳元便趁机对他下了毒手。杨炳元自己也没想到，仅仅几年之后，他就要步赵家馨的后尘，横尸街头。

杨炳元非等闲之辈，不仅给刘文辉当了十来年的贴身警卫，而且与刘文辉沾亲带故——是刘文辉夫人杨蕴光的远房侄子。因为这层关系，杨炳元什么事都敢干，树敌颇多。但投鼠忌器，谁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当年在成都，他带人到东胜街拉“肥猪”，不巧被来蓉公干的国民党要员伍朝枢撞见，伍朝枢回过头告诉了刘文辉。刘文辉很难堪，这才把杨炳元抓了起来，准备处以极刑。但夫人杨蕴光一吹枕头风，还是刀下留了人。杨炳元从此愈加猖狂。到雅安后，兼做鸦片和军火生意，发了不少横财。自认为本钱够了，回到大邑唐场开山立堂，当起了舵把子。一天，他和几个兄弟伙下酒馆，多吃了几杯酒，来了劲，对刘文彩评头品足。酒醒之后才听人讲，他大骂了刘文彩一通。这杨炳元固然骄横，但还没有胆量拿刘文彩开玩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收拾细软，叫了一乘轿子逃往雅安，想继续在刘文辉的大树下乘凉。刘文彩平时就对杨炳元十分厌恶，得知杨炳元在唐场酒馆里的

一番"豪言"，不禁暴跳如雷。马上派人通报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刘元塘：截杀杨炳元。刘元塘奉命惟谨，随即用电话向驻守邛崃县黑竹关的连长蒋锡尧下令：绝对不可让杨炳元逃过黑竹关。但蒋奉令时，杨炳元已过了黑竹关。蒋没法复命，就派出一支十多人组成的行刑队，一直追到雅安城。杨炳元却是毫不知情，以为回到刘文辉身边，谁也拿他没办法，万事大吉了。又大摇大摆地公开活动，全无防备。这天早上，他应当地袍哥舵把子张明清之邀，到雅安中大街青年会馔芬餐厅吃早茶，蒋锡尧的行刑队知道了他的行踪，迅即出手。机关算尽的杨炳元最终是在劫难逃。

自幼投身袍哥的刘文彩，是很讲究江湖礼仪的。哥老会帮规要求所有会众"第一要把父母孝，尊敬长上第二条"。"如上不认兄，下不认弟，荒淫乱伦，要受'三刀六个眼'的处分，自绑自杀，或自己挖坑自跳活埋"。公益协进社社规也宣称："本社讲仁义，讲忠孝，不准对父母忤逆，不准对拜兄失礼。没有不是的拜兄，只有不是的拜弟。"在深受袍哥旧俗习染的刘文彩看来，上下尊卑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大家长的地位和尊严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胆敢冒犯他，便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纨绔子弟杨炳元便是因此命归黄泉。

"串灶"也为袍哥深恶痛觉。哥老会"黑十款"第三款警告会众："弟淫兄嫂遭惨报"。公益协进社社规更是声色俱厉："如若串灶，抛江扑灰。"刘文彩虽然自己妻妾成群，私生活记录远远谈不上干净，却绝对不能容忍他的下属触犯"串灶"禁规。由此引出另一桩命案。

刘文彩有个姨太太，叫王玉清，是贫苦农家出身。王玉清的弟弟自小叫王老二，据说长得鱼背猴腰，但因为是刘文彩的舅子，娶的媳妇长得倒很周正。这王老二命薄，婚后不

久就病故了。王二嫂正当盛年，实在寂寞得可以，便多次对刘文彩讲，要招个上门女婿支撑门户。刘文彩一脑子的正统观念，认为女人夫死守寡是理所当然，因此不仅不同意王二嫂另娶，而且给蔡场乡乡长保长们都打了招呼：谁要敢招惹王二嫂，小心脑袋搬家。

刘文彩扎紧了篱笆。但他不可能天天守着王二嫂。当地有个土匪，叫王子舟，因在家中排行第八，人称王老八。此人色胆包天，别人都不敢碰王二嫂，他却悄悄找上门去，暗度陈仓。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哪瞒得过左邻右舍的眼睛。很快有人向刘文彩告了密，刘文彩气得吹胡子，只过了两天，就指派几个兄弟伙，在万石桥的一家茶馆里，把王子舟拉到街上，数落了他的"罪状"，然后当众"枪毙"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冒犯了大家长的尊严，舅母子的情夫也好，刘文辉的弁兵也好，刘文彩一个也不宽恕，没有哪个太岁爷是他不敢触动的。杨炳元命案和王老八命案在公益协进社十万会众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前车之鉴，还有谁敢对刘文彩的大家长地位提出挑战？

刘文彩恩威并用，公益协进社会众对之莫不俯首听命，十万"罗宾汉"召之即来，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农村的活动能量至此达于极点。公益协进社的触角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势力范围。在刘文彩精心调度下，公益协进社终于成长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诸多"隐形军队"中，惟一一支可与蒋介石集团在江湖草莽直接、全面和持久抗衡的王牌"隐形军队"。这是晚年刘文彩对其家族集团在政治上最大的贡献。旧时同庆茶楼堂壁上挂有一幅画，画上一虎作回首长啸状，并题有一诗——

逐逐眈眈顾盼雄，中原谁是主人翁；

我今欲别山林去，回首一啸八面风。

这些诗画，当然不是半文盲刘文彩所能挥就，想必是刘文彩兄弟的知交所题赠——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系刘文彩兄弟早年梦寐所求。现在，逐鹿中原的迷梦固然已是烟消云散，但作为一种政治口号，作为激励整个家族集团卧薪尝胆的精神原动力，“逐鹿中原”之说却并未过时。为刘文彩题赠这些诗画，实际上是以“回首一啸八面风”的出山猛虎隐喻刚刚结束蛰居生涯复出江湖的刘文彩，实际上是以此勉励刘文彩奋勇拼杀，为其家族集团开拓江湖新边疆。而这些诗画也确实代表了刘文彩的心志，于是刘文彩将它高悬于公益协进社的大堂之中，以此自勉。经过苦心经营，公益协进社果然可以在川西农村驰骋自如，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江湖新边疆果然不断拓展。刘文彩确实没有辜负家族集团的殷殷之望。

公益协进社不仅叱咤江湖，对官府同样颇具威慑力。公益协进社核心机构“内八堂”，与一般袍哥公口的“内八堂”迥然有别——并无“座堂”、“盟证”、“陪堂”、“元堂”、“执堂”、“副堂”、“礼堂”、“刑堂”、“新一”之设，而是全盘照搬政府体制，设慈善股、调解股、水利股、教育股、治安股、总务股、财务股、交际股，几乎将政府事务囊括净尽。这是刘文彩对袍哥传统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使袍哥组织和职能现代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也是与蒋介石集团把持的地方政权分庭抗礼。在刘文彩眼里，他的公益协进社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权形态——“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而他自己，则常常以“地下首脑”、“幕后首脑”的身份，凌驾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长之上，对他们颐指气使。对刘文彩的这种自命，地方合法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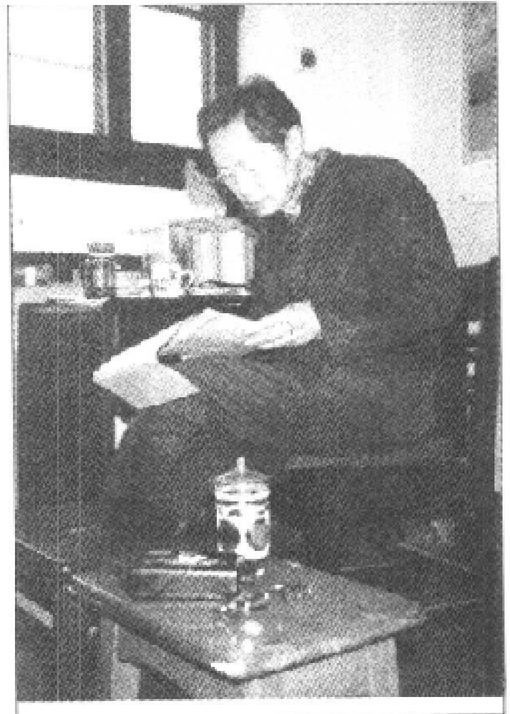
首长没有谁敢不默认。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称，公益协进社总社所在的同庆茶楼，简直像个小朝廷，“一年四季，这里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土匪，还有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云集‘小朝廷’里，向‘土皇帝’刘文彩请安上寿，禀报请示”。这段描写基本上是实情。刘文彩进入了他一生中权势最盛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他当然颇为自得。有一次，他公开戏谑来老公馆“朝拜”的几位“父母官”说：“你们这些蒋介石的豆瓣，不要以为‘为政不得罪巨室’嘛，只要你们有啥，就给我说。”（幸蜀峰1976年5月28日口述）在那个一提到“蒋总裁”就须全体起立的年月，刘文彩在公开场合对蒋介石直呼其名，“父母官”则被他戏称为“蒋介石的豆瓣”，可见官方礼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刘文彩对蒋介石没什么敬意，这在当时并非秘密。安仁第十一保保长叫蒋焕庭，刘文辉、刘湘老家都在其辖区内。有一次，刘文彩灵感突发，笑嘻嘻地和蒋焕庭开玩笑说：“讲袍哥，我是公益协进社总舵把子，你是我的兄弟伙；论公事，我家两个省主席都要归你管，我更是不在话下。你硬是‘蒋委员长’呢。”从此，常在公开场合称蒋焕庭为“蒋委员长”。抗战伊始，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全面推行党化政策。1940年3月，大邑县政府训令全县中小学教师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次年训令公务人员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有的国民党党部甚至公开宣传，入党可以不当壮丁，入党等于参加袍哥，入党当教师才有保障。有的事先为他人填写申请书，报批了始通

知本人。为推进党化政策，当局不遗余力。可这些招数在刘文彩的地盘上却行不通。大邑县政府多次派员与刘文彩洽谈，要求在文彩中学建立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发展党员，一直为刘文彩坚拒，不能如愿。《刘文彩罪恶的一生》说，刘文彩连“三民主义”为何物都不清楚，竟闹过把“三民主义”说成“三门手艺”的笑话。其实事件原委是，刘文彩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没有兴趣，一次，别人提到了“三民主义”，刘文彩嘴一撇说：“啥子三民主义，不如学好三门手艺。”思想上感情上与当局格格不入，实践中刘文彩更是信守不合作主义，当局无可如何。虽然大邑县府依照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指令，于 1943 年、1947 年迭次颁布关于哥老会组织的各项禁令，对眼皮底下的公益协进社却不敢稍有冒犯；虽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中国人固有的心理，地方当局却也只能默认双重政权并存的现实，即“地下政权”、“幕后政权”公益协进社与地方合法政权并存的现实，默认“地下首脑”、“幕后首脑”刘文彩对地方合法行政首长指手划脚。幸蜀峰晚年还称，刘文彩忠告“父母官”：“不要以为为政不得罪巨室；只要你们有啥，就给我说”，这一套完全是“假言”——“其实是根本不敢惹他的。”1940－1941 年间任大邑县县长、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协总务处副处长的陈平三，在文革前夕一次斗争刘文彩儿子的机关政治学习会上，也曾提到他在大邑县县长任上，一切政令法令（包括征丁、征粮等），未蒙刘文彩首肯，休想推行。以公益协进社为凭借，既称霸川西江湖，又要挟地方当局，干预地方政治；从而使刘文辉家族集团不仅操纵了川西民间社会，而且在事实上驾驭了蒋介石在川西地区相当数量的基层政权。川西地区因此不可能演变为蒋介石集团进取西康的跳板，反而成了护卫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屏障。

第十二章

生　死　搏　斗



1. 刘文彩的贴身随从刘泽高
2. 刘文彩的三儿子刘元富

蒋介石的钦差大臣甘当后台老板，陈少夔家族哪有拒绝之理。于是，公益协进社初创仅一年，陈少夔家族就组织了“鹤山总社”。陈刘两派袍哥之间的较量由此开场。

就在权势最盛的时候，刘文彩遇到了他一生中的第三个劲敌、也是最后一个劲敌——陈少夔。

陈少夔，又名郡，绰号陈猫毛，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生于大邑东沟，后常住县城正东街。祖父陈华斋系清末武生，大邑袍哥总舵把子，为人仁慈宽厚，在地方上享有盛名，时有“出成都南门问华斋妇孺皆知”之说。1935年，当局赠“式昭孝义”匾额以褒扬其德行。

陈华斋膝下三子，老大陈泳夔，清末文生，为陈少夔之父，英年早逝；老二陈献周，曾在二十四军任第十混成旅旅长；老三陈拙修，历任二十四军营长、团长、副旅长、二十四军防区蓬溪县县长。

也许是遗传基因所致，出身名门的陈少夔，自幼便聪颖好学，十来岁考入成都存古国学院，颇受院长骆秉骧赏识，骆曾感叹：“少年得此，可造材也。”陈少夔果然出落得风神伟秀，而且文采斐然。同学们誉他“颇有元龙气概，不愧世代簪缨。”毕业后供职于刘文辉开办的川康边训练所，深得所长胡子昂器重，从此平步青云，不久即出任二十四军第十混成旅清乡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继而任二十四军防区邛崃县征收局局长。

古来才子都风流，陈少夔也不例外。在风流本性和官场腐败风气的双重驱动下，他很快就无可挽回地堕落了，抽大

烟，玩女人，贪污受贿，可说是无所不为。有一年，他到成都赶花会，带去银洋八百元，日嫖夜赌，挟妓兜风，结果花会未完，八百元银洋已花得精光，借了三十元路费才回了邛崃。1933年秋，刘文辉在节节败退之际，委陈少夔为后方留守司令。陈少夔不肯给大势已去的刘文辉当陪葬品，便召集二十四军一批溃兵组成一个团，投奔邓锡侯二十八军当团长。但邓锡侯不信任他，“二刘之战”刚结束，就将他遣散。陈少夔只好到处流浪，到培英中学当了一段时间校长，又到川康绥靖公署当了一段时间参军。都不得志，在政界军界处处碰壁，干脆于1937年辞职回乡，子承父业操袍哥，在大邑北部地区开山立堂，当起了“屏华社”社长。1941年，大邑当局组织兵力围剿黄龙山绿林李全武，委陈少夔为军警指挥兼第一区军警治安分会主任、东西乡联防办事处主任，陈借机掌握了大邑东、西部的人事大权，扩展了权势。一些匪首投靠到他麾下，作乡大队长。陈少夔因此在地方上颇具实力，东山再起，于1942年2月5日出任大邑县银行经理，终于实现了“曲线救国”的梦想。

东山再起的陈少夔，以大邑北部地区为其私人领地，在他自己划定的私人领地内恣意妄为，毫无节制。有钱的都要给他上寿，越有钱上寿越多。谁敢不上寿，就会祸从天降。大邑县普陀乡大队长李经裕在大邑县城遇刺（未遂），县警察第一中队张旭东家被抢，银屏乡乡长王变三大白天在子龙庙门前的大路上被“拉肥猪”（四川土话，意为绑票）……所有这些恶性案件，都是陈少夔主谋。家住县城西街的地主李彬相，是陈少夔的姑父，世上哪有姑父向侄子上寿的道理？所以李彬相没有给陈少夔定期纳贡。哪知道陈少夔却记了他一笔，暗中指使兄弟伙将姑母绑架。不巧事情败露，舆论大哗。为了摆脱被动，陈少夔丢卒保帅，把那个执行绑架

任务的兄弟伙当作“真凶”给抛了出来，拉到刑场上枪毙。那个兄弟伙后悔不迭，经过县城十字路口时大喊：“陈团长唉，是你叫我干的噻！‘肥猪’就关在你屋头的嘛，你咋个把我给卖了呢？”听见的人莫不掩口而笑。敦义乡大队长杨瀛洲拉二十四军将领叶大昌母亲“肥猪”，叶到成都告状，四川省政府斥令乡长张及瑭抓捕案犯，张及瑭一片好心叫杨瀛洲到成都避风，打算抓几个走卒交差。不曾想叶大章方面早有防备，暗中派人跟踪杨瀛洲，杨一进成都就落入法网，被逮捕处决。陈少夔却一口咬定是张及瑭要的花招，把张及瑭叫到家里，拍着桌子说：“张及瑭，你把杨瀛洲给我弄死了，敦义乡就没人给我上寿了，我也要把你弄死！”张及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吓得跪地求饶，说：“杨瀛洲死了，我就是团长的杨瀛洲。”陈少夔这才放了他。后来张及瑭果然当起陈少夔的“杨瀛洲”，杨生前怎么给陈少夔纳贡，张及瑭还怎么纳贡。

虽然如此强横，但在开初，陈少夔对刘文彩却不能不礼让三分，从来不敢冒犯。理由很简单。陈少夔家族固然是大邑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家族，但无论是陈少夔本人，还是其家族的其他成员如陈少夔二叔陈献周、三叔陈拙修，当年都曾经是二十四军重要干部，都受过刘文辉栽培，刘氏家族与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主属关系。有这么一层关系，陈少夔开初还不敢目空一切，对刘文辉家族还有所敬畏。1941年冬公益协进社初创，陈少夔曾亲往安仁致贺。陈少夔拉张旭东“肥猪”，刘文彩不知何路豪杰所为，大不高兴，说：“张队长挺落教的，连他都要拉，那还成话！”陈少夔听说了，赶紧吩咐手下：总办有意见，快放人吧。张旭东这才侥幸脱险。

陈少夔与刘文彩反目为仇，并非是因为陈少夔和刘文彩

之间有什么积怨，而完全是外部因素介入所致。

这就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冷融。

冷氏家族与刘文辉同乡。兄弟三人，长为冷曝东，曾任西康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次即冷寅东，曾任川康边防副总指挥及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老三冷融，既与刘文渊结为儿女亲家，也是刘文辉集团核心成员，长期担任刘文辉驻宁代表。兄弟三人分居要职，后人称作"冷氏三杰"。但"三杰"后来都与刘文辉分道扬镳，冷融更是成了反刘急先锋。还在驻宁期间，蒋介石集团就加紧策反冷融，把他当作打进刘文辉权力核心的一个楔子。冷融不负厚望，刚当上西康民政厅厅长，就赤膊上阵——

> 冷融上台以后，首先要出的一招，便是清除"异党势力"，伙同一些和他接近的人，掀起一场"打狗救主"运动，企图借以达到他壮大本身势力的目的。有一次，冷在纪念周上，公然向刘文辉施放冷箭，他大声吼叫："现在无官不商，无商不烟。"并露骨地说："军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现在有的军政人员，既不保国，又不卫民，还要扰民、祸民、毒民。这种军队，留来干啥！"这分明是把矛头指向刘文辉的，因为当时刘文辉在西康财政极端困难下，不得不从烟税上开源。另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许愿提升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团军团长，要刘率部出川。刘认为蒋是借故调虎离山，一出四川，便会变成赤手空拳的光杆，因而以西康是边防重地为托词，拒绝了蒋的调遣。冷的这个讲话，很触了刘的痛处。（《刘文辉史话》第 134－135 页）

冷融所言，并非虚构。"无官不商，无商不烟"；军队

“扰民、祸民、毒民”，这与西康现实确实相去不远。刘文辉对反蒋势力多所结纳，与人为善；对治下小民，却鲜有“仁爱”之心。西康内政，确实乏善可陈。但在刘文辉看来，蒋管区的现实状况与西康的现实状况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遥。冷融不是与刘文辉集团同仇敌忾，对蒋管区的弊政没有一字之责，反而借西康弊政大作文章，矛头直指刘文辉本人和整个西康统治集团，显系别有用心。冷融的高谈阔论，在蒋介石集团是如获至宝，重庆《扫荡报》马上刊载，大肆渲染，刘文辉集团“扰民、祸民、毒民”之说，流播全国。刘文辉简直无地自容，盛怒之下，大骂冷融忘恩负义。而冷融并无收敛。不仅抨击烟毒，而且禁烟雷厉风行。这直接威胁到刘文辉集团的现实利益、根本利益——它将从经济上置刘文辉集团于死地。刘文辉集团忍无可忍。冷融自以为令箭在手，可以无往而不胜，实际上他太书生气了，完全不清楚他所凭借的不过是匹夫之勇，他不过是在扮演堂·吉珂德的角色。

冷融对大邑情况了若指掌。以其高度敏感，很快察觉刘文辉幕后操纵公益协进社的真相。于是一方面在西康和刘文辉斗法，一方面在大邑江湖物色代理人，钳制公益协进社。陈少夔家族是典型的袍哥家族，在大邑江湖长期一枝独秀。在冷融看来，公益协进社的迅猛扩张，势必蚕食陈少夔家族在大邑江湖的固有地盘，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之所以没有转化为现实，无非是因为陈少夔家族势单力薄，不敢鸡蛋碰石头。若有外力扶持，陈少夔家族绝不会坐以待毙。再就个人素质而言，陈少夔文武双全，勇谋兼备，心狠手辣，足以担当大任。冷融在大邑江湖的政治代理人也就非陈少夔莫属了。扶持以陈少夔为首的“北派”，对抗以刘文彩为首的“南派”，就构成冷融钳制公益

协进社的基本战略。

冷融如愿以偿——蒋介石的钦差大臣甘当后台老板，陈少夔家族哪有拒绝之理。于是，公益协进社初创仅一年，即1942年，原鹤山社陈拙修出面，把鹤鸣、龙泉、复兴、普陀、太平等乡镇的二十多个袍哥公口联合起来，组成“鹤山总社”。下属四十个支分社。冷融出任“鹤山总社”名誉社长。以“鹤山总社”和“屏华社”为主体的大邑陈派袍哥，事实上成了冷融“以毒攻毒”、与公益协进社在川西江湖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政治工具。

这一点，亦为《鹤山总社信条》所印证。《鹤山总社信条》开篇即称：思想上以“三民主义”为指南，制度上以“党国法律”为根本；其官方意识形态色彩之浓，是当时袍哥社规中仅见的（庄园档案67宗F5卷）。这就注定了大邑陈派与公益协进社之争，不仅仅是陈少夔、刘文彩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而主要是冷融与刘文辉之争在大邑的延续；更确切地说，是蒋介石集团与刘文辉集团之争在川西江湖的延续。

但冷融的反刘大业只开了个头，“鹤山总社”不足一岁，冷融便“出师未捷身先死”——

1943年春，蒋介石调冷融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冷融由此晋升为蒋介石的嫡门弟子，关系更趋亲密。这年5月，冷融从中央训练团结业回到西康，踌躇满志，“看来夺取西康权力的闹剧，行将揭幕”（《刘文辉史话》第135页）。就连掌握西康财政大权的刘文辉的一位亲戚都向冷暗地输诚，以求易主后保住官位，可见刘文辉的处境是如何的危急了。刘文辉实在怒气难消。5月25日，冷融从成都回大邑，路过温江县城附近公平场时，突遭枪手伏击，当即倒毙。随行的译电员曾世民同时遇难。

冷融命案何人主谋，至今没有水落石出。但无论何人主谋，冷融死于刘文辉集团之手，则没有疑义。这点，当时就有人一语说破。学者夏学斧为冷融送了一副挽联，联云：“憎命有文章，绝代才华李清照；直躬来鬼蜮，千秋疑狱武元衡。”他向冷融夫人解释说：“这事就是西康方面搞的。杰生（冷融名号——引者注）禁烟，断了人家的财路。我把他比作武元衡，其实武元衡并不是什么疑狱，也就是地方武力向中央武力示威”（黄稚荃：《冷融和他遇害的前后——我所了解的事实片断》，原件藏庄园陈列馆）。冷融命案从根本上说，是蒋介石中央政府与刘文辉集团矛盾激化的结果，冷融不过是刘、蒋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冷融毙命地点，距国民党成都行辕仅十来公里，刘文辉集团差不多是在蒋介石的院子里杀掉了冷融，真可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一则是警告蒋介石，不要再挖刘文辉的墙角；再则是警告地方上的亲蒋分子，不要狐假虎威，否则，连自己的老部属、长兄刘文渊的儿女亲家都敢杀，连蒋介石的钦差大臣、嫡门弟子都敢杀，遑论其余！这些潜台词，蒋介石不会读不懂。但蒋介石一筹莫展。虽在形式上责令地方当局缉凶，实际上并无动作。个中秘辛，专司缉凶之责的成都行辕秘书长刘寿朋曾如此解说：“现在正在抗战，要真正缉凶，除非打内战。若抓两个不相干的人来塞责，又有什么意思？”（同前）蒋介石怕把刘文辉逼上梁山，反受其乱，不敢动真格，只能打掉了牙往肚里吞，不了了之。

刘文彩在大邑江湖的幕后劲敌就这样抱恨而终，鹤山总社痛失师尊，一蹶不振。只有陈少夔不甘心，独力支撑屏华社，要和刘文彩决一死战。

刘文彩屡屡得手，陈少夔防不胜防，地盘一天天收缩……

大邑是四川著名的军阀之乡，民国时期，大邑籍国民党军长、副军长多达八人，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多达十八人。另有少将军官十余人。他们在异乡拥兵自重，裂土自封；在家乡也拉帮结派，以拱卫亲族故园。所以，大邑素来群雄并峙，山头林立。民谣云："东门走，刘禹九（东部各乡镇为刘成勋控制）；南方干，找总办（南部各乡镇为刘文彩控制）；向西睡，陈少夔（西部各乡镇为陈少夔控制）；往北走，陈拙修（北部各乡镇为陈拙修控制）；做好官，刘灼先（即刘文渊，时任大邑县参议会议长）；秘书员，杨翰丹（科秘人员多由杨氏引荐）。"就是这种多极状况的写照。1941年公益协进社初创，1942年鹤山总社成立，多极演变为两极。陈派主要把持北部十来个乡镇；刘派主要把持南部十来个乡镇。两派一方面逐鹿江湖，一方面在大邑政坛展开激烈竞争。

逐鹿江湖，主要是争夺势力范围。刘文彩完全没把陈少夔放在眼里，刚刚交锋，就挥师直取大邑县城。刘文彩在县城有个内线，此人便是陈洪范之子陈树德。当年刘文辉恩将仇报，逼得陈洪范走投无路，翩翩儒将竟成一介痴人。刘文彩却能说服陈树德尽释前嫌。双方议定，刘文彩出钱，陈树德出人，在县城组建公益协进社大邑城关支分社。以陈树德为城关支分社舵把子。达成协议后，陈树德回县城到处张贴告示，恭请各界人士参加订于某月某日举行的公益协进社城关支分社成立大会。这等于是公开向陈少夔宣战——大邑县城本来是陈少夔的一统天下，陈派袍哥的大本营；哪能容忍

别的袍哥在这里设码头呢！陈少夔大发雷霆，派人警告陈树德：立即取消组建公益协进社城关支分社的计划，否则后果自负。陈树德不为所动。成立大会布置妥当，揭幕在即，陈少夔派兄弟伙给陈树德送去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颗手榴弹和一副孝联。陈树德这才有点发怵，赶紧去安仁向刘文彩汇报。刘文彩大包大揽，说："怕什么！到时候我派武装保护成立大会。他陈猫毛敢乱来，我杀他个片甲不留！"说到做到，成立大会召开那天，刘文彩果然派安仁乡副乡长王丕昭和公益协进社管事杨茂全，带上驻守刘树成公馆的机枪连，在县城四门架起机枪保护陈树德。城内则由公益协进社各支分社派出的武装分队巡逻，暗中佩带短枪，相机行事。这天，大邑县城人山人海，彩旗飘扬，一派节日景象，实际上却是杀机暗伏。此前气壮如牛的陈少夔，没想到刘文彩会有这么大的动作，只好躲在家里不出门。就这样刘文彩还饶不了他，公益协进社安仁支分社的几个骂家围在陈少夔门前，跳着脚把陈少夔祖宗八代骂了一通。拿刘文彩没办法，陈少夔就拿陈树德出气。一次，陈树德的兄弟伙在僧会寺看戏，陈少夔闻讯，马上派人前往，会同县府侦缉队，突然查验陈树德兄弟伙的持枪证。陈树德一方毫无防备，都没带证，兄弟伙罗志成等便因"无证持枪"遭当场逮捕。陈洪范夫人唐佩贞大怒，要陈少夔给说法。后来由刘成勋居间调停，将陈树德的兄弟伙全部放了出来，总算为陈洪范家族挽回一点面子。

验枪事件，不过是泄愤之举，于大局毫无补益。大本营都保不住，其它地盘更是岌岌可危。公益协进社城关支分社成立不久，刘文彩又在陈少夔的另一个属地黄土桥组建支分社。这次刘文彩未雨绸缪，先发制人，黄土桥支分社成立之前，就函告陈少夔：

屏华贵社陈少夔阁下：

贵境内黄土桥李元华，订于×月×日成立敝社黄土桥分社，欢迎阁下率大队光临，敝社礼而候教。（庄园档案67宗F5卷）

刘文彩既然有备，陈少夔哪敢造次。但他不甘心老是作困兽，便故伎重演，用白纸包了几颗子弹和一副孝联，派人给公益协进社黄土桥支分社舵把子李元华送去。刘文彩估计陈少夔不过是提虚劲，黄土桥支分社成立那天，一条枪也没派去。黄土桥支分社成立大会果然安然无恙。但为防万一，刘文彩还是先给各支分社打了招呼，要他们作好准备，如果黄土桥有事，即刻出动支援。刘文彩屡屡得手，陈少夔防不胜防，地盘一天天收缩。1947年，陈少夔领地大邑灌口场也组建了公益协进社支分社，陈少夔实在看不下去，打算武力干涉。刘文彩得到情报，便在灌口场支分社成立那天，从安仁乡调集了两三百个全副武装的壮丁，由乡长刘钦明和副乡长王丕照带队，前去示威。其它支分社也派了队伍。那天的灌口场遍街是枪，但都是刘文彩的枪——听说刘文彩大动干戈，陈少夔只好把伸出的拳头又收了回去。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陈少夔纵有周瑜之才，奈何"东风不与周郎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大邑头号袍哥家族的没落不可逆转。

在大邑政坛的激烈角逐，陈少夔则小有斩获。

冷融去世后，陈少夔深感孤苦无助，急于寻求新的靠山。1943年，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四川保安第三团团长邹楠移防大邑，陈少夔去拜门，被吸收为青年党党员，奉命在大邑筹建青年党组织。经过苦心筹划，1945年2月，中

国青年党大邑县执行委员会成立，陈少夔自任主席。“发展对象多系社会上有权势的人，以达到把持县事的目的”（《大邑县志》第167页）。陈少夔在政治上终于有所依托。但青年党既不在朝，又不是什么大党，依附青年党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太大发展，必须另有所恃。经人引荐，陈少夔结识了原国民党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家居大邑县城的退职政客魏廷鹤。1945年冬揭幕的四川省参议员换届选举，则为他提供了与魏廷鹤交好的绝妙机会。这次换届选举，大邑分到一个省参议员名额。三人竞选，一个是陈派推举的杨翰丹；一个是刘派推举的退伍师长张成孝；魏廷鹤毛遂自荐，算是独立候选人。由县参议员和职业团体投票。一共37张选票，全县26个乡镇，每个乡镇一位县参议员；11个职业团体各一票。开初，刘派掌握了16票；陈派掌握了15票，魏廷鹤只有6票，这6票还不保险。陈刘两派相持，刘派略占优势。为求稳妥，刘派设法从陈派手中夺票，用黄谷200石把陈派控制的王泗乡参议员杨履初拉了过来，用高压手段胁迫陈派控制的银屏乡参议员陈楚湘倒戈。这样，刘派便由原来的16票增加到18票，陈派折损两票，完全不能和刘派抗衡，魏廷鹤更不在话下。刘派本来是稳操胜券，哪知道风云突变。陈派参议员牟允文，是魏廷鹤的老师，在这次选举中一直为魏廷鹤充当智囊。他见陈派没有取胜希望，便认为机会来了，亲自游说陈少夔：陈派魏派各自为阵，谁都不是刘文彩的对手，肯定一块儿完蛋。但如果联合起来，说不准可以力挽狂澜。陈少夔一想也是，自己这13票，如果还投给杨翰丹，等于白白浪费。倒不如改而投给魏廷鹤，一来可借魏廷鹤击败刘文彩，二来让魏廷鹤当了选，魏肯定要感谢自己的拥戴之恩，自己也就有了过硬的后台。于是依计而行。刘文彩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形势已经起了变化，选举

前一天，他坐着滑竿，带上数百人枪，信心十足地进城观战。却不料魏廷鹤以19票当选，呼声最高的刘派候选人张成孝以一票之差落选。刘文彩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如斯结局，“大惭，急不等会毕，负气归家”（《地主庄园沧桑录》第89页）。

交手多年，陈少夔总算报了刘文彩一箭之仇。

但此番斩获，在陈少夔不过是回光返照。陈少夔原指望魏廷鹤感恩图报，哪料到魏廷鹤会翻脸不认人。陈刘两派谁强谁弱，魏廷鹤心中有数，不敢和陈少夔真心相与而开罪刘派，一旦当选省参议员，便马上抛弃陈少夔，极力和安仁交好。魏廷鹤前妻与王安懋妻子是亲姊妹，而王与刘文彩过从甚密，在大邑无人不知。魏廷鹤就先和前妻复婚，然后以连襟身份，请王安懋出马，向刘文彩说项。连襟所托，王安懋无法推辞，仆仆奔走于刘、魏两家之间，穿针引线。刘文彩这才原谅了魏廷鹤。后来魏竞选立法委员，曾在王安懋陪同下，亲往安仁恳求刘文彩支持，刘文彩老大不情愿，又不好拒绝王安懋，只好让人开了个条子，通知属下各乡镇帮魏廷鹤竞选。但刘文彩还是暗中做了手脚，那个条子按惯例应由他本人盖章，这盖章是有诀窍的——条子上面有暗号，印章必须不偏不倚地盖在暗号上，才算真的有效。刘文彩却故意盖偏，意思是帮不帮魏廷鹤竞选，他刘文彩没表态，属下各乡镇尽可自行把握。王安懋是内行，知道刘文彩的用心，就亲自出面给各乡镇发条子。各乡镇哪能不买王安懋的面子，于是一边倒，魏廷鹤终于顺利当选。魏廷鹤对王安懋还讲点情义，1949年秋，王安懋因地下盟员身份暴露被捕，关在邛崃县监狱，魏廷鹤时在成都，曾多方设法营救王安懋。

魏廷鹤不过是把陈少夔当作一次性用品，用过了就甩到一边。陈少夔出了口恶气，此外便一无所获了，政治上依旧

孤苦伶仃。和刘文彩在大邑政坛上的角逐，也就不能不和江湖上的角逐一样，连遭败绩。

比较典型的是“在乡军官会”之争。

大邑退职军官达六百余人，居全国之首。这些退职军官大多是地方武装的骨干，掌握了这股力量，政治上是如虎添翼。所以，当四川省政府下令各县组建“在乡军官会”时，陈派刘派都想抢占先机。陈少夔不等县府委派，就自己刻了颗“在乡军官会”的大印，在县城找了个门面作办公处，通知各乡镇退职军官前来登记。刘文彩也要组建自己的“在乡军官会”，陈少夔颇为不屑，说：“他凭啥跟我争？他是招牌，我是草鞋（指刘文彩没有行伍履历，他自己则真的扛过枪打过仗）。”

陈少夔确实是抓住了刘文彩的弱点。刘文彩出面组织“在乡军官会”，名不正言不顺，当真争不过职业军人出身的陈少夔。在这种情况下，刘文彩想到了刘文辉的老部下和民盟战友王安懋。王安懋在二十四军当过营长；1945 年，受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负责人张志和派遣，重返大邑，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同盟大邑分部。回大邑后，王安懋与刘文彩互为呼应，配合极为默契，成了大邑政坛上的一对好搭当。正是在刘文彩的大力举荐下，王安懋顺利接掌大邑县民众自卫队，到任不久即应刘派之请，在已设的两个中队之外，组建第三中队，以第三中队的第一、第二分队驻守刘派重镇唐场，以第三分队驻守刘派大本营安仁，所有第三中队之调动、指挥权，全都交给刘元琮和刘文彩。第三中队实际上成了刘派的私人武装。王安懋与刘文彩的关系非同寻常，足以信托。于是，刘文彩不再坚持自己组织“在乡军官会”，改而举荐王安懋出面组织。王安懋是职业军人出身，他出面陈少夔无话可说。王先到县府登记备案，陈少夔则没有履行这

个手续，给了刘派口实。刘文渊便走上前台，以县参议会名义，指责陈少夔"在乡军官会"未经政府批准，宣布取缔。王安懋名正言顺地出任"在乡军官会"筹备主任，实际上是掌握在刘派手中。陈少夔棋输一着，又吃了个哑巴亏。

祸不单行。权力斗争中连遭败绩的同时，陈少夔在经济上也彻底破产，以致完全绝望，从一个侧面加速了陈、刘决斗的爆发。

远在1942年2月5日，处于上升时期的陈少夔就凭借权势，把大邑县银行经理、大邑县公库主任等肥缺抢到了手上。"从此，大邑县银行就成了供他挥霍耗费的经济来源。在任职期间，他擅自挪用银行资金，侵吞承包粮食储运处加工粮谷二万石（折合560万斤），并将新新乡乡长卢承先所承包的新场肉税现款中饱私囊。其广为结交，庇匪纳霸，常常'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昼夜喧嚣，竭尽享乐"（《地主庄园沧桑录》第87－88页）。竟至挪用县银行资金做毒品生意，毒资被人侵吞，银行金库为之一空（《大邑县志》第544页）。县银行系官商合股，千金散尽不复来，陈少夔既无法面对普通股东，更无法向官方交待。

在经济上是输红了眼的赌徒，在官场上是逼急了的猛兽。窘困万端之中，陈少夔铤而走险，一手策划了"蔡洞庭命案"。

郑树三突然闪身进屋，蔡洞庭已被惊醒，翻身坐在床上……

"蔡洞庭命案"缘起于1947年的"国大选举"。

哥老会后期，"袍哥要操亮，必须把官当"的口号广为流行，袍哥已经不满足于驰骋江湖，而是力图操纵地方政

治。1947年“国大选举”，则被他们看作是打进政界的绝好机会。于是空前活跃起来，干预甚至垄断选举，演出了一幕幕明争暗斗的闹剧。

与大邑相邻的新津，也上演了一场这样的闹剧。新津人口在50万以下，根据选举规程，只能产生一个“国大代表”。候选的却有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提名的蓝尧衢，另一个是胡开云。这两人的知名度都不小。蓝尧衢是成都六大公司、三家银行的董事长，四川省参议员；又投靠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张继，财力和背景极其深厚。胡开云当过二十九军旅长、成都警备司令。退职后一直是新津县参议会议长、新津县袍哥总舵把子。蓝尧衢在上层的活动能量很大；但在地方上的活动能量则远不及胡开云。竞选“国大代表”，当然主要是靠地方支持。蓝尧衢因此处于下风。估计到用合法手段很难战胜对手，蓝尧衢便不惜血本，用20两黄金买一个乡镇的选票。这一招果然见效，蓝尧衢立马扭转乾坤，名题金榜，胡开云意外落选。

胡、蓝之争，原本与刘文彩、陈少夔无涉。蔡洞庭的介人，却使胡、蓝之争最终演变为陈、刘之争。

蔡洞庭，字澄波，新津头号文人，少时家贫，曾得胡开云资助。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又蒙胡开云举荐，被刘文彩聘为文彩中学校长。蔡是个重情义的人，为了回报胡开云的知遇之恩，常为胡开云出谋划策。胡开云行伍出身，勇而少谋，在政坛纵横捭阖，也确实需要一个摇羽毛扇的，故而对蔡洞庭非常倚重。胡开云竞选“国大代表”，蔡洞庭即出任胡的竞选秘书。胡落选，蔡洞庭心有不甘，于是多方奔走，查出真相，“极力怂恿胡在成都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快邮代电’，呼蓝为‘曹锟的徒子徒孙’，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上告法院。蓝对蔡私下言和，许以重贿；蔡不但断然拒绝，还

将此事向报界公开，一时舆论哗然”（《袍哥探秘》第197页）。再不制止，难免鸡飞蛋打，蓝尧衢愤而扬言：“有谁能除蔡洞庭，蓝某虽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以巨额赏金征聘杀手。

陈少夔有个亲信，叫范怀德，是大邑县银行副经理兼成都办事处主任，与蓝尧衢的成都“市民银行”经理董某过从甚密。一次闲谈中，董某向范怀德讲了蓝尧衢的心事。陈少夔闻讯大喜。他认为刘文彩疏于防范，不难下手。而且一旦刺杀蔡洞庭得手，既是对刘文彩的沉重打击，经济上更有丰厚回报。真所谓一箭双雕。马上嘱范怀德向董某核实，董表示所言不虚。几经密商，陈少夔终于收押金、签合同，包揽了这笔“生意”。

陈少夔在江湖素以“仗义”著称，养了一批亡命徒为他卖命。崇庆县羊马场乡长带朱耀庭、郑树三、杨子清前来避难，受到盛情款待。这三人胆大心细，机智沉着，又是外地人。陈少夔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他们下手最适合。许诺事成之后重赏。三人早想报效，毅然应命。陈少夔对暗杀行动作了周密布置，要他们先化装成笔墨商，混进文彩中学探听虚实。三人照此行事，把文彩中学的房舍、门径和蔡洞庭容貌摸了个一清二楚。第一次行刺，计划从学校左边的水洞潜入，洞有铁栅，三人在更深夜静时用钢锯锯断了三根，还是无法穿过，只好半途而废，另作他想。

1948年1月14日晚，三人再度出动。当晚从县城赶到安仁镇，午夜两点潜到事先选定的文彩中学一段围墙下面，搭人梯翻上墙头，放下软梯，下得墙来。正逢放假前夕，师生大联欢之后，俱已酣睡，校园一片静寂。杨子清藏在树丛里，把守路口，朱耀庭、郑树三行至蔡洞庭门前，朱取下“校长室”门牌，确信无误，撬开房门，郑树三突然闪身进

屋，蔡洞庭被惊醒，翻身坐在床上，未及呼喊，郑树三上前连开三枪，命中蔡洞庭前胸。朱见郑树三得手，立即用手电向路口扫射寻问，路口的杨子清也以手电回射，表示平安无事。两位凶手立即逃往路口，和杨子清一起越墙而遁。

蔡洞庭卧室三声枪响，校内不少人听到，但都大意了，有的以为是炸鞭，有的以为是打狗。等到蔡洞庭隔壁的文彩中学文书刘厚秋起来小便，才发现蔡洞庭卧室门户洞开，赶紧进去查看，蔡氏倒在血泊中，已经气息全无了。

蔡洞庭命案轰动川西。安仁镇是刘文彩卧榻，文彩中学更是刘文彩心血所系之地，国民党当局都敬畏三分，却有人老虎嘴边拔毛。这是晚年刘文彩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刚得到噩耗，刘文彩如遭雷击，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天蒙蒙亮，他就赶到命案现场，喘着粗气，厉声喝斥刘厚秋：

“你睡死了？连隔壁打枪都不知道！”

刘厚秋无言以对。其他围观者莫不垂手肃立，谁也不敢正眼看刘文彩。

蔡洞庭遇刺次日，陈少夔即派严甫成（成都人）、余月明、刘绍钦（均系大邑人）乘包车前往市民银行报捷，领回四百元一张的“关金券”三大麻袋（每袋容量五十公斤）。陈少夔颇为自得，但他并不清楚，暗杀蔡洞庭，在他不过是饮鸩止渴——刘文彩既蒙受奇耻大辱，岂会善罢甘休！凭借其赫赫权势，遍地耳目，查清命案真相又有何难。而一旦查出命案真相，陈少夔的末日也就到了。事实上，刘文彩确实是以蔡洞庭命案为契机，穷追猛打。有人建议以血还血，刺杀陈少夔，刘文彩一口回绝。他不要陈少夔不明不白地死掉，让陈派有文章可做；而是力图把陈少夔送上公堂，用法律手段置陈少夔于死地；使陈少夔身败名裂；并借此给陈少夔家族以毁灭性打击。于是，刘文彩发动蔡洞庭眷属和文彩

中学师生到处喊冤，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1948年1月16日，成都《新新新闻》刊出《文彩中学蔡校长前夜被暴徒击毙》的要闻，内称此案“与选举有关”。仅隔两日，《新新新闻》又刊出蔡洞庭夫人周芷芬的鸣冤启事，笔锋直指蓝尧衢——

> 缘氏夫蔡洞庭（蔡澄波）早岁毕业于川大及中央训练团，置身教育，与人无争。本年新津大选，因竞争人蓝尧衢大行贿赂，办理人受贿舞弊，因之违法当选。氏夫为爱护桑梓，伸张民权起见，曾依法向四川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案经三讯，因调证未结，不幸氏夫突于本月十五日夜在文彩中学校内，被人枪杀。

同时刊出的《大邑文彩中学全体学生鸣冤启事》，也强调指出：蔡洞庭“平日与人素无仇怨，惟近与乡人蓝尧衢为选举事涉讼，蓝氏数度挽人调和未允”。

拔出萝卜带出泥，揪住了蓝尧衢，也就不难追到陈少夔。但蓝尧衢非寻常之辈——既是国民党几位元老的门生，又是国民党当局钦定的“国大代表”；既有权，又有钱。经他上下打点，很难保证国民党当局会公正审理蔡洞庭命案。刘文彩因此必须大造声势，一方面将蓝尧衢为蔡洞庭命案关键人物的真相公诸于世；一方面运用哀兵战术，由死者眷属和死者学生直接向社会求助，众目睽睽，群情汹汹，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令国民党当局无从推诿。但刘文彩并未指望国民党当局彻查此案，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各路袍哥码头，严密侦察搜索，力求人赃俱获。刘文辉坚决支持，嘱咐他：“不要姑息代价。找出凶手，交给我来处理。”刘文彩派出的几个密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甘孜、

阿坝等藏汉混居地找到朱耀庭等三位刺客。向他们许诺：只要供出主谋，就对他们网开一面。为了活命，三位刺客顾不得哥们义气，将命案真相和盘托出，答应到时出庭作证。大功即将告成，孰料天不作美，1948年3月，因长期吸毒和纵欲，陈少夔亏虚过甚，暴毙家中，时年四十二岁，算是逃过了一劫。刘文彩一片苦心付诸流水，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转而与陈派另一位头面人物、陈少夔叔父陈拙修交涉。为免尴尬，陈拙修决意杀人灭口，将郑树三、杨子清诱至老家陈家场狮子桥暗杀，朱耀庭只身逃脱。1984年有关部门修乡志，派人到羊马场叩访朱耀庭，朱耀庭对当年情景记忆犹新。

陈少夔暴毙，陈拙修的能耐则远不能和陈少夔比拟，无法支撑门面。大邑陈刘两派之争，至此落下帷幕。1948年冬，“鹤山总社”在副总社长胡万选主持下，集体加入公益协进社，胡万选从此青云直上，由刘文彩推举，出任大邑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大邑县志》第51页、219页）。公益协进社吞噬了大邑境内最后一头拦路虎，成了大邑的袍哥托拉斯。

刘文辉的多头政治在激烈角逐中确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刘文彩苦心经营的公益协进社，则是刘文辉多头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刘文辉多极反蒋力量中的一极。

公益协进社称雄川西，予刘文辉以有力臂助。随着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风云的莫测变幻，这种臂助愈来愈醒目。

抗战胜利，可视为蒋介石与西南实力派相互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蒋介石认为外患既除，当务之急则是安内，消

灭割据以实现中央集权。对西南实力派也就不再以安抚羁縻为主要手段，而是“图穷匕首见”。刘文辉的两位盟友因此大栽跟头。

一是刘湘的衣钵传人潘文华。潘对刘湘素来忠心耿耿，颇触蒋忌。但蒋介石入川之初，潘实力在握，为求后方安定，不得不厚给官爵以示笼络。于是潘文华官上加官。及抗战胜利，蒋介石已别无顾忌，立刻将潘文华所辖五师一旅肢解无余。潘文华从此无实力可言。“刘邓潘三角同盟”折损一角。

再就是“云南王”龙云。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龙云下手。先将龙云所部六个师全部调入越南受降，然后乘龙云后防空虚之际，急令中央军围攻云南省府五华山，迫使龙云交权。川康滇三省同盟，至此已折损一省。

蒋介石“削藩”大见成效。整个西南实力派，实际上只剩下刘文辉、邓锡侯两员干将，刘文辉“多头政治”在上层遭受强力遏制。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对刘文辉不时旁敲侧击。解决龙云的前一天，蒋介石悄悄来到西昌，蒋介石此行，一来是便于就近指挥昆明军事解决龙云，二来是怕刘文辉声援龙云，就近监视。他还特意给刘文辉发去一封电报，说什么“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羡”。实则是警告刘文辉：“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 13 页）。以后蒋介石对刘文辉确实有所动作。1946 年春，蒋介石托人转告刘文辉，要他作好准备，到中央当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明白这是调虎离山，也托人转告蒋介石：“把军队和地盘交出来，自乾很愿意。但他说他在军政界任职多年，毫无成就，不特灰心，而且惭愧，他决定回家当老百姓，不愿到中央去做官。”刘文辉态度坚决，此计未能得售（《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第

203 页）。稍后，旨在胁迫刘文辉交权的荥经暴乱风起云涌，幸为刘文辉迅速平定。1949 年 7 月，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王陵基、曾扩情仍密谋倒刘，得到陈诚大力支持。当曾扩情到台湾向陈诚征求意见时，陈诚强调指出：

如果不把刘文辉去掉，不仅川康两省协同反共无望，而且还难保他在紧要关头不变生肘腋。你回去后，可会同王陵基发动反刘运动，免留后患。将来即由你继任西康省主席。这一定能获得领袖的许可，惟仍须向领袖当面请示，以昭郑重。（《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第 255 页）

陈诚对刘文辉的判断，不可谓不精当。刘文辉应予解决，这在蒋介石集团早是共识。但刘文辉毕竟不同于龙云和潘文华，解决刘文辉，未见得就是一桩赚钱的买卖。蒋介石深感棘手。一方面忍无可忍，欲罢不能。一方面，必须瞻前顾后，下不了最后决心。调刘文辉到中央，在蒋介石来说不是非如此不可，而是留有退路，一旦刘文辉拒绝，也就不了了之。荥经暴乱，蒋介石并未明火执仗，而是假手当地袍匪。蒋介石不敢像解决龙云那样，断然处置刘文辉；迂回曲折，力图摸索出解决刘文辉的最佳方案，最终是一无所获。1949 年 7 月，曾扩情奉陈诚之命，到广州谒蒋，请求批准解决刘文辉。他们原以为此项动议深得蒋心，因而信心十足。却不料竟被蒋介石回绝。曾扩情不肯罢休，一个月后再次提出计划，又为蒋介石所阻。关键时刻，蒋介石突然变计，有论者如此分析：

蒋之不愿对刘文辉下手，可能张群从中有所关照，

但这属次要；主要原因是蒋怕解决刘文辉，会影响西南局势的稳定，于他在四川建立反共基地带来不利，决非有所爱惜于刘文辉也。（同前）

虽然川康滇三省同盟、刘邓潘三角同盟，已因龙云、潘文华的失势而残缺不全，刘文辉在西南地区的盟友仅邓锡侯一人而已；虽然刘文辉的自身实力对蒋介石来说似也不足为虑。刘文辉却竟然仍可影响西南局势的稳定，于蒋介石在四川建立反共基地带来不利。换句话说，对蒋介石仍具威慑性，令蒋介石不能不忍辱负重，自敛锋芒。其中奥妙，则在于刘文辉对四川政局强大的渗透力。其实，西康不过是刘文辉的寄居之地，从1938年白日政潮起，刘文辉的经营重心始终是四川。早期主要是通过刘邓潘三角同盟遥控四川；刘邓潘三角同盟被蒋介石拆散之后，刘文辉另辟蹊径，打通两大管道渗透四川政局：

一是经由邓汉祥，渗透四川行政系统。邓汉祥是刘湘头号军师，刘湘生前，"省府事务悉交邓主持"；"大抵政治上的问题，靡不由邓汉祥独立应付"（《刘湘》第303、170页）。刘湘出川抗战，更由邓代理省政府主席。潘文华是刘湘军事上的继承人，邓汉祥则是刘湘行政上的继承人，门生故旧遍布各厅局机关。1947年复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四川行政系统尽在掌握之中。邓一贯绝对忠实于地方实力派，刘湘在世时惟刘湘之马首是瞻，刘湘去世后，刘文辉成为川康实力派的当然领袖，邓汉祥便惟刘文辉之马首是瞻，刘文辉因而可借助邓汉祥，操纵四川行政系统。

二是四川省参议会。省参议会的民社党、青年党参议员早就被刘文辉收买，"一旦有事足可信托"。参议长向传义"不仅立场偏于地方，更与川康实力派关系密切，故刘文

辉、邓锡侯及熊克武等人常可于幕后加以策使，对蒋介石在四川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榨取，制造了不少障碍”（《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第259页）。副议长何宗杰则是因刘文辉大力推戴而当选的。四川省参议会事实上成了川康实力派的政治堡垒，成了刘文辉的政治工具。

这样，无论是四川的行政系统，还是四川的“民意”机关，都为刘文辉所用。刘文辉依旧长袖善舞，依旧是四川政坛最关键的幕后人物。

不过，这些还不是刘文辉在四川的全部政治潜力。合法管道而外，还有一个非法管道，即袍哥。刘文辉弟男子侄都操袍哥，最成功的则是刘文彩。也只有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处于“西南反共基地”的心脏地带——川西，从而对蒋介石构成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就消极的而言，刘文辉固然可以运用合法手段对付蒋介石；就积极而言，一旦蒋介石真要断然处置刘文辉，则不仅合法的地方力量会群起抵制，遍布川西三十余县、对成都形成包围态势的公益协进社，大多数会众也会由袍而匪，把蒋介石在川西农村的坛坛罐罐砸得稀巴烂。

借助合法管道，刘文辉可操纵四川政坛；借助非法管道，刘文辉可遥控川西江湖。其在四川的政治潜力由此扩张到极致。刘文辉集团有如深海冰山，二十四军和西康地盘是露出水面的部分，铲除这些部分在蒋介石是易如反掌；但刘文辉集团在川康尤其是四川深厚而强劲的政治潜力，则是隐藏于水下的坚冰，不可测度，令蒋介石望而生畏。蒋介石讲过：“四川是抗战胜利的发源地，中央很重视，有了四川就有办法。”张群也强调：“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又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不能丢”（《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第266页）。刘文辉是四川政坛最关键的幕后人

物，欲安四川，不能不先安刘文辉。对刘文辉虽然忍无可忍，最终还是一忍再忍。刘文辉的多头政治在激烈角逐中确实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刘文彩苦心经营的公益协进社，则是刘文辉多头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刘文辉多极反蒋力量中的一极。

公益协进社的臂助，刘文辉至死不忘。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中，对此埋有伏笔。他详尽陈述了反对征粮、反对大巴山设防等史实，然后指出：

> 我同邓、潘搞上面这些活动，是直接反王，间接反蒋。归根结柢，还在于争取地方力量，不仅要争取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听我们使唤，而且要争取地方上的实力分子基本上跟着我们走。我们认为，只要有了这个本钱，就可以威胁蒋介石，使之不敢吃我们。我们的事情远没有做成功，但已使蒋介石意识到，“恶龙难斗地头蛇”，惟恐地方出乱子，不好对付。所以我们长期耽在王陵基暴力控制下的成都进行反蒋斗争，而蒋始终不敢向我们下手，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和地方上的实力分子，用什么手段去争取、用什么形式去包容、运用，刘文辉没有交待。这里，刘文辉欲说还休的其实就包括了公益协进社，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用以争取、整合川西地方力量的政治工具。对蒋介石集团起着威慑作用，对刘文辉起着掩护作用，这就是公益协进社的历史地位之所在。



文彩中學第一屆同學畢業

業精於勤

劉元瑄題

第十三章

暮年兴学及其是是非非

1. 文彩中学图书馆
2. 刘文彩的儿子刘元瑄为文彩中学首届毕业生题辞
3. 1995 年文彩中学 50 年校庆开放的纪念亭
4. 刘文彩捐给文彩中学的德国钢琴





物质上的富有无论如何都无法遮掩文化上的赤贫，这在刘文彩是一大隐痛……

半月池边安仁旧县，
叹当年文物杳若云烟。
谁咏菁莪培俊彦，
仗星公挽颓澜
学府宏开春风普馨。
愿同人努力钻研，
灯火三更莫贪安晏。
男踪班超女木兰，
烈烈轰轰扬弘业，
重光禹甸勉旃。

这是当年文彩中学的校歌，歌中的“星公”即为刘文彩。

创建文彩中学，是晚年刘文彩所有公益活动中最得意的一笔。

晚年刘文彩济困扶危，有两个用意，一是重塑自我形象，二是聚合人心。暮年兴学也不例外。但仅此还不足以概括刘文彩暮年兴学的全部思想渊源。刘文彩幼年失学，扁担大的字识不了几箩筐；所以，虽然是家财万贯，权势显赫，但在大雅之堂，仍然免不了尴尬。1932 年 1 月 15 日，刘文彩就任叙南清乡司令，当着睽睽众目闹了个笑话。那天他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谈到清乡如何“任重道远”时，信口开河说：“现在国难当前，我们记得论语上说的，齐家，治

国，平天下，这句话的意思，简直是由小及大，我们这清乡的责任，可以说是治国的根本，这责任是多么的重大……”只要是读了几年私塾，就会知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大学》，堂堂“中将司令”刘文彩，却把这句话栽到《论语》头上。记者们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有意让刘文彩出丑，把刘文彩的演讲一字不易地登在当月26日的《川报》上。“文彩无文”之讥，便从此悄悄流传开了。刘文彩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有此一遭，后来再怎样风光，都不登台演讲了。物质上的富有无论如何无法掩饰文化上的赤贫，这在刘文彩是一大隐痛。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孩子身上，想把孩子培养成才。在叙府做官时，他请了三四个老师教家塾，又请一个姓张的老师去上海买了许多图书，包括全套《万有文库》和《四部丛刊》，还有不少大专读物以及全套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这个张老师因此发了一笔不小的回扣财，可也带回了一身花柳病，不久即遭解聘。老师们为这些图书和教学器材分类就足足忙了几个月。刚忙完，“二刘大战”就爆发了，刘文彩不得不从叙府撤退。撤退前特制了一批大木箱，就是后人说刘文彩用来装金银财宝的那批箱子，把图书和教学仪器全部装箱运回老家安仁，堆了整整三间房。可惜孩子们对那些藏书并没有太大兴趣，倒是对理化仪器和动植物标本非常好奇，偷偷拿出来当玩具玩，结果当然是全都糟蹋了。在老家安定下来之后，刘文彩把几个儿子送到成都上学，自己每年去成都一两次，每次住两到三天。去一次他就要给孩子们训一次话，教导他们用功读书，说自己年轻时家里困难，读不起，推车、担粪、下田、赶脚，什么苦活累活都干。现在你们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好好读书，对得起父母吗？可一片望子成龙的苦心，终究付诸流水——刘文彩几个儿子没一个在学业上有出息，刘文彩后来也不得不完全放

弃，精神上的强烈自卑因此始终不能消除。

正是出于精神上的强烈自卑，对文化教育，刘文彩常存敬畏之心。在刘氏兄弟中，刘文彩最佩服大哥刘文渊和弟弟刘文辉，不仅是因为他们地位最高，也是因为他们学问最高。在社会上，最受刘文彩推崇的也是饱学之士。驻叙期间刘文彩最推崇的是举人杨惠泉——“说服二老婆杨氏，从保险柜取出银圆五千块；为了不伤害杨惠泉的‘清高’，用‘上会’的名义送给他。后来，又赐给他商会文牍、伪十八团顾问一类拿钱不干事的闲职。”虽然杨惠泉最终让他大失所望，但他对饱学之士的热情却并未稍减。退居安仁后，一向傲岸狂放的清末秀才安湘霖，常常受到刘文彩叩访，安湘霖终于为刘文彩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两人结为知交。到了晚年，刘文彩对文化教育热情更高，结交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莫不待若上宾。所以，刘文彩暮年兴学，既可解释为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也不能否认出自真情诚心。

其次，尊师重教素称刘氏家风。30年代初，刘文辉在成都创办“建国中学”，自兼董事长；刘湘病故后，当局遵从遗族之意，在“甫澄纪念公园”侧近创办“甫澄中学”。这两所中学在当年很有名气。刘文彩曾对安湘霖讲：“公赞太翁在日，于振兴文学，常垂训焉；兄升廷先生亦殷殷以是相举。”刘文彩素来争强好胜，其弟其侄，于教育事业均有建树，他又岂甘人下！

也就因此，文彩中学虽是刘氏家族名下的最后一所私人中学，但却是最好的、最知名的一所私人中学。

“自是役经始，公无日不亲临监视；严冬立雪，手脚皲皴；盛夏量材，汗常浃背。逮目堵皆兴，不知耗几许心血矣！”

最早拟办文彩中学，是在1941年。当时情景，《地主庄园沧桑录》曾有刻划：

初秋的一个夜晚，在刘文彩老公馆的西式客厅内，高悬的汽灯射出灿灿的光亮，十二颗人头碰在一起，正在决策一个新的方案。

这是一次极平常的会议。在刘文彩的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集会。每逢建房、迁地等所谓大事，他都要召集乡绅、“谋士”商议。

只见白白胖胖的刘文彩穿着黑色长袍，端坐在高高的居中的座椅上，审视地看了看周围的人。他的右上方坐着安仁乡乡长刘绍武，右边坐着年轻的绅士安雨晴。今晚他们商讨的主题是要在安仁街上建筑“文彩中学”的事。建立学校的发起人共有二十位，其中的一部分现时就坐在刘文彩身边。

“时下全国都在时兴办学。我们安仁的李吉仁（应为李吉人——引者注）办了个小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又受到许多人称赞，更培养了他的自家人，学校校长全由他家包了。如果总办能在安仁办个中学，将来一定会出更多的人才……”。率先发言的是安雨晴。此刻，在明亮的灯光下，他显得慷慨激昂，朝气蓬勃。

讨论异常激烈，建学校的主张和门路一个接一个地亮出来，包括建筑样式和规模大小也提了许多种方案。经过反复选择和比较，刘文彩……暗下了决心：就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于是，他总结性地对大家说：“干！拼着2000亩地不算事，等于我给他们四弟兄（指刘文彩的四个儿子）每人少买500亩地，办个学校也有些望头。”

据知情人回忆，刘文彩创办文彩中学的决策，确实是他在一次幕僚会议上作出的。但开会地点不是老公馆的“西式客厅”，因为老公馆本无客厅之设，当然更谈不上所谓“西式客厅”了。现在所谓“西式客厅”，不过是后人杜撰。刘文彩与部属议事，一般不在家里，镇上花园落成之前，大多在同庆茶楼议事；花园落成之后，则改在花园议事。远客才带到老公馆账房，和刘文彩会谈。除了这些细节失实，上段描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刘文彩是个急性子，说刮风就下雨，随即选址、征地。安仁镇南面街口是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姓的屋基、坟园，刘文彩把校址定在这里。为了鼓励农民搬迁，他制定了一套优惠“政策”：用自己的两亩地换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换规划区的一间屋。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应换地二十亩。但当时刘文彩手中的地契，最少的一张都是四十亩。如果到县府地政部门把地契换零，既要托人，又费时日。刘文彩耐不得这个烦，干脆把四十亩地全部拱手相送。陈启贤意外发了笔“横财”，让不少人眼热，谁也没料到陈启贤会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四十亩地，建国初陈启贤被打成了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和一个少年发生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朝陈泽章拦腰砍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现在年过半百，身高不过1.40米。陈启贤本人则因“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时身陷囹圄。妻子怕受牵连，带上小女儿挥泪改嫁。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征地颇费了些周折，但最让刘文彩头痛的还是技术人才的极度匮乏——刘文彩手下没一个懂建筑工程设计的。真是天公作美，就在犯难之际，国民政府下令在崇庆县修建战备

机场，一个专家小组进驻安仁镇，待命修筑机场专用公路。后来机场改址为邛崃县桑园镇，机场专用公路必须重新设计，暂时不能上马。专家们闲来无事，就备齐礼品到老公馆拜会刘文彩。一来是想见识见识这位传奇人物；二来是因为出门在外，必须和驻在地的头面人物搞好关系，才能彼此相安。专家们主动造访，在刘文彩真是蓬筚生辉。于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当即设宴接风，主宾相聚甚欢。从那天起，专家小组在安仁便处处绿灯，备受照拂。专家们感激不尽，听说刘文彩正在筹建文彩中学，就自发设计了文彩中学建筑草图。刘文彩乐得眉开眼笑，拿到草图就派人去崇庆，请来三十多名高级厨师，在老公馆为专家小组举办盛大酒筵，向他们一一折躬致谢。

文彩中学终于开工了。但技术人才问题实际上仍然悬而未决——专家小组不过是匆匆过客，靠他们只能应付一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果然，时隔不久，专家小组便奉命移住邛崃。文彩中学眼看只好停工，刘文彩心急如焚，就向机场工程处求援，希望工程处从即将调离的专家小组中，给安仁留驻几个技术顾问。工程处满口答应，但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拿出相当于建校总投资的十分之一的资金，酬谢工程处。刘文彩认为这是趁人之危，当场回绝，会谈不欢而散。消息传到专家小组，大家都很同情刘文彩的处境，两位川籍专家——一个是遂宁的张先仕，一个是彭山的彭鼎鸣——自告奋勇，辞去"铁饭碗"，留下来负责文彩中学的技术保障。刘文彩这才如释重负。投桃报李，便在文彩中学落成后，通过刘文辉给两位专家批了一项筑路工程，两位专家的腰包从此鼓了起来。

刘文彩对建筑完全外行。按常规，他出了钱，挂了名，就足够了。建校的繁杂事务，尽可委诸他人全权处理。但刘

文彩不肯这样做，非要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时任大邑县教育科科长的张绪英1995年在其广汉师范学校寓所中告诉来宾："刘文彩修学校很热心，自己出来监工。"《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也称：

自是役经始，公无日不亲临监视；严冬立雪，手脚皲皴；盛夏量材，汗常浃背。逮目堵皆兴，不知耗几许心血矣！

从1941年秋到1944年12月，整整三年光阴，刘文彩几乎天天在工地上，几乎天天为建校奔波。这时他已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王玉清回忆，"修了一段时间，钱也比较紧张，刘文彩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刘文辉做了几转鸦片生意，又做了一转谷子生意，才修完的。"刘文彩还把杨仲华名下的田租房租抽走一半，补贴建校经费。尽管资金短缺，刘文彩仍然不减一砖一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修礼堂时他主张尽量修大些"（张绪英语），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高大恢弘，模式取样于四川华西大学礼堂。礼堂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用钢材焊接。刘文彩为此从成都请来了技术好的工人，买来了质量好的钢材。这座礼堂不仅至今完好，而且仍然气派不凡"（《地主庄园沧桑录》第77页）。

1944年底，文彩中学落成。五十一年之后出版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中学校友通讯录》对其风貌作了如下铺陈：

忆往昔，我们的校园，令人心驰神往。不但校址宏广、堂舍轩敞、设施齐备，而且环境优美、学风纯正、

> 图书丰富，堪称本地一流学府。确是一所造就人才的好地方。因此，很值得我们留恋和怀念。且看那古朴典雅的钟楼，雄踞门洞，巍然屹立；……宽敞的饭堂，八仙桌相距排立，俨然如几何图案；崇丽且宏大跨度的礼堂，仿佛还余音绕梁；堂侧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座落在花圃丛中，令人心旷神怡……两翼各三间划一的教室，窗静几明，温馨宜人；广阔平坦的操场，可容万人集会。周边围墙内栽种的各种树木，形成绿色屏障，仿佛与世隔绝，令学子专心致志……；操场右侧，过数扇门洞，便是绿荫覆盖、流水环绕、单门独户的教员院，其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幽静别致……

该校高61级王肇泉，1995年2月也在《雪泥鸿爪——安仁中学师生诗词、散文选》载文回忆：

> 我还在五龙小学上三年级的时候，校长李学仁即带我们去安仁作徒步旅游。中午在安仁中学吃饭，饭堂之宽广，已令我惊讶，再目睹礼堂之高大，中无支柱，上不见横梁，更觉神妙；而路径之幽曲，竟使你不敢乱走，恐迷而不出。从此，即心向往焉，如高山之仰止。

笔者生于学校，长于学校，迄今仍忝居大学教员之位，名校游历多矣。但到文彩中学（即今安仁中学）参观，仍惊叹其气度之宏大，环境之清秀。就笔者所知，可以比肩的中学，乡镇姑且不论，即便大城市也不多见。据说刘文彩的生活非常奢靡，但无论是老公馆，还是送给刘文辉的新公馆，其占地面积、配套设施，较之文彩中学，都是小巫见大巫。

大邑县有关人士告知笔者，今天创办一所与文彩中学同样水准的学校，倾大邑县全年财政收入，也未见得有多少宽裕。

这也难怪。文彩中学乃刘文彩后半生心血所系，关怀，呵护，无微不至，又怎能不美仑美奂呢！

文彩中学横空出世，给刘文彩带来无边的欢乐和辉煌。在刘文彩眼里，文彩中学因此更加伟岸，它的利益高于一切……

1945 年初，“江源旧邑，安仁今镇，宏开学府”。文彩中学“像磁石般地吸引着许多求学之士，包括一批已辍学和停学的清寒学子争相赴试”。第一期招生三百余人，统统免费入学（《雪泥鸿爪》第 4 页）。首任校长高树元、首任教务长吴德让。该校高男二班学生荀远章回忆说：

> 吴校长（吴德让为文彩中学第二任校长——引者注）是蓉城教育界名流，主张办好学校应备三个基本条件，即：进校学生的基础要相对好一些；师资水平相对高一些；学校设施要相对完善一些。他在办学实践中，基本按此思路操作。每届招生（当时为春秋季始业）除校本部设考场外，另在几处设考场，如曾先后在成都、邛崃、眉山等地设过考场。这样做，旨在扩大生源，多录取成绩优秀者入学。聘用师资里，尽可能多聘一些蓉城的知名教师，当时的文百川、舒晓沧、卿汝修、赵符湘、解子宜、张杏云、熊务民一大批教学经验丰富而事业心又强的教师，均受聘任教。购置教学设备时，力求尽可能完善一些。多方设法充实理化实验仪器，使之能

作分组实验。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文化医疗设施，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等。采取以上措施后，很快就形成了“校内秩序井然、读书风气浓厚、师长苦心教诲、同窗互帮互学”的好风尚。（《雪泥鸿爪》第40－41页）

无论是师资，还是仪器，文彩中学莫不追求一流。高男一班毕业生彭学鑫告知笔者，文彩中学的王牌老师除以上列举的文百川、舒晓沧、卿汝修、赵符湘、解子宜、张杏云、熊务民外，还所在多有；“文彩中学的关键老师，都是成都甚至四川很有名气的，教数、理、化、英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真正学到了东西。”如吴世谦，“他是华侨，专教英语，棒极了”。文彩中学名师如云，真是当地学子的福气。这些方面，普通中学无论官办还是私立，完全不能望其项背。如今只有少数“贵族学校”才会这样高投入。但如今的“贵族学校”，没有哪所不收取巨额学费。文彩中学则几乎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第一批学生全部免费，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也不过六斗米（《地主庄园沧桑录》第82页）。文彩中学能有如此光彩，吴德让与有功焉，但吴德让毕竟只是聘用人员，至多充当智囊和执行者，投资者和决策者仅刘文彩一人而已。

刘文彩对文彩中学老师优礼有加，这在安仁是有口皆碑的。张绪英1995年回忆说：“刘文彩要找好老师，我推荐文百川。学校出高薪聘请。”文彩中学老师的收入，是普通中学老师的双倍。文百川、舒晓沧等王牌老师，其薪金更在原收入的两倍以上。所有老师住的都是独门独院，像校友通讯录描写的那样，独院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幽静别致……”。老师回家探亲，都有

专车接送。他在成都湖广街的一套独院，也成了不挂牌的“文彩中学驻蓉办事处”，文彩中学老师因事赴蓉，都在这里食宿，而不必掏自己的腰包。最初两年，每逢星期天，刘文彩都要以文彩中学董事会名义，设宴款待全体老师，也邀请一些袍哥大爷参加。袍哥大爷都是粗率之人，席间猜酒划拳，往往闹得乌烟瘴气，文彩中学老师很难和他们相处，时间长了就兴味索然，赴宴的越来越少，刘文彩没法勉强，只好取消了这个程序。

岂止是老师，文彩中学学生也备受刘文彩关照。不仅收费低廉，刘文彩还特设一项“清寒补助金”，安仁士绅分别出资，定向资助一批贫寒子弟，保证他们不致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影响学业。抗战胜利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算作“战利品”。刘文彩马上要来一辆，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免其长途跋涉之苦。

有一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安仁一些老先生现在还能娓娓道来。

文彩中学某女生，上学时路过怀远乡，与怀远乡乡长的一个狗腿子狭路相逢。这狗腿子素来色胆包天，见女孩只身一人，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尾随追赶，调笑猥亵。女孩不堪其辱，一边夺路狂奔，一边呼救。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女孩才侥幸脱险。刘文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大怒，马上吩咐手下，到怀远乡把那个“二杆子”抓起来，一顿棍棒打了个半死。

这则美谈在大邑广为流传，四乡流氓无不闻之变色。那时的大邑遍地兵匪，恶性案件时有所闻。文彩中学却如世外桃源，除了蔡洞庭遇刺，从无变故。后来刘文彩更指令全校学生，外出一律佩带校徽。校徽成了护身符，学生外出，极受社会尊重，彭学鑫回忆，“没有一个被地痞流氓侮辱的，

甚至连学生家庭也跟着沾了光”。

1945年3月，料峭春寒中，文彩中学开学典礼隆重举行。鼓乐齐鸣，彩旗猎猎，安仁镇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庆典主席台上，端坐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达官名流。台下三百多名学生服饰整齐，精神抖擞。校内外戒备森严，每隔十步就有一名士兵持枪守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中山之子孙科，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负责人黄季陆，二十四军军长、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均送来贺辞、贺匾。中国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老先生非常佩服刘文彩的兴学义举，亲自赶到安仁出席庆典。他饱蘸激情，为文彩中学礼堂题写了八幅大字对联，字字千钧，弥足珍贵，可惜在文革中全部化为灰烬。老先生还题写了门牌——“私立文彩中学”。在主席台上，老先生对着铁皮话筒喊：“今天这里是文彩中学，明天这里就是文彩大学了！”这并非是他一厢情愿，而是刘文彩的创意。对刘文彩的这个创意，商老先生当然连声叫好。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也发表了演讲。他说：

> 现时四川省有学校六百三十多座，但那些学校都是用旧学校扩建或古庙改建的，真正属于私人集资兴建的学校，纵观规模和形式，“文彩中学”当数全川第一。（《地主庄园沧桑录》第78页）

作为四川省教育行政主管，郭有守的评断颇具权威性。若由此推论，当然也可以说，刘文彩是四川民间兴学第一人。

庆典蔚为壮观。其间，刘文彩在首任校长高树元的陪同下，检阅了学生方队。他身着长衫，满脸谦恭，步履沉着而

舒缓。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三亿五千多万元法币的家产，统统交付了兴学之梦。如今美梦终于成真，他的心中，应该是感触万端吧。

文彩中学横空出世，给刘文彩带来无边的欢乐和辉煌。在刘文彩眼里，文彩中学因此更加伟岸，它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刘氏家族！

文彩中学校产三亿五千多万元法币，这是按1945年的物价指数计算的。套用当时的黑市汇率，应折合美金两百万以上。偌大一座金山，不免令人垂涎。刘文彩固然是慷慨解囊，不可能食言自肥，但校产毕竟出自刘文彩名下，在他百年之后，假若后裔执意收回校产，谁又有理由阻止呢？当时就有人向刘文彩提了个醒，刘文彩一听有理，随即口授训示，声明刘氏家族对校产只有监督权，没有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也就是说，从文彩中学注册之日起，全部校产与刘氏家族就不再有干系了。这样做他还放心不下，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将石碑安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使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刘文彩不敢把学校当作私产，而是看作殿堂。面对这座神秘而神圣的知识殿堂，半文盲刘文彩自惭形秽；所以，建校的三年中他几乎天天去工地，事必躬亲。开学后却很少到学校视察，更没有把师生召集起来指手划脚。他只负责学校的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具体校务，尤其是教学业务，刘文彩从不横加干涉，都由学校自主。他不过是充当文彩中学的守护者。

作为守护者，刘文彩是称职的。1947年夏，安仁发大水，全镇被淹，升平街和仁和街水深齐腰。其中一股水从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寝室、教室积水一尺多深。吸取这个教训，退水后，刘文彩调集人马，把整个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

三尺。从前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将来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倒是可以保全，仁和街却因为地势过低，更容易变成泽国，居民怨声载道。其实，刘文彩并没有占什么便宜——仁和街系刘文彩独资兴建，他在这条街上有不少店铺。将来发大水，一旦仁和街进水，损失最大的还是刘文彩自己。但为了文彩中学，刘文彩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为解决文彩中学的用电问题，刘文彩更是屡败屡战。第一次是在1945年，选址安仁镇场尾老刘水碾处，装机容量7千瓦；第二次选址安仁廖河坝乌鱼凼处，装机容量28千瓦；第三次选址新刘水碾处，装机容量20千瓦。这三处电厂因水源变化和水利纠纷，均拆除。1947年，刘文彩第四次建电厂，选址安仁李油榨碾处，装机容量28千瓦，定名“星明水电厂”。文彩中学从此电力充裕，剩余电力供应刘公馆和安仁镇。此前十多年，刘公馆平常和普通农民一样用菜油灯照明，来客多用煤气灯，这时才沾文彩中学的光用上了电灯。

作为守护者，刘文彩更看重知识殿堂的崇高和圣洁，不容任何人玷污。文彩中学虽然男女兼收，刘文彩却绞尽脑汁，在男女之间层层设防。他规定：应聘教师的年纪必须在中年以上，因为青年往往情难自禁，闹出一些有伤学校声誉的浪漫奇闻。学生宿舍分男生部和女生部，中间用又高又厚的砖墙隔开。女生部只一门可进，门头大书：“男生非经许可，不得擅入此门。”该校高男二班学生、著名书画家赵光涛回忆：

过去高二班的男女同学，分别在男女生院开班。……三年同班同学，彼此不知何许人也，至今一个女同学的名字也记不得，一张清楚的容颜也泛不上脑际。当年要

留下几位幺妹同学的花容，也够回忆几十年的。（《雪泥鸿爪》第42页）

这样严厉的防范当然过于极端。但从这种极端不难看出，刘文彩是多么急切地维护着文彩中学的纯净。正因为如此，当两位颇得刘文彩赏识的文彩中学元老感情征服理智而闯入雷池后，刘文彩不惜“挥泪斩马谡”，将他们相继辞退。

四川省三百多位人士，曾集资立碑，褒扬刘文彩的兴学之功。碑文由安湘霖所撰，词云：

刘（公）文彩，字星廷，慷慨好义根于性，生笃交游重然诺，能急人急，有燕赵豪侠风。前任川南税捐局总办暨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信赏必罚，恩威并行，人以是爱而畏之。解职归田，恭己下人，若忘其曾为达官也者。乡居喜排纷难，倘有构衅，经年法庭不能判决者，得公片语立释，地方讼事赖以消化殆尽。盖诚信所孚，非偶然也。至遇公益事，辄倾囊为之，故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而尤以培植人才为急务。余与公夙好，故知之稔。甲申冬十二月既望，公创立文彩中学，成各乡绅耆德公，相与醵金助石，嘱余为文记之。余曰：兴学盛世也，匪值为乡国计关焉，是乌可以不记。且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人才者立国基础也。人才之盛衰，一国安危系焉。泰西列强崛起而争国霸业者，人才盛也。改革以还，政府顾虑及是，急起而经营之。学界前途乃渐有日新月异之象。顾吾邑僻处偏隅，推进略后，中学尚寥寥焉。在恒人狃于肉食者谋之，之见漠不关心，而公独病之，慨然出其私储，谋建男女两级中学，

以求文化之发展，眼孔胸襟盖过人远矣。惟以工程之巨，非一蹴可骤，几亦非一二人之力，能兼策用，集士绅组织董事会，以期众擎易举，既度地于安市东南亢爽之区，购田百亩作校址。民国三十年秋田事毕，纠工攘剔，凸者划之，凹者培之。基平，适有工程师张（君）先仕，彭（君）鼎鸣感公义举，愿为设计、绘图。既揽良工坌集，分奏厥技，阅三寒暑乃告竣。校中图书、标本、仪器，一切应用各物，亦相继购制完成。计始末共耗法币巨万，复捐私产一千亩，为常年费。由县府呈请教育部立案。自是役经始，公无日不亲临监视；严冬立雪，手脚皲皴；盛夏量材，汗常浃背。逮目堵皆兴，不知耗几许心血矣！校成，余就参观。见体育场恢闳，礼堂之广爽，办公延客及诸讲习、食寝诸室，至于庖厨、厕所，罗列秩然，毫无贻憾。若夫，规模之大，基金之裕，则固吾蜀所仅见也。嗟夫！以公父母心肠，培育他人子女，至牺牲精神、财产而不惜，彼自私自利徒为儿女作马牛者，以视我公，能无汗颜乎？吾乡尚无学校，误尽青年，自附近乡镇各小学兴而文盲渐化，第毕业后升学，必就他方。寒酸苦之。且因是而辍学者，前后相望，实修途一大障碍也。公一举而障碍廓清，嘉惠士林，千秋永赖，伟哉厥功，弗可及已。然溯其功所由成，公父兄实有以启之。公尝云："公赞太翁在日，于振兴文学，常垂训焉；兄升廷先生亦殷殷以是相举。"公承父兄志，而有是举，可谓孝且弟矣，求之晚近可多得哉。夫学校为人才冶炉，冶炉既开，人才之盛可立待，伫盼云蒸霞蔚，分道扬镳，茫茫禹域，庶几其有豸乎？公之建斯，义气也，为国为乡，并堪不朽寿之贞珉，树风声，励颓俗，甚善也，故忘仆遫为之记。

歌功颂德之作，不乏迎逢、溢美之辞。但有些评价还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如今的大邑县档案局，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这样一份原始文献——

奖　状

14735 号

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捐助私立文彩中学国币三亿五千零二十八万二千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特授兴学一等奖奖状。此状。

教育部长：朱家骅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同年四月五日，国民政府令——

行政院转教育部呈。为四川大邑县士绅刘文彩捐助私立文彩中学校产、校地、校舍暨图书、仪器、体育卫生设备等，共计值三亿五千零二十八万二千元，该与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相符，除由部授一等奖状转请鉴核、明令褒奖等情；查该刘文彩慷输巨资兴办学校，热爱教育，至堪嘉赏，应予明令嘉奖，用昭激励，此令！

真是威名远播，好评如潮。刘文彩一生中风光的日子不算少，但像这样的风光，他还是第一次领略。

刘文彩生前怕文彩中学被淹，不惜毁坏自家街面，引走了自然界的洪水。但他哪里能够料到，在他身后，却正是他本人，引来了政治上的洪水。文彩中学终不能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刘文彩办文彩中学，本来是想留下“道德君子”的新形象。他在世时，确曾因此而让人刮目相看。但他万万想不到，他去世后，文彩中学为他招来的却是无穷骂名。文革中编写的《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序馆内容介绍》就这样宣称：

> 文彩中学——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在此黑体标题之下，“内容介绍”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 1945 年，刘文彩霸占杨坝一带农民的房屋、田地，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了文彩中学。
>
> 文彩中学极力向学生灌输孔孟之道和法西斯思想，欺骗麻痹青年，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妄图“挽银河，清八表，重奠元黄”——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对刘文彩暮年兴学极尽谩骂之能事：

> 1945 年春，文彩中学招生了。为修建这座学校付

出大量无偿劳役的广大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弟，被高额学费拦在门外。被刘文彩家族控制的这所学校，把反动透顶的《中国之命运》定为必读书，反动官僚、政客、党棍，不时地被“请”来登台“讲演”，学生穿统一的制服，由国民党现役军官充任军训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严密监视，稍为触犯“校规”，立刻受到处罚。

刘文彩从他“重奠玄黄”（即恢复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天堂）的办学目的出发，处心积虑要把学生培养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坚人物”，“投笔从戎”，为镇压人民的革命解放充当炮灰。

熟悉文革历史的读者，对这类暴力语言当然不会陌生。但其荒谬主要还不在行文，而在对历史事实的肆意歪曲。其实说怪不怪，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年代，热爱教育当然是罪过。就连贫下中农武训行乞办学，尚且大加讨伐，何况乎“恶霸地主”刘文彩？

恨屋及乌，对刘文彩的全盘否定导致对文彩中学的全盘否定。文彩中学由此跌落深渊．

1951年2月，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私立文彩中学，将校名改为“大邑县中学”。1958年又改名为“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中学”。如今的安仁镇，既有“安仁中学”，又有“安仁镇中学”，两校仅隔咫尺，令人莫辨雌雄。

整个50年代，文彩中学，即所谓“安仁中学”，其境遇还不算差——它是当时大邑惟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同时也是当时大邑设施最完善、师资最雄厚、教学质量最好的中学，实际上也就是大邑的“最高学府”。而且刘文彩只是在1958年年底才被“批倒批臭”；所以，在大邑乃至温江

全境，它仍然享有盛名。但进入60年代之后，它就在劫难逃了：既为刘文彩创办，当然不乏毒素。就用“阶级斗争为纲”这架高倍显微镜，对三十四名教员一一切片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竟有百分之五十的在职教员属于“敌我矛盾”：有“伪法院院长”，有“伪县参议员”，有“特务”，还有“三青团县负责人”……但这还算走运——只否定了部分教员，而没有否定整个学校。学校领导很聪明，赶紧抓住本校“阶级斗争”的活材料和刘文彩的罪恶历史，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因此一鸣惊人：“安仁中学”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转发全国，《光明日报》、《四川日报》多次介绍该校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教育部部长何伟前往视察，中宣部工作组也去该校蹲点。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文革狂飙呼啸而来，“安仁中学”终于被抛到了谷底，纵有孙悟空七十二变，也挣不脱刘文彩那巨大的阴影。刹那间它就成了“黑校园”，红卫兵、大字报铺天盖地向它扑来——

“安仁中学的流毒流遍全国！”

“安仁中学是培养地主爪牙的温床！”

古朴清幽的校园升起了滚滚烈焰。滚滚烈焰吞噬了学校积存多年的档案，吞噬了刘文彩为学校购置的11421册图书——绝大多数是线装书。按1945年的物价计算，合法币2642000元；按当时的黑市汇率折算，合两万多美金。这当然只能显示其物的含金量。学校的门桌板凳，几乎被砸了个精光。

1969年秋，“安仁中学”停办，全体教员被赶到乡下“劳动改造”。为了彻底清算刘文彩和文彩中学，还从文彩中学毕业生中抓典型——抓坏典型，以此论证刘文彩和文彩

中学的“反动本质”。几乎所有毕业生都被召回学校，一一过滤。但直到1974年才有收获。庄园档案记载——

> 1974年安仁中学进行阶级教育，找到一个典型例子。在大邑安顺公社有个反动家伙，名叫杜福东（文彩中学高男五班学生），写反动诗词，妄想搞复辟活动，一贯偷窃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教唆他自己的儿子去偷窃国营公司的木材。如果偷不到，还要处罚他儿子。在进行阶级教育时，安仁中学专门派人去把材料取回，说明反动的文彩中学培养的啥子人材！

刘文彩生前怕文彩中学被淹，不惜毁坏自家街面，引走了自然界的洪水。但他哪里能够料到，在他身后，却正是他本人，引来了政治上的洪水。文彩中学终不能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1971年春，“文彩中学”破败的校园又迎来了新生，但那是特殊意义上的“新生”，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囚徒——“五七干校学生”。文彩中学实际上成了“黑五类”的囚笼。“黑窝关黑帮”，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谈到这段历史，连《地主庄园沧桑录》也不乏悲怆之情：

> 著名演员冯喆（哲）来了，他曾在《南征北战》中饰演过高营长等有名的正面人物；他也演过《桃花扇》中的男主角、反面人物侯方跃。正因为演了这一角色，使他成了“汉奸”、“特务”，批斗连批斗，审讯接着审讯。在安仁中学的批斗会场上，他的头低到了地面，他无话可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气之下吊死在安仁

中学的厨房里！

著名书画家赵蕴玉、苏葆贞也来了，他们那握惯了画笔的艺术家的手，却在这里扯着无尽的荒草……

昔日知识殿堂，如今却成了知识的炼狱。

刘文彩被“打倒”，文彩中学被“打倒”，当年领导文彩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无法幸免。1995年3月31日，一位与前文彩中学校长吴德让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其寓所中告诉笔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前所长吴德让，这个同志过世了（1982年4月27日病逝于成都——引者注）。我在七十年代和他一起工作过，而且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他跟我讲过一件事，他当过文彩中学的校长，实际上（那时）他在党内还是个老资格。当时他是以校长身份做共产党的联络工作。他既然是文彩中学校长，和刘文彩当然有关系。文革初期，有的人发现了他的一张照片，是他和刘文彩照的，这张照片我都看到过，吴德让本人穿的西服。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带给他很多麻烦。为这事，吴德让就自杀，在颈子上用刀片自杀。自杀未遂，把他救活了。所以他颈上一直有个伤疤。这是我亲自听到吴德让讲的，千真万确。

直到如今，文彩中学仍然是一大悬案。

1995年3月5日，“安仁中学”为纪念建校五十周年举行盛大集会，这次校庆在一些人简直是火

上加油。他们拍案而起……

要害问题仍然在于刘文彩暮年兴学的功过是非。这方面，《地主庄园沧桑录》的评断基本上代表了正统立场：

> 安仁中学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材，但这并不能说明刘文彩建校的功绩，亦不构成使刘文彩成为开明地主的有力证据。因为刘文彩为巩固其家族势力而建"文彩中学"的初衷，与为祖国为人民培养栋梁之材的思想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反之，党为保护、改造和发展当年的"文彩中学"，长年不懈努力，花费了巨大心血，方使"文彩中学"有了本质的升华，从一所私立中学飞跃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校园。当然，亦不否认，刘文彩当年兴建"文彩中学"，的确是他一生中的明智之举。

刘文彩兴学是为了"巩固其家族势力"，论者所罗列的"依据"只有一点："刘文彩心想：办学确能培养一些人材，学生毕业后首先充实到弟弟刘文辉的部队里去。想到这里，他暗下决心：就创办一所一流的中学。"以自己的想当然作为评判刘文彩兴学的依据，不免武断。事实上，截至1949年12月，文彩中学七百多名毕业生中，还没听说有谁被"充实"到刘文辉麾下。

如此言不由衷，也是迫不得已——既不能重弹文革老调，把文彩中学当作刘文彩的"罪证"；另一方面，必须对刘文彩兴学维持"原判"，不能让文彩中学成为刘文彩的"功德碑"。两全其美的惟一可行的抉择，是把文彩中学与它的创始人刘文彩一刀切开，充分肯定文彩中学而彻底否定

刘文彩兴学。但要否定刘文彩兴学又实在言而无据，只好求助于主观想象。

到了90年代，这种正统评断不可能一统天下。

很多人持有异议。文彩中学高男一班毕业生、中国著名的机械专家彭学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向笔者宣称：刘文彩暮年兴学，“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他在这一点上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功劳的，这一点不管如何是变不了的。”他这样讲是出自他的切身感受。他回忆：“我当时在崇州市（即原崇庆县——引者注）树声中学上初中，（19）44年暑假入成都市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因中途无伙食费了，而被迫停学。中农的家庭，是难上得起学的。”但他刚停学一年，文彩中学即开始招生，他就考进了文彩中学。文彩中学的师资、设备都是他原来就读的学校不能比的，真是因祸得福。他从来学业出众，小学、初中一直是名列前茅，考进文彩中学后，仍然一直是名列前茅。文彩中学对优等生特别关照，他的学费、灯油费全部减免；因为家在安仁，就走读，早晚两餐都在家吃，只在学校吃顿中餐，所以不需要住宿费，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就这样轻轻松松读完三年高中，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四川大学工学院。大学毕业后供职于机械部科技司，“四十年来，先后为摆脱美、苏过去对我国镍铬封锁进行了立足国内资源的反封锁斗争，建立了机械工业用钢体系；而且还为我国载重汽车，‘三大三小’轿车，大型氮肥成套设备，大型火力、水力发电成套设备，大型石油化工成套设备，大型重型矿山、工程机械成套设备，自动化仪器仪表，电子技术等的发展，提供了一批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耐磨损、高强度、高韧性、高精密、高功能等性能的关

键性的新材料……”彭学鑫对中国机械工业确实贡献不小，但如果不是刘文彩创办文彩中学，他的那些贡献又何从谈起！

像彭学鑫这样的文彩中学校友，不在少数。他们建立于切身体验的认知，不可能被正统论断说服。随着极左政治的逐渐式微，那些被长期压制的声音必然要爆发，而且是越来越响亮。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安仁中学校友万富中随即倡议：开放“文彩中学纪念亭”。在报请大邑县委、县府、县人大批准后，万富中捐款千元，将查封数十年的“文彩中学纪念亭”修葺一新。亭内《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文彩中学校史》等石刻一应俱全。刘文彩兴学究应如何评价？换句话说，正统评断能否自圆其说？问题终于无可回避。1994年3月，安仁、元兴、苏家三镇联合举办“庄园鸽鸭会”，特邀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文彩侄子刘元琯，四川省妇联委员、刘文彩侄女刘元恺与会，请柬上赫然直书：“（鸽鸭会）在文彩中学操场举行”。地方政府如此写来，想必不是一时疏忽。刘元琯因病未能成行，刘元恺则刚好回唐场安葬母亲骨灰，又是顺路，就出席了。席间遇到新上任的大邑县长金嘉祥，金氏果然许诺：文彩中学将于年内正式恢复原名。但金氏的许诺直到今天也没能兑现。1995年3月，第二届“庄园鸽鸭会”开张，地方政府仍旧盛邀刘文彩后裔与会，请柬上仍旧直书：“地点：文彩中学操场”。刘文彩后裔大概是不想在敏感场合露面，便再没有应邀。

地方政府的倾向不言而喻，地方耆宿也为文彩中学复名而四处奔走。重评刘文彩兴学的呼声不断高涨。

1995年3月5日，“安仁中学”为纪念建校五十周年

举行盛大集会，“文彩中学纪念亭”朱门洞开，恭候各界嘉宾。“校史展览室”对文彩中学的创建历史也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

同期发行的校友通讯录，则重刊了《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和《文彩中学校史》。面对历史，与会者对刘文彩兴学及其身后遭际不禁诸多感慨。曾任大邑县委副书记的四川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罗同春就曾登台陈辞：

> 这次回来参加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活动，我从内心表示祝贺。回校后看校门钟楼（即“文彩中学纪念亭”——引者注）修复一新，心里为之高兴，也勾起了我的回忆。解放前，我们祖国千疮百孔，经济不振，无力兴办许多学校育人，当时人才的培养，知识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有识之士创办的私立学校。我们这一代同龄人，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私立学校渡过的。原文彩中学创立时，是全县环境一流好、老师一流好、名气一流大的一所学校，五十年过去了，安仁中学校园如故，在党的领导下更有了很大发展，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安仁中学桃李基金会机关报《桃李讯》第八期第1版）

罗同春没有提到刘文彩的名字，但对刘文彩的力学的褒扬之情，却是溢于言表。他并且提议：“今后的校庆活动，不要回避和忘了原文彩中学的一段历史。”

如此校庆，在一些人简直是火上加油。他们拍案而起，联名上告，指控安仁中学利用校庆为刘文彩歌功颂德。有关部门也就不好坐视，便在这年6月初派员赴安仁调查。形势严峻起来，小小乡镇中学实在顶不住，赶紧宣布关闭“文彩

中学纪念亭”，请民工6月15日来校封门抹字。

与此同时，一场笔墨官司也沸沸扬扬地展开了。先是《重庆法制报》周末版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大特写”——《刘文彩卷土重来》。编者在提要中感叹：“今天，前往大邑的旅游者们竟以争穿恶霸地主刘文彩当年的长袍马褂、坐进八抬大轿中拍张‘地主像’为乐；那座当年由刘文彩投入3.5亿伪法币创建的安仁中学正拟恢复其文彩中学的旧名；而刘文彩的姨太太也摇身一变成了万人争睹的‘活宝’……，历史沧桑，阶级仇恨，转眼已逝若云烟。”一些人如获至宝，马上借题发挥。1995年7月15日《四川日报》刊出署名“华敏”的杂文：《莫使历史颠倒》。作者特别声明：“‘大特写’读后，吾方心静止水，既无悲今悼昔之感，更无重唤‘阶级仇恨’之意。”实则是由刘文彩“卷土重来”而痛感今不如昔，痛感经济建设冲淡了阶级斗争。一副忧国忧民、“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救世神态。事实上作者完全不能理解，作为中国地主阶级总典型的刘文彩，本来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为纲被正式废止，中国社会逐步恢复常态，作为变态时代的产物的中国地主阶级总典型刘文彩，当然不再有生命力，不能不从时代大潮的中心游离出来，退到边缘。虽然还有人关注刘文彩，但已经不可能像在极左时代那样只是从政治的角度关注，而是要多方位地重新审视。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现象，在那位作者的笔下，却成了反常，成了“大逆不道”。作者利用刘文彩“卷土重来”给现实把脉，诊断出现实的荒诞——“如今，历史沙漠在扩大，青少年对历史兴趣索然，一个心思想钱的人又生吞活剥拉‘历史姑娘’去当‘礼仪小姐’，怎能不出现尊严与卑劣、功劳与罪过的大错位呢！”作者严

辞警告，荒诞的现实如果不从根本上疗治，前景将极为不堪——“刘文彩‘卷土重来’后，很可能尾随而来的是袁世凯、张作霖、吴大帅们。而他们的卷土重来，却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而是历史的颠倒，这就是真正的闹剧了。”那么如何救治现实的荒诞呢？作者开了个药方：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因此进行系统的历史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在这里所呼唤的“历史教育”，不过是“阶级教育”，不过是极左时代以刘文彩为主角的那种“阶级教育”。呼唤那样一种“阶级教育”，所要复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幽灵，应该不难想象。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惜乎回天乏力，只能把万千愁绪形诸笔墨，嘻笑怒骂。连这样的嘻笑怒骂也没谁买账。作者声色俱厉地谴责世人“轻薄”历史，要捍卫“历史”的尊严。但在世人看来，极左时代走红的不过是“伪历史”，具体到刘文彩而言，许多“血泪控诉”都出自当年的精心编导。这些“伪历史”如今渐成沙漠，其实正是历史真实恢复的开始，其实正是历史的大幸。便有专栏作家“江沙”出来打抱不平，文章题作《时间伟大》：

> 有人说：“非两汉以上的书不敢读。”我不懂。闲时，读安得诺的《试金石学说》，有云，未经数十载风雨岁月考验所留存的书，实在有些信之不过啊。看来，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人，的确富有哲学思维。我想，“大跃进”时代及后来的“高、大、全”文学，怕是流传不下去的了。但那些作品，不等于就不曾有过“意义”，以姚文元那群笔杆的文章为开端的“文革”，令中国整整倾斜了十年；那时的一些文学、

舞台作品，也曾超越了文学自身功能，政治化了，几乎成了国人当时的学习文件，其功夫已在文外及戏外了。还是时间伟大，今日回首，终于明白，那些东西是“天方夜谭”，说穿了，不外乎一个“假”字贯穿始终。好险，差点误了我民族。

然而，我之又想，诚实未必是易事。几年前，巴金提倡讲真话，并从自己做起，写出一部“说真话的书”。当时，不也有众多人儿跳将出来，口诛笔伐，批判巴金之提倡讲真话吗？还是时间伟大，大不了也就十年吧，巴金早已是讲真话的勇士和楷模，那些跳将出来的众多人儿呢？……其实，谁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说假话，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仅系水平各异、质量不一、收效不同而已。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几亿人，就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知道，有一个贫苦女农，生在旧中国，被地主关进水牢，九死一生……贫苦女农的悲惨经历，感人至深，除非是阶级敌人，谁会不落泪，真真个轰动全国。其震撼力之大，几乎影响了两代人。当时的在校学生，更是深受教育，仿佛进入了自上而下的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哭哭啼啼，愤愤然然了好长一段时间。你想想看，既然是报纸上登、书刊上印、广播里喊，又说是真人真事还有实物，而且又是上面在组织学习、讨论，你能不感动，你敢对那事儿的真实性打个问号吗！

还是时间伟大，后来终于水清石现，一大报披露，原本没有那事儿。

天呀！大众受骗了。（《成都晚报》1995年7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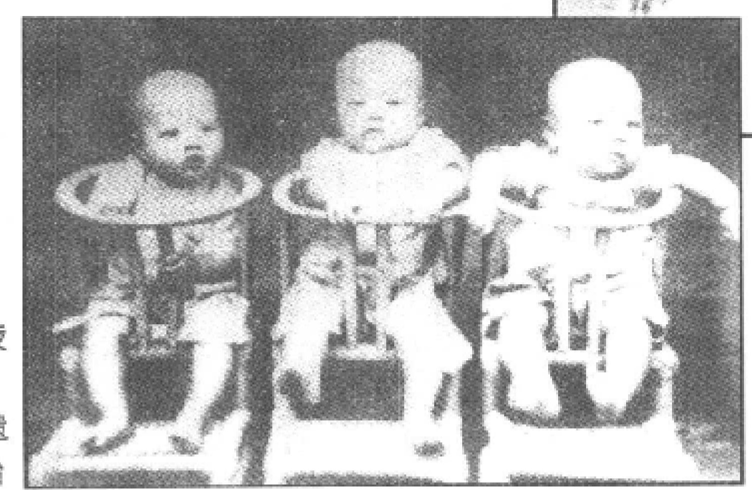
时间确实伟大。那么时间究竟怎样裁决刘文彩暮年兴学的功过是非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下篇

残阳如血

第十四章

情　　劫



1. 刘文彩姨太太凌君如(右)
2. 凌君如为争夺遗产炮制的三胞胎





3. 王玉清与庄园陈列馆工作人员
4. 刘文彩为王玉清准备的棺木
5. 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



刘文彩一怒之下就摔起了东西。杨仲华哪会服气，乒乒乓乓地也摔开了，刘公馆顿时热闹非凡。几个孩子全被惊醒，愣怔怔地望着他俩。

在旧中国，纳妾嫖妓是上流社会的时髦。许多权贵把“食色性也”当作座右铭，最热衷一个“色”字，笃信“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纳妾嫖妓是正常，不纳妾嫖妓倒成了反常；纳妾七八九个是正常，只娶一个两个倒成了反常。二十军军长杨森究竟有多少姨太太，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森的姨太太不会少于一个加强班，子女可以编一个排。而且所有太太一律发“工资”，一切待遇都有明确规定：生男得多少，生女得多少，每个子女的生活费多少，教育费又是多少……“傻儿师长”范绍增，姨太太多时达三十几个。他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妖冶娇媚的十七姨太，两人常在一起追逐嬉戏。这位美妾的风流韵事，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竟然轰动坊间，一时洛阳纸贵。在四川军阀中，刘文辉是最有抱负的，私生活比较检点，但也有两妻两妾。事实上，中国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一直存在着双重标准。上流社会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私生活方面同样享有特权。在特权骄纵下，上流社会成了一个大染缸，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刘文彩不是特立独行之人，一旦跻身上流社会，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习俗。抽大烟是这样，赌博是这样，私生活方面也是这样。

刘文彩一生中，有过五位妻妾。发妻吕氏，正室杨仲

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

刘文彩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发妻吕氏，出身于大邑县三岔乡的一个普通农家，有着一般劳动妇女的吃苦耐劳和善良豁达，把刘文彩的小小鹊巢拾掇得井井有条。刘文彩也才能一门心思地到处奔波。吕氏初进刘家，刘家还远远谈不上富足。老幺刘文辉是全家最后的希望、重点培养对象，但上学时仍靠泡菜冷馍填肚皮，每月只有几文钱零用。吕氏看在眼里，怜在心头，常用私房钱接济刘文辉。刘文辉刘文彩从来手足情深，吕氏功不可没。但吕氏不幸应验了"好人不命长"的谶言，未满三十岁便一命归西；稍后，一对儿女也相继夭折。

三年之后，即1917年，刘文彩与杨仲华缔下白首之盟。杨仲华是大邑县三岔乡东升村农民杨登友之女，嫁到刘家时刚满十七岁。杨氏身高1.60米左右，年纪和身材都比刘文彩小了一大截。但她全无小妻的玲珑柔弱，性格刚强，风风火火。刘文彩萧条多时的庭院，从此又有了勃勃生机。起初，夫妻还算和睦。杨仲华颇有主见，令刘文彩少了几分夫唱妇随的乐趣；但她确实忠厚而且能干，刘文彩对她不能不有所敬畏。那时的刘文彩，离乡不离土，还不敢放纵自己，反倒比常人更机敏。所以，杨仲华对刘文彩也没多少挑剔。小两口齐心协力，家境渐有改观。长子刘元龙、长女刘忆云，就在这几年间呱呱坠地。

夫妻感情的变化，始于刘文彩个人地位的变化。

1922年刘文彩到叙府做官。远离家乡，不必担心族人尤其是大哥刘文渊的关注；而且腰缠万贯，不致因囊中羞涩而在红灯绿酒前畏葸退缩。大玩家的派头从此渐渐养成。一位知情人回忆，叙府刘文彩"开始是规矩的"，"前面生二（儿子）、三儿子和二女的数年中，（夫妻）感情都是很好

的。”即使如此，也只是因为立足未稳，百端待举而不能不谨言慎行。覃筱楼败走之后，叙府军政财诸项大权集于刘文彩一身，个人地位完全巩固，也就无所顾忌了。糟糠之妻杨仲华，再也无力看守这匹脱缰野马了。

就在幺女刘婉蕙出世之时，一个女子闯进了刘文彩的视野，刘文彩的家庭格局为之剧变。

她便是风尘女子凌君如，别号凌旦、凌豆，出身于叙府中场乡凌友臣门下。有作者称：凌旦“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肤白皙，身材苗条，其娇弱羞柔的媚态，袭人魂魄”。凌旦之智未必超群，但其貌其态，此番描画倒也不算夸张。无怪乎刘文彩会一度神魂颠倒。

传说凌旦本来是曹荣光的情妇。曹荣光升任宜宾县征收局局长，对主子刘文彩感恩戴德，设家宴款待，让凌旦作陪。刘文彩如见天人。这正中曹荣光下怀，趁机将凌旦拱手献出。就这样结成一对“神仙眷侣”。刘文彩在叙府观音街为凌旦购公馆一座，金屋藏娇。庄园档案有则记载——

> 文彩一日赴宴归来，凌旦在楼上打牌。刘即藏入衣橱中。凌旦下楼遍寻不见，大骂随从：“处长哪里去了，你们就放心吗？快去找来。”刘在橱中忍笑不住，橱门忽动。凌即开橱将刘牵出，说：“随便你藏在哪，我都要把你找着”。（《川南王刘文彩》第33页，藏庄园陈列馆）

似乎很有一些柔情蜜意。

本来就“媚态袭人”，又在风月场中练就一套邀宠绝招，刘文彩对凌旦，自是百般宠爱。起初，这段“浪漫之旅”还处于地下状态；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住在粮房街

刘公馆的杨仲华终于察知，由此引出一场口角大战。事发是在一个晚上。杨仲华先安排几个孩子睡下。两间卧室，一个是长方大间，一个是小间。大间有两张床，大女儿和三儿子一张，刘文彩夫妇一张。小间只摆了一张床，老大刘元龙、老二刘元华共用。小女儿年幼，由奶妈带着。等几个孩子睡熟，杨仲华把刘文彩叫到过道上，问他关于凌旦的传闻是怎么回事。刘文彩知道纸包不住火，就承认了，但拒绝和凌旦一刀两断。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用一个目击者的话来说，刘文彩"不是个没脾气的人"，一怒之下就摔起了东西。杨仲华哪会服气，乒乒乓乓地也摔开了，刘公馆顿时热闹非凡。几个孩子全被惊醒，愣怔怔地望着他俩。仆人想阻止，又怕引火烧身，就把刘文彩的两个亲信叫了过来，一个是内侄杨孟高，住在粮房街刘公馆隔壁；再一个是堂侄刘绍武，住在粮房街刘公馆对门。两个人怎么打躬作揖都没用，情急生智，抱出刘文彩的三个小儿子。小家伙齐刷刷地跪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央求别再闹了，夫妻俩这才暂且收兵。

夫妻关系从此急转直下。刘文彩三天两头往观音街公馆跑，乐不思蜀；杨仲华天天在家生闷气。劝没用，闹没用，杨仲华终于完全失望，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摔门而去。

但是，在那样的年代，刚强如杨仲华者，也不可能有自立的勇气。虽然欲求"异梦同床"而不可得，夫妻名分仍须保留。杨仲华出走后，住进了刘文彩在成都文庙后街购置的公馆。刘文彩两度派人说项："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何必斤斤计较。"都没能把杨仲华说服。后来刘文彩亲自出马，到成都恭请夫人返叙。杨仲华仍然不为所动，说，她不是想不开，风气就这个样子，所以她本来也没有指望刘文彩守身如玉，刘文彩尽可妻妾成群。但纳妓为妾实在有辱门

庭，她不能不计较。刘文彩不把凌旦从观音街公馆赶出去，她和刘文彩就绝无和好的可能。杨仲华如此决绝，刘文彩又不肯割爱，僵局就再无化解之日了。虽然在形式上刘文彩对杨仲华虚位以待，实际上为刘文彩主持“后宫”的仅凌旦一人。凌旦这时俨然以刘文彩夫人自居了。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却仍旧好景不长，仍旧逃不脱始乱终弃的厄运。

驻叙期间，刘文彩与凌旦如胶似漆，可说是妇孺皆知，当地至今仍有如下传言：

凌旦爱着奇装异服外出游逛，常要弁兵、丫鬟、奶妈、干女儿、女马弁紧随其后，“数车相连，横行街巷”。路人必须马上回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车的弹簧坐垫不够软，刘文彩就找一个胖女人做她的“肉垫子”。

为了博取凌旦的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旦拥有的各类用品、衣物，琳琅满目。衣物要装五十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四百多双，有的鞋上缀满黄金做的小铃，走起路来叮当响。一颗钻石戒指价值五千余元，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

某年春天，凌旦想去成都看花会。刘文彩无暇陪同前往，又不敢扫凌旦的兴致，便巧言相劝：“太太何必劳神，去成都太远太累，我在叙府给你办个花会好不好？”不久，盛况空前的“花会”果然在叙府北较场开张。

甚至有人断定：生杀予夺，皆决于凌旦一语。刘文辉一位警卫1963年11月6日揭发说，“二刘之战”前夕，他和刘文彩从重庆护送军火到宜宾，乘坐刘文彩的蜀通轮，同行

的有凌旦等三个少妇，还有两个学生。三个少妇和刘文彩打得火热，学生少见多怪，不免私语嘲笑。“据说被凌旦发现，怒不可止地即向刘文彩说。”刘文彩正在打牌，探出头来瞅了两眼，表情极为不满。第二天船到江津，驻军首长张清平把他们接上岸；深夜回到船上，不见了两个学生。警卫问刘文彩随从，随从回答说：我送他们回老家去了。警卫便据此断言，那两个学生是被刘文彩杀害了（庄园档案67宗D2卷）。刘文彩此次押送军火极端隐秘，如揭发者所称，“所幸刘树臣（成）暗中掩护，始收武器偷运上船。”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接近蜀通轮。能够上蜀通轮的那两个学生，当然不会是普通学生——一个是护商大队连长冷少康的亲戚，一个是护商处连长凌致远的亲戚，和刘文彩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如果连他们都“为了一笑而遭惨杀”，刘文彩之草菅人命确实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可惜，凶案的几个关键环节，揭发者都只是“据说”而未亲见；更重要的是，“死者”老家都在安仁，安仁却谁也不知此事，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死者”家属——提到过一个字。刘文辉那位警卫的揭发至今仍是孤证，应该不具备史料价值。

但刘文彩确曾“冲冠一怒为红颜”。有文章称——

> 一次在启明电影院，连长李德先在巷道用电筒晃对方。适凌旦车来，认为有意戏侮，即遭枪杀于府堂坝。张伯英宜宾县长任内，民政科长田某初来不识途，进合江门回县府，应转右而转左走冠英街（实为观音街——引者注），经（刘文彩）新公馆，适凌旦上车，往视一眼，又因车铃响，侧之让路。凌认为田有意调看，即将他枪杀于岷江畔。（《川南王刘文彩》第31页）

田某被冤杀之事，未见原始资料。“李德先事件”则有案可查，主人公的真实姓名叫“李德轩”，事件缘由与前说大有出入——

据龙泉公社曾岗大队肖敬然讲，刘文彩驻宜宾时，有一妓名凌君如，绰号凌旦，部队上下级军官都曾玩弄过。李德轩是连长，王泗人，也曾参与过。后来凌君如被刘文彩看上，收为姨太太。有一天凌君如到启明电影院看电影，适逢李德轩率部守电影院，李不认其为总办太太，仍然嬉戏。凌受辱，回告刘文彩，刘文彩决意除去李德轩。若以此事为名，则实在不光彩，就抓住李德轩与滩心匠（土匪）有勾结将李捕杀。

某日，司令部派人通知李德轩到司令部。肖敬然是文书上士，与其同往。李刚走，刘文彩又命人把部队人员徒手带离营房训话。

李到司令部，就（由）事先安排好的人通知他，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明白，你还有什么需要交待的快交待。李知事不对劲，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只需要为他备办酒菜，要肖敬然陪他饮酒送终。肖难堪已极，而李却一再劝酒，并讲军人命令服从。李饮毕，脱下身穿呢子军大衣赠肖并称肖为老弟，声言留作纪念。脱下军帽，对众鞠躬并说，同事们，别了。走向按他要求搬来他用的被子床单。

枪响，李倒于被单上，某人（实为监斩人）上前翻验，补火说是减少他的痛苦。（庄园档案67宗D2卷）

这段陈述基本可信。凌旦乃叙府名妓，不乏旧相好。刘文彩既将她宠以专房，岂能容忍凌的旧相好惊扰他俩的鸳

梦！由此杀机横生，李德轩不过首当其冲罢了。此例一开，凌旦的其他旧相好莫不闻风丧胆，纷纷逃离叙府。

“情场如战场”，看来刘文彩对这句名言也是奉若圭臬。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为凌旦挥金如土，为凌旦大开杀戒。但所有这些，只是刘文彩所付代价的一部分，还有更大的付出——被激怒的远不止杨仲华一人。刘文彩“与妓共舞”，辱没门庭，刘氏家人莫不震惊，族长、长兄刘文渊更是又羞又恼。刘文彩承受着巨大的家族压力和社会压力。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仅将凌旦迎入叙府公馆，而且在“二刘之战”中，与凌旦双双把家还，坦然面对父老乡亲莫测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灵位。如果是逢场作戏，刘文彩大可不必这样做。可见刘文彩并未计较凌旦的出身，确实想和凌旦厮守终生。

但他俩仍然好景不长，仍然逃不脱始乱终弃的厄运。

“二刘之战”中刘文彩退据安仁，既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也是他与凌旦感情变化的开端。凌旦毕竟是风尘女子，见惯了纸醉金迷。僻冷的乡村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刘文彩有些预感，因此有言在先：你要跟到我，就规规矩矩到乡下住一年。在凌旦看来，退据安仁虽不如人意，但只是过渡性安排。刘文彩在成都田宅极多，迟早会去成都当寓公。与叙府相比，成都当然更繁华、更光怪陆离。凌旦欣然从命。《地主庄园沧桑录》这样描写当时情景——

夜深，一勾弯月高挂。金沙江中，月芽凌波。江心二条木船一字排开，第三条船是只彩色楼阁油轮。刘文彩推开阁门，走上船头，迎风而立。不一会，三太太凌君如、四太太梁慧灵也勾肩搭背，忸怩着站在刘文彩左右。

“四太太梁慧灵”是凌旦的表妹，因其身材丰满，人称“梁胖”。据一位知情人回忆，梁胖并非和刘文彩、凌旦同往安仁。而是在安仁住了一段时间，才派人送帖子把梁胖接过来的。成亲那天，刘文彩一个儿子正在公馆前面的坝子里玩耍，佣人告诉他：你的新妈又要来了。他就跑出去看。“见一乘轿子拢来，弁兵徐福卿放了一阵花炮。抬进门，梁在堂屋里跪拜磕头。”刘绍武四岁左右的小儿子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一边拍着手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哼唱取笑新娘的童谣。后来凌旦和梁胖口角，梁胖还讽刺凌旦：“我是拜过堂的。”言下之意，凌旦没拜过堂，是来路不正的“野货”。凌旦无言以对。其实梁胖不仅“拜过堂”，而且读过几年私塾，略识文字，在刘文彩的几个妻妾中，算是见识较多的，本来可以成为刘文彩的一把帮手。但刘文彩只是以貌取人，因梁胖不过中等资质，远不像凌旦那样风情万种，为人也比较木讷，所以不太把梁胖当回事，常常冷淡她，待她远不如待凌旦好。

刘文彩娶梁胖，竟然还是凌旦拿的主意。这倒不是凌旦“大公无私”，有意成全梁胖和刘文彩，而是有她自己的小九九——只在安仁住了几天，凌旦便后悔不迭。那时堂堂安仁镇也不过几排破败的平房，油灯如豆，虫蚁不绝。凌旦对此虽有思想准备，仍不免倍感清苦。于是，没住上一年就吵着要迁居成都。此时刘文辉正在康境重整旗鼓，亟需刘文彩坐镇后院，刘文彩哪里走得开。凌旦软磨硬缠都不奏效，决定只身赴蓉。刘文彩颇为不快，说，你走了，这么多家务事谁管？凌旦就把梁胖引荐过来，代替她主持安仁“后宫”，自己则兴冲冲地直奔成都的花花世界而去。刘文彩和凌旦就此分居。

凌旦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共富贵不可共患难，这便是凌旦留给刘文彩的新形象。凌旦毫无察觉，变本加厉，终于闹出令刘文彩羞愤难当的大笑话，双方裂痕至此完全不能弥合。

凌旦寓居成都陕西街公馆，开有一个人力车行，按月收取车租。加上刘文彩拨给她的其他款项，经济上颇为宽裕，但精神上并未舒展。成都的刘氏家人都不屑和她交往，刘文彩一年中也不过探望她一两次。对她垂涎三尺的纨绔子弟倒是不少，但慑于刘文彩的虎威，都只能"望洋兴叹"。凌旦形单影只，百无聊赖，就把远在叙府的干妈——妓院老鸨——接来作伴。凌旦有桩心事：早已丧失生育能力，将来瓜分刘文彩遗产时，儿孙绕膝的杨仲华势必占尽风光，而孤苦无助的她势必叨陪末座。每念及此，凌旦就忧思如织。老鸨抵蓉后，向凌旦献上一计，凌旦如得锦囊，即照老鸨所云，用棉花将腰身填大，伪装怀孕；暗中收买贫家男婴，同时买通医生作弊，顺顺当当地为刘文彩"生"下一胎。自以为天衣无缝，却不料隔墙有耳。刘文彩收到举报凌旦的"群众来信"，满腔怒火，却又不便发作——这毕竟有损刘氏家族尤其是他本人的名声。笃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的刘文彩，只好暂且隐忍，静观其变。凌旦还以为此计得售，后悔自己"肚量"太小，只"生"了一个，仍不能和杨仲华平分秋色。干脆再接再厉，又腆着大肚皮招摇过市，一年后陕西街刘文彩公馆再传"佳音"：凌旦一胎生了三个男婴，加上"头胎"，膝下共有四子，在与杨仲华的"生子大战"中终于扭转败局。她所创造的，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像父不像母、彼此间也毫不相象的"三胞胎"。嗅觉灵敏的小报记者，对如此天方夜谭哪会放过！不仅详细报道，而且图文并茂。亲友莫不引为笑谈。凌旦弄巧成拙，最丢脸、最恼火

的当然还是刘文彩。刘文彩怕凌旦继续遭小报记者围追堵截，闹出更多笑话；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把凌旦弄到身边，严加看管，就指令凌旦迁回安仁老家。凌旦在成都实在是声名狼藉，正想找个避风港。这样，两人在安仁老家“团圆”了。

形式上“团圆”，实际上是“团”而不“圆”。因为彼此都已看透了对方，早年那份缠绵之情，也就如风中薄云，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刘文彩召回凌旦，在经济上尤其加强“宏观调控”。凌旦素来天马行空，哪受得了这份窝囊气，不免怨恨不已，与刘文彩虽然还谈不上反目，但对家务事，则是完全不闻不问。梁慧灵对凌旦言听计从，在凌旦的“熏陶”下，“在安仁拉帮结派，又混上了鸦片瘾，变得越来越懒”，与刘文彩也就更加疏远。刘文彩名义上妻妾成群，实际上“后宫”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外面他是前呼后拥，回到家却如落进冰窖。刘文彩深感孤寒，渐渐萌生再娶之意。

便有了第三个如夫人——五太太王玉清。

“王玉清貌仅中下，外表一副老实相。刘吸取了凌、梁的教训，反而十分满意。这个土头土脑的老女子，又是满口乡音，让刘文彩晚年得到慰藉不少。”

关于刘文彩此次娶亲，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

刘文彩打算再娶的风声传出去之后，媒婆纷至沓来。最早被刘文彩看中的是个大家闺秀，长得水灵灵的，简直就是天仙下凡。可这姑娘在老公馆住了不到半个月，刘文彩就要赶她走，对人说：

"她呀，绣花枕头一包草。每天都要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能经管好家务吗？"

接下来被看中的，是一个秀秀气气的女学生。在老公馆住了几天，刘文彩很满意。一天傍晚，他们一起到外边转田坎，忽然从豆田坎上爬出来一条菜花蛇，女学生一见，"哎呀"一声，脸都吓白了。这一下刘文彩不干了，当晚就把媒婆叫了来，说：

"这姑娘人不错，就是胆子太小了。胆子小，咋个给我经管家务呐？咋个经得起一点儿风险呢？"

过后，媒婆们接二连三地领来了好多个，论长相、身材，都是百里挑一，可刘文彩一个也看不中。有一次，刘文彩到蔡场兴福寺收租，半路上碰见三个高高大大的村姑，在一条几尺宽的沟边上玩，比赛跳沟。刘文彩就饶有趣味地坐下来看。其中两个姑娘试了几次都不敢跳，另一个却大胆地接连跳了好几个来回。最后一次，她踢了个石头到沟里，把一根藏在草丛中的水蛇吓得镖了出来。两个姑娘一见，转身就跑。跳过沟的姑娘非但不跑，反而随手拿起一根棍子，不慌不忙地把蛇打死了。

"这家伙胆儿真不小。又是穷人出身，拿来经管家务，保险稳当。"刘文彩指了指打蛇的姑娘，问陪同他的保长："她是哪家的姑娘啊？"

"玉米花匠的嘛。"保长明白刘文彩的心思，笑嘻嘻地回答说："要是总办瞧得起，包在我身上。"

保长回过头就去找玉米花匠提亲。玉米花匠喜出望外，刘文彩当天就把打蛇姑娘领回了老公馆。晚上，嬉皮笑脸地要和她同房。她说啥也不肯，并对刘文彩说：要真瞧得起她，就该选上个黄道吉日，和她拜堂成亲。刘文彩一听，马上应承下来。

这位打蛇姑娘就是以爱吃鸭脚板而名震全国的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

这段故事，人物描写说得上栩栩如生。可毕竟是文学笔法，与史实相距甚远。实际情形到底是怎样呢？还是听听王玉清本人的述说吧——

我娘家老家原在（大邑县）蔡场公社五大队二队。民国二十四年有五间半草房子，七个人，自己有三亩田，又佃了四家人的田……，共十七亩田。父亲家里有四弟兄，大爸、二爸、幺爸他们在家吊挂面。父亲叫王子云，在蔡场开糖房，生意好，我们爷经常拿钱回去。我幼小在蔡场长大。妈叫王刘氏，娘家在韩场刘墩子；奶奶四十几岁就死了（病死），她死时我才六岁多。我十三岁那年我们就没开糖食铺，回来种田。我们租人家的田，租子交得够，一颗都没少过。我们喂有一头黄牛耕田。

我有三姊妹，三个兄弟。民国二十四年接的两个弟媳。原先给我说的人户（四川土话，指婆家——引者注）多，共发给二张八字，我们赵大姐的儿赵建廷给我说的人户。赵建廷是帮刘文彩拿新福寺的谷子的。刘文彩找到赵建廷说：给我说个农村的。赵说：新津县、崇庆县管的可以么？刘文彩说，不，要大邑县管的。赵建廷说：没那么合适的，有合适的才说。赵不认识我，他原想说我一个爸爸（堂叔）的女。他给我们大爷在蔡场烟馆里摆（谈），赵说：人家总办要我给他找一个青白传家，多少识得几个字的。大爷说：你没有找对，你应该找上头大舅的女。大爷说后，赵才来说的。（1980年12月26日王玉清口述，见庄园档案67宗D9卷）

历经情海劫波，刘文彩对男欢女爱已是兴味索然。这时他所物色的与其说是如夫人，倒不如说是“生活秘书”，是“后勤部长”。所以他才向媒人特别强调要附近农村的女子。都市女子在他眼里已是虚浮放浪，因而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这种感觉当然主要得自他与两位都市如夫人的情感纠葛。

婚嫁经过，王玉清至今历历在目——

已经是腊月二十几头了（民国二十五年），赵给刘文彩说，刘文彩就要求看人。在赵的堂屋里看的人，我和刘文彩一个坐在堂屋这头，一个坐在堂屋那头，隔远看的。刘文彩问我：大小姐，你读过书没有？我说，读过两年多私塾。刘文彩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把中午饭吃了才回来的。刘文彩是先把父亲喊到安仁去说好规矩了，才写的八字，八字写好了才要求看的人。八字是请算命的看了才写的八字。三月间定的年月，四月十四日结的婚。定年月刘文彩拿的是七十几个大银元，结婚两年后我都问过刘文彩，为什么只拿七十几元，刘文彩没开腔。我想，可能是赵拿起来了。有八节布料，四床缎子床面，两丈云斗绸，就是拿来做汗衣的。四月二十四日早晨接去吃的中午（饭），同去的有一个兄弟（小的），几个抬东西的。四个人抬的轿子。办了事（酒席）的，只是（请）家里的人，没有请外人。梁胖在家。我结婚穿的是蓝丝绒衣服，自己请裁缝做的，裤是软缎的，绣花鞋。我带去的东西是父亲在成都给我买的一双凉皮鞋，一双方口懒式皮鞋。买的两口缎鞋，六对枕头，四床被面，四口箱子（在成都买的皮箱）。接去

的什么都有：两间床，两个柜子，两个连二柜，两个书柜（新的），两个写字台（旧的）。

我结婚时，不知有梁胖、凌君如，只知有杨仲华。原我也不同意这件婚事的，我给我父亲说：人家有老婆了。我父亲说：你身体不好，到其他地方去，你会吃苦。我父亲喜欢这门亲事。（同前）

其间有段小插曲，王玉清未曾提及：娶亲时王玉清的大轿从侧门进而未从正门进；婚酒也“只是（请）家里的人，没有请外人。”大概刘文彩认为此次再娶不是什么值得张扬的事，因而低调处理。

关于婚后生活，王玉清说——

我刚过去时，人家吃啥子自己就吃啥子。我爱帮到做事。一次，我去挽草把子，请来的谢大娘叫我回去，她说，人家都在这里耍，你耍不来？你来挽草，又要多早叫我回去给你烧洗澡水。最后我想，她们都耍得来，我还是耍耍。我也就没挽草了。我们的衣服是专门有人洗的。我们每天都是十一点钟左右才睡。一次我上街赶场，我一个小时的好朋友看见我说：你好瘦啊！我想可能是我睡迟的原因。我回去给刘文彩说：我们早点睡。刘文彩说：早死十年，要睡好多觉啊。刘文彩天不亮就要起来，他有时到薛畴久那里去，有时转田坎……

我不吃鸦片烟，因为吃鸦片烟就不会理事。梁胖吃鸦片烟，不揽事，经常上街耍，屋里没有人管她的。我四月份结的婚，过（春）节客人送的礼，花生、皮蛋……都放在堂屋里，没人管。我四月份来后，这些东西都生虫了。刘文彩的衣服梁胖也不搁好，屋里柜子多，衣

服到处都是，刘文彩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衣服放在哪里，我结婚后才给他管的。我把他的衣服各是各的放好。刘文彩说他还有两件皮衣不见了，我想可能是她们把它送人了。她们没有一个人管家，刘文彩接我，主要是接一个会理家务的人……

我结婚十二年都爱上街赶场买菜。我赶场都是走路，她们几个爱坐鸡公车、轿子。

我在刘家原先穿的朴素，后来我看到她们几个都爱穿花的，我也穿花的。后刘文彩在成都给我扯了四种都是红颜色的料子。才去刘家时，我是短头发，她们几个都是烫了头发的，最后我也去成都烫发，烫的是长发，在安仁也烫过。安仁是请姓廖的师傅在家烧起火盆烫的。我爱穿平底缎子鞋、半高跟。她们爱穿高跟皮鞋。（同前）

刘文彩这次总算没有失望。在他的四位妻妾中，最体贴他的，就是这位村姑出身的如夫人了。刘文彩的一个儿子承认：

王玉清貌仅中下，外表一副老实相。刘吸取了凌、梁的教训，反而十分满意。这个土头土脑的老女子，又是满口乡音，让刘文彩晚年得到慰藉不少。

刘文彩也待王玉清不薄。结婚不久，王玉清娘家就添了四十亩水田，草房也被漂亮的四合院所取代。但刘文彩的这些馈赠没能使王玉清娘家兴旺起来——人算不敌天算：仅仅四个月之后，王玉清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相继去世，留下一门三口寡妇。王玉清含泪抱养了亡弟的一个爱女，更名刘元

俊，视若己出。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雇工院至今仍存放着刘文彩生前定制的七具豪华棺木，均为建昌红漆描金花棺，红绫覆盖。其中一具特别注明王玉清专用。刘文彩妻妾中，能享受此等“厚遇”的，仅王玉清一人。

刘文彩的万般宠爱，在王玉清自然是刻骨铭心。1993年春，她与来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 “刘文彩待人很好。”提起那段感情，在王玉清81岁的脸上仍不难寻到幸福的痕迹。今天，她仍这样对我们说。
>
> “刘文彩对你好，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能举例说明吗？”
>
> “比如，我们到安仁街上同庆茶楼打小牌（麻将），无论多晚回来，刘文彩一直等着，从不先睡。”（《地主庄园沧桑录》第197页）

刘文彩的音容笑貌，在王玉清依旧是分外亲切：

> 刘文彩人高，不胖，爱穿长衫子，有时穿对门襟马褂，洋皮衫子；爱穿苏白的、浅淡的颜色。一次四哥（刘文成）来，我看他穿的是毛料，我就给刘文彩说：人家都穿的是毛料，我们又不是没有钱，我要去扯。我上成都去就给他扯了二件毛料。他说我：你给我扯啥子，我穿补巴巴的衣服，别人也知道我是刘总办。我们不管穿啥子他都不管，随便我们。他冷天戴呢博士帽、和尚帽，热天戴瓜皮帽，都是黑色的料子。穿自己做的鞋，上的是皮底，我和刘二姐给他做的，买的鞋他穿不得。一次我到成都去，照他的码子给他定做（在成都三

江岩做的），买回来穿不得就把它退了。刘文彩回家吃水烟，吃鸦片烟。刘文彩吃鸦片烟不凶，吃得大口。他是有规律地吃的，最多吃七口就不吃了。刘元龙吃烟凶，他（刘文彩）都要骂他（刘元龙）。刘文彩不爱戴表，我爱戴，我们家每个人都有表。刘文彩有一串佛珠，不爱拿。这串佛珠是刘文辉从西康带回来给刘文彩的。他们都信佛的。刘文辉爱拿佛珠。

我们平时喜欢吃啥子就吃啥子，刘文彩不吃也要做五六样菜，不太吃肉。刘文彩不爱吃蛋，有时给他打蛋他都要估（强迫）到你吃，他才吃。刘文彩病时，我在成都给他买过三箱燕窝、一箱银耳。我买回来刘文彩说：不要买，这些都是假的，没有意思。我只买过这次，以后就没买了。我和刘文彩基本上顿顿都在一起吃饭，有时候刘文彩喜欢吃煎的鱼，我就自己去给他做。我们家每天都有人，顿顿都有肉。刘文彩上街茶馆里耍，就在街上吃饭。我上街买菜、耍，也在街上吃，自己带厨子去。我吃饭每次都有一桌人，刘文彩吃饭每次都有几桌人。（1980年12月26日王玉清口述）

刘文彩对于衣食并非“精益求精”，这为目击者所公认。刘文彩一个儿子回忆说，刘文辉曾向刘文彩引荐一个名厨，但刘文彩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把那个厨子打发走了，原因是那个厨子惯做高级菜，而刘文彩喜欢吃家常菜，觉得名厨的手艺在老公馆派不上用场。刘文彩随从刘泽高则说，刘文彩在安仁镇上街就餐，常备菜不过几碗萝卜、几盘红烧肉。只在过年、过生日才热热闹闹地大办酒席。刘文彩生日是农历冬月二十三，有一年生日曾请文彩中学学生上街游行庆祝。但刘文彩后来私下说这太铺张了，第二年生日前夕就

往成都跑，好避开老家的众多亲友。到生日那天果然清净多了。刘泽高称：“当时我在场，还有吴德让、刘元琮、刘元华、刘元恺等人。中午大家打小牌，下午三时，在南大街摆海参席”。薛畴久也断言刘文彩决非饕餮之徒——

> 刘吃菜都不大舍得，上街都未进馆子里炒过菜，尽是家里喊厨子去做。家里腊肉是终年不断，其他就未吃啥了。凌旦在的时候，每顿要吃得好些，四五样荤菜；王玉清来后，只有二三样毛毛菜。（庄园档案67宗D9卷）

后来的著述却称，刘文彩餐厅“肥酒大肉、山珍海味顿顿不离（原文如此——引者注）……，要啥有啥，奢侈浪费就不用说了”。刘文彩本人“更是一个饭桶，……吃的像猪一样胖还要吃洋参、鹿茸等补品”（《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说明》）。这些情节就不免是夸张了。

在全国共诛刘文彩的几十年中，王玉清不知被提审了多少次，每次她都是据实相告，从不迎合时好信口胡诌，借糟蹋刘文彩来换取自我生存环境的改善。如今再度面对“刘文彩究竟坏不坏”这个命题时，她依旧快人快语：

> 我一个妇道人家，对刘文彩外面的事不甚了解。我只是站在妻子的份上觉得，刘文彩这个人的性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除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爱我）了，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真正爱过我。至于刘文彩坏不坏，坏，是肯定的，不坏那么多钱从哪里来？因为那个社会就是那个样。再说刘文彩手下有那么多的人，刘文彩既不能保证他们不做坏事，他们做了坏事，刘文彩也不能保证不涉及到他。（《地主庄园沧桑录》第198页）

很明显，她对刘文彩仍然是一往情深。

三位如夫人互相倾轧，闹得刘文彩老公馆鸡犬不宁。

刘文彩暮年再娶，无疑是对三位旧太太的公开挑战。他与王玉清愈亲密，这种挑战就愈扎眼。早已暗潮汹涌的刘文彩老公馆，由此更加动荡不安。

王玉清始料不及。80年代追忆旧事，她还感叹："我在（刘文彩）屋里比做活路还恼火，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要费脑筋。"她不知所措，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我与他（刘文彩）一结婚，尽管他对我好，但我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开始了。"

锋芒最露的是杨仲华。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杨仲华在王玉清的脑海里仍是一派狰狞：

> 她很凶很恶，经常打骂丫头。有一次服侍我的谢大娘给她端饭去，她就把饭碗给谢打去，说她（谢大娘）不应叫我太太。谢说（王玉清）都是总办接的，不叫太太叫啥子。当时我从外边过时听到，我很忍气。以后我才告诉刘文彩。刘说，你咋不给她吵吗。我说你都在外边给人家解决事情，未必连屋头的事都解决不好?

刘文彩的一个儿子对此却另有说法：

> 其实杨仲华是能忍的，忍多年了，也"忍"惯了。使她和王玉清发生冲突的是"名分"问题（旧时大家庭

最重视）。事情发生在日机袭蓉频繁那段时间，杨避空袭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佛堂就是那时布置的）。杨、王见面尚相安无事。杨住在堂屋侧，王住后院。一次老家的谢大娘谈话中提到王时，说“太太”怎样怎样，杨就不高兴，问啥子太太呵（这种情况 四伯家是称“新太太”），骂了谢大娘。谢认为，家里（老家）一直是这样称呼王，又不是她发明的，挨了骂很不高兴，就去告诉王。王向刘（文彩）说了，刘也没有和杨吵。是杨觉得一个家里两个“太太”，叫起来不知是叫谁，王玉清本来是娶的“小”，这一来就像“两头大”似的，一生气就搬到崇庆县住了几个月，空袭稀少后，又回成都。其实并未大闹。

不管杨仲华“忍”还是“不忍”，闹还是没闹，她对王玉清都不构成实际威胁，因为她常住成都，与王玉清很少谋面。与王玉清朝夕相处、因而摩擦系数最大的，还是凌旦和梁胖。王玉清晚年回忆——

> 刘文彩接我，梁胖不安逸，她们几个也不安逸。梁胖跟刘文彩傚（赌）气，饭都不出来吃，每天都要把饭给她摆在屋里。她一天到晚就在屋里吃鸦片烟。

但梁胖也不构成实际威胁，因为她胸无城府，而且她在刘文彩心目中本来就没有地位。

倒是凌旦颇有些心计。她不像杨仲华那样与王玉清直接“交火”，也不像梁胖那样与王玉清“冷战”，而是实行接触“政策”，和王玉清套近乎，争取“和平演变”。但她的苦口婆心仍归徒劳——

> 凌君如挑我走，她叫我不要跟到刘文彩。她给我说：你怎（这）么好一个人，咋个跟到他。你随便找一个都比他强。我没开腔，我想我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的，不管他好坏都要跟到他。凌君如走了几年后，我才给他说的。刘文彩说：你咋个不早说。我说：我给你说，你们好吵。

三位如夫人互相倾轧，闹得刘文彩老公馆鸡犬不宁。在这场混战中，初出茅庐的王玉清虽是众矢之的，却始终稳操胜券——刘文彩作后盾，谁也莫奈她何。在刘文彩看来，有王玉清为伴，晚年再无孤寒之忧，那两位都市如夫人也就无足轻重，没必要继续迁就她们。对她们从此不再客气，加紧“治理整顿”。一天早上，他把如夫人全都叫到他的房间，一脸严肃地说：当着你们三个的面，我给你们说好，每人每个月二十块零用钱。够用就好，不够用，自己养猪、喂鸡去找钱。不要拿了我的钱到处乱跑，惹事生非。凌旦听了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梁胖则从刘文彩床头上的钱盘子里抓了两个银元，怒冲冲地转身就走。刘文彩毫不理会她们的抗议，当月兑现。这番“经济体制改革”，其矛头表面上指向凌、梁、王“你们三个”，实则只是要剥夺两位都市如夫人的经济特权，对王玉清并无丝毫束缚之意。王玉清自己就说：“梁胖她们走后，我用钱就是随便用的。”

脉脉温情早就荡然无存。凌旦和梁胖之所以恋栈未去，无非是舍不得刘文彩的万贯家财。现在刘文彩完全撕破了脸皮，而且从经济上把她俩捆得死死的。她俩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纵情挥霍，荣华富贵已无从谈起。凌旦和梁胖万念俱灰，与刘文彩只能是分道扬镳了。

刘离异经过，王玉清印象极深——

梁胖是凌君如挑起走的。一天，我到亲戚家去吃酒碗，我家婆家的一个老表给我说，他看见梁胖走了，带了七口箱子，问我是咋的。我说我咋晓得嘛。我回去，刘文彩给我一张纸，叫给他搁好。刘文彩给我说，梁胖给他做（赌）气。他去问梁胖啥子事，梁胖说：随便你。我们刘文彩有点聪明，他就说：是不是你要离婚？梁胖说：是。刘文彩就说：你要离，我不留你。刘文彩是最喜欢热闹的人，是不想她走的。梁胖当真就要走，刘文彩就叫她马上写张离婚书。梁胖说她写不起，刘文彩就说：那你就叫薛副官（薛畴久）给你写。梁胖找薛副官给她写了。刘文彩叫她摸到写，要她的亲笔字。梁胖摸到写了，她摸的字多大。刘文彩说，你把你的东西拿起走，我不要你的。梁胖带了七口箱子走，刘文彩派人把她送走的。

梁胖走后三年，她就给杨仲华写信，说她要回来，她说儿女大了，她回来帮到一下。梁胖的手是巧的。刘文彩不要她回来。我给刘文彩说叫她回来算了，刘文彩说：她又不是哪个带不得她把她撵走的，是她自己要走的，不要她回来。梁胖也就没有回来，以后也就不知她的情况了。

梁胖走后，凌君如借口她妈病了，也就走了。凌君如走后，刘文彩给她写了几封信叫她回来，去人接她，她也不回来。

妻妾成群的日子至此终结，庄园中的明争暗斗告一段落。刘文彩如释重负，他终于可以享受恬静的家庭生活了。

四位妻妾，没有一位不受刘文彩拖累，历尽磨难。倘若她们嫁到普通人家，过男耕女织的平常日子，未始不能与夫君白头偕老。却和刘文彩结缘，终为刘文彩所误。

凌旦和梁胖自由了。可对她俩来说，这并不美妙。像她们那样的女子，只有藤而没有干，所以从来都只会依附缠绕而不可能独立临风。假如无干可依，无枝可绕，她们将孤悬空中，听凭摔打和践踏。自由之于她们当然不是天堂，而只会是无边的苦海。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梁胖悔不当初，不惜向昔日的情敌求情，仍然欲归不能。凌旦虽然走得那么坚决，也没能走进再生之地。最初几年，她与演员王闻仁打得火热，两人坐吃山空。凌旦年近不惑，无法重操旧业；又不愿抛却贵妇风度，屈尊下嫁。风雨飘摇之中，倍加怀念过去的锦衣玉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途。在她看来，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她与刘文彩有过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死恋”。现在既然她已“幡然醒悟”，庄园中不会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她万万想不到刘文彩会如此绝情。王玉清追忆：

她走四五年后就想回来了。她回来过，是刘文彩把她拉出去的。刘文彩不要她。凌君如抱了两个男娃儿回来。我给刘文彩说情，叫他把娃儿收到。既然不要她，给她几百（块）钱，她拿去做一个小生意。刘文彩说要给她，（但）我不出面。我说，我出面给她。我给凌君

如五六百元钱，两个娃儿丢在家。娃儿调皮不读书，天天在家钻床脚，偷糖食吃。刘文彩发气，说把他们送人。那时我妈还在，我说送到我妈家。刘文彩说：妈妈那么大的岁数了，还要她操心。刘文彩不同意。两个娃儿在光相寺读书，每个星期回家。我们去转田坎，都要教他们好好读书，不然人家瞧不起你。后来有几个星期没见他们回来，我就问：老五、老六呢？刘文彩说：送人了。我一直不知道送给谁了。

真是神仙打仗，娃娃遭殃。

但此后刘文彩对凌旦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凌旦还能依靠刘文彩在叙府的房租过日子。可这并非长久之计——土改时，刘文彩的全部家产都被没收，凌旦再没有房租可支，不得不回到中场镇娘家自食其力，晚景非常凄凉。目击者周少英 1976 年 5 月 12 日供称：

解放前，我同凌旦的妈住的是对门，那时经常见到凌旦。解放后就只见过一次凌旦。

记得是生活困难时期，大概是 1962 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桥北街见到她。她头上戴了个烂草帽，穿了一身很烂的蓝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讨饭。她还搞了些破烂，卖糖、卖包子（五角钱一个），跟一个陈四姐在一起。我见到她，看见她那个样子，很惊讶。我问她："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发刘文彩，说不定政府还会给你个事情干呢。"她说，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谎说，她从叙府来，钱包丢了，没法，只得讨饭，晚上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我就不相信，能住

火车站，能讨饭，哪里有钱呢，说明把钱包丢了是扯谎。由于我们过去认识，她就在我们这里住下，当时我们住在青石桥北街36号刘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刘婆婆家（刘婆婆已经死了），搞了个地铺住上。住了几天，我们大伙给凑了一些破烂，如绣花枕头等，她拿走了，去摆摊子，以后就再没有来。

自那次见凌旦后，我再没有见过凌旦。刘文彩太坏了，把凌旦整的不轻。

凌旦现在是否还活着，不太清楚。（庄园档案67宗D10卷）

周少英为凌旦指点的确实是条光明大道。如果她顺应潮流，以其特殊身份“交待揭发”刘文彩，肯定轰动全国；作为“反戈一击”的有功之臣，何愁没饭吃。但即便是穷途末路，她仍旧“不想去找政府”，拒绝提供炮打刘文彩的素材，顽固到底。可见她对刘文彩还不是一点情义不讲。估计她不可能久在人世，否则，后来的文革狂飙怎么都要把她推上风口浪尖。

“红颜薄命”，这个古老的法则真是万古常青。

第三如夫人王玉清，同样饱经风霜。刘文彩刚刚“出土”，她就成了“牛鬼蛇神”，与刘文彩同台亮相。1959年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专辟“王玉清寝室”，其解说词云：

王玉清这个活狐狸，为了取得她丈夫的喜爱，常以打干姊妹的手段，勾结恶霸、地主、官僚和伪乡长等的太太小姐们到她家吃烟、打牌，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并与刘文彩进行无耻勾当。

王玉清每出入一步，不是小轿车就是私包车、轿子或滑竿，后跟上了（丫）头和贴心随从。在吃的方面，她更讲究阔气，一顿要吃三十几个鸭子，为什么呢？因为她只吃鸭子足上的蹼；在住居和穿着上，那更不消说了。请看，这室内睡的床被、穿的衣服、用的家具和各种摆设等，不知是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经过加工整理，这些内容被收入《刘文彩罪恶的一生》——

刘文彩把他的宠爱集中到比他小三十多岁的王玉清身上。王玉清喜欢吃鸭，刘文彩命他的厨工每次宰杀三十多只鸭子，取下来用人奶文火煨给她吃。王玉清吃饭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窝汤。为了提高她的食欲，刘文彩千方百计增加她的活动能量，办法就是让她在逍遥宫里，和其他地主、官僚的太太、小姐一起争夺红球，或者扔下一个金戒指，让她们抢着玩。

这显然更生动，更有感染力。

60、70年代，有两个中国女人的生活细节最为公众津津乐道。一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的传闻，再就是刘文彩爱妾王玉清吃鸭脚板的传闻。在那个欲求温饱而不可得的匮乏年代，这当然是暴殄天物、奢靡无度的范例。时至今日，游客访晤王玉清，"吃鸭脚板"仍是他们提问的热点。对此，王玉清啼笑皆非。她说：

吃鸭脚板的事是有的，但并不是为了奢侈。像当时刘文彩这样富有的家庭，吃鸭子是常事。恰恰他家的公

> 子、小姐都不吃鸭脚板，一是怕脏，二是嫌没肉。我是从农村来的，舍不得把鸭脚板都倒掉，每次就留下来吃了。四川人都会养鸭子，哪个会把吃鸭脚板当作享受呢？（《地主庄园沧桑录》第198页）

义正词严的指控，竟然又是一个“误会”。

至于其他“罪恶”，如引诱十姊妹“与刘文彩进行无耻勾当”，如在所谓“逍遥宫”健身，王玉清的答复很干脆：“乱说！”

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潮中，谁愿听她的解释？又有谁会相信她的解释？刘文彩既然是中国头号地主，作为刘文彩惟一健在的爱妾，她当然就是中国头号地主婆。中国头号地主婆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对她怎么穷追猛打当然都不算过分。

回忆自己的后半生，王玉清没有哀怨，而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她说：

> 刘文彩埋没几天就解放了。杨仲华她们走我不晓得（她们没叫过我走）。胡宗南的队伍没来她们就走了。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刘家的侄儿媳妇给我说部队来了，快走，我才走的。我到乡下陈家去没住几天，就坐鸡公车坐到三江口，然后，雇一辆轿子到成都。隔几天胡宗南的队伍就到安仁了，我们家的东西也抢了。解放后，退押组在（成都）慈惠堂街找两间房子，杨仲华和我一大家人住。……我们一大家人的生活是刘文辉帮助的。有时刘元华的媳妇到她娘家去拿点针线活路来做。我帮别人改点衣服，做咸菜卖。我卖过一段时间的纸烟，织过纱布，解放一年多去读过识字班。这样过了四

年多，人家给我介绍（四川省）文史馆的姜闻山。祖重山说的媒。祖原是在二十四军（防区）当县长，解放后收荒，他的女跑会府街做生意。祖他们认识文史馆的陈老师，他们跟陈老师的女人好，他们说起的。姜闻山是辛亥革命人士，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的。姜有三个儿，姜世修（老四）我去几年就死了，世全还在，小的世洪和我侄女结婚。我和姜结婚时，我四十几岁，姜已六十几岁。

王玉清与姜闻山没有多少感情可言，因为她在晚年讲过："我这一辈子除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爱我）了，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真正爱过我。"姜闻山虽然没有给她爱，在她却是不可或缺——姜乃辛亥宿老，文革前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他荫庇，王玉清虽已"臭名昭著"，但人身上还未受到伤害。1964年姜闻山病逝，王玉清就成了旷野中一棵无助的孤树，听凭摧折。1965年11月28日，成都市慈惠堂街派出所通知她："这儿没有你的户籍，你回大邑去吧。""没有户籍"不过是个由头，主要原因还是政治的——其时，泥塑《收租院》已大红大紫，庄园陈列馆广场上频繁举行的斗争大会，需要她现身说法。她必须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跪"。王玉清就这样被赶回蔡场老屋，当了二十多年的活靶子。

当"活靶子"是"义务劳动"，一点报酬没有。平时王玉清就和贫下中农一同下地挣工分，用王玉清自己的话来说，"一直出工，一直没补过钱"。农闲做针线活，捞点外快买油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戏落幕了，王玉清的活靶子生涯到了头。1980年摘除"地主"帽子，不仅加入了"人民公社社员"行列，而且当上了五保

户。现在定居安仁镇，孑然一身。当地政府每月补贴的120元钱，就是她的全部收入。在一间简陋至极的平房里，天天面对佛像，虔诚地念叨“阿弥陀佛”。

刘文彩夫人杨仲华30年代初迁居成都，与刘文彩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娶了王玉清，刘文彩对她更冷淡，一年到头难得去几次成都，去了也只住两三天。见面很少，可说是咫尺天涯。只有一次朝夕相处了一个来月，还是因为日机空袭成都，杨仲华不得不回老家避难。那段时间，刘文彩把烟具拿到杨仲华房间，天天和杨仲华一起烧大烟，对杨仲华算是以礼相待，实际上很不耐烦，常在背后抱怨：她咋个还不走喔。

彼此都是敷衍，彼此都是活受罪。

杨仲华母子在成都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全部源自刘文彩在成都郊县的田租（每年约有千石黄谷）。30、40年代，寓居成都的刘氏家人大多有小汽车；杨仲华也有一辆，却是出厂近二十年的老爷车，发动机都让人拆走了，根本不能使用。杨仲华觉得很失面子，嘱孩子们回老家时向刘文彩说项，给她换辆新的。刘文彩总是回答说，修新公馆开销太大，过两年再说。可新公馆刚刚落成，文彩中学又开了工，刘文彩手头更紧，不但未如约买车，反而把杨仲华名下的田租收走了一半。杨仲华也无可如何，买车之说从此不提。

关于杨仲华的后半生，她的一个儿子回忆说：

> 杨性好善，每年冬天都要捐给善堂大米数千斤，施舍贫苦。四十岁后开始学佛，念经吃素。此时除亲友中有重大事情外，不再出门应酬。解放时，由于刘（文彩）刚去世，所有家属都弄不清财产情况，成都的家和老家在刘文辉起义后，都遭到蒋帮溃军的洗劫，因此，

民主改革时期各项经济任务（公粮、退押、补税等等）全压在她的头上，困难重重。而王玉清则因外相老实，又是老夫少妻，一般总认为是强迫婚姻，反而得到同情和宽大。杨把成都家产应负担的任务，罗掘俱空地完成了后，还要她负起刘（文彩）的整个家产应尽的任务，弄得焦头烂额。后来还是在重庆的刘文辉知道了，慨然把欠数担了过去，杨才得以松口气。

杨仲华……由于早婚多育，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又受凌（旦）事（件）的刺激，健康更差。在叙府时就常以鸦片疗疾，逐渐成瘾。1937 年为了三儿子的耳病，下决心戒了烟（在那医药落后的年代里是很痛苦而且危险的事），带三儿子到平、沪求医，不料治病无望，反而碰上“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抗战”，被困在平、沪近两个月，担惊受累地逃难回家，身心更是大大受损。此后大病小病常年不断。解放后，迁住善堂的一间偏房里，每天拐着两只改组派的小脚，往返步行二三十条街，到女友家的缝纫组去揽些零活维生。枉自有众多子女，却无一个可以依靠的。……四儿在起义部队改编后，编入进藏部队作战士，杨仲华因此才有个军属的光荣，不无慰藉。（19）53 年一次旧病卧床，心跳突停。如果医疗条件好，也许能抢救过来，但那时一切都谈不上，就此去世，年仅五十三岁。综其一生，枉在富贵之家走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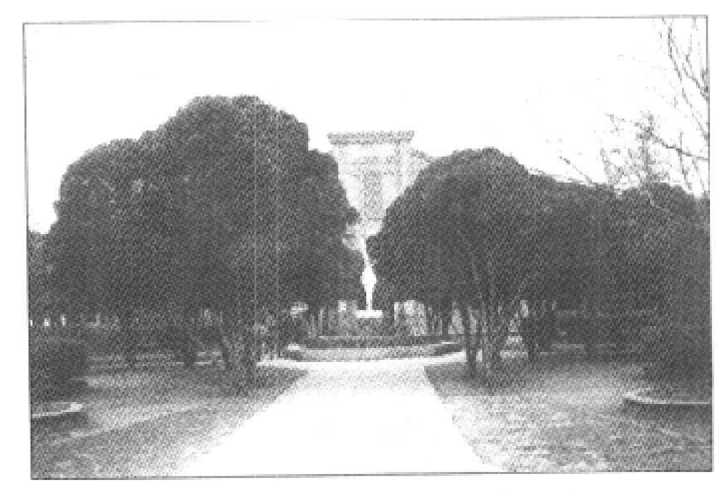
四位妻妾，没有一位不受刘文彩拖累，历尽磨难。倘若她们嫁到普通人家，过男耕女织的平常日子，未始不能与夫君白头偕老。却和刘文彩结缘，终为刘文彩所误。可见富贵并不仅仅是浮云，有时简直就是陷阱。

在私生活方面，刘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声色犬马，眠花宿柳，用之于中年刘文彩，可说十分贴切。这不足怪。富贵思淫欲，是中国暴发户的通病。刘文彩不过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权力和财富所腐蚀，不被恶浊的社会生态所同化，不沉溺于声色犬马，这无异缘木求鱼。



第十五章

死后并非万事空



1. 刘文彩三儿子刘元富
   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2. 文彩中学礼堂外景

在妻子儿女凄切的哭泣中，豪华棺木缓缓沉入墓穴。从安仁镇到墓地，挤满了围观的乡民。唢呐声声，风幡飘飘。万众瞩目下，刘文彩逐渐从世上消失了。……

1947年，刘文彩六十岁，年岁不算太大，但身体状况已是危机四伏。这年过生日，刘文渊授意儿子刘元琥、刘元璪、女儿刘元慎，给刘文彩送了一幅寿联：

万事劳形，纳诸恬静；
三多祝嘏，养以太和。

但要确保刘文辉家族集团始终叱咤江湖，刘文彩必须胜任繁剧，事实上不可能“纳诸恬静”，“养以太和”；病情只会加重，终至不救。

刘文彩病情加剧，始自1948年2月。那天他从街上回来，一路上腹部总是隐隐作痛。刚刚跨进井坎门，一股血腥味突然往上涌，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他急忙扶住门框站稳，“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从这天起刘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西医诊断为肺病。但刘文彩不相信西医，拒绝入院治疗，只让中医到家里来把脉开方。病越拖越重，到了1949年春，刘文彩不能不承认在安仁已经没有治愈希望，这才同意去成都求医。带上王玉清，佣人刘二姐、乐玉英和一个厨子，乘轿子赴蓉，经过双流县擦耳乡，曾到“全福社”舵把子、著名的“红色袍哥大爷”徐茂森家里拜访，一起吃了顿饭。到成都住在文

庙后街公馆。文庙后街公馆有几套四合院，一个网球场，一间车房，还有一套花园洋房。四合院堂屋两边厢房，一边是杨仲华寝室，一边是刘文彩两个女儿的寝室。洋房有两层，一楼用作几个孩子的教室，二楼用作老师宿舍。刘文彩来了之后在洋房一楼大厅住下，王玉清就住在隔壁。仍然只请中医看病。据王玉清回忆，那段时间刘文彩的感情变得特别脆弱，梁胖和凌旦早就走了；杨仲华不打照面；几个孩子各有各的事，隔三差五来探望一次。亲属中只有王玉清天天陪着他。刘文彩很伤心，“经常爱哭”。有一次王玉清说头昏，刘文彩一听便双泪长流，说：我的命真不好，就你一个人照看我，你自己也弄病了。王玉清赶紧劝他：我没事，我只是头昏，可能是休息不好的缘故。你好好养病。你总是哭，咋个把病医得好嘛。但王玉清根本劝不住刘文彩，刘文彩“想想又哭”。王玉清只能暗自落泪：“那段时间把我眼睛都哭蒙了。”

住在成都，看病拿药方便得多，病情却没有丝毫缓和。1949 10 月 17 日清晨，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早就醒了，听着窗外乌鸦的叫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一口也吃不进。刘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没心思吃,公馆的气氛显得分外压抑。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刘文彩不耐烦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谁都拗不过他，只好派人去田颂尧公馆和刘元瑄公馆叫来两辆小轿车、一辆吉普车，准备启程。此前，刘文彩早已命随从杨孟高执笔，立下遗嘱。遗嘱规定，原先在成都湖广街给王玉清买的那套院子，还是归王玉清；另在安仁街上划出一套独院、十二个铺面给王玉清。杨仲华不高兴。杨孟高私下劝她：这有什么，几个儿女都是你的，除了王玉清那点东西

外，其余东西也都是你的。杨仲华这才稍稍宽解。

奄奄一息的刘文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几的个子，连羸弱的王玉清都可以抱上抱下的。大家小心翼翼把刘文彩抬进小轿车，刘文彩靠在刘二姐身上躺着，脸色蜡黄，双目无神。车开得很慢，开到离成都二十里地的簇桥，刘文彩突然发作，昏厥了过去，怎么也喊不答应。大家吓坏了，怕他死在路上，车队回头又朝成都开。王玉清则回安仁拿早先准备好的寿衣和棺材。车开进文庙后街公馆，开到花园前面停下，几个人把刘文彩抬出来，放在台阶上的一张椅子里。刘文彩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这一抬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没有回到安仁，轻轻叹了一声，然后头一偏，断气了。大家手忙脚乱地赶紧把他抬进室内，一个个围着他哭。不知是谁跑到刘元瑄公馆，用电话通知了刚刚抵达成都的刘文辉，刘文辉马上乘车赶来，一看刘文彩已经断气，连连顿脚，大喝："哭有什么用？还不赶快去请医生！"平时总是神色安祥、从容不迫的刘文辉，这时完全失态。家人如梦初醒，请来了一位和刘文彩私交甚笃的教会医院院长。院长给刘文彩打了两支强心针，第一支照常规打在手臂上，见没有反应，意识到打错了位置，赶紧在心脏上补打一针。仍然没有反应，这才结束抢救，把刘文彩放到床上。不久，王玉清就从安仁赶了回来。因刘文辉反蒋起义已到最后关头，当局强化了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监控。所以刘文辉一再嘱咐不要太过铺张，以免惊动当局。在成都办的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排场。杨仲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请和尚为刘文彩念了一个多月的经。随后将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这时已经是 1949 年 10 月。

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先陈放在文彩中学礼堂，吊唁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在老公馆办席，不问远近亲

疏，也不问门第官阶，皆可戴孝帕，吃丧酒。接着就下葬，墓地是刘文彩生前指定的。1946年春，刘文彩估计自己来日无多，派了三批风水先生选墓址。刘文彩的祖坟林在安仁镇场口，相传那里是一块“宝地”，风水先生称作“独虎挂印”。但刘文彩不愿意葬在那里，他要选一块更好的地。第一次选中距安仁镇十多公里的李油榨碾，据说李油榨碾曾有一片水泽，水泽中央有座小岛，小岛像球一样飘浮着，却又稳如泰山。风水先生都夸这儿好，取名“水上浮月”。可刘文彩斟酌再三，还是改变了主意，要风水先生再选。最后选中了“三埂四梁”一块面积2.5亩的稻田。这块稻田土质非常神奇——田里的稻子从来没有病虫害；不用施肥，稻子也会长得蓬蓬勃勃，而且田里从来只长稻子不长草。那时，安仁地区平均水稻亩产是六百来斤，这块田水稻亩产八百斤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有人做过试验，在陆地上着意培植也难以成活的柏树树苗，在这块田里，随意折根枝条插进去，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刘文彩想办法把这块稻田换了过来，然后请来民工，从远处运土把稻田填平。一年后，又把这块稻田划为两半，偏东的一半修了一座长约两丈、宽一丈多的气势恢弘的大坟。坟背用钢筋水泥和鹅卵石筑成，厚达1.8尺，有若地下堡垒。偏西的一半则修了排砖瓦结构的平房，供守墓人居住。守墓人有三个，一个叫郑廷山，一个叫刘叔通，再一个就是刘清山。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头，刘文彩给他们每人两间房，两亩水田，还赠送全套生活用具。守墓人从此吃穿不愁，对刘文彩感恩戴德。刘文彩去世五年后，六十四岁的刘叔通无疾而终；七年后，七十一岁的郑廷山也溘然长逝。1958年刘文彩隆重“出土”，刘清山老人则以身殉职。

在妻子儿女凄切的哭泣中，豪华棺木缓缓沉入墓穴。从

安仁镇到墓地，挤满了围观的乡民。唢呐声声，风幡飘飘。万众瞩目下，刘文彩逐渐从世上消失了。他的消失可说是恰逢其时——他是和他的时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个时代是典型的乱世，而他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奇才。他和刘文辉固然是两位一体，但他的性格与刘文辉却是迥然不同——他远不像政治家刘文辉那样张弛有度和善于变通，更多江湖游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羁。所以，他只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空间和用武之地。他在他的那个时代的最后一刻辞世，与其说这是巧合，倒毋宁说是冥冥中的刻意安排。

刘文辉脸上一派平静，说："共产党中央早就派有电台住在我这里了嘛。"这下该轮到刘元彦大吃一惊了：没想到父亲比他"赤化"得更厉害，早就和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文彩尸骨未寒，刘氏家族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故。

194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刘文辉儿子刘元琦带上一个副官，乘人力车回成都新玉沙街公馆。下了车，副官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刘元琦掉在后面。副官一进门就踩响了地雷，轰隆一声，三幢楼房中的两幢灰飞烟灭。刘元琦转身就跑，侥幸拣回一条命，副官则尸骨无存。

在刘文辉公馆埋雷的是胡宗南部。12月14日深夜，胡宗南部向刘文辉新玉沙街公馆发起突然袭击，公馆驻有刘文辉的一个排。排长姓左。因敌来势凶猛，左排长下令闭门抵抗。敌从正门久攻不下，就从四面民房爬入，左排寡不敌

众，只好撤退。胡宗南部将刘文辉公馆洗劫一空，然后每幢楼房都埋了雷，本来打算炸死刘文辉全家，没想到胡宗南部溃退后，会有一位刘文辉副官先来探路，天机大白。后来解放军工兵从未炸毁的一幢楼房中又取出许多炸药和雷管，刘文辉全家幸免于难。

围攻刘文辉公馆两天之前，胡宗南部已对驻守成华大学的二十四军周桂山营、驻守武侯祠的二十四军董旭坤团发起了攻势。武侯祠战况尤其惨烈，敌在坦克掩护下，横冲直撞，董团阵地被迅速突破，官兵大部阵亡，董旭坤等数十人被俘。

与此同时，胡宗南部也闯进了成都文庙后街刘文彩公馆，连锅都端走了。刘文彩家人都成了胡宗南部的搜捕对象。所幸家眷因回安仁举行葬礼，早已离开成都。12月底，胡宗南部开进安仁。刘文辉原本派了一个连负责新公馆警卫，但一个连的杂牌军哪敢与数十万中央军对阵？只好换上便衣，分散躲到老乡家里，大局底定之后才各各归队。刘文彩的几个儿子则分散投奔几十里外的亲戚家。安仁老公馆和新公馆被胡宗南溃兵翻了个天翻地覆，所有贵重物品席卷一空。

刘氏家族的这些历险奇遇，是刘氏家族决定性的政治转折的必然结果。

这个决定性的政治转折，便是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彭县起义。

1948年春，中共川西地下党要刘文辉儿子刘元彦给他父亲捎个口信，那时刘元彦已参加学生运动，是中共外围组织成都“民协”成员。3月的一个早上，刘元彦趁刘文辉一人吃早点的时候，悄悄告诉刘文辉，川西地下党请求会晤。刘元彦原以为刘文辉多少会有些惊讶，因为他与地下党的过

从一直对家里保密。没想到刘文辉脸上一派平静，说："共产党中央早就派有电台住在我们这里了嘛。"这下该轮到刘元彦大吃一惊了：没想到父亲比他"赤化"得更厉害，早就和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文辉所说的中共电台，1942年8月1日就从雅安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发出了沟通延安的第一个信号。这个电台是根据周恩来刘文辉1942年2月重庆秘密会谈达成的协议设立的，台长王少春，由周恩来直接指派，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派驻刘文辉部的"特命全权大使"。自发报的第一天起，凡收到的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编上号，外加标题、按语送给刘文辉看，有重要的还请刘文辉转给成渝两地的朋友看。据闻，刘文辉是每日必读，实在忙不过来，就利用抽大烟的时间，睡在烟盘边，边抽烟边看被他称为"红色参考消息"的内容。有时看入神了，连烟都忘了抽。八年共二千九百多天，从不间断。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也由王少春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个电台的设立，标志着刘文辉与中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联共，起初只是基于政治上的利害。刘文辉晚年曾经这样交待："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介石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6页）随着时势推移，刘文辉联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真诚合作。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刘文辉已开始酝酿起义，于1949年9月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起义酝酿情况。周恩来复电说：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

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这个电报深深地打动了刘文辉，直到1962年写回忆录，还能记诵大部分原文。在此之前，王少春也提出过类似意见，要刘文辉对蒋方妥善因应，不可操切，埋头整训部队，积蓄力量。刘文辉这才按兵不动。1949年10月，西宁、银川、广州次第克复，战争重心转向西南。蒋介石亲临四川，指挥大军分别向川东、川南、川北集结，打算死守川康。刘文辉部成了从内部瓦解蒋介石"西南反共堡垒"的关键性力量，起义时机终于成熟。

刘文辉毅然决定赴蓉。当时成都是"西南反共堡垒"的神经中枢，许多人觉得刘文辉在这种时候赴蓉危险太大，一旦发生不幸，影响起义全局，刘文辉却认为去成都危而实安。一位地下党员劝阻他，他解释说："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成都，其祸速。"在关键时刻，他越是与蒋介石疏离，蒋介石就越会疑神疑鬼，对他的监控就越紧；必须去成都，与蒋介石同榻而卧，才能使蒋介石稍为宽解，避免起义意图过早暴露。而且他是川康实力派领袖，他去了成都，川康实力派才不致群龙无首，才能保证起义时步调一致。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大智大勇的决策。刘文辉不仅作出了这个决策，并且在去成都之后，一方面暗中调兵遣将，部署起义；一方面与蒋介石及其僚属酬酢言欢，将起义部署掩饰得滴水不漏。政治手腕之老辣，令人叹为观止。12月7日，刘文辉和邓锡侯从成都脱身，闯过重重艰险，于12月9日晨抵达邓锡侯部控制的彭县。潘文华也如约赶到。刘、邓、潘会商决定，马上起义。起义通电早已送往雅安中共地下电台，由王少春报请中共中央审定。起义通电发布后，因毛泽东已赴莫斯科，遂由朱德总司令复电慰勉。蒋介石闻讯，大惊，生怕重演"西安事变"，连饭也吃不下，即刻乘飞机从成都逃往台湾。

果然变生肘腋，蒋介石气急败坏，下令将刘文辉撤职查办，另委贺国光为“西康省政府主席”。胡宗南部在向二十四军展开攻击的同时，也向整个刘氏家族下了手，洗劫住所，埋设炸弹，追捕家眷，企图将刘氏家族斩草除根。国民党起义将领中，享受这种“待遇”的，仅此一例，可见蒋介石集团对刘氏家族怨毒之深。但报复行动无补大局，刘、邓、潘起义，彻底动摇了“西南反共堡垒”。解放军随即攻克成都，胡宗南部全线溃退，残部转而进犯雅安，企图打开逃往境外的缺口，但遭到二十四军顽强阻击，解放军主力兵团随后赶到，将胡宗南残部肃清，西康全境光复。

1950年2月1日，二十四军将西康防务移交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开赴刘氏家族重镇安仁、唐场两地。因躲避国民党军警追捕而逃匿的刘文彩家眷这才有了安全感，回到老公馆。但老公馆已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1950年6月底，二十四军与解放军第六十二军合并，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并入六十二军独一师，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并入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改编后，原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任六十二军副军长，原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兼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任六十二军一八六师长，原二十四军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任六十二军独一师师长。刘文辉本人则被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蒋介石压迫下苟延残喘的刘文辉集团，终于修成正果，走到了人民阵营。

刘文辉起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其他起义将领所不具备的。刘文辉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家族统治，刘文辉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政治集团。刘文辉起义因此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正因为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所以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把报复性攻击仅仅指向刘文辉一人，而是指向整个刘氏家族；而刘氏家族确实与刘文辉保

持了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在转折关头，没有任何动摇和分裂迹象。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眷一般都面临着以下三种选择，一是死心塌地地追随蒋介石而与新政权对抗；二是起义，走到“人民阵营”；三是既不反蒋也不亲共，而是出国当寓公。作第一第二种选择的固然不在少数，作第三种选择的同样大有人在。许多四川军阀及其家眷都在解放军入川前夕匆匆流亡海外，杨森和刘湘夫人刘周书都举家出走。刘文辉家族是个大家族，那么多的弟男子侄，而且都拥有巨额家产，却没有一个步杨森、刘周书之后尘，出国当寓公，都留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刘文辉的抉择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认为刘文辉已经把他们拜托给了共产党，他们已经拿到了新时代的入门券，所以不必像惊弓之鸟那样离乡背土。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新时代的来临，急于在新时代的天空下，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主要起义将领刘元琮，成了改造和清算的对象。而且不是一般的改造和清算对象……

俗称入土为安，更何况刘文彩入葬的是块风水宝地。但世事如棋，风水宝地并没能庇佑刘文彩亡灵和刘文彩后裔。

很快就发生了“刘元琮事件”。

刘元琮是刘文辉的亲信部将。生于1909年10月，幼读私塾，受幺爸刘文辉及兄长们的影响，于1925年从军，入二十四军军官传习所受训。结业后到大哥刘元璋任司令的雷马屏屯垦司令部所属部队，从士兵升任排、连、营、团、旅、师各级主官直至中将副军长。他处事鲁莽，作战勇敢，在军中以“猛张飞”著称。冷融遇刺，就有人说是刘元琮所

为——听到刘文辉骂冷融忘恩负义，刘元琮怒不可遏，指使部属傅德轩在温江伏击冷融。傅德轩得手后，即由连长升任营长。此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刘元琮对幺爸刘文辉绝对忠诚，则是没有疑问的。刘文辉对他欣赏备至，刻意提携，把他当作自己在二十四军中仅次于代军长刘元瑄的一个主要助手。

对刘文辉联共反蒋的决策，刘元琮也是倾心拥护。有关部门承认刘元琮有三大功绩。

一是配合解放军阻击胡宗南部队。二十四军起义前夕，刘文辉已预料到成雅公路是胡宗南部逃往西康的主要路线，因此部署刘元琮所属一三七师在成雅公路设防，迟滞敌人行动，以配合解放军围歼胡宗南主力，打好成都战役。当年12月，胡宗南见大势已去，果然以王陵基的九个保安团为前锋，沿成雅公路进犯西康，一度攻占洪雅县城。12月10日，刘元琮指挥一三七师向洪雅反攻，并“悬赏一万元，活捉王陵基”。两天后轻取洪雅，王陵基率部逃窜，刘元琮派一三七师朱食呼团留守，率主力继续追击王陵基。17日，与解放军三十六师会师丹棱，协同作战。但他没有料到，，一三七师主力开出之后，胡宗南部三个团又包围了洪雅。朱团奋起抵抗。刘元琮鞭长莫及，惟恐有失，急电刘元瑄派兵增援，终于稳住了洪雅阵地。

刘元琮的第二大功绩，是协助军代表改造一三七师。

1950年4月20日，刘元琮从成都回到驻扎大邑的一三七师，这时部队已经整训了两个多月，连队普遍建立了民主制度。起初，刘元琮听有些军官讲：“士兵闹民主，纪律松弛，下级不听上级管了。”他很忧虑，立即向一三七师军代表蔡正宁反映。他说话慢吞吞的，一着急还有些口吃，气咻咻地谈了此事，最后下结论说：“这样的政治教育怎么行，

怎么行？快不成军队的样子了。”蔡正宁耐心地给他作了解释，他便很快释然。从此积极配合军代表工作。

当整训进行到“军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这一课题时，刘元琮又有了疑问，对军代表讲：“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变质？很难说。”蔡正宁便又给他作了一番思想工作，他心服口服。

刘元琮回部队不久，解放军工作团就在一三七师开展了以戒烟为主的反对不良风气的教育活动。刘元琮对此举双手赞成。他本人原来也吃大烟，起义后就戒掉了这个恶习。这次军代表主持部队戒烟，他热情很高，亲自给烟瘾大的官佐谈话，劝他们戒烟。还从自己家里拿出一批粮食作戒烟经费，配制戒烟丸。当时天气已经热起来了，他便在唐场镇郊的河边树林里，开设了一个露天茶馆，经常邀约有烟瘾的官佐来这里一起喝茶、下棋、摆龙门阵，借此机会宣传戒烟。这样一来可以减少一些人在驻地违反军纪，二来也可以督促官佐们戒烟。士兵则由营连集体上课和组织戒烟。因为刘元琮密切配合，只用了两个来月的时间，一三七师绝大多数有烟瘾的官兵都甩掉了烟枪，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刘元琮的第三大功绩，是参加川西剿匪。在大邑整训期间，川西发生匪乱。刘元琮率一三七师在大邑、崇庆、郫县、灌县交界处，配合解放军参加了几次剿匪战斗，取得了一定战绩。尤其是该师所属补充团、黄以仁团和毛国懋团的文健营，在作战中表现突出。

起义后叛变的原四O八团二连连长刘树荣，在战场上被俘。约在1950年4月间，解放军驻邛崃剿匪指挥部将刘树荣押送二十四军军部处理。刘元琮代军长和军代表立即召集各师主官和军代表开会讨论。当时，部队对此事反应强烈，意见不一。有要求从严惩处的，也有为刘树荣说情的。

刘元琮在会上则是旗帜鲜明，说：我历来主张“杀一儆百”，只有将刘树荣枪毙，才能维护本军起义的光荣。最后一致决定：处刘树荣死刑。其间，川西大匪首李麻子曾通过刘元琮的卫士长游说刘元琮参加叛乱。刘元琮对传话人“呸”地啐了一口，严辞拒绝说：“我跟着幺爸起义，我们现在是起义部队，哪个当匪？！”（以上据《刘元琮起义之后》，见《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及改造亲历记》）

就是这样一个有功之臣，却在稍后自杀身亡。

1950年6月，刘元琮被任命为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7月，一八六师开赴黔东南剿匪，次年2月又赴朝参战。这些行动，刘元琮均未参与，而是只身留在成都。师长一职徒有其名，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改造和清算对象。

刘元琮之所以成了改造和清算对象，是因为他的大地主身份。

刘元琮是大地主，包括刘文辉在内的整个刘氏家族都是大地主。历史上他们是大地主，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要当大地主，怪不得别人。到建国初他们仍旧是大地主，就另有原因了。刘文辉对中共政策的研究是既深且透，不会不知道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不会不知道大地主会在建国后成为专政对象。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实上，当时中共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大地主身份已经非常关注。共产党驻香港负责人乔冠华就给刘文辉代话，要刘文辉拥护土改，要有资金投入工业。还有人明确劝告刘文辉，卖掉一些田地，转而投资工商业。这是因为中共已宣布执政后要保护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将是中共执政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依靠力量；资本家也就不会像大地主那样在建国初的社会改造大潮中受到直接冲击。但这些建议都为刘文辉所拒绝（刘元彦：《关于父亲刘文辉起义的回忆》，见《人物》1986年

第3期）。刘文辉之所以拒绝这些建议，有两种考虑，一是因为起义已到了关键时刻，蒋介石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盯得正紧。这时政治上任何一点异常表现，都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所以主张一切都不要有异常，一切维持原状。二是因为刘文辉相信自己和整个家族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继续当大地主，会得到中共的理解，而不致影响到他和他的家族的前程。起义前夜，张群把刘文辉召去，要他马上表态，究竟跟谁走。刘文辉假装慷慨激昂地说："这还用得着说吗？事实摆得很明白，……我又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资本家，样样都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张群听了很感动，拍着刘文辉的肩膀说："自乾今晚说的是真心话。"（《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41页）刘文辉明知自己"又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资本家，样样都占齐了"，结果还是跟了共产党。这是因为他坚信共产党绝对不会计较他和他的家族当时的阶级成分。他这样判断并非是盲目乐观。他一向注意研究中共的政策，尤其注意研究中共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政策。新华社刚刚播发毛泽东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就从驻雅安的中共联络员王少春手中得到了。其中一句话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反复揣摩，越揣摩越困惑，干脆把王少春叫来，要王少春当面解释。那句话主要是界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刘文辉认为这句话直接关系到他今后的命运："我是大地主，又是大军阀，也是大官僚、大资本家，无疑是革命的对象，人民阵营里有我的地位吗？"他问王少春，毛泽东那句话怎么理解？王少春知道了

他的意思，当时就表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整个剥削阶级，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且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指出，革命后的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政治制度。共产党之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敌对，共产党就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王少春并列举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后受到重用，李鼎铭参加陕甘宁边区联合政府等事实，来说服刘文辉（《苍坪山上的红色电波》，见《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及改造亲历记》）。后来傅作义北平起义，共产党果然对傅部起义将领既往不咎并大力宣传这个政策，这对国民党军政官员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国民党军政官员倒戈的主要因素之一。刘文辉从此放下心来。他认为，既然既往不咎，出于起义大局的需要，他和他的家族再当几天大地主，当然有百利而无一弊。所以，在接到乔冠华的口信后，刘文辉及其家族一分地也没卖出去，完全没有把在土地上的投资转向工商业，他和他的家族也就没有能够在建国前摆脱大地主的身份。

刘文辉本人确实没有为他的大地主身份所累。他的家族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元琮事件则是那些沉重代价的开端。

刘元琮只身留在成都，成了改造和清算的对象。而且不是一般的改造和清算对象，有关方面现在也承认，当时是把刘元琮当作“有代表性的大地主”来对待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个“有代表性的大地主”的“说理斗争”，促使他“认真退赔，带个好头，以推动减租退押和土改工作”（《刘元琮起义之后》）。实际上是要通过与刘元琮的“说理斗争”，来震动整个川西地区——连起义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师长都首当其冲、不能不低头认罪，一般地主谁还敢

抱侥幸心理？川西地区的土改也就是势如破竹了。这样一来，刘元琮是否“配合”，是否“低头认罪”，便成了川西土改第一战役成败的关键。正因为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川西党政首脑亲自出马作刘元琮的工作——在推行人民币、征收公粮、发行公债的过程中，在减租退押和土改时，川西行署负责人“很关心留在成都的刘元琮，多次同他谈话，动员他响应政府号召”（同前）。

如有关部门现在所承认的，在此之前，刘元琮对新政权在各方面都是积极配合的。刚被当作“模范运动员”培养时，他仍然积极配合——“当时元琮心情较好，卖了成都一处房子，上清了公粮，政府还给他家发了奖状，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减租退押开始也表现较好，他拿出了一些金银首饰、银元等退押”（同前）。

可以断定，如果仅仅要求刘元琮减租退押，刘元琮还会积极配合下去，说不准会真的成长为一个“模范运动员”。可惜有关方面要他做的远不仅此。1950年冬，大邑县唐场、安仁被确定为川西区土改示范点，1951年1月，川西行署负责人专程去唐场、安仁参加农民反霸控诉大会。据说就在这些会上，农民纷纷诉苦并呈递控诉书，其中有关刘元琮的历史劣迹38件。“农民群众要求人民政府为他们伸冤，要求让刘元琮回唐场依法处置，赔偿损失”（同前）。

刘元琮家乡成了土改示范点，川西行署负责人并且亲临刘元琮家乡听取农民控诉，这再次显示出对“模范运动员”刘元琮非同一般的重视。在听取农民控诉后，有关部门会如何因应呢？

口号声、叱责声响成一片，会场像煮开了的锅。农协干部正忙于排

解，刘元琮突然将他准备退赔的财物甩到地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川西农民有偏差！"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包药粉，迅速倒进口中……

在建国初的政治运动中，群众要求政府"依法惩处"起义将领，刘元琮不是仅有的一例。其他地区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也有类似遭遇。不同地区对此有不同应对。现在最为人们称道的应对是陈赓、周保中两将军的手笔。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第四兵团进驻昆明。这天早晨，领导云南起义的龙云部将卢汉远赴昆明东郊菊花村迎候。他拉住陈、宋两将军的手说："我主持滇政，匆匆四载，效傀儡登场，既负于滇人，又负于革命。如云南解放之完成，我即当引退而待罪。"

陈赓、宋任穷握住卢汉的双手，接过他敬献的一面锦旗，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云南起义的评价。宋任穷说："共产党对卢将军率部起义，表示非常赞赏，这次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你是有功劳的，共产党欢迎你，人民欢迎你。"

陈赓接着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也就是既往不咎，陈赓、宋任穷说到做到。

新政权成立后，城市依旧处于混乱之中。一些出人意料的群众集会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一天，陈赓正在读文件，卢汉前来造访。看上去惘然若失，远出郊外迎接时的热烈情绪，早已荡然无存。茶杯里轻

烟袅袅，他也不想喝。

“卢将军为何情绪不佳？是不是还记得那场球？”卢汉的篮球队与四兵团政治部篮球队两度对垒，均大败而归。陈赓安慰他：“胜负乃兵家常事。”

但卢汉告诉陈赓，他不是为球赛发愁：“我不理解的，是群众集会。”

“哦，我明白了。”陈赓劝慰他：“群众刚刚解放，想吐出心中的积怨是可以理解的。”

“说我是蒋介石的走狗也好，李宗仁的帮凶也好，我都能接受。说我是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这是颠倒历史。事实是……”

“卢老兄，你放心，人民至少会记住你的两条大功，一是台儿庄奋勇抗敌，二是此次率部起义。我党对卢先生的义举十分敬重。”

陈赓并且肯定地说，那些群众集会只是暂时的混乱，而混乱不是革命。“你知道，在混乱漩涡里最会有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你是共产党正式委任的省军政委员会主任，你以新政府成员的名义大力抓好城市管理，我马上派出得力助手配合你。”

很快，军代表奔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局势稳住了，再也没有出现针对卢汉的群众集会。

3月5日，陈赓在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上讲话，严厉批评接管人员：

“怎么能这么干呢！前天还和人家卢汉握手，转过身就骂人家，连《阿细跳月》里都编进个卢汉……我不是说咱们部队，可得注意，卢汉跑来告状。他是彝族人，不管他过去怎样反动，起义了，兵不血刃，和平解放了云南就是功劳。大家要好好执行政策，不要犯‘左’的错误，要做起义部

队、起义政府人员的团结工作。”他特别提醒接管人员：不要被群众的掌声冲昏了头脑，不要人家一称你英雄，你就想当“云南王”。

陈赓亲自保驾，卢汉有惊无险。

即使在陈赓率军事代表团出使越南之后，卢汉仍旧备受关照。

有过很多次，在碰头会上，时任云南省委第二书记并兼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的周保中将军拿出一些信件交给卢汉说：“这些是军管会收到的控诉，揭发卢主席的信件和状子。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你是一省的军政首长，难免不开罪于人，让人怨恨。加之你的起义行动，必然使阶级敌人仇视，所以在后面煽动怂恿，藉此诽谤和诬蔑你，损害你的形象。我们党是明辨是非的，对这类行动不置一顾。现在和以后，有类似的东西，我们都交给你看看，看后烧掉算了。你不必在意。”

卢汉沉默不语，接过状子，顺手交给秘书马子华。

回到家里，马子华把状子念给卢汉听。其中一份状子是海潮庵尼姑写的，指控卢汉修公馆时，强占了她的庙产。卢汉听了哭笑不得，说：

“海潮庵已经是只有一个老尼姑的尼庵了，她香火不盛，生活困难，多次请人来要售卖庙产，我都不要。后来要盖房子给回国的卢国澄夫妇居住，才接受了她这个要求，派人和她讲价，得她同意正式订立杜契，当中还通过佛教会和昆明市政府了解过，他们都证明她有庙产的所有权，可以售卖，我才买下来的。现有杜契为证，怎能说我强占她的庙产呢？杜契已交给军管会，你把这些情况写份说明，送交军管会。”

马子华即遵命办理。

安宁县一个妇女呈送的状子更离奇。信中称："我曾被卢汉公馆雇佣，做他少爷的奶妈。曾经言明每月给我工钱五十元，等到周岁断奶以后，给我全套铺笼帐盖，还给一副铺笼帐盖。可是我喂奶一年，便被撵出回家，不惟没有什么铺笼帐盖，就连全年的工钱都克扣不给，现在请求叫他家赔还全部损失。"

卢汉说："我的两个儿子是七八岁才从昭通随他妈上省城来的。另外卢国梅也没有请过奶妈。我一向坚持孩子要吃亲生母亲的奶，一来有优良的遗传，二来免得有什么传染病，更何况我家即使雇佣奶妈，何致于不付工钱，不给酬谢的礼物。这恐怕是谁也不会相信的。"然后嘱咐马子华，到安宁县去查查，"看是怎么一个刁妇，看她后面有无挑唆的人。回来告诉我！"

但马子华还没查，只读了一遍状子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那份状子出自他当年一位文学朋友的手笔，那位文学朋友后来"投笔从戎"，跑到南京考取了警官学校，毕业就做了国民党特务。解放初回安宁老家定居。

马子华来到安宁县城，与原告见了面。原告一口咬定状子上写的都是事实。马子华静听静观，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五十二岁。"

"你是哪一年奶卢家少爷的？"

"大概有三十几年了。"

"他家有几个少爷小姐？你奶的是哪一个？"

这一问，原告慌了，一忽儿说卢家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一忽儿又说是两个少爷。奶的是哪一个？她说："我奶的是大少爷。"

马子华又问了她一些卢家的情况，回答都是牛头不对马

嘴。马子华最后说：

“卢家的大少爷现在也四十八九，和你的年龄差不多了，难道十多岁还吃奶吗？二少爷也有四十左右，也不会再吃你的奶。你说的那些也不对。总之，大嫂，要本本分分的做人，不要受人挑唆，诬赖别人。如果你还不服气，你再到人民法院去告好了，但是你注意，诬告是犯法的。”

回到昆明，向卢汉作了汇报，卢汉叫他写个情况送给军管会。

还有许多状子，卢汉要马子华去查，都是查无实据。马子华便有了情绪。卢汉说：“对待这样的事要严肃认真，它关系到我的名声太大。你不要嫌麻烦！”责成马子华照旧写出调查报告，连同原函一并送到军管会。像这样控告卢汉的诉状源源不断，大概有三四十件，真是“案积如山”。马子华不胜其烦。后来还是周保中劝卢汉说：“这类诬告的莫须有的状子，匿名信太多。你以前为一省的军政首长，那有不受到抱怨之理。潜藏的特务或敌人，也会对你进行诬蔑，诽谤，挑拨，破坏你的形象和名声，老早我就劝你不必重视，看看以后一火焚之就算了。你要盘根究底，还要向军管会报告，实无必要，军管会也是看后就置之不理了。算了罢，以后我叫他们，凡收到这类信件或状子，一律销毁，不再送来给你了。”

卢汉从此不用操心，高枕无忧。

陈赓、周保中对卢汉问题的处理是妥贴的，这在今天已经是公论。刘元琮受到的处理，则与对卢汉的处理形成鲜明对照。卢汉被控，云南当局的理解是：这些现象必然发生，因为卢汉是一省的军政首长，难免不开罪于人，让人怨恨。加之卢汉的起义行动，必然使阶级敌人仇视，所以在后面煽动怂恿，诽谤和诬蔑卢汉，损害卢汉的形象。刘元琮被控，

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这样的理解。川西行署负责人亲自到刘元琮家乡参加控诉大会，接受农民诉状，回到成都就要刘元琮向农民“低头认错”，赔偿损失，找刘元琮谈了两次话。刘元琮不得不应允，但思想不通，“在行署委员会上没能认真检讨”。有关部门不依不饶，“又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约请三位民主人士继续到刘的家中恳谈，还邀请农民代表五人，同他多次说理谈判。”（《刘元琮起义之后》）

刘元琮并非不识时务，阻击胡宗南溃军、改造二十四军、川西剿匪，一直表现积极；减租退押之初，如有关部门承认的，仍旧表现不错，还受了奖。这些事实说明，只要严格执行统战政策，待之以礼，同时待之以理，刘元琮是可以和新政权合作得很好的。现在刘元琮有了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也就不能单单归咎于他的主观原因；换句话说，有关部门应该反省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统战政策，是否待人以礼，待人以理。有关部门没有作这样的反省，矛盾只能走向激化。刘元琮是个军人，而且是军中著名的“猛张飞”，性情极为刚烈，宁折不弯。作为起义将领，他很看重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承诺。他认定，现在非但不是既往不咎，而且在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时，有关部门也并没有对那些指控进行严格的甄别、核实，听见风就是雨。所以他本来就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愈是施加压力，愈是要用行政手段迫使他低头，他就愈反感，愈不服气。而在有关部门呢？是不服也得服，因为有关部门本来就把刘元琮是否“配合”，是否“低头认罪”，看作川西土改第一战役成败的关键。刘元琮必须“配合”，必须“低头认罪”，才能产生预期效应。而现在竟在刘元琮这个节骨眼上卡住了，有关部门怎么能够罢休呢？于是，双方都寸步不让，事实上是闹僵了——“拖延近两个月，终无结果”（同前）。

到1951年3月，退押进行到深入阶段，按当时政策，少数大地主除退还农民押金外，还要让他们赔偿损失。有关部门认定“刘元琮也属于这类情况的大地主之一”。在云南，当群众集会要求惩办卢汉时，陈赓的做法是派军代表稳定局势，不许再出现类似集会。在川西，则是政府组织集会，并把刘元琮交给参加集会的群众。第一次这样的集会是在3月15日，因唐场派来农民代表38人，将刘元琮告到川西人民协商委员会。协商委员会便召开会议，要刘元琮与农民当面对质，“农民代表对刘控诉、痛哭”（同前），实际上开成了对刘元琮的控诉会、斗争会。因为会上刘元琮仍对农民代表的要求“采取敷衍态度”。会后，协商委员会又派五人与刘元琮谈话，连续谈了四次，“刘的态度却愈来愈强硬”（同前），所承受的压力实际上已达极限。就在这时，唐场农民代表另向七县农协驻蓉办事处提出控诉，据说“‘七县农协’也发现刘自报押金数与佃农所报材料有出入”，便决定在3月22日召开“佃农代表对刘元琮减租退押核算会议”。刘元琮不能不再次面对群众集会，终于在这次集会上发生了不幸。

建国初，成都分为八个区。此次会议由刘元琮公馆所在地的第二区召集，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区工作组长主持。与会者一方是农民代表，一方是刘元琮。刘元琮身穿便衣，坐上自己的汽车来到会场。他把准备退赔的银元、元宝等摆到桌上，坐下来听农民代表发言，“但仍流露出对立情绪”。当一妇女代表哭诉“刘以往的残暴行为”时，有的代表要求刘站起来答复，刘置之不理。还有代表责令刘元琮：“跪下！”刘元琮听了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说：“我死也不向农民低头！”农民代表更火了，口号声、叱责声响成一片，会场像煮开了的锅。农协干部正忙于排解，刘元琮突然

将他准备退赔的财物甩到地上，撕下他身上佩戴的“川西行署”符号（刘元琮兼任川西行署委员），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川西农民有偏差！”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一包药粉，迅速倒进口中。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刘元琮吞下的是毒药。在会议室外面等候的刘元琮之妻吕介英，听到刘元琮喊口号，知道大事不好，马上冲进会场察看，发觉刘元琮已经服毒。工作组和刘元琮家属立刻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抢救无效，刘元琮长眠不起。

作为原二十四军主要战将，作为主要起义将领，刘元琮在川康地区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自杀，在川康政坛也就无异于晴天霹雳。震动最大的是有关部门——非但没能培养出一个“模范运动员”，为川西土改起立竿见影的表率作用。反而造成了刘元琮的自杀身亡。真是弄巧成拙。这意味着有关部门对刘元琮工作的严重失败，对有关部门是个沉重打击。震怒之余，有关部门对刘元琮作出了异常严峻的处分。在刘元琮咽气的第二天，川西行署就召开了以处理刘元琮自杀事件为主题的第十九次行政会议，并邀请川西人民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会议指控刘元琮抗拒农民的正义要求，不愿低头悔过，并以自杀逃避个人应负的责任。据此，会议决定了对刘元琮的三项处理办法：

一．由政府公布刘元琮案件处理经过及刘元琮的问题，

二．由行署及军区呈报并宣布撤销其行署委员及一八六师师长职务。

三．政府应继续接受农民正义的控诉与要求，按司法程序处理刘元琮的问题，继续赔偿农民的损失。

接着，召集了成都市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会议，据说是“一致拥护政府的三项处理办法”。还发动刘元琮的故旧友好揭发批判刘元琮的历史罪恶，表示划清界限。地方报纸

上批刘檄文连篇累牍，极具声势。

刘元琮已经身败名裂，有关部门仍未息怒，随后逮捕了刘元琮妻子吕介英。刘元琮准备自杀，吕介英毫不知情，却被视作“同谋”处以五年徒刑。1958年刑满，又判处三年劳教，实际上直到1983年才将她释放，吕介英失去自由达三十年之久。1983年的复查判决书全文如下：

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 刑申字第448号

吕介英，女，现年六十八岁，现住本市解放中路义坊巷新5号。1958年3月22日，本院(57)法刑字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介英管制三年，吕介英不服判决，1980年向我院提出申诉。经本院复审查明：原判对吕介英认定性质和适用法律不当。据此，特判定：一、撤销本院（57）法刑字第438号刑事判决书；二、对吕介英不追究刑事责任。

成都西城区人民法院（公章）

1983年7月18日

两年之后，吕介英又领取了一份她渴盼已久的文书，全文如下：

起义人员证明书

刘元琮同志，原系国民党陆军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于1949年12月9日在雅安参加起义，特此证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1985年6月20日

刘元琮的起义将领身份终于得到重新确认。1989年1月出版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及改造亲历记》，则将刘元琮列进《主要起义将领》名录。

这都是后话了。

刘元琮死于非命，并且死后仍不得安宁而遭受那样严酷的处置，家眷也被株连入狱，刘文辉自然是悲愤莫名。有一种说法，称刘文辉在得到通报后，曾向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告了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一状。此说虽不可考，但从此之后，刘文辉及其家族与有关部门、有关责任人的关系，确实是非常微妙了。

刘文辉家族跨进了多事之秋。

刘氏家族的悲剧，主角似乎是刘文彩，其实不然。大戏开演时，刘文彩早已作古，盛与衰，荣与辱，于他又有何干！再怎么锋利的箭矢，于他又有何伤！真正受难的，其实只是生者！

刘元琮自杀不久，川西农协将据说是安仁刘家的田契、佃约、大斗、铁镣手铐等剥削压迫农民的实物及象牙塔、象牙球等稀有物品送到成都市文化宫公开展览。这是安仁刘家“罪恶历史”的第一次亮相。

稍后，那些展品和相关文献资料被送交北京中央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展出。还有一些安仁刘家文物在大邑县文化宫展出。

1954年元月，大邑县筹办“农业合作化”展览，制作了所谓“刘文彩水牢”，展出后引起极大轰动，连正在北京

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代表们都听说了。代表们很感兴趣，要求到大邑县刘文彩老公馆参观。大邑方面闻讯，立即决定把“刘文彩水牢”从县文化宫移植到老公馆，并补充其他内容。于是将驻军从老公馆暂时迁出，收回部分原刘文彩老公馆的物品。由成都市农会和大邑县委宣传部出面邀请正在成都教书的舒志斌到老公馆主持展览设计。一切准备就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代表却因故未能成行，仅印度农业考察团到老公馆逛了一圈。

准确地讲，建国后刘文彩“声誉鹊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刘文彩老公馆从此成了四川方面的一道“名菜”，只要来了客人，便拿出来“招待”一番。

虽然在刘元琮自杀后，有关部门作了这么多文章，但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基本正常，没有大气候配合，再怎么努力，文章也做不大。反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气候，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则是中国政治气候改变的明显标志。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23日落幕，6月，有关部门即已责成大邑派员搜集整理安仁刘家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由此不难看出有关部门的心情是何等急切，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9年春节庄园陈列馆开馆，临时性展出至此终于升格为固定展出，原来的草台班子至此终于升格为正规军。最重要的是，刘文辉家族这篇文章，终于做大了并且可以做得更大。

有关部门实际上以整个刘文辉家族为目标，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文革和文革前就不说了，1978年出版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对整个刘文辉家族的关注更是更为明显。

在描述了刘文彩老公馆的布局之后，作者笔锋一转，说：

在大邑县斜江河畔的安仁、唐场一带，刘文彩的庄园，不过是较为突出的罢了。这一带还有好几座庄园，兀立田野，遥遥相望，真是黑压压一片，像一群嗜血的恶蚊叮在一个瘦弱的人身上。庄园的主人绝大多数都姓刘，而且都出自辛亥革命前还只是安仁镇小劣绅的刘文彩的祖父刘应良一家。这些庄园主包括刘文彩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和二哥的几个儿子以及刘文彩的堂侄大军阀刘湘。他们盘根错节，枝叶相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刘氏家族。……在那黑暗的旧中国，这一带的天是刘家的天，地是刘家的地，衙门全为刘家开，俨然成了刘家的天下。

在介绍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四川的军阀混战之后，作者断言：

恶霸地主刘文彩及其家族，正是在这种军阀混战的土壤上寄生出来的一簇大毒瘤。

刘文彩父亲刘公赞是“野心家”、“守财奴”；刘文彩祖父刘应良是“小劣绅”，刘文彩先祖则是“镇压过张献忠农民起义的官宦之家”。主持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有关部门仿佛并不知道，刘文彩祖宗同时也是刘文辉祖宗。

这样，刘文辉家族就成了典型的政治恐龙家族，中国头号政治恐龙家族。实际上是把整个刘文辉家族都钉上了历史耻辱柱。刘文彩不过起一个“龙头”作用。选中刘文彩当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用心良苦——刘文彩与刘文辉从来两位一体，是仅次于刘文辉的刘氏家族主要政治代表，刘文彩的

罪恶历史，诸如种毒贩毒、苛捐杂税、垄断商业，组织公益协进社大闹江湖，等等，整个刘氏家族都脱不了干系，刘文辉则是最高决策者。清算刘文彩的这些罪恶历史，对整个刘氏家族、对刘文辉本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对这一点，1978年出版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在介绍刘文彩缘何为官叙府时，先讲"刘文彩兄弟"以叙府为"防区"，自立门户，然后说：

> 这"防区"的制度，是在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的。……各独立的军阀，把自己队伍驻扎的地区称为防区，成了防区的土皇帝，依靠枪杆子独揽一切大权，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为所欲为。现在刘文彩的兄弟坐镇叙府，很需要一个搜刮民财的帮凶，于是很自然地想起了家中那个贪馋成性，刁顽狡黠的刘文彩……。

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把刘文彩说成"刘文彩兄弟"的帮凶，刘文辉的主犯角色，已是呼之欲出了。在陈述刘文彩的叙府暴政时，作者又评论说：

> 刘文彩更加卖劲地在防区里替刘氏军阀搜刮民财。他搜刮愈多，刘氏军阀的枪支和队伍就愈多，随之，刘文彩的官职和家产就愈高和愈膨胀……

这里的"刘氏军阀"，稍懂一点四川近代史的人就知道说的是刘文辉。

在精心创作的刘文彩故事中，夸张虚构是家常便饭。但在一个关键环节上，即刘文彩刘文辉兄弟相互关系这个环节上，却是定位准确，并不回避刘文辉为主、刘文彩为辅的历

史真相，并不回避刘文辉的“罪恶历史”。如此“实事求是”，当然不是没有原因。

但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有关部门必须把刘文辉处理成背景人物，不能让刘文辉走上前台。对刘元琮，则完全没有这层顾忌。于是，刘元琮便成了刘氏家族的第二号霸王龙。蜡铸模型中，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而这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都是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的。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凶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后来编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又把参与平定川西暴乱的刘元琮变成川西暴乱的参与者——“刘元琮伪装起义后，也在其庄园内暗藏枪支弹药，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

刘文辉家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困厄之中，又发生了一桩血案——1968 年 10 月 22 日，伍培英自杀身亡。伍培英曾任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1949 年 12 月 9 日追随刘文辉在西昌宣布起义，阻击胡宗南溃军有功，受到温江军分区表扬。二十四军改编后，出任解放军六十二军独一师师长、六十军炮三师师长。抗美援朝前夕调往南京军事学院，因教学工作积极，受到学院奖励，并当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 年转业，回四川不久，庄园陈列馆就开了张，伍培英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文革初不堪虐待，绝望之中，踏上了刘元琮的覆辙。

话说回来，对刘文辉本人，中央政府是持保护立场的。刘文辉与周恩来交情很深，刘元彦回忆：“我父亲在解放前的一系列进步活动，是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进行的。具体说，是在周总理完美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领导下进行的。在每个形势变化的关头，周总理都及时地给予指

导，使我父亲不致走入歧途。……解放后，形势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周总理这种及时的指导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具体。”对刘文辉身体的关怀，尤其“无微不至，令人感动”。正因为如此，尽管刘文辉与四川方面的关系在刘元琮自杀身亡后一直很微妙，四川方面对刘文辉本人仍不能不有所忌惮。1958年6月，四川方面开始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7月，中央政府便把刘文辉从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调到北京，要刘文辉接任中央林业部部长，刘文辉实际上是官升一级。这既是为了避免陈列馆开张后刘文辉处境尴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刘文辉的一种安抚和补偿。即便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刘文彩已经扬名全世界，刘文辉本人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当红卫兵前去揪斗刘文辉时，刘文辉已被周恩来指派的专使接走，护送到某医院“疗养”。这里还有则笑话，刘文辉出去“疗养”，没叫上夫人一起走。他毫发未伤，夫人没地方躲，吃了不少苦头。后来回到家，夫人抱怨为什么不带上她一起走时，刘文辉一脸的无奈：“没办法呀，总理的名单上只写了我没写你，我怎么能自作主张呢？”直到去世时，刘文辉仍然是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虽然如此，刘文辉的晚年生活并不愉快。1995年3月，笔者采访刘文辉长女刘元恺，刘元恺回忆：

> 地主庄园刚刚开始登报，《××日报》第一个先登，就把刘文彩的事情登出来，登出来过后《××日报》记者就采访我父亲。我父亲就说了一句。当时他心头很不舒服。他就说：我莫得多余的话跟你们两个说，嗯，刘文彩这人，你们登的那些事情好多不是事实。但是，这个……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该我负责。就是因为我

的关系造成他这样子的，因为当时我也有局限性嘛。

1962年，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刘文辉的回忆录——《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回忆录重点记述了联共反蒋的具体过程，实则是提醒公众尤其是提醒四川方面注意刘文辉的起义将领身份。同时也承认了刘文辉在川南、西康苛政中的主要决策者地位。参与回忆录撰稿工作的刘元彦讲，回忆录发表前曾寄给刘文辉故旧征求意见，一时议论纷纷，都认为刘文辉不必把川南、西康苛政写得那么真切，“给自己脸上抹黑”。但刘文辉力排众议，坚持秉笔直书。这固然反映了刘文辉的坦率，但刘文辉如此举动，又何尝不是间接地为五哥刘文彩分担罪责！可惜回忆录影响有限，仅仅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份现代史资料，没有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也不可能稍稍改善刘氏家族的处境。但刘文辉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此后他只能忍耐。

久经磨炼的刘文辉，城府极深，心中纵有万丈波澜，表面上仍看不出一丝涟漪。晚年的他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他压抑着，独自承受着命运。但也有压抑不住的时候。刘元恺回忆：

有一年刘元华（刘文彩二儿子——引者注）到北京去。我父亲看到他进去，我长这么大我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看到刘元华他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他已经动不得了，在那儿坐到，他就喊我给他手帕，我就把手帕拿给他揩眼泪。他心头就痛，觉得因为他把这些娃娃（拖累了）。父亲说不清楚，当时“四人帮”在台上，好多话根本说不出来。如果他在的话，现在这些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刘文辉也就始终耿耿于怀。刘元琮自杀后，他再没回过安仁，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任上没回去，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任上，与安仁近在咫尺仍没有回去；在林业部部长任上还是没有回去。他不是不想回去看看，他不是忘了家乡水，家乡人，他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有家不能归，落叶无法归根，这对一个传统文化情结很重、乡情很重的老人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折磨啊！刘氏家族的悲剧，主角似乎是刘文彩，其实不然。大戏开演时，刘文彩早已作古，盛与衰，荣与辱，于他又有何干！再怎么锋利的箭矢，于他又有何伤！真正受难的，其实只是生者！

刘文辉于1976年6月24日因癌症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死复何言，刘文辉心中的伤痛，是永远无法平复了。

云散云合，沧海桑田。但庄园陈列馆还矗立在那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矗立在那里——只不过名号有了变更，不再叫“地主庄园陈列馆”而叫作“刘氏庄园陈列馆”。大戏并没有因为名号的更替而拉上帷幕。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帷幕才会真正落下呢？

后　记

本人竭尽全力试图揭示的刘文彩事件，仍然远不能说是全部真相。揭示其他一些真相，不是作者力所能及，至少不是现在力所能及的。为此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惭愧。但愿能够尽量早一天补救。

本书在采访中，曾得到刘泽高、刘有江、王寿堂、彭学鑫及刘氏庄园陈列馆资料室杨政等诸位先生的帮助。承蒙刘氏庄园陈列馆热情接待并开放庄园档案。《今古传奇》杂志舒少华、冯知明也为采访提供了方便。这些都是作者应该深致谢意的。

刘氏家族后裔订正了部分史实。遗憾的是，曾经接受作者采访的刘元瑄老人已于前年不幸病逝，无法读到曾为他所期盼的这本小书了。但本书终于能够面世，九泉有知，相信刘元瑄老人会释怀的。

作　者

1998 年 6 月 18 日于蜗室之中

主要参考书目

1. 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民党第二十四军起义及改造亲历记》。《成都文史资料》1989年第1辑。

2.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著：《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乔诚、杨续云著：《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文辉著：《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5. 彭迪先、舒国藩等主编：《刘文辉史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王纯五编著：《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

7. 周东浩著：《地主庄园沧桑录》，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

8. 吴金钟等：《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9. 四川大学历史系、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编著：《刘文彩罪恶的一生》。1978年印行。

10. 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编：《地主庄园陈列馆》，1963年印行。

11.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编：《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序馆内容介绍》。

12.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人民出版社合编：《批林批孔资料：孔老二·林彪·刘文彩》，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13. 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编：《血海深仇收租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14. 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中学、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中学桃李基金会编：《血泥鸿爪——安仁中学师生诗词、散文选》，1995 年印行。

15. 大邑县安仁中学桃李基金会编：《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中学校友通讯录》，1995 年印行。

16. 《大邑县文史资料选辑》，1995 年第 1 辑。

17. 马子华著：《卢汉后半生》，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18. 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革命造反联络站编：《革命师生来馆造反大字报汇编》，1966 年 12 月 10 日。

19. 《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0. 《帮会奇观》，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

21. 尹家民：《战胜者的姿态——记陈赓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见《人物》1994 年第 4 期。

22. 中共大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1989 年印行。

23. 中共大邑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1994 年印行。

24. 赵锡骅著：《民盟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